THE ROAD

「大路」
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著 —— 張贊波

在中國，並非條條大路通羅馬。

另闢蹊徑，何偉（Peter Hessler）
《尋路中國》的「高速公路版」！
絕對現實，絕對魔幻，充滿濃厚底層氣息的寫真文本！

沈可尚 台灣記錄片導演　齊柏林《看見台灣》導演、空中攝影師
—— 感動推薦

The Roa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ROAD

「大路」
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著——張贊波

在中國，並非條條大路通羅馬。

另闢蹊徑，何偉（Peter Hessler）
《尋路中國》的「高速公路版」！
絕對現實，絕對魔幻，充滿濃厚底層氣息的寫真文本！

The Road

沈可尚 台灣記錄片導演　齊柏林《看見台灣》導演、空中攝影師
——感動推薦

在紀錄片拍攝的現場，我常有攝影機後的人是藉由拍攝他人以映照自己，像在照鏡子般的出神時刻。我喜歡這些時刻，往往一離開攝影機就趕緊把這些所思所想轉成文字，雕塑如何繼續用攝影機書寫下去的方向感。幾年，幾部片下來，這些載滿當下的自我探索，變成一疊疊本子，再怎麼說，也要陪著下葬般地被珍惜著。我猜每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也都有那樣一疊疊不會公開、也不會離棄的本子，那樣磚磚瓦瓦築起自己究竟是誰的堡壘。

張贊波的文字卻顛覆了我對那疊本子的想像。它在攝影機前後的映照關係外，拉出一個揉合時間、感性與深究的體裁，屬於可以完全獨立閱讀的文學象限。載滿作者的關照、作者的生活與作者的宇宙。比紀錄片更紀錄片，觀者藉此可以得到比看紀錄片更大的自由。

那將是一條我們去同理國家在高速發展下，底層人民必將面臨失衡境遇這個悲傷的題目時，可以更由衷、更深刻體會的大路。

—沈可尚

（台灣紀錄片導演，其《築巢人》獲得多項大獎。）

《大路》紀錄著中國高速公路不斷被拓展延長的光鮮璀璨，也訴說著開山闢路的泥濘艱辛。它證明了中國發展的堅強意志，也對淪陷於工程之中的自然環境與歷史建築感到深深隱憂。

張贊波聚焦於中國高速發展下被國家機器犧牲的個體尊嚴。他是一位極佳的影像說書人，擁有紀錄片導演的細膩之眼，在這本「中國公路紀錄片」中，忠實記錄著這條失速的軌跡。他的文字中潛藏著強大的原生動力，展露出最深厚的人文關懷。而在台灣的我們，是否也看到了相似的隱憂？

齊柏林

（空中攝影師、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看見台灣》導演）

第一章

中夥鋪

我想拍部「公路片」

每次，我在行走途中，都會與一條條或寬廣或狹窄、或平坦或顛簸的公路相遇，並最終被它們運向遠方，抑或運回故土。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誠然，道路消弭了空間的阻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成了商品和景觀的交換，增添了生活的品質、速率、廣度和深度。這是道路所饋贈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不認為這就是一條道路的全部。就像在一條看似波瀾不驚的河流底層，既會有各種魚蝦和水草的生長，也會有暗流和漩渦的存在，在一條道路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看不見、想不到、陌生而未知的東西存在和生長著。同樣是在旅途中，坐在各種交通工具上，我也時不時與一些正在修建中的道路迎面相遇。它們或者置身窮鄉僻壤，或者靠近繁華都市，卻不約而同地展現了一條道路未加修飾的雛形：骯髒，雜亂，破碎，無序，原始，封閉……放眼望去，滿目泥土，遍地廢墟，一片塵埃；灰頭土臉的民工們正彎腰在上面敲敲打打；挖土機或壓路機在旁邊轟隆不息地作業。如果是夜晚，一盞掛在高處的高功率燈泡會像明亮耀眼的太陽一樣，照耀著這片白花花的工地，照耀著水泥灌地，塵埃升起，汗水滲出；將黑暗驅散的同時，又製造出新的人影幢幢。這樣的「人造風景」起先對於一位行走者和旁觀者來說，完全是一道獨特而陌生的景觀。這些建造道路的人，他們是誰？來自哪裡？又將隨著道路的延伸去往何方？這些道路，又是由誰掌控著它們生長的週期、軌道和方向？究竟連接著哪些此地和彼地？又會經過誰家的院落和墳塚？……這些問題，對於與它們匆匆擦肩而過的我們，始終是一個謎。

但並非所有人都想要一個謎底。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工地景觀大量繁衍，頻繁出現，與它相遇的人慢慢對此見怪不怪；再加之，巨大的生存壓力催促著每個人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自生活的軌道上，無

暇旁顧；因此既不會停下來對他人的生活進行想像與凝視，更談不上對它的意義加以思考和探究。而我，這個有著大把無聊時光的行走者、記錄者，願意花上幾年時光去見證一條道路的從無到有、開天闢地，去紀錄這些和道路有關的人生之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總之，在完成我的處女作《天降》[1]後，我想再拍一部紀錄片，講述一些人和一條公路的故事，我覺得它將成為一部名符其實的中國式「公路片」。

這個決定還跟我的朋友們有關。早在我的少年時代，和我一塊長大的好友斌和就子承父業，在高中輟學後成了一名修路工人──他的父親是公路局的一名老職工。在和我的頻繁通信中，他描繪了他置身其中那嶄新且艱苦的生活。時隔多年，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用幽默的文字向我講述上個世紀九○年代他在湖南雙峰縣內一個叫做「青樹坪」的鄉下工地生活──那時他在當地修建一條省級公路：

《築路》這篇課文，初中彷彿念過，如今才是真正人生裡的「築路」了。彷彿當年知識青年大串聯、大插隊，我單位幾十號人全都駐在這裡，男女同事，浩浩蕩蕩。這是一個蚊類群居的地方，早晨上簡易廁所，共五個坑連通在一起，中間無遮羞的隔斷牆。那地方黑壓壓潛伏著上千隻「斷臍螟」，嚇得我不敢解褲帶。更有甚者，大便掉坑中叮噹有聲，可與鄰廁女同胞之「便聲」同鳴。或偶爾急甚，卻五坑皆蹲著有人，各叼一煙，談笑風生，很有氣度。而我不敢加入，只有每每找幽靜僻遠之處，回歸自然了……住房磚質，有窗（不如說牆上一個一平方米的孔），釘了綠紗窗，卻有農田中見光而來的「火螞蟲」，進出自由，卻偏只進不出。一個晚上下來，火螞蟲掉得屍骨遍地，足有一釐米厚，蔚為奇觀！……每晚，與同事各提一桶，奔赴井邊，引吭高歌，匆匆忙忙，洗完身膚。之後，天黑下來，黑蚊子轟然之聲蓋過法國「幻影F1型戰鬥機」，所以只有縮守蚊帳的份了。我常拿著別人家包鞋子的廢報紙，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工作是管一台柴油機，一台攪拌機；一個是轟隆隆之物，一個是龐龐然之物。機械修理，加水加油，很單調的生活。有對講機一台，價三千元，我們常用來互相罵娘和聊天。甚至每晚當電台廣播，輪番做主持人……（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

就在那條蚊蟲出沒、生活單調卻苦中作樂的道路上，斌和為此獻出了整整三年寶貴的青春—「青樹坪」這三個字也在我們往來通信的信封地址欄上出現了整整三年。三年後他又輾轉去了好幾條別的道路，從一名普通的道路施工員逐漸成長為一位工程項目的管理者，後來又親身經歷了路橋公司「改制」[2]和「下崗轉型」[3]等這個時代暗藏的陣痛。他的少年以後的人生，完全可以分拆開來對應一條條道路的名字：其中既有普通的公路，也有高等級公路，當然，還有一條條高速公路。道路的形式各不相同，遭遇的世事也紛繁複雜，但五味雜陳的人生況味估計大同小異。

我的另一位高中時的好友阿二，高中畢業後去了北方當兵，在退伍返鄉後，也輾轉進入了道路工程行業。但他用了一種截然不同於斌和的草根路徑，他走的是上層路線。據說他和省交通廳的高層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此他的「轉包」[4]事業做得風生水起。

總之，我對「道路」這個詞彙的初步認識，一半源於自己的判斷，一半來自朋友們傳遞給我的資訊和啟迪。然而，我對道路如何生長和壯大並無切身體驗，我幻想著當我帶上攝像機去往現場的那天，潛伏在內心且蠢蠢欲動的感受和思索，將和朋友們的經歷發生一種奇妙的呼應。最終，我選擇了一條正在家鄉湖南修建的高速公路作為我的具體拍攝對象。

截至二〇〇八年年底，中國的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數超過了六萬公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一張宏偉的國家高速公路規劃網正在緊鑼密鼓地編織，這張路網計劃把中國人口超過二十萬的城市和所有鐵路、民航、水路交通樞紐、重要對外口岸連接起來，強力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份來自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報導寫道：

在國家的支援下，我國高速公路建設加速延伸，年增長幅度之大在世界公路建設史上罕見：一九九八年末達到八千七百三十三公里，居世界第六；一九九九年十月，突破了一萬公里，躍居世界第四；二〇〇〇年末，達到一點六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三；二〇〇一年末，達到一點九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二；二〇〇四年八月底突破了三萬公里，比世界第三的加拿大多出近一倍。

中國官方對這樣的數據和排名充滿著難以掩飾的自豪。甚至，連普通的中國民眾也對此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在著名的「天涯」網路論壇裡，有個帖子起著非常醒目的標題：

世界高速公路擁有量排名，中國是印度的三百七十一倍，英國不及陝西省的里程。

這個善用對比法的帖子，很快引起了網民們極大的關注和討論。大部分人都激情洋溢，表達對自己國家高速公路建設的驕傲：

大國崛起！

偉大的中國日新月異。

二○○○ 年以來，這個星球上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最突出、最輝煌的是中國。

這就是共產黨的好處， 如果是自由資本主義，窮地方根本不可能修那麼多路，因為不賺錢，回本慢。私人企業不會做這些虧本投資的。

英國人還不瘋了，中國一個面積比它小、人口比它少的西部落後省份的高速公路都比它多。

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網民還紛紛跟帖，舉例自己家鄉裡高速公路的發展成績：

河南省是中國高速公路里程最長、最密集的省。

河北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突破五千公里。

四川今天成德南高速、巴南高速通車剛突破四千三百公里。

浙江的高速里程由一百四十五公里到三千三百多公里用了十五年時間。

當然，也有極少數不合流的人，在狂熱的留言中說著不合時宜的「風涼話」：

高速公路收費站的數量能否說下先？

中國的高速公路收費貴得要命，為什麼不比比不收費高速路的里程

呢？

中國是堵車里程最長的國家嗎？

但這些風涼話很快就淹沒在群起而攻之的唾棄裡。無論如何，中國正在發生巨變，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高速公路中的「高速」一詞，完全可以用來形容這個「日新月異」的中國。二○○九年秋，中國政府剛剛實施「四萬億計劃」，藉以帶動內需刺激經濟，包括公路建設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佔有相當重要的投資比例。「中國速度」、「中國奇跡」再一次為世界所矚目——雖然這個計劃可能引發的後遺症也備受詬病。

在我的家鄉湖南，這個經濟並不太發達的中國中部省份，也有大量資金潮水般湧入公路建設行業，高速公路建設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好像專為配合我的「公路片」拍攝而及時進行的豪華置景。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均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我在一張《湖南省「五縱七橫」高速公路網規劃示意圖》中驚訝地看到，湖湘大地上各種道路縱橫交錯，織就了一張巨大而炫目的「蜘蛛網」。我知道，那些在現今藍圖中還只是一條條蛛絲般的細線，很快就會在現實中爭分奪秒、摧枯拉朽地生長，最終穿山越嶺、跨河架橋，變成一條條連接村莊和城市的通衢大道。沒有誰能阻止它們的形成和壯大。

路上的風景

二○一○年三月份，春雨霏霏中，我來到了湖南，懷著無比複雜的心情，向我的拍攝地中夥鋪村挺進。這個寂寂無名的小村鎮位於湖南省西部城市懷化市的東北角，坐落在標號為S223的省道旁邊，距離懷化市中心僅約四十公里。出了懷化市，如果不出意外，大概一個小時後就能抵達目的地。這裡，是溆懷高速公路（溆浦至懷化）第十四合同段項目部的所在地。溆懷高速，是湖南省二○一○年開工建設的十四條高速公路之一，這條四車道的標準高速公路全長九十一點七八公里，總投資八十一點八億元。從開工到通車預計在兩年內完成。

在高速公路修通之前，通往中夥鋪村只能走省道。這條省道是我見過最為破爛、骯髒卻異常繁忙的道路之一。路面狹窄，一路上都坑坑窪

窪，下雨的時候泥濘不堪，晴天又灰塵彌漫。無論晴雨，道路上都散落著各種來路不明的生活垃圾和工業垃圾：便當盒，農藥瓶子，速食麵包裝袋，廢輪胎，碎玻璃，廢報紙，礦泉水瓶，甚至一把傘骨斷裂的舊雨傘或一隻盛滿泥水的舊鞋子……路旁的樹枝上掛著大小各一的廢棄塑膠袋，在風中此起彼伏地噗噗作響，像一面面獵獵飄揚的旗幟。樹木的葉子永遠裹在一層泥土中，而失去了它的本來顏色，讓人不免疑心那些樹只是塑膠做成的假樹。

坐著汽車從這樣顛簸不堪的路面經過，與其說是在坐車，還不如說是坐在一艘汪洋中的航船上。一路上我不斷看見重型卡車，它們原本有著醒目的橘紅色外表，但現在幾乎全蒙上了一層塵土而變得暗淡無光。甚至連車身上懸掛著的車牌都隱匿在塵土中而變得模糊不清。它們一輛接一輛飛揚跋扈地呼嘯而過，笨頭笨腦地從車廂裡灑下一地溢出的貨物，多半是超載的散裝水泥、碎石、沙子、渣土……還有煤炭。

這正是中國省道上的常見一幕。你可以看到這些超載大卡車的車身兩側，都刷著大大的「寧停三分，不搶一秒」的警示語，但實際上它們是最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車輛，超載、搶道、超車樣樣精通。不但是導致路面急遽受損的罪魁禍首，也是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我在這條路上看到過好幾起車禍，幾乎都跟這個橘紅色的「馬路殺手」有關。它們要麼將一輛迎面駛來的倒楣小汽車撞得稀巴爛，面目全非地躺在道路中央，漆黑的煤炭和鮮紅的血跡傾灑一地；要麼就兀自側翻橫躺在狹窄的道路中間，造成令人絕望的延綿幾公里的堵車。在接下來的這個夏天，我坐著一輛空調大客車進城，就被堵在這條道路上幾個小時，前後左右全是熄火的各色車輛，骯髒的道路成了一個巨大停車場。審時度勢的司機們為了避免汽油耗盡後拋錨荒野，及時關掉了空調。封閉式車廂裡悶熱得能讓人窒息，乘客們不得不下車，站在炙熱的道路旁無望地等待。最後我徹底捨棄了這輛紋絲不動的大客車，頂著毒辣辣的夏日陽光，在車輛的夾縫裡艱難而狼狽地步行數公里，終於走出堵車的行列，最後花高價攔了一輛運營的摩托車才得以重新進城—此時的我已是汗濕全身，變成了一隻幾乎要在烈日下昏厥的落湯雞。

如同在中國的其它城市或鄉鎮所看到的景象，你會在道路的兩邊看見各種各樣的廣告、標語和口號。最司空見慣的當屬商業和政治兩類—商

業往往是房產、電信或其它商品廣告，政治類就是一些五花八門的政策宣傳或警告語。在城市和靠近城市的近郊，它們多半出現在橫空而起的巨大T型看板上，或在橫跨馬路的長長橫幅上。而到了遠離城市的鄉下，這些口號往往出現在路旁農家的整堵牆壁上，用白色的塗料或鮮豔的顏料直接刷上，讓人在一閃而過的車上驚鴻一瞥也會觸目驚心：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一人結扎，全家光荣！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在一座廢棄礦山旁的建築物上，一條標語也讓我驚愕不已：

当你走进矿山工作，希你放弃个人自由！

當然，也有些標語溫情脈脈，甚至深情款款：

一事一议政策好，党的恩情忘不了

儘管我並不清楚這個自詡為好的「一事一議」政策究竟是什麼，但這點似乎並不重要，因為，後半截才是重點。前一句只是引出後一句的無關痛癢的鋪墊。這樣的口號無疑深得中國傳統相聲中「捧逗」技巧的真傳。還有一些標語也體現了中國咬文嚼字的光輝傳統：

心系群众魚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
行端好比松傲雪，贪念犹似蚁決堤

這兩條標語都在宣揚黨的工作作風，前一條針對親民路線，後一條針對反腐倡廉，均熟練地運用了比喻且對仗工整。這彷彿在提示我們，儘管杜甫、李白所處的中國詩歌黃金年代已經遠去，但黨的幹部們卻依然有著一顆舞文弄墨、附庸風雅之心——沒錯，這樣的口號多半是宣傳幹部坐在辦公室裡絞盡腦汁所撰寫而成。某些時候，有些標語散發著意外的幽默之光，令人忍俊不禁。

福馨陵园，你人生的后花园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违者法办！

我實在無法想像，政府將如何「法辦」一位已經觸電而死之人。此外還有：

中央取消农业税，盘古开天头一回

這句標語從意思上理解應該本是讚頌，但因為突兀地扯上了「盤古開天」的典故，而顯得像是一句令人莞爾的諷刺。最讓我覺得困惑的一句標語出現在一個小村落邊，醒目的七塊大牌子並排立在馬路一側的山頭上，每個牌子上都寫著一個字，連起來讀就是：

洪 源 农 林 跟 党 走

「洪源」究竟是這個小村莊的名字還是一個開發公司的名字不得而知。這句冒頭冒腦的標語讀起來總讓人覺得哪裡不對勁。細究起來，這句話表意不完整，「跟黨走」應該只是前提而不是結果，如果再接上類似「搞好農林為人民」這樣的話──儘管仍屬陳詞濫調、毫無新意──至少表意更為完整，邏輯上也通順不少。如果像現在這樣，只將「跟黨走」作為一個大張旗鼓宣揚的結果──像舊時代的中國曾經歷的那樣，就難免不讓令人覺得突兀而浮想聯翩。

就這樣，我一邊欣賞道路兩旁這些風格迥異而深具中國特色的口號、標語和廣告，一邊不知不覺地打發掉了在糟糕的路上行駛的難熬時光。車輛一路前行，駛入群山之間，山上種植著鬱鬱蔥蔥的油茶樹──如趕上春冬季節，白色的油茶花盛開，漫山遍野將馥郁清香，如雲似雪。這時，窗外出現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

欢迎进入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县湖南辰溪县

大約十分鐘後，汽車便駛入「中夥鋪」村。我下了車，環顧眼前這個陌生的村莊──這個我接下來將駐紮三年多的地方，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好友斌和在少年時的信件中反復描述的「青樹坪」。二十年前，他也剛

好在那裡待了整整三年。但我從來沒有到過那個叫「青樹坪」的地方，關於二十年前的「青樹坪」和二十年後的「中夥鋪」之間的同與不同，我除了回憶和想像，依舊無從得知。

一個古老的村莊

中夥鋪雖然是個普通的行政村，但從外在的「繁榮度」看，它跟一個鎮沒有什麼區別。因為省道從村中穿越而過，村莊自然而然形成了集鎮的形態。沿街兩邊逐漸匯集了不少商鋪，有汽修店、飯店、旅館、超市、診所、五金店、美髮店等，大多都是本地村民利用自家民宅所經營，掛著雜亂招牌，空間狹窄，裝潢簡陋，設施陳舊，但基本上能滿足人們的食衣住行等需求。村裡還有一家有著十多台電腦的小網吧。我曾經為了收發郵件進去上過幾次網，裡面燈光昏暗，人氣冷清，陳設裝有老式輸入法的舊電腦和髒兮兮的破椅子，網速慢得像蝸牛。最醒目的，是「國家」在這個小村鎮具體而微的存在。這裡有一個「中國石化」的加油站—儘管只有五台加油機，其中還有兩台是柴油機，但幾乎佔用了半個足球場大的場地，氣派的大頂棚側身刷著鮮豔的大紅底色，上面印有「中國石化，SINOPEC」的字樣。另外，還有「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郵政」等國企大鱷都在這裡設有經營點。相比於村民們自家經營的寒磣小商鋪，這些擁有洋氣雙語LOGO的「國家隊」，無論是場地還是招牌都要豪華很多，它們佔據了中夥鋪村最好的幾個商業路段，碩大的玻璃門被擦得鋥亮，門口往往還懸掛著各種針對鄉村市場的廣告牌或橫幅。

中国移动手机卡，一边耕田一边打
出门不用带现金，绿卡在手我放心
联通手机信号好，地上地下全覆盖

即使大白天，這些店面通常也會燈火通明，櫃檯後的服務員一律穿著筆挺制服，臉上帶著親切和優越感參半的微笑，還有立在牆角的飲水機給顧客提供免費飲水……這些細節，無不引起前來辦理業務的當地村民的豔羨目光。

中夥鋪村還有一個農貿市場，位於馬路旁一片占地不少的空地上，有著石棉瓦蓋的大屋頂和水泥砌成的貨品台。每逢陰曆帶三和八的日子，集市就會開市，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就來到這裡趕集。各種商品應有盡有：肉類、水產、蔬菜、水果、服裝及各種日用品，價格都很便宜。市場裡人來人往，人聲鼎沸。因為市場裡的攤位滿了，來晚了的攤販甚至將攤子擺到了外面馬路一側。

你很難不被攤位上擺放著的各種土產當季蔬菜和水果所吸引，它們新鮮欲滴，彷彿剛從地裡或樹上採摘下來，散發著濃濃的大地氣息。有一次我就被一個老婆婆自產自銷的干豇豆所吸引，那是她親手種植並風乾，整整潔潔地用粽葉捆綁，有著好看的暗黃色調，看起來就像一件民間手工藝品。我當即買了下來，將它帶回去和排骨一塊蒸著吃，非常美味，有著城市裡的大篷蔬菜不可比擬的鮮味。在春天時，我還買過幾顆汁液飽滿的本地大石榴帶回去送給我的女友。還有一次，我在農貿市場裡跟拍一個工地民工買菜的過程，他先是買了一大塊豬肉，幾棵萵筍，一把空心菜，還有一大把尖椒，然後，又來到一個鞋攤上花了二十元買了一雙軍鞋……這時，鏡頭後的我的購物慾望被激發了，我忍不住放下攝影機，也給自己買了一雙短幫套鞋，內裡有著保暖的絨毛，穿在腳上非常暖和與舒適—湖南的春天寒冷而多雨，我正用得著它。

中夥鋪是個不大不小的村子。不到兩百戶人家，人口約八百條人—在這裡，你會聽到他們稱呼「一個人」為「一條人」，「八百條人」即為八百個人，聽起來儼然有「老子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般的豪爽。但如同中國大多數的農村現狀，中夥鋪的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兒童居多，年輕勞力大多都去了廣東、長沙等發達地區打工，平時在村莊裡很難見到幾「條」年輕人。

這個村的人均耕地面積約為六擔—同樣，他們計量田地的面積也與別處不同，用「擔」而不用「畝」。 六擔即為一畝。也許源自當時一畝田地大概能產六擔穀子之意。今古風猶存，仍保存這種叫法。除了水稻種植，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是油茶。正如我在來中夥鋪的路上看到的那塊牌子所稱，辰溪縣是「全國油茶生產發展示範縣」，現有油茶林二十四點三萬畝，年產茶油七千五百噸。但在中夥鋪，雖然山上生長著不少油茶樹，但連一家茶油生產廠也沒有，大多都是家庭式作坊生產，生產和銷售都沒有產業化。以前村莊轄區內還有煤礦，但現在地底下的煤炭資源基本被開採殆盡。

自古以來，位居湘西的懷化是中原通往大西南的必經之道，中夥鋪境內很早就有連接北京與昆明的古驛道經過。古驛道也是當時的「官道」。光從「中夥鋪」這個名字就能看出，這是一個道路上的古老村莊。「鋪」在古代是交通機構，相當於現在的「養路段」，負責官道的維修養護，偶爾用以接待途經此地的上級官員。比「鋪」略高一級的機構為「驛」，即古代的驛站。古有「六十里一驛，三十里一鋪」一說。在懷化，叫「鋪」和「驛」的地名非常普遍，有金錢鋪、白泥鋪、太平鋪、馬底驛、三里驛等。距中夥鋪十五公里左右，還有個地方叫「山塘驛」──也是一個交通要道。

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林則徐被皇帝任命為主考官，從京城去昆明主持雲南鄉試，就曾經此官道路過了辰溪縣的山塘驛和中夥鋪，並留宿在中夥鋪的古留雲寺，留有「晚宿山塘驛」、「過中和鋪，憩留雲寺」等文字。這段經歷在《林則徐集．日記》中均有詳細記載。

「中和鋪」即現今的中夥鋪。一九四九年新舊政權更替後改為現名。對於這段歷史，中夥鋪的大多數人都不甚明瞭。相比於「過中和鋪」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林則徐經過沅陵的典故卻廣為人知。沅陵距中夥鋪幾十里，現在是懷化市下屬的一個縣。清代叫「辰州府」。林則徐在那裡留下了「一縣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為君清」的名聯──如今，這副膾炙人口的對聯成了沅陵縣政府用來推廣自己的一張鍍金名片。但這兩段經歷其實均屬同一趟旅途，而時間上只相差四、五天，且同樣被記載於《林則徐集．日記》中。

除了林則徐外，還有聞一多、沈從文等多位近現代史上的名人均曾路經此地。抗戰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嶽麓山下組成了長沙臨時大學，開學一個月後，日軍沿長江一線步步緊逼，危及衡山湘水，師生們便於一九三八年二月遷入雲南成立西南聯大。當時，包括聞一多、曾昭倫在內的多位教育界精英均加入了「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徒步至昆明，步行三千六百里，所走的正是途徑此地的古驛道。因為老家就在距中夥鋪不遠的鳳凰縣，沈從文的足跡更是多次灑落此地，對此其著作中多有涉及。他曾寫到三人抬舉的「三丁拐」轎子，便是為了對付這種狹窄驛道而設計。

這條當時僅寬一米多的青石板古驛道，後來被民國年間修建的湘黔

公路所取代，只在一些荒郊野嶺間還殘存著段落遺跡。再後來，因為開展新農村建設進行「村村通公路」計畫，全都被破壞殆盡，原路拓寬成了水泥路面。唯一留存至今的遺跡，可能就是在中夥鋪境內的一座古驛道橋，名為「龍門溪橋」，橋頭石壁留有摩岩石刻名。此橋最初建於康熙年間，後遇洪水坍塌，今存古橋為乾隆五十年間重建，是一座石頭壘砌的三拱橋，做工非常精良，至今堅實牢固。

湘黔公路最早建於民國時期。一九三五年，因抗日戰爭需要，國民政府要求四個月內完成從桃源至貴陽的築路任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湘黔公路工程處設在沅陵縣城，由沅陵籍人士張敘丞任主任秘書，他在時間短、任務重、經費少的情況下，將桃源至貴陽全線劃為十三段(湘境六段，黔境七段)，每段派一名監修人，一名工程師，採取「計酬承包，分段負責，各盡其能，全線齊上」的措施，分別承包到縣。當時，國民政府將修建該項公路視為「中心任務」，兩省公路沿線各縣，共組織三萬多民工，日夜施工，工程進展極快。後因經費不足，沅陵至貴陽段多數只築修簡易路面，溪河也只架設便橋。全線於當年八月二十七日通車，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敘丞在組織施工中，晝夜沿途督察，處理各種問題，因而積勞成疾，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病逝。國民政府為他在鳳凰山修建墓地並舉行公葬，蔣介石、何應欽、陳立夫等一干政府首腦署名悼念，墓地的碑柱上刻聯：「葬名山長眠絕頂；創偉業乃踞高峰。」為了紀念，國民政府還特意將沅陵汽車站命名為「敘丞站」，後廢棄。[5]文革時張敘丞墓葬也遭毀壞，只留下殘損墓碑一塊。

湘黔公路的修建為抗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就因為得益於這條道路所帶來的交通便捷，著名的盟軍機場—芷江機場，就建在湘黔公路沿線小縣芷江，那裡同屬懷化市所轄，距中夥鋪僅約一百公里。它是中國空軍基地和第一所美式航空學校的所在地。當然，更為人所知的，它也是美國將軍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之飛行基地，在抗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經過湘西會戰—日軍對中國戰場的最後一場進攻戰的洗禮，芷江也迎來了日軍的投降，見證了抗戰的勝利。當年，修建芷江機場時，國民政府徵調了芷江周邊十一個縣的一萬九千名民工，其中也包括不少辰溪人。離抗戰勝利不過短短幾年，這條被國民政府修建用來驅逐日寇的湘黔公路，在一九四九年「迎來」了另一個敵人—比外敵更加強悍的內敵共產黨。此時，國共兩黨的內戰進入尾聲，共產黨的兵力向南方步步緊逼，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國民黨南京政府，終於在四月的一天被渡江

而來的「人民解放軍」一舉攻克。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處西南前哨的山區省份貴州仍被國民黨軍隊佔據，於是共產黨命令它的王牌軍隊──「第二野戰軍」，擔負進軍西南攻克貴州的任務。當時，他們進入貴州所經路線就是這條著名的湘黔公路。沿著十四年前張敘丞犧牲生命修築的這條穿山越嶺的道路，沿著飛虎隊員無數次從空中俯瞰過的這條硝雲彈雨的道路，這支共產黨軍隊將戰火從湖南西部一路燃到貴州，最終勝利攻克貴陽，為他們最終奪取政權奠定了基礎。一條見證了昔日輝煌勝利的光榮之路，最終卻成了一條成全敵人斷送自己的毀滅之路。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之弔詭讓人唏噓。

　　時間進入上世紀六○年代，共產政權已經徹底取代國民政府，並掌控中國大陸十餘年，趁著「大躍進」的幹勁，他們決定對老湘黔公路進行大規模的重修。和當時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大煉鋼鐵、大辦養雞場和養豬場等瘋狂行為一樣，這一行動也被賦予了「超英趕美」的宏大政治意義，是極具夢幻色彩的共產國家藍圖的一部分。無數餓著肚子卻照樣群情激昂的勞力，像螞蟻一般匯集到這條道路上，幾乎用最原始的勞作方法對其進行了拓寬改道。道路兩旁的不少古跡也被順勢當做資產階級的遺毒而剷除，包括古留雲寺的墓塔。再後來，於湖南境內的這一段湘黔公路又歷經幾次修復改建，被重新命名為S223省道。

除了湘黔公路經過中夥鋪村，還有一條鐵路也從村後的的山嶺間穿過。這條鐵路也以「湘黔」二字命名，是連接湖南和貴州的重要幹線鐵路，歷經國民政府和共產政府兩代政權的修建，於上個世紀七○年代初建成通車。據當地人回憶，通車那天村民們萬人空巷去往鐵路旁的山頭上圍觀。隨著一陣撕心裂肺的嘶鳴，只見一列蜿蜒如龍的火車從山洞裡鑽出，鼻孔裡還冒著濃煙，吭哧吭哧地朝著北方的群山呼嘯而去。所有村民都被初次所見的這個鋼鐵怪物驚得目瞪口呆！

　　在湘黔鐵路修通之前，當地還有原始森林，裡面長著不少參天大樹，老虎、野豬和麂子等野物生活其中。因為交通原因，它們在大煉鋼鐵的時代裡倖免於難。但鐵路修通後，很快就被砍伐殆盡，一是為了給鐵路讓路，在修建鐵路時被砍掉了不少；二是有了鐵路後，昔日養在深閨無人識的木材立刻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一車一車的林木被這個鋼鐵怪物飛快地拖往急需木頭資源的外地城市。

現在，中夥鋪的山嶺上，除了茂密的灌木叢和一些低齡的油茶樹、杉木、竹子等常見樹種外，古老的樹木很難見到蹤影。但我注意到有些山坡上連綿著大片鬱鬱蔥蔥、由同一樹種組成的樹林。高大的樹幹一律挺拔直聳，樹冠卻較小，樹葉有著別緻的藍綠色。這種樹林看起來長勢驚人得好，比其他樹木明顯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裡也不落葉。當地有村民告訴我，這種樹叫桉樹，是附近的造紙廠承包當地的山地所種下，特意用來造紙。這種樹的生長週期很快，三到四年便能成熟派上用途。但村民同時憂心忡忡地說，這是一種「霸王樹」，對土壤的肥料和水分需求極大。凡種植了桉樹的土壤，土地肥力和水分就會下降乃至枯竭，其它植物種類也因此受到嚴重破壞，極易導致水土流失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

除了陸路，中夥鋪還有一條水路和外界貫通。一條叫龍門溪的河流，從村中蜿蜒而過，將村莊分為南北兩岸，然後相繼穿過省道和古驛道橋向東流去。這裡是龍門溪的上游，流往沅江，匯入洞庭。早個幾十年，循著此水還能去往洪江、常德、漢口等繁華商業碼頭—在過去，河流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道路。往昔辰溪的煤基本上就靠這條水路運出—辰溪歷來盛產煤礦，沈從文寫過一篇《辰溪的煤》，文章中寫道：

湘西有名的煤田在辰溪。……沿河兩岸常有百十隻運煤船停泊，上下洪江與常德碼頭間無時不有若干黑臉黑手腳漢子，把大塊黑煤運送到船上，向船艙中拋去。若到一個取煤的斜井邊去，就可見到無數同樣黑臉黑手腳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圍一片破布，頭上戴一盞小燈，向那個儼若地獄的黑井爬進爬出。礦坑隨時可以坍陷或被水灌入，坍了，淹了，這些到地獄討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

字裡行間，能看得出沈從文對民間疾苦的關懷和體察，及蘊含其間的悲憫和良善。寫煤是假，寫人才是真。

我到達中夥鋪時，這條河流早已不能通航，因為早些年河道裡紛紛建起了水電站。距古驛道橋百米遠處就有一座。河流被一道水壩攔腰截斷，骯髒的水面上漂浮著一些暗黑的泡沫和垃圾，早已失去了當初的清澈和活力。早幾年河裡還有野生的娃娃魚，現在也早已絕了蹤影。附近

的煤礦倒是還有不少，只是早改水運為陸運。一輛輛重型卡車拖著煤渣從村莊裡日夜不停地經過，村頭還有一個由辰溪縣礦產資源局設立的「煤炭資源稅費徵收稽查站」，經常有許多輛煤車排著隊停在那等待檢查。當地村民的前輩中很多曾是船家，專事水路運輸，會唱很多船歌號子，但隨著河流的斷航，老人們也紛紛過世，所唱號子均已散佚。

現在，專事修路的外地人又一次紛紛湧往這裡，為的是給當地再增加一種新的交通方式──高速公路。

從古驛道、水路、公路到鐵路，再到高速公路，時代的步伐永不停歇地匆匆向前，一定有什麼東西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一定有什麼東西任世事蹉跎而亙古不變。

項目部

我走進中夥鋪村口的一座裝飾嶄新的小院，這裡便是溆懷高速公路第十四合同段項目部。它緊挨著省道，由兩棟租來的三層民居改建而成。一棟用來辦公，另一棟用來當員工宿舍。通往項目部的院子要經過兩扇大門，門口分別掛著一副對聯，第一副準確地刻畫了「築路人」的職業特點，同時也流露出中國人面對大自然的豪氣干雲、野心十足：

削平山岭修大道，跨越江河架宏桥

讀起來頗有幾分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所寫詩詞的氣勢，讓人不由聯想起他在「高峽出平湖，當驚世界殊」的詩句裡所描繪之「人定勝天」的現代化圖景。相比之下，後一副對聯的語言要樸實許多，但其中的政治意蘊一點都沒減弱，它藉用了毛之後的其他中共領導人慣用的政治術語和句式，展現了一個基層建設機構在現階段的工作目標：

与时俱进，树娄底路桥形象；开拓创新，铸溆怀高速精品

婁底路橋，指的是承建溆懷高速公路第十四合同段的公司。這家建設公司通過中標，獲得了修建整個高速公路中一段道路的機會──和張敘丞修建湘黔公路時採用的「分段負責制」一樣，這條高速公路也被分成

二十段由不同單位承建。第十四合同段承建的這段道路穿越中夥鋪和周圍其它幾個村莊，長四點五六公里，中標造價高達二點二七億元。兩年前，婁底路橋公司還是家擁有數億資產的大型國營公司，但被迫改制，被一家叫鵬泰的民營房地產公司以三千萬元收購。而這筆交易之所以能達成，而價格又是如此之低，據說是鵬泰和當地市政府的關係良好，才拿到「這塊肥肉」。

這家公司不僅把自己的名字鑲嵌在對聯裡，還醒目地在項目部的辦公樓頂上豎起公司標誌，遠遠一看，「婁底路橋」四個金屬大字赫然在目。項目部的外觀也洋溢著中國式建築工地的風格，正面牆壁上懸掛著二行巨大的紅色立體字：

尊重业主，服从监理；精心组织，科学管理

這似乎是針對管理者的工作規範，而另一棟宿舍樓上也以同樣形式懸掛著一句口號，似乎是針對工地工人而言：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团结拼搏，务实求新

如果你站在省道上放眼打量這棟宿舍樓，窗口下掛著「預防」兩字的這間屋子就是我的棲身之處：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子，位於宿舍樓的最頂層，窗口正對著馬路。我一直認為這樣的安排一定隱含某種神祕意義：一間窗口下掛著大大的「預防」兩字的屋子裡住進了一位隱姓埋名的獨立導演……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一部引人入勝的黑色電影開頭？

但隨著這部電影的序幕拉開，在獲得劇情之前，得先忍受一片噪音。因為窗底下就是大馬路，白天車流不息，各種車輛摩肩擦踵地經過，車流聲，喇叭聲，剎車聲，甚至車載音響裡傳來的流行歌曲聲……此起彼伏，經久不息。其中尤以重型卡車和各種大型機械車最為囂張，尚在一公里外，我便能聽到它們的雷霆萬鈞，它們聲勢浩大地經過我的窗下，像一支耀武揚威的部隊般，呼嘯而去。即便到了深夜，我將窗子緊閉，也難得安寧。儘管車流較白天有明顯減弱，但仍時不時有夜間趕路的大貨車經過，不斷劃破夜晚的寧靜。剛住進這間房子後，我幾乎每晚都失眠，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彷彿睡在一輛正行駛在顛簸山路上的臥

鋪車裡。為了對付失眠的煎熬，我開始玩起自己獨創的「猜車型」遊戲—我的耳朵像個聲波接收器般，接收著黑夜裡傳來的車聲，然後將資訊迅捷地傳給大腦，大腦再緊張地運用既往經驗，外加一點想像力，算計出這是一輛什麼車：重型卡車，皮卡，小汽車，或者摩托……在得出結果的同時，我腦海裡還會放電影似地浮現出它的準確形象——一輛八成新的紅色力帆牌摩托頂著夜色風馳電掣而來，在雪亮前燈的漫射下，能依稀看清車手是個染著黃色頭髮的鄉村少年，後座上還坐著一個緊摟著他腰肢正睡意沉沉的少女。他們也許剛從附近打工的城市裡返鄉……這樣，我慢慢地被自己虛構和想像出來的情節所拖累，最終只得向這些令人煩憂的噪音投降，逃避進自己的夢鄉。

習慣了噪音之後，你還得習慣同吃、同住、同工作的集體生活。四、五十號人擠在一個逼仄的空間裡，呈現出熱鬧過頭的景象。我剛來項目部時，一點都不習慣。老實說，我生性自由散漫，已經多年沒有集體生活的體驗，最近的一次，還是在十多年前讀大學時。我和同學們住在一棟老式的宿舍樓裡，有著長長的公共走廊，每間宿舍裡都擺放著五張上下鋪的鐵架子床，十個人生活其中。此外，大家還共用著那種九○年代簡陋的公共大食堂、公共澡堂，及骯髒的公共廁所。到了項目部，我的這種久遠集體記憶很快就被重新啟動。項目部有著固定的作息安排，每天起床、用餐及出工都嚴格按夏冬兩季的作息時間表進行。一天的工作時間為九個小時，每月可累計休假兩天。

項目部剛成立的前幾個月，並沒有考勤制度，但是有一天，老李—他的頭銜是綜合辦公室主任—突然買來一台電子指紋考勤儀裝在辦公室的牆上，規定所有員工必須在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時間內分別錄入右手食指的指紋。如果有缺勤，就會被紀錄在案，然後在月底扣發工資。因此每到上班時間，綜合辦公室就會響起此起彼伏的打卡聲。隨著滴的一聲，一個嬌滴滴的女聲會從考勤儀裡傳出：

您的指紋已錄入，謝謝！

這種先進的打卡考勤制度引起了員工的抱怨。他們認為這樣的制度運用到一個相對管理鬆散的工程施工團，在業內極為罕見。而在婁底路

橋的歷史上，更屬頭一遭。

「我在這家公司工作這麼多年了，從來沒有打過卡！」一位年紀稍大的施工員說。

「這麼苛刻地管理我們，太不合理了，那他們怎麼不在工地上裝個監控器隨時監視我們呢？」一位年輕的測量員說。

員工們不約而同將這種苛刻的制度歸咎於頂頭的私人老闆──鵬泰集團。在他們心目中，自從國營的婁底路橋被私營企業鵬泰集團收購後，他們的鐵飯碗就等於被砸了，集體歸屬感也頓時失落無存，感覺自己成了後娘生的孩子──沒人疼了。當初，這樁收購幾乎遭到了職工們的一致反對，甚至引發了上街抗議遊行，但很快被大力促成收購的政府給鎮壓了下去。現在，無論是中層還是底層員工，大多都覺得自己不過是替毛氏集團──鵬泰的老闆姓毛──打工而已，留在這裡只是討口飯吃，卻還要時不時受到老闆的苛待。項目部的最高職務為項目經理。十四標的項目經理姓佘，是婁底路橋的老職工，年齡卻不到四十歲，有著較為豐富的路橋施工和管理經驗，公關能力也極強，但實際上，他也只是給毛氏集團打工而已。真正的「一把手」是掛名為黨書記的毛總，他是鵬泰集團的股東，也是毛氏家族中的一員。一般來說，黨書記在工程項目部只是一個虛職，但毛總卻是特例，他掌握關鍵的人事大權和財務大權，人員的調用、資金的支出都必須經他審批。辦公室牆上貼的一張組織機構關係圖中，卻並沒有他的存在。他就像是個神祕的「影子角色」。

在項目部裡，資方和勞方的對立看似並不嚴重，但暗流湧動，無處不在。這些時不時湧起的抱怨就是證明。我甚至由此預感到未來有一天，這股暗流將衝破平衡的堤壩，激蕩起一點小小的麻煩。果然，後來發生的一件事，驗證了我的預感。

二○一二年上半年，鵬泰集團突然宣佈，公司將對屬下各項目部實施一種新的目標考核制度，考核內容涉及品質管理、進度管理、成本及效益管理、安全管理、財務管理等方面。簡單來說，這項明確而繁瑣的考核規則相比之前的老規矩，對職工們的管理更嚴了，甚至有些條款將很容易導致職工利益的受損──用職工們的話來說，如果說公司改制使他們的鐵飯碗變成了木飯碗，那麼這個制度的實施將使木飯碗變成瓷飯碗。項目部內對此一片怨聲載道──遠勝過針對上一次的刷指紋考勤制度。

「這個制度只是他們毛氏集團一廂情願弄起來的，完全沒有尊重我們職工的意見，光從程序上來講也不合理。」有一天晚上，項目經理的專職司機王榮突然表達了他的不滿。「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應該團結起來，一起去向總公司反應意見，這樣就可以維護大家的權益。」

王司機將近四十歲，屬於改制前的婁底路橋的「老職工」，單位改制後被迫下崗。先後從事過各種營生，開過汽修廠、停車場、蔬菜店、服裝廠和KTV，還做過洗煤生意和堅果生意，但幾乎沒賺到什麼錢，如今欠了一身的債，所以才來到工地上給項目經理開車。王司機屬於職工中見識和觀念都較為不錯的人，平時也和我交好，經常喜歡和我聊點國內外的時事話題。此刻，他正激烈地向同宿舍的室友—測量員小梁闡述這個制度的不合理。

「沒用的，沒有誰敢站出來，都是一盤散沙、得過且過的人。」小梁看似沒那麼樂觀。

「你太武斷了，沒去瞭解怎麼知道別人不願意？」王司機貌似並沒有受到小梁的悲觀情緒影響，「不需要很多人呼應，有五個人站出來就夠了。只要找上五個人，我保證帶頭去找毛總說！」

「要是你王哥帶頭，那肯定就算上我一個，反正我不怕。」小梁說。他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平時比較信任年長的王司機。「那不就有兩個了嘛，再找上三個人，就齊了！」王司機興奮起來，「你覺得還有誰比較可靠？也敢站出來？」

小梁想了一下，「愷夫子？」他們說的是實驗室主任周凱，他資質老，專業能力強，為人處世也比較厚道。

「對，我也覺得他比較合適！他不是毛的人，我們現在就去測探他一下。」王司機說到這裡，表情嚴肅地對小梁說，「這事要做的話，必須謹慎，絕不能走漏風聲。」

「還有你，千萬不能跟其他人去說這個事。這個項目部裡有他們太多的內線。」王司機扭過頭來，表情嚴肅地警告我。他所說的「內線」和「毛的人」，指的是「毛氏集團」的「勢力」—不少職工和施工隊都與毛氏家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人們戲稱這些人為毛氏的「嫡系部隊」。他們不但在包括分工在內的利益分配時能得到額外關照，而且即使在犯錯時也能得到相對寬恕的處理。

在我保證守密後，他們倆允許我拿著攝像機拍攝，躊躇滿志地來到愷夫子的宿舍。如他們所願，愷夫子果然也表達了不滿。

「那我們打算去找毛總反映意見，你跟不跟我們一起？」王司機興奮地說。

「行啊，你們去我就去。」愷夫子不急不躁地說。

「那可是你說的，我們再找幾個人，一塊去說。這樣才有效果。」王司機說，「到時一定要團結，千萬不能有任何退縮，更不能被他們瓦解了！」

王司機擔心的「瓦解」並不是杞人憂天。婁底路橋所管的另一個項目部—幾百公里外的婁新高速項目部去年也發生了一起職工「鬧事」事件—也是針對資方制定的某項制度，在一位劉姓職工的策動下，職工們紛紛找公司論理，甚至還開始罷工。後來卻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一開始，這位姓劉的鬧得很凶，後來突然就不說話了。」王司機說，「他被公司領導收買了，工資後來突然漲到了年薪十萬。」

「那其他人的工資漲了沒有？」我問。

「哪有？門都沒有，就是漲了他一個，明顯就是招安他嘛。他漲工資的事情還是好久之後有人無意中知道的，要不還蒙在鼓裡呢。在我們這裡，每個人的工資都只有自己知道，別人的都不公佈，說是祕密。」王司機有點氣憤地說，「這就是暗箱操作嘛！」

我問王司機，「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以告訴我你的工資是多少嗎？」

「當然不介意，我的月工資是三千六百元。但目標考核後，這個數字很有可能會縮水，因為如果目標沒完成，工資就會被扣掉一部分。」王司機悻悻地說。

「那佘總的工資呢？」我問。佘總是項目經理，屬於項目部的最高行政領導人，王司機就是給他開車的。

「那就不知道囉。」王司機無奈地攤了攤手，「有關崗位薪酬的文件裡規定，項目經理的月工資是六千到八千元，但顯然遠不止這一點。」

沒過多久，躊躇滿志「密謀起事」的王司機卻不見了蹤影，只有小梁獨自在宿舍裡玩電子遊戲。我問他王司機去了哪裡，他說跟著佘總出去了。我再問他「五人計畫」如何了。他頭也不抬、不置可否地說：「那就不知道了，就看王哥唄。」再次碰到王司機是幾天後，他從外地出車回來。我發現他不再提起任何有關目標考核的話題，似乎早已忘了之前熱衷的「五人計畫」。彷彿我之前看到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想像—這

只是一次並不存在的臆想中的「起義」。猶豫再三之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追問起他這件事的進展。

王司機停頓了一下，看著我，「你知道，在中國，要搞革命是不可能的。」他聳了聳肩，苦笑了一下，走遠了。看來，這次臆想中的「起義」終於塵埃落定。儘管我並不知道，從王司機當初的激情滿懷到如今的苦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從此我再沒有追問過他。

之後的日子裡，項目部裡儘管時不時還會蕩漾出一點抱怨，但大體上一直風平浪靜。每天，辦公室的指紋考勤機仍在有條不紊地響個不停：

您的指紋已錄入，謝謝！

做為一個天性散漫之人，我完全理解他們針對考勤制度的抱怨。憑我有限的上班經歷，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奇怪的考勤機。有一次，在辦公室，我終於忍不住好奇，將自己的食指放在考勤儀的辨識面板上，卻只聽見裡面傳來一聲：

對不起，請重按手指。

我重複著剛才的動作，考勤儀還是發出相同的提示音。

「你這樣做是沒用的，因為我沒有錄入你的指紋。」老李冷冷地說。大部分時間，他的臉上都有一種類似的淡定。

老李以前並不屬於婁底路橋的職工，他之前從事的是電器銷售，但自從婁底路橋改制之後，他在《婁底日報》工作的哥哥成為股東之一，因此他在哥哥的提挈下轉行來到了項目部。他除了管理項目部的時間，還負責管理項目部工作人員的腸胃。

項目部設有一個小食堂，裡面擺放著四張簡易的圓形木質餐桌，各自圍著一圈塑膠凳子，一桌一般坐十個人。職工們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十塊錢。一日三餐，早餐是米粉或麵條，偶爾是饅頭和稀飯；中晚餐均為米飯，三菜一湯、兩葷兩素。小食堂的對面，是一個只有一張圓桌的包間，裝飾良好，還裝了空調，專門用來接待上面來的領導。項目部三天兩頭就會有各級領導過來檢查或進行其它工作，如果趕上了飯點，

老李就會給他們「加餐」。通常有十來個菜，少不了當地的土雞活魚。我剛到項目部時，項目經理佘總喊我去陪監理處來的領導吃飯，菜做得比小食堂精緻很多，還有酒水和果盤伺候。按中國人的習慣，因為要喝酒聊天，這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飯局一般要吃上很長時間。

相反的是，每到固定的飯點，食堂外牆上的電鈴就會急促地響起，此時，職工們就會飛奔進食堂，紛紛搶佔最佳位置。跑在最前頭的，是剛從工地回來的饑腸轆轆的施工員。他們會用一隻最大號的碗盛上滿滿的一碗飯，手中的筷子一陣飛舞，盆裡的菜很快就被分夾到各自的飯碗裡。甚至有人直接用舀湯的大勺子將菜舀到自己碗裡。對於這種粗魯行為，員工們稱之為「開挖機」。這是一個非常貼合他們職業形象的比喻。通常情況下，有人會發出噓聲，「喲，你怎麼又開挖機了！」但這種鄙夷所帶來的效用似乎不大，我經常會看到職工們旁若無人地在餐桌上的菜盆裡開動著挖機──這副架勢，讓我想起工地上那些真正的挖機作業的場景：隨著一陣陣轟鳴聲，那些鋼鐵怪物風捲殘雲地將一片片菜地或果林瞬間夷為平地。

在用餐中，如果碰上有雞鴨、排骨和魚之類的菜，骨頭和魚刺會被扔得遍地都是。每到這個時候，等候在桌下的「黑皮」和「悍馬」就會爭相飽餐一頓。牠們是兩條狗，一隻是黑色，一隻是黃色，肩負著看守項目部大院的光榮職責。而它們的頂頭上司是安保部部長楊保國。

安保部全名「安全環保部」，這個部門的主要職能，一如其名，一是負責工地上的日常安全及施工現場的安全防護，二是負責工地的環境維護和形象佈置。形象佈置直接關係到領導們前來視察時能否對你的工作形成好的印象──在注重「面子工程」的中國，這點很重要；所以他在工地上豎立起各種宣傳或警示標牌、橫幅、壁報……花的錢有好幾十萬。「牌子是不銹鋼的牌子，能不貴嗎？」他說，「但這些都是工地的門臉，再省也省不了這筆錢。」

最不被重視的，就是環境維護。這項工作基本上就是聾子頭上的耳朵──擺設。你從掛在項目部院牆上的一塊壁報就可看到這一點。這是項目部剛駐場成立時，楊保國特意從城裡訂制、並親手掛上的。壁報上畫著一雙手捧著一顆藍色的地球，配著醒目的通欄主標題：

提高保護環境意識　愛護我們共有的家園

正文除了登有兩篇介紹「環境保護法」的小豆腐塊資訊文章外，還在醒目的頭條位置刊登了一篇長文：

最近，我讀了《鯨魚的自述》這個故事，從中懂得了我們要保護環境，給動物一個美麗的家園，讓牠們自由成長的道理。小鯨魚居住在大海裡，過著幸福而又快樂的生活。不知什麼時候，小鯨魚看到海面的水變黑了，水裡的空氣也不清新了，牠決定去看個明白。呀！原來是垃圾把海水污染了。當小鯨魚回到海底時，牠的哥哥覺得噁心、頭暈、目眩，媽媽知道了，把牠送往醫院，河豚醫生說：「由於海水的污染，造成了你們鯨魚的呼吸困難，這種病我們是治不了的，只有人類才能拯救你們。」就這樣，鯨魚家族滅亡了。我讀了這篇文章，十分感動，是啊，我們人類再不能破壞環境了，要保護環境，還給動、植物一個美好的生存環境吧……

顯然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既沒有標題，也沒有作者署名──文中的「我」到底是誰不得而知，更沒有注明出處。根據行文風格判斷，它很像小學生的一篇作文，應該是一篇讀後感──但被閱讀的《鯨魚的自述》究竟是一篇文章，還是一本書籍也不甚明瞭。我很納悶它會如此冒頭冒腦地出現在高速公路項目部的一堵宣傳牆上，畢竟駐紮在這裡的不是一支海上作業隊，文中的「大海」和這條鄉壤之上的「道路」也相距遙遠。我想，它八成是楊部長從網路上隨意抄來的。甚至，我在瞭解到楊部長曾是一位小學語文老師後，更大膽地推測這很可能是他當初佈置給學生寫的一篇習作。如今，他利用職務之便將它挪移到了自己的新崗位上，其實是在暗暗懷戀往昔時光。

我敢保證，在整個項目部，並沒有人會去完完整整讀完壁報上這些突兀、空洞而囉嗦的文字，儘管他們每天都要在這塊牌子前出出進進。這樣的牌子純粹只有裝飾功能而無實用價值，就跟會議室裡擺放的幾盆假花、院子前插著的一排彩旗一樣。「環保」這兩個字對於工地上的人來說，顯得非常空洞和遙遠。不但遙遠的「鯨魚家族」的命運絲毫打動不了他們，即使是對他們置身其中的環境，他們多半也無動於衷。幾乎所有的民工工棚周圍，都是垃圾遍地，臭氣熏天。隨著修路工人的到來，昔日的蒼翠青山間很快就散落著各種各樣的生活廢棄物。有一次，我還親眼見到民工隊將整車的生活垃圾偷偷填埋在大橋下的土方之中。

而項目部的管理者們，也沒有更環保，他們經常從車窗往公路上、田野裡隨手拋撒垃圾；不管有人沒人，客廳裡的燈、電視機甚至空調都是二十四小時開著。

有次我半夜醒來，聽到客廳裡傳來瘋狂的電視購物聲：

只要二百九十九元，只要二百九十九元你也能擁有……

我起身打開門，客廳裡空無一人，空氣中的煙霧還沒有散盡，木地板上菸蒂遍地，桌上堆積如山的瓜子皮、花生殼和啤酒瓶。電視上一個妖嬈做作的女人正舉著一台山寨手機在歇斯底里吼叫……我關了電視機，穿過客廳，來到另一頭的公共廁所，在門口照例聞到了一股難聞惡臭。廁所裡污漬遍地，經常會有人忘了沖廁所，有人甚至直接在洗漱池裡小便。良好的生活習慣對於他們來說，總是難於上青天。要這樣的一夥人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去悉心領略鯨魚的困境，顯然是徒勞的。

楊保國雖說是安全環保部的堂堂部長，但整個部門只有他一個人。當然，現在局面略有改觀，可以再加上「黑皮」和「悍馬」—這兩條狗屬於安保部的「編外人員」。黑皮在兩年前來到項目部，當時還是一隻喜歡在人的腳踝邊蹭來蹭去的小黑狗，後來變成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母親」，連續兩胎都產下九隻小狗——一胎九仔的現象即使在狗類也並不多見。

黑皮剛生下九仔時，楊部長高興得眉開眼笑，「九犬一獒，九犬一獒！」他不斷地說著這個典故。其他的人更是在一邊打趣，調侃說要項目部的黨書記毛總請客。毛總在創立鵬泰集團的毛氏九兄弟中排行第三，一職工們背後稱之為「毛三」，同理，稱排行第八的董事長為「毛八」。毛三總得知黑皮產下九仔的喜訊後也很高興，在第一時間去了後院的狗窩旁表示慰問。面對著黑皮和牠的九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當即叮囑辦公室主任老李，一定要精心養護著這九個將給公司帶來福氣的「小福娃」。

但很遺憾，這九個寄予著毛總厚望的萌態可掬的小傢伙，最後都相繼死於非命。有掉進茅坑淹死的、有被馬路上的行車撞死的、也有被項目部自己的車不小心輾死的、還有失蹤的。黑皮的第二次懷孕生子，依

舊如此遭遇，只有「悍馬」倖存了下來。當時牠還有一個同胞兄弟叫「陸虎」—喜歡車的楊部長給牠倆取的名字。但陸虎最後不幸罹難，被馬路上一輛橘紅色大卡車帶走了幼小的生命。不知道大卡車的司機在撞上牠並加速逃離的那一刻，是否會慶幸他所撞的不是一輛真正的陸虎，而只是一隻卑微的小狗？

老實說，項目部並不太適合養狗。這裡人多車雜，喧嘩無序，最重要的，這裡很多人在對待動物的態度上，有著讓人吃驚的粗暴。要他們像那篇壁報文章中所寫的一樣去「還動、植物一個美好的生存環境」，顯然是癡人說夢。虐狗的場景層出不窮。有個剛大學畢業的實習施工員，喜歡將夾文件的鐵夾子夾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腳上，看著牠在辦公室里痛得嗷嗷亂竄，便和著一群圍觀者哈哈大笑。還有人喜歡狠狠地踢桌子底下的黑皮，甚至用大頭皮鞋去踩牠的腳。在冬天，我甚至見到一個施工員拎著幼小的悍馬的脖子，將牠從辦公室門口拋至室外的雪地上，儼然在拋一具沒有生命的物品。看著被摔得暈頭轉向的悍馬從雪地裡一瘸一拐地爬起來，他和另一幫圍觀者發出了興奮喝彩……我忍不住制止他們，但沒有絲毫見效—他們才不在乎我這個外來者說什麼呢，只是繼續他們的遊戲，並從中獲得他們的快樂。這種底層民眾身上隱藏著的不自知的暴戾，讓我不寒而慄。

對暴力的無動於衷，在我所生活的這個底層集體表現得非常突出，事實上，這也是當代中國人的特質，這是一個在革命、戰爭、政治運動中生活了太久的群體，以致冷漠變成了基因。有一次晚飯後，大家聚在院子裡閒聊，話題聊到了局勢正亂的利比亞。讓我吃驚的是，只有極少數人覺得推翻格達費的暴政是合理的，而絕大部分人認為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去干涉他國內政。「他們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這麼幹的，只是為了石油。」有人提出這個觀點，大家群情激奮地紛紛認同，整個局面頓時變成了針對美國的主題批判會。

我本來一直在扮演一個聆聽者的角色，聽到這裡忍不住插了一句話：「可是，不管怎樣，格達費出動皇家直升機衛隊掃射平民是不應該的吧？」

他們怔了一下，轉過頭來看著我。一個年輕的施工員很快就接過了我的話茬。「哪有政權不殺人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而殺人，這

個完全可以理解嘛。」他是老婁底路橋的職工，個子矮小，身材瘦弱，皮膚因為經受太陽的過度照射而變得格外黝黑。他平時舉止斯文，對人彬彬有禮。但也曾義憤填膺地向我講述公司被迫改制後職工的權益如何得不到尊重和保障。此刻，他的話，似乎有悖於他的氣質和經歷。但其他人馬上附和著他的觀點，紛紛七嘴八舌地嚷嚷起來。

「要是你當了皇帝，你的手下要反對你、推翻你，我敢肯定你也會殺人。」

「非常時期採取暴力無可厚非，國將不國了，就應該果斷鎮壓。」

……

我決意放棄和他們繼續辯論，趕緊起身離座，丟盔棄甲地逃回自己的房間。在上樓梯時，我碰到了黑皮。它正躺在樓梯口津津有味地啃著一塊骨頭。我想起今天的晚餐中有紅燒排骨這道菜，腦海中馬上浮現出小食堂裡人聲鼎沸各自饕餮的樣子——儘管大家手上捧著的不再是以前的鐵飯碗了，但每一個人依舊都吃得很香。在那一刻，無論是遙遠的砲火紛飛的利比亞，還是那段令人不太愉快的「改制」記憶，看起來都跟他們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

---

1. 《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拍攝於2008年，完成於2009年，講述北京奧運會前後，湖南一片擁有十六萬人口的地區迎接奧運轉播衛星和委內瑞拉衛星之火箭殘骸的故事。作為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定點火箭殘骸落區，該地域二十年來先後數十次迎接從天而降的「天外來客」。本片第一次以影像方式揭示中國殘骸落區的真相和祕密，呈現被迫為國家航天事業發展做出巨大犧牲的家園圖景和個體命運，從而深刻反思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
2. 又叫「企業改制」，在中國，一般是將原單一所有制的國有、集體企業改為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制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
3. 「下崗」是中國對工人失業的慣常叫法，失業工人叫下崗工人。下崗工人再就業叫「轉型」。
4. 「轉包」是工程行業的行話，指承包人將工程轉讓給第三人，受讓人成為合同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由於轉包容易造成工程品質低下、建設市場混亂，所以中國的法律、行政法規均禁止「轉包」。
5. 上述張敘丞事蹟見《沅陵縣交通志》第十一章人物傳。

第二章

留雲寺

一座讓路的「古寺」

二○一○年的春季某天，我拎著攝像機走進了項目部對面的一座山上。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山，但名叫靈龜峰。山不太高，山腳處金黃的油菜花正在怒放；山腰部分是一大片嶙峋的石頭，淩亂地散落在茂盛的灌木叢裡；山頂則有一片低矮的柑橘林和一大片杉木林沿著山脊鋪展，遠遠地望去，像是這座山留了一個莫西干頭。正是施工的前期階段，一些民工在山坡上修建便道，運輸材料，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施工做準備。

我剛走上山頂，就聽到了不遠處的樹林一側鼓樂齊鳴，間或有鞭炮響起。我好奇地循聲而往，原來有一座寺廟像是正在舉行法事。它簡陋而古樸，山門上掛著「留雲寺」的匾額，院落裡面分為天王廟、彌勒殿和大雄寶殿等三座主體建築，側面則是齋堂和廂房。大雄寶殿最為氣派，裡面擺放著三座彩塑大佛像，正中間的是慈悲的釋迦摩尼。寶殿裡香煙繚繞，僧人一邊敲打著法器，一邊念經，許多村民模樣的人正在菩薩面前虔誠地跪拜，大多是一些老人。原來今天是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的生日。當我拿出攝像機拍攝時，村民們大多好奇地看著我，還有人朝我指指點點，竊竊私語，但我幾乎全聽不明白他們講的本地方言。一位中年人突然出現在鏡頭前，他友好地笑了笑，問道：「請問你是哪個電視台的？」他姓唐名軍民，看起來四十出頭，有著寬厚的臉膛，穿著一件米白色格子休閒西服，氣質斯文儒雅。他不但講普通話，最讓人吃驚的，他還用了「請問」──這在此地鄉下實屬罕見。而這也符合他的身份，辰溪縣一中的語文老師。

「我不是電視台的，我是來拍攝高速公路建設的，聽到這裡很熱鬧，就過來看看。」我趕緊停下拍攝。我也沒忘對他友好地笑了笑。

「哦，拍高速公路的啊，我們這座廟就因為高速公路要拆遷了，這是最後一次在這裡舉行法事。」

他轉過身去，指著大雄寶殿背後的峽谷。「你看，高速公路將從那邊修過來，穿過留雲寺，向南而去。那座山谷上將建起一座大橋，而橋頭—」他停頓了一下，「就是這裡，寺廟的一大部分地盤都處於拆遷紅線之內。」我順著他的指向看過去，峽谷兩側是陡峭的山嶺，龍門溪正從山腳下蜿蜒而去，溪畔草木蒼翠，農舍錯落有致。居於河岸一側山巔的這座寺廟，看起來風水似乎不錯。

這座寺廟有一千多年歷史。當唐老師帶著掩飾不住的驕傲告訴我時，我還不相信。因為我眼目所見，無論從建築物、還是菩薩雕像的新舊程度來看，它都不會太老。然而，中國的建築史，某種意義上也是段以木瓦為主的建築不斷焚毀、不斷重建的歷史。

留雲寺始建於唐朝，據說由一位雲遊至此的北少林高僧草創而成。到了清代，寺廟規模空前盛大，還擁有周邊不少田產山林，遍及中夥鋪、肖家溪、虎地等村落。寺後還建有三、四百座高僧墓塔，均為巨石壘築，做工精細，遍佈古驛道兩旁。清嘉慶年間，林則徐從京城出發，去雲南主持鄉試，途經此地。他在日記中留下了「過中和鋪，憩留雲寺」的記載。它挺過了軍閥混戰，挺過了外敵入侵—民國時因為抗戰需要，留雲寺被徵為鄉公所，但廟宇、菩薩和墓塔均完好無損—然而卻未能挺過革命和建設。上世紀六○年代，當老的湘黔公路進行拓寬改道時，大部分墓塔被毀壞。到了文革時，墓塔和菩薩幾乎被銷毀殆盡，僅留下一座空寺，也改為小學學堂。上世紀九○年代，當地教育部門對小學校擴建，將殘存的寺廟建築徹底摧毀，僅留下一具古碑，上面寫著四個字：「回頭是岸」。

「你看，就是那四個字。」唐老師指著大雄寶殿的正牆，牆裡面鑲嵌了一塊石碑，上面是草書「回頭是岸」。「那是乾隆元年當時的辰州府道台—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沅陵縣縣長—陳廷慶親筆書寫的。」

二○○一年，當地的善男信女發動村民重修留雲寺，考慮到要儘量遠離公路，最終決定建在靈龜峰上，而非在原址附近。歷經一年時間，這群善男信女們修建了新的大雄寶殿、天王廟和彌勒殿，並將「回頭是岸」碑重新鑲嵌到正殿牆裡。還僱請當地的泥塑和木雕師傅，重新雕塑了三十六具菩薩。雖然並不能完全恢復古留雲寺盛況，但也算是了卻了一樁心願。

「但沒想到，僅僅八年後，又要修路了！溆懷高速施工方要求我們儘快拆遷完畢！哎──」他充滿感慨地歎了一口氣，說，「留雲寺真是多災多難啊。今天是觀音菩薩生日，所以我就倡議弄個法事，也算是一種紀念吧。」唐老師雖然人在縣城教書，但老家就在中夥鋪，所以這次留雲寺的拆遷重建，當地的父老鄉親託付給他來主持。

「難得他們信任我，但我壓力還是滿大的。俗話說拆廟容易蓋廟難。你們倒好，推土機一過來三兩下就將我的廟給推倒了，但要新建一座廟不容易啊。」唐老師將我當做了高速公路建設方的人，「何況，你們給的賠償標準還這麼低，總共就賠償了四十多萬元，估計要建起新廟來還會有一、二十萬的空缺。」

距離觀音菩薩的生日沒幾天，留雲寺的拆遷開始了，那是在另外一個黃道吉日。湘西一帶，鄉民們普遍對神靈抱有敬畏之心。幾乎家家都供有神像，村村都有廟宇──最常見的是土地廟。所以，對寺廟的拆遷也不能隨便，必須選擇黃道吉日並遵守一些民間規矩。

當我趕到寺廟時，唐老師正召集一夥村民，準備將釋迦摩尼佛像從老廟裡「請」出來。

「神靈棲息之地怎能隨便動？」唐老師說，「不過，我們今天請了粟師傅過來，就沒問題了。」唐老師的身邊，站著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人。他個子矮小，身材消瘦，嘴上留著稀疏的八字鬍，但目光炯炯有神。

「這是我們懷化有名的菩薩木雕師粟師傅，留雲寺裡的好多菩薩都是他給雕的。我們粟師傅是真正的能工巧匠。」唐老師把粟師傅介紹給我。

「哪裡──哪裡──」老人微笑著說，他看著我手裡的攝像機，「你是哪個──電視台──的啊？辰溪的──還是──懷化的？」

「這是小張，從北京來的。他來拍高速公路，順帶拍一下我們留雲寺。」唐老師替我回答。

「哦，還是北京──來的啊，」粟師傅說。他聲音洪亮，抑揚頓挫，且尾音繚繞。口音和腔調都頗像我在文獻紀錄片裡見過的毛澤東說話的方式。

「有需要雕刻──什麼的，儘管──找我──」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佛

像需要雕刻，正在想著這個問題時，他向前一步，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他的一隻腿腳有點殘疾，走起路來一拐一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像我們已經相識許久。

名片正面印著一副彩色的世界地圖，地圖上有兩雙像商人一樣緊緊相握的手。上面寫著：

湖南省会同县祖传神像雕刻名師
粟吉成
手机：138744093**
地址：洪江市黔城镇桥头加油站对面（神像雕刻厂）

名片的背面寫著：

雕刻范围
神像、木刻立体、龙凤
花鸟、平板雕刻、浮雕雕刻、
各种花草、各种鸟类、
各种动物、人物、山水

搬遷菩薩開始了。唐老師先在大雄寶殿前面的空地裡燃起一堆紙錢，而粟師傅站在殿內，一隻手端起一碗水，另一隻手在空中揮舞，手指快速地掐捏著，他半睜半閉著眼睛，對著碗中念念有詞。幾個等著搬菩薩的村民虔誠地站在一旁。

「好了！每人過來喝一口—」粟師傅突然睜開眼睛，雙眼渾圓，眉毛倒豎，大吼一聲。幾個村民趕緊畢恭畢敬地走到他面前，依次接過那碗施了魔咒的神水，仰頭喝上一口。

「請菩薩是—有規—矩的，新建廟宇請進菩薩為『上座』，拆遷廟宇請出菩薩為『下座』。馬—虎不得的。」他突然轉向我的攝像機，向我解釋道。這個小插曲和嚴肅的儀式交織在一起。我在鏡頭裡看到他突然跳出角色，心裡不禁一樂。

待最後一個村民喝完，粟師傅將剩下的水一把灑到三尊大佛腳下，對著室外大吼一聲：「鳴炮—有請—菩—薩—」

鞭炮劈哩啪啦響了起來。村民們有的爬上菩薩底座，有的在地面接

應，他們拿著木棍和繩子，開始用力地搬動菩薩。粟師傅在一旁神采奕奕地指揮著，時不時大聲吆喝兩句。他目光如炬，就像一位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

居於正中間的釋迦摩尼首先被「請」下來，它被紅綢緞團團綁住，然後再被幾根粗長的木棍挑了起來。為了避免對神靈的不恭，粟師傅特意叮囑村民們準備了紅綢緞──多少有點稀釋了「綁住佛祖」的不雅。

七、八個人一起奮力地抬著佛祖，顫顫巍巍地往不遠處的山腰走去──那裡是重建留雲寺的新址，已經用石灰粉畫出粗粗的地基標線，像一塊剛剛翻墾等待播種的菜地。村民們將釋迦摩尼放在一塊空地上，坐北朝南，然後用油布搭起一個簡陋的臨時棚子。沒有門窗，四面通風，只有四根柱子撐起一個薄薄的屋頂──但已足以為佛祖遮雨蔽日。這就是釋迦摩尼的臨時家園，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內，它將孤獨地立在這裡，默默地看著山腳下向東而流的龍門溪，看著對面的山巒一點一點地被推倒，漸漸鑿出一條大路的雛形……直到新寺建成，它才會結束這段寄人籬下的生活。

大雄寶殿裡剩下的菩薩，則被鄉民們抬到了天王殿裡。它有幸不在紅線範圍之內，可以暫時不拆。天王殿小很多，原本是四大天王的居所──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持國天王，他們是佛教中的守護神，手上拿著各種法器，看起來面目猙獰兇狠，但代表良善和正義。他們慷慨地敞開了自己的大門，收留了觀音菩薩、地藏菩薩等一干無家可歸的鄰居，一起分享著這原本逼仄的空間。

這看起來是諸神和諧相處的時刻。在這個非常時期，諸神也為了國家的通衢大道建設而相互理解、共度難關。然而，當你站在天王殿的門口，目睹著這些擁擠在一起的神祇時，也難免心生悲涼，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神祇似乎正在失去祂們原本的尊嚴。

並非所有的菩薩都被「請」走，大雄寶殿裡兩尊已經部分風化的泥菩薩，已經無法搬動，唐老師只得捨棄了它們。這座大殿現在已經空蕩蕩的了。「這些東西一看就沒得靈─性。」粟師傅打量著那兩具可憐的菩薩，他搖了搖頭，慢條斯理地說。

「你看，他們的這些眼睛，就不是活的嘛，蒙著一層灰塵似的，哪有半點光彩和靈性嘛？」他轉向了我，「一看那個做菩薩的師傅手藝就

不行。」

「哦，他們不是你做的嗎？」我問。

「怎麼可能？我怎麼會做出這麼差—的東西？你看我做的那些菩薩神仙，眼睛多麼有神—」粟師傅調轉手指指向自己的眼睛，瞪了瞪眼—眼睛立刻變得炯炯有神，散發出不可抵擋的光芒。我突然想起四大天王。他們的臉型、五官、神態，尤其是倒豎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雙眼。對，祂們的面孔簡直和粟師傅如出一轍。我沒法不懷疑他們是「臨摹」粟師傅的五官雕塑而成的。

這些泥菩薩出自當地一位泥塑師之手。雖然唐老師向粟師傅訂製了一尊全懷化最高的千手觀音雕像，但他希望拿到更多的菩薩訂單。「唐老師，我覺得—你新廟裡還是不要再做泥菩薩了。常言道，泥菩薩—自身都難保嘛，怎麼保佑你們老百姓呀。」他繼續說，「還是木菩薩好。」

唐老師忍不住笑了起來，「那句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這只是一個比喻而已。不是你理解的意思。泥菩薩和木菩薩沒有高下之分。」

粟師傅不再說話，他一邊嘀咕著什麼，一邊走開了。

「他想獨攬工程，所以老說那個師傅做得不好。」唐老師笑著說，「但那樣工作量太大，很可能影響到品質和工期。你是否覺得粟師傅有時候像一個孩子。」他問我。

粟師傅的狡黠和淳樸一體兩面。他確實在很多方面，也表現出孩童般的熱情。我贊同唐老師的觀察，並和他一同走到殿外。粟師傅很快就轉移了新話題，突然熱情地說，「我給你看手相，來，小張。」我來不及拒絕，他就一把抓過去我的手掌，仔細端詳。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也有點殘疾，手掌蜷縮著，不能自然伸開。

「你這個人啊—賺不了什麼大錢，有點小錢，自得其樂。」粟師傅放下我的手掌，慢騰騰地說，「你的性格太直率了，很容易得罪人。」

「你算得還真準，我就經常得罪人。」我笑著說，「而且確實沒錢。」

「對吧。」看到我認同他的「神算」，粟師傅很神氣，「這樣吧，我送你八個字，你要牢—記，對你今後的發展有好—處。」

「哪八個字？」

「韜—光—養—晦—，明—哲—保—身—」粟師傅用他獨有的

「毛主席口音」一字一頓地念出了這八個字，「小伙子──，懂不懂這意思啊？」

「懂的，懂的。」我連忙點頭，差點笑出聲來。

「小伙子，你下次有空去我的雕刻廠玩，帶上你的這個東西，給我拍拍，放到電視上去。」粟師傅湊到我的攝像機前，指著它說──他一點都不懼怕鏡頭，表現欲也很強，顯然是一個不錯的拍攝對象。

「上次懷化市電視台就報導過我。」

「是嗎？他們報導你什麼？」

「當然是報導我手藝高超嘛，我雕的菩薩在湖南都很有名，還遠銷貴州、浙江好多地方呢。」粟師傅驕傲地說。

「不過，他們收了我兩百塊錢，然後才答應給我一張光碟。」粟師傅悻悻地補充說。

「那你放心吧，我不會要你一分錢的。」我答應去拜訪他的菩薩工廠。這個有著毛澤東口音和四大天王面目的菩薩雕刻師，身上一定潛藏著不少等待開掘的故事──雖然我不具備看手相的技能，但揣測他人命運的興趣和熱情也許並不遜於一個占卜師。

一個初夏的早晨，一台橙紅色的挖土機轟隆隆地開到大雄寶殿門口。大雄寶殿和彌勒殿的屋頂已被拆完，只剩下了兩個空架子，裡面東倒西歪著幾個被捨棄的泥塑菩薩，殘眉缺目，斷臂少腿，已經失去了庇佑民眾的法力。就離祂們數步之遙，龍門溪大橋的樁基工程已經在熱火朝天地開工了，靠近留雲寺一側的橋端佈滿了近二十口樁井，用不了多久，它們就會生長成二十條雄偉的橋墩。最近的一口樁井就在大雄寶殿牆角，幾乎赤身裸體的民工正在裡面揮汗如雨。看到拆遷開始，他們停下工作，饒有興趣地過來圍觀。

項目部的老總、副老總、挖機司機依照法師的指示，燒了一堆紙錢，對著廟宇廢墟裡的殘缺菩薩行禮如儀。他們今天的祭拜格外虔誠，請求菩薩的原諒，姿勢和神情完全像個忠實信徒，幾乎讓人忘了他們就是這座廟的破壞者。「古話說，寧拆十座橋，不拆一座廟。」唐老師無奈地說，「而你們倒好，為建一座橋，而拆一座廟。」他的話音剛落，挖土機便加大油門向大雄寶殿沖去，大搖臂轟隆隆地升起。隨著一聲巨響，一堵牆壁被重重推倒在地，迸發出一堆漫天灰塵。圍觀的民工們紛

紛捂著口鼻往後退去。

十分鐘後，曾經香火興旺的留雲寺變成了一片廢墟。幾個泥塑菩薩徹底地變成了一堆塵土，回歸了祂曾經庇佑過的大地。只有「回頭是岸」古碑和「大雄寶殿」的匾額被留了下來，這些東西將被彌足珍貴地重新砌在新寺裡。一座號稱傳承自唐代的千年古寺，反復歷經各種劫難後，到最後也只剩下這幾件屈指可數的老東西，其它一切都是新的，如同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

「神」愛世人

唐老師是個完美主義者，有自己一套固執的美學觀和價值觀，雖然他要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設計出新留雲寺的藍圖，還要將藍圖一一變成現實，包括地基的審批、菩薩的訂製、各種建築材料的選擇、建築師傅的僱請、人工和資金的籌集……事無巨細，但他希望將這座廟建得講究些，「哪怕多花點錢都不要緊。」

他為此專門去了一座燒製「唐磚漢瓦」的磚窯，還到鄰縣邀請到了一位有名的建廟工匠，石師傅泥、瓦、漆、木，各門手藝樣樣精通，附近十里八鄉有好幾座寺廟均出自他手。他答應再為留雲寺出馬一次。

二○一○年陰曆六月份，石師傅帶著徒弟和家人進駐了留雲寺新址，在地基旁搭了一個小窩棚住下──和借住在咫尺外的釋迦摩尼比鄰。他將在這裡住上一年多，新留雲寺將在他的手下從一塊磚頭成長為一座廟宇。

也許，真沒有什麼比一個城裡的語文老師去鄉村建一座廟更不務正業了。唐老師幾乎每天都來報到，比項目部打卡的員工都還認真。他在三十八公里外的辰溪縣城教書，每次在課餘時間，就開著他的「現代車」風塵僕僕地趕過來。我很少聽到唐老師主動談起他的教學，但卻經常聽到他滔滔不絕地說起留雲寺的歷史，還有未來。

「如果新留雲寺建好了，這裡將成為老人們休閒的地方。他們在農閒時間可以來聚集，拜完菩薩後拉拉家常，唱唱山歌，吃吃齋飯，衲衲鞋底，織織毛衣……這些都比打牌和看電視好很多──尤其看電視，那上面的垃圾實在太多了。」唐老師說，「宗教其實沒那麼玄乎，有時候只

是一種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

「可是我們的統治者卻好像很提防宗教，其實完全沒有那個必要嘛。」他接著說。「不說遠的，就說我建這座留雲寺，還要去宗教局登記審查。本來老的留雲寺就登記過了，現在新的還要登記，說不登記就是非法的。」

「登記可能是為了他們更好地管理吧？」我說。

「問題是他們根本沒什麼管理。另外，登記還不是免費的，還要收你的錢。」唐老師憤憤不平地說，「按理說農民建寺廟修菩薩，宗教局應該撥款才對，可他們非但不撥款，還換著法子要收我們的錢。」

「怎麼收錢？」

「各種理由多的是！新廟登記在冊，要收五千塊錢所謂手續費，辦個宗教活動，要一千塊的場所許可證；每年還要交一筆所謂的宗教事務管理費，一年幾百塊錢，可是一年到頭哪有什麼管理？最過分的是，一聽說我們要蓋新廟，宗教局便找上門來，說要從我們的建設資金裡抽取百分之五的傭金，當做管理費。你說我建廟尚有不少資金缺口，為此我正發愁，還要找高速公路指揮部協商呢，哪有錢孝敬他們？」

唐老師所講的「高速公路指揮部」，是政府為了保障高速公路的順利施工而成立的一個臨時性機構，負責組織、協調、調度等工作。指揮部的拆遷補償款僅為四十多萬元，重修一座同等規模的新寺遠遠不夠。「我必須找他們追加款項，」唐老師說，「新地基、新菩薩都要額外花錢。光是粟師傅的千手觀音像，就要六萬八千元。」

夏天到了，此時距唐老師託付給粟師傅雕刻千手觀音已經過去了兩個月，他雖然一直用電話跟蹤進度和品質，但還是有點不太放心，決定親自去看一眼，我正好藉此機會跟著他一路驅車過去。一講到這尊觀音像，唐老師的煩惱頓時有所減輕。「它將用樟木雕刻，高二丈二尺八，可是懷化市最高的千手觀音像。」他的臉上露出了自豪神色，「粟師傅之前也從沒有雕過這麼大的觀音，我希望他將看家本領都給我使出來，雕出一尊傳世之作！」

兩個多小時後，我們趕到粟師傅的雕刻廠所在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黔城。黔城是一座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城，唐代詩人王昌齡被謫貶至此做縣尉時，曾在此地寫出「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千古詩句。到了古城

門口，唐老師的車卻沒有進城，而是朝城外另一條路拐了過去，很快就停在一個緊挨馬路的窩棚前。門前立著一塊牌子，上面刷著不平整的油漆，歪歪斜斜地寫著一行繁體字，一看像粟師傅的手筆：

洪江市黔城神像雕刻工藝廠

與我想像的大相徑庭，粟師傅的「神像廠」出奇的簡陋。窩棚「神像廠」門口就是公路，背後不到十米處則是一條鐵路。如果不是道路牌上寫明了這是一座工廠，我還以為這是在公路和鐵路之間見縫插針搭建起來的一棟違章建築。門口堆放著一堆廢棄木材，低矮的屋頂上，橫七豎八地蒙著幾塊粟師傅廢物利用的噴繪廣告布，像打著不規則的補丁。

粟師傅出來迎接我們，天氣炎熱，他光著膀子，只穿一條西式短褲，消瘦的腰上緊緊地繫著一條黑色皮帶。他熱情地走過來跟我和唐老師一一握手。我不由地想起他名片上那兩隻熱情緊握的手。

窩棚工廠裡暑氣逼人，一片逼仄和淩亂不堪。一扇木板隔開成兩個區域。裡面的一個小房間，沒有窗戶，光線幽暗，擺放著一張床和幾個櫃子，那就是粟師傅的臥室。另一片較大的不規則空間就是「雕塑車間」，地面上堆放著好多木材和幾個未完工的佛像，到處散落著木屑和木花。一名中年男子正光著膀子埋頭在木工檯上，用鉋子打磨著一根木頭，汗珠從他的背上不斷滲出。

粟師傅帶著我們參觀千手觀音像。他翻開牆角的一堆木頭花，裡面露出一個由好多張臉組成的大佛頭像，還沒有打磨上色，露出原木的粗糙質感，但基本上已成型，五官輪廓都已雕好，法相莊嚴，有著飽滿的額頭、嘴唇，及好看的丹鳳眼──要不是親眼所見，我實在想不到，庇佑萬民的觀音菩薩就出生在這麼一個貧寒的窩棚裡，更想不到祂出自面前這位手腳均有殘疾的乾瘦老人之手。

「你覺得怎麼樣？」粟師傅期待地看著唐老師。

「還行，但還得再精加工，要更注重細節，比如說眼睛要再雕活一點。」唐老師說，「要充分發揮你的才華呀粟師傅，不能有所保留。」

「那當然──，我這是初稿，還要經──過好多道工序的。這個你──唐老師你……」

前方馬路上不斷地傳來車輛駛過的呼嘯聲，此時，後面的鐵路上來了一列火車，鏗鏘鏗鏘的聲音就像駛過耳膜一樣，淹沒了「放心」兩個

字。

「看，手也基本上做好了！」粟師傅帶著我們，走到靠鐵路一側的牆壁下，彎腰翻出一堆捆綁在一起的木手，大大小小約有幾十隻。乍一看，像一堆出自恐怖片中的殘肢，令人產生驚恐的聯想。

「只剩下佛身和蓮花寶座沒有做了。」粟師傅說，「不過你放心，不會誤你的事的，你看我都僱了劉師傅來做木工了，就是為了加快進度。」

他朝正在做木工的中年男子呶了呶嘴。沒想到他只是一個臨時僱來的木工，而不是粟師傅的徒弟或職工。看來粟師傅的所謂雕刻廠其實只有他一個人——他既是廠長又是職工，同時還身兼產品推銷員。

粟師傅留我們吃中飯，他從牆角推出一輛摩托車去菜市場買菜。他手腳都有殘疾，但這並不妨礙他騎車，他很麻利地騎上車，突突地朝城裡方向駛遠了。

我走到窩棚外，無意中繞到了那塊寫著「黔城神像雕刻工藝廠」的路牌背後，突然發現了路牌背後，寫著一行標準的印刷體字：

黔城大桥交通管制站由此前行三百米

上面還有一個指示箭頭。無論從色澤還是字體看，這才是標準的路牌。我恍然大悟，原來，「黔城神像雕刻工藝廠」只不過是在搭「交通管制站」的順風車而已。我為粟師傅就地取材、因勢利導的聰明才智感到啞然失笑。

「也只有粟師傅敢做這樣的事了！」唐老師也笑了起來。他告訴我，這個雕像廠是違規搭建的窩棚。本來政府要來清理，但粟師傅拿起一根木棍堵在門口，就沒誰敢動了。

「一來大家考慮到粟師傅是個殘疾人，就照顧他，二來可能大家顧慮他會點法術吧，也不敢輕易得罪他。」唐老師說。我沒想到粟師傅的法力，除了對付妖魔鬼怪外，竟然還能對付政府。

「粟師傅的家本來在鄰縣會同縣，」唐老師說，「他不知怎麼，就拋棄妻子來了黔城，一來就不走了，已經在這裡待了十多年。但經常有不同的女人跟著他，好像時間都不太長，那些女人明顯是圖他的錢。粟師傅會這門手藝，還是滿賺錢的。他比我賺得多。」

我想起了被謫貶至此的王昌齡，不知粟師傅身上是否也有「一片冰

心在玉壺」的故事。

過了一會，粟師傅買菜回來了，摩托車後座上卻多了一個中年農村女人。「你快點做飯，一起五個人哦。」粟師傅下了車，對著那位女人說。女人手腳俐落地拎著菜，走進了車間角落裡的廚房。

「喲，粟師傅找來家庭主婦了。」唐老師開玩笑說。

「女人嘛，就是做飯洗衣服的。」粟師傅豪氣十足地說。

粟師傅出生於神像雕刻世家，因為此地宗教氣氛濃厚，民眾喜好興建廟宇，供奉神靈，所以粟家父輩們活計不斷，較之同村老實巴交的種地農民要滋潤不少。粟師傅從小耳濡目染，但當時還很年幼，父輩們並沒有刻意教他，他只是偶爾找塊廢棄的下腳料，學著大人們的招數雕刻一番。沒過幾年，中共政權上台後，「破四舊」開始，傳統宗教被歸為精神鴉片，村莊裡的神廟們被工作隊紛紛佔領，各種菩薩神像也都被銷毀一空。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祖傳的神像雕刻工藝一下銷聲匿跡，父輩們還來不及將滿身絕技傳給他這一代，就被迫重操種田舊業。剛學點皮毛的年輕粟師傅，只好改弦易張，安心做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聊起這些往事。「那個年代啊，」粟師傅說。「有人家裡的一些家具也刻著菩薩像，比如說櫃子啊，床啊，結果就將菩薩的臉部鑿掉，咋一看那些面目全非的菩薩們顯得很恐怖。」

然而某種意義上，文革也成就了聰明的粟師傅。隨著文革愈演愈烈，局勢又發生了詭異的變化，毛澤東逐漸走上神壇，替代了那些原本的神祇。粟師傅靈機一動，翻出父輩們塵封許久的吃飯家當，順應當時高漲的政治需要，雕了不少毛主席像，一時名聲大噪。直到八○年代改革開放，宗教活動重新被允許後，粟師傅又應時代之需改為雕刻神像。

「我雕的毛主—席像維妙維肖呢，我們那的革—委會主—任都很欣賞我。」粟師傅邊吃飯邊自豪地回憶起他光輝的過去，「我的雕刻技—能—就是在那幾年突飛猛進的。」

「因此，要說師傅的話，毛–主–席–才是我師傅。」因為喝了點酒，粟師傅說得一時興起，手舞足蹈，神采飛揚，「毛主席口音」似乎也更重了。

我在心裡暗暗吃驚。我沒料到粟師傅的雕刻經歷如此充滿傳奇，從雕刻毛主席像到雕刻菩薩像，他憑著堅韌、勤勞和狡黠，亦步亦趨地緊

跟著時代的風雲變幻。

來到中夥鋪後，我在村頭村尾四處溜達時，不斷地與好多村民家裡貼著的毛畫像相遇，它們有半身，也有全身，有單人，也有合影。單人像的背景往往是天安門、延安、西柏坡、遵義、南京長江大橋等革命聖地，或黃河、長江、黃山、草原等自然風光；合影大都是毛與「四大偉人」━馬克思、恩格斯、史達林、列寧，或毛與「十大元帥」，或開國大典、閱兵儀式等。通常上面還附有毛語錄。這些畫作普遍色彩豔麗，筆觸誇張，散發出一種混雜農民畫和波普藝術的獨特氣息，讓人過目難忘。我猜它們八成是出自粟師傅這樣無師自通的「民間藝術家」之手。此外，畫像張貼的位置，以前都是規規矩矩地貼在屋子正中央的神龕上，現在卻是什麼地方都貼：正屋、偏房、廚房、臥室、書房。甚至有一次，我在一戶村民家的廁所，吃驚地發現了一張《毛主席去安源》━腋下夾著一把油紙傘的年輕領袖，正風華正茂地看著我，要不是那天實在急得不行了，我差點就將一泡尿給憋了回去。

唯一能與毛的無處不在相比的是土地廟。村口、大樹下、橋頭、巷尾、屋前、屋後、田間、地頭……到處都能看到這種微型寺廟。它一般用石頭或磚頭砌成，高不過腰，寬不過一隻手臂，像一個四四方方的盒子，供奉著兩尊微型的土地神━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祂們衣著樸實，神態憨厚，看起來就像一對鄰居家的老夫妻。祂們是離中國農民階層最近的神，掌管著和農民最息息相關、賴以生存的土地，庇佑著一個村莊和一片土地的風調雨順、人畜興旺。這點可和走上神壇的毛全然不同━這位中共政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儘管出身於農民，卻是一個永不安分的無神論者，提倡「和天鬥其樂無窮，和地鬥其樂無窮」。雖然我不信仰宗教，但每當我走近這些簡陋粗糙的小土地廟時，都會不由地放慢腳步，心生敬畏。

中夥鋪的街道旁有一家無名小店，只在外牆上寫著「米粉，水餃，快餐，炒菜」的字樣。如果我錯過了項目部食堂的用餐時間，就會來到這裡吃便當。店內的牆上掛著一幅耶穌受難圖，然而圖的兩邊卻掛著中國式的對聯，橫批是「以馬內利」：

敬畏耶稣福杯满溢，效法耶稣喜乐无疆

餐館主人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當地阿姨，非常友善和氣。這家小吃店只有她和女兒兩人，從洗菜、切菜、炒菜和打掃衛生都是這母女倆親自動手。自從我去店裡吃過飯後，哪怕我從十多米遠的馬路上經過這家店，她都會主動跟我打招呼，滿臉樸實的笑。

「您是信基督嗎？」我好奇地問她。

「對的，耶穌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而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神的榮耀。耶穌基督降生後，就成了恩典時代，祂來到世上拯救人類，相信耶穌的人才能得永生。」阿姨一張口就是《聖經》的話語。她看我顯露出了興趣，便放下正在洗的碗碟，走到了我的餐桌對面坐了下來。

「你信基督嗎？」她直視著我，眼中好像有一種找到了同道中人的欣喜。

「沒有，我沒信，我只是好奇，」我實話跟她說。她眼中剛升起的期待瞬間黯淡了下去，我突然感到一陣尷尬。

「但是我對祂有興趣。」為了彌補我過於直率的過錯，我補充說。這句話又重新燃起了她眼中的光芒。

「你可以試著去聽聽神的聲音，耶穌基督將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替人類受苦受難，就為了拯救人類。」她接下來向我講了一通關於基督的典故和教義，但表述不是太俐落，有些生硬和勉強。但這毫不影響她內心的堅定和虔誠。

三年前，鄰村一個親戚引領她信了主。在中夥鋪，信基督的人很少，都是些上了年紀的老姐妹，根本就沒有年輕人信──當然現在也沒什麼年輕人留在家鄉。我問她什麼時候和教友做禮拜，我能否跟她去看看。她一聽立刻變得緊張起來。

「我們基督教平時一般不搞什麼儀式，只有聖誕節和復活節才有活動，也就是聚集在一起，讚美一下神。」她盯著我放在餐桌上的攝像機，明顯在提防著什麼。

隨著我多次在她店裡吃飯，她知道了我只是「來拍高速公路」後，我再跟她聊起信仰的話題，她才消除了戒心。「我們一般都是悄悄地搞儀式，儘量不聲張。」她說，「我們不想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有些人害怕我們聚會。但我不知道他們害怕什麼。我們這是正規的大教，做正當的人，又不做見不得人的壞事，按理應該鼓勵才對。」

「現在這個世界真是罪惡滔天，愚頑的人必說沒有神，他們所行的一切都是邪惡，為了金錢可以去打架、殺人、賭博、嫖娼。」她批判著

種種不當行為，「神教導我們不要殺人和姦淫，神在看著我們，在愛我們，還會給我們悔改的機會。如果我們拒不悔改，就只能下地獄。」

但最後，她突然批評了正在修建的留雲寺。

「花那麼多錢，又建廟堂、又雕菩薩，真是愚蠢。」她的言語裡充滿了不屑，「我們的神引領我們憑的是一種精神，不搞偶像崇拜，我們的神只在這裡。」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透露出一種無以名狀的清高。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從馬路上經過她的店，阿姨正在門廊裡炒菜。油煙繚繞中，她抬起頭來，看見了我，再次露出熟悉而樸實的笑。

我發現，店鋪的正牆上掛起了一塊紅底黃字的大牌子，上面醒目地寫著：

神爱世人饭店

無能為力的神祇

新留雲寺的修建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每天都有十多個村民來協助石師傅蓋房子。經歷一月有餘的勞動，千手觀音殿已見雛形，「回頭是岸」的古碑被重新砌進牆壁。「再過兩個月，這座千手觀音殿就可以上樑了。」唐老師對留雲寺的明天充滿著美好憧憬。與此同時，高速公路的建設也在如火如荼進行，看起來更像一場和時間的賽跑。

中夥鋪人明顯感覺到，他們的村莊已經和過往完全不同了。最近的幾個月，大量外來民工如潮水般湧入中夥鋪，帶著各種各樣的口音出現在街道上、商店裡、集市中。一些民居很快出租一空。空地上堆起了各種各樣的施工工具：鐵鍬，鋼筋，小推車，捲揚機，電動機，空壓機，風砲機……甚至還有幾輛大型挖土機、推土機及重型卡車。村後廢棄的採石場也被高速公路施工方租了下來，並改建為項目部的「攪拌場」。高高的攪拌塔被立了起來，上面刷著醒目的「婁底路橋」四個大字。大門口還掛著一塊讓當地人莫名其妙的牌子：建好漵懷高速向懷化人民致敬。昔日的田間，還出現了紅白藍三色條布搭起的窩棚，到處能看到戴著紅黃色安全帽的外地人，挖土機從田野中間旁若無人地駛過，山谷裡傳來驚天震地的爆破聲和機械噪音……

而老留雲寺舊址，已經變成了熱鬧非凡的工地，來自湖南新化縣的民工隊伍進駐到這裡。他們在遺址上搭起了防雨布窩棚，裡面橫七豎八地擺滿了用木板鋪成的簡易床，剛夠大家摩肩抵足睡下，這就是他們將度過兩年多時間的新家。還有十多人被分到了倖存的天王廟廂房裡，與面容可怕、心地良善的神毗鄰而居，每天一身臭汗、滿面塵土、滿腳泥水地在這些神靈面前進進出出。

這支民工隊負責土石方和涵洞施工，大概有三十多號人。包工頭老陳將近六十歲，身材矮小，長著一副地道的農民臉孔，土裡土氣，和一般穿著洋氣、遊手好閒的包工頭不太一樣。每次我去他的工地，都會看見他和手下的民工們一起在溝渠裡勞作，完全一副民工的樣子，用力地搬運石頭，灰頭土臉，滿身大汗。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他隊伍裡的一位啞巴民工，大概三十來歲，每次看見我去，就會指著我的攝像機哈哈大笑──他的笑和常人不一樣，似乎是直接從胸腔裡發出，爽朗、洪亮，富有節奏和韻律，「哇─哈哈──哇─哈哈──！」但只要我一將攝像機對著他，他就立刻變得嚴肅和緊張起來。臉上的笑容瞬間就消失了，身體僵硬，兩腳並立，畢恭畢敬地站著，面朝我擺出一個老式的拍照姿勢。當我將拍好的影像重播給他看時，他先是面露驚訝，然後很快又發出了爽朗的大笑，「哇─哈哈──哇─哈哈──」。在他笑的時候，周圍的空氣似乎都在共鳴，笑聲在山谷裡傳得很遠──我一時有點感動，我從來沒想到自己的這台破攝像機還能給人帶來這麼純粹而直接的快樂。

但神靈們好像並沒有保佑這些陪伴著他們的新鄰居。先後有兩位民工從腳手架上摔下，造成肋骨骨折。最嚴重的是，老陳僱請的一個村民，他左手的四根手指不幸被空壓機生生截去。老陳為此焦頭爛額，包括醫療費、賠償費在內，這三起事故共支付了他十五萬多塊錢。

「我真是倒楣，辛辛苦苦賣幾年苦力，自己還會虧損幾萬塊錢。」

並非只有老陳的民工隊出現傷害，其它地方也發生了不幸的事。一個民工被鋼筋籠砸斷六根肋骨；一個工程車司機連車帶人從山坡上摔下，車毀人亡；一台架橋的塔吊倒塌了，司機當場斃命……工人們帶著賺錢養家的夢想，背井離鄉來到這裡，除了要將汗水灑在這條道路上，還可能一不留神就付出鮮血甚至生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一條道路的築成都暗含了生命的代價。神靈們對此心知肚明，卻無能為力。

「我以後再也不出去做這樣的活了。」老陳心有餘悸地說。他就坐

在殘存的天王廟廂房裡，抬頭就能看到門外四大天王的身影，神靈的面前還依然供著香爐，只不過香火已熄，爐灰已冷。

我問老陳，有沒有想過要拜一下這些神靈以求平安。他苦笑了一下，搖著頭說，「我不信這個。」

噩耗也發生在本地人身上。在一個人人被裹挾其中的高速發展時代裡，似乎無人可以逃離某種慘痛的命運。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是中夥鋪趕集的日子，慘劇就在這個下午發生：一輛開往工地的運沙車穿過中夥鋪時，因為嚴重超載導致剎車失靈，為了避讓一輛迎面駛來的計程車，卻撞到停在路邊的一輛農用三輪車上，造成本地民眾五死六傷。

車禍發生的第二天，我正好乘車經過事故現場，路邊停了大概二十多輛警車，上百個警察圍著，加上圍觀群眾在內，烏壓壓的一大片人群，幾乎將中夥鋪街道旁的空地堵得水泄不通，途徑車輛只能緩慢開過。

我本能地拿出攝像機，透過車窗拍攝。車禍現場還幾乎保持著原狀，側翻的車輛擺在路邊，已嚴重毀損，河沙傾倒一地。傷心欲絕的死難者家屬在守靈，幾具棺材擺放在路邊，地上還燃燒著幾堆紙錢。看到這樣的場面，攝像機後的我感到一種極端的不真實感。更讓人覺得不真實的，是那些三三兩兩散落在街道邊的警察，他們並沒有想像中警察執行公務時的嚴肅和有序，而是隨意且淩亂地或站或蹲、或倚或靠、或行或跑。有些還抽著菸，嚼著檳榔，互相之間說說笑笑，甚至還有兩個警察一直在路邊開心地嬉戲著，最後兩人勾肩搭背慢悠悠地從我的鏡頭前橫穿馬路，好像兩個正走在放學路上的小朋友一般。他們的歡樂和悠閒幾乎沖淡了死亡所帶來的悲傷和恐怖氣息。

車司機小杜告訴我，死者親屬對善後處理結果不滿──因為肇事者家庭貧困，無力承擔經濟賠償，由政府墊付每一位死難者家屬八萬元善後費。情緒激動的親屬昨晚將棺材擺放在路上，堵住省道，公安局緊急調動大批警力趕往現場疏導，但他們固執地堅守，不肯撤離屍體。

晚上，我想起白天所見的這一幕，幾乎無法入眠。它似乎只是一起偶發的車禍，但我隱隱覺得，在此時此地，它以這樣一種慘烈方式出現時，似乎就無法和這個發展的時代脫離關係了。我又想到了張敘丞，一

九三五年，當他奉抗戰之命殫精竭慮修建這條公路時，他一定想不到這條道路如此遙遠的未來：他想不到被毀掉的古老寺塔，也想不到一輛奔馳在這條路上的運沙車帶走了五條鮮活的生命，他更想不到的是，另一條更寬更快的道路正在群山峻嶺中加速生長，即將替代他曾經冒死修建的舊道路。

我突然決意，要趁著夜色去做一件事。我打著手電筒，獨自一人出了門，外面下起了毛毛小雨，我冒雨步行來到事故現場。比起白天的喧嘩，此時已經安靜了不少，警察們大多撤離，只留下了一小批值班警察守候在馬路對面的警車裡。幾個死難者親屬坐在路邊，為親人守靈，焚燒的紙錢在黑夜裡跳躍出一串串微弱的火苗，彷彿死去的靈魂不捨離去。他們身後幾米外，那輛傾倒的沙石車已變成一堆模糊不清的陰影。

我在幾米遠外站定，靜靜地環視了四周一番，確定並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悄然到來。我輕手輕腳地走到那輛毀損的運沙車旁，拿出一個手提袋，飛速地用手往裡頭扒了差不多滿滿的一袋沙子。這些沙子本來要被送往另一個工地，卻在這裡被無情的命運之手攔截了一下，經過激烈的碰撞和震盪後傾倒在地，嘩啦啦地蓋在了五條輕盈的靈魂之上。我提著袋子，趕緊撤離，一路上我的心都在怦怦地加速跳動，我分明感受到手中袋子的分量：它沉甸甸的，粗糲，綿密，潮濕和冰冷。彷彿那就是死亡殘酷的肌理。

我將沙子晾乾後，送到了項目部的實驗室裡，那裡有一台篩分沙石樣品的電動設備。我沒敢告訴實驗室人員沙子的真實來歷，我怕嚇到了他們──中國人一般都對這種不祥的物件充滿忌諱。很快，我就將那袋沙子篩分為一袋細沙和一袋粗沙。細沙細膩而純正，而粗沙含有各種雜質，顯得粗糲而質樸，兩者都有著同樣的土黃色調，看起來普普通通、平淡無奇。

我用白鐵皮「水泥留樣桶」分別裝下它們，準備帶回北京，在適當的時候，我會用它們做出一件名為《沙漏》的裝置作品：細沙用來填充進玻璃沙漏瓶中，懸掛在展廳中央；粗沙由遠及近灑在參觀者要走過的道路之上。貪戀現代化成果的都市人將踩著這五位來自遙遠鄉村的遇難者的靈魂，看一眼他們的生命像流沙一般悄然流逝的過程。我還覺得，「沙漏」也是一個象徵，它既象徵著這個時代不可阻擋的發展，也象徵著文化、傳統、人心、道德、甚至生命本身，在發展中漸漸逝去。

因為中夥鋪屬於辰溪和中方縣的邊界地帶，五位遇難者分屬中方縣

和辰溪縣。後來我通過多種途徑，一一查到了他們的名字，分別是：

胡秀芳、夏秀香、毛代喜、胡自開、楊永海

還有六位傷者的名字：

盧益娥、滕八妹、張化軍、張金平、黃雨剛、黃澤旭

這份傷亡者名單也將出現在《沙漏》這件作品裡。當然，同樣不能缺少的，是我在車上即興拍到的那一幕充滿不真實感的事故現場：毀損的車輛、傾倒的沙粒、棺材、紙錢、遇難者親屬、警車、警察、圍觀的群眾……他們紛紛在神靈的眼前一閃而過。

俗世、神界與黨

眼看著新留雲寺馬上就要落成，唐老師又像一台機器般加速運轉起來。粟師傅的千手觀音雕像已經運來，端坐在新建的觀音殿裡。粟師傅還要花時間，給菩薩一筆一畫地塑上金身。在依從俗世的處事原則和人際關係外，還得遵循一套來自神界的嚴格禮數，唐老師在這兩方面似乎都做得有條不紊，疏而不漏。這位中學語文老師，現在儼然成了寺廟的半個住持。他前一刻還在和高速公路施工方談判追加賠償款額，後一刻又為如何選購掛在觀音殿簷角的風鈴而細心考量；他昨天還在應付宗教局的糾纏，今天又敲定了菩薩上座的黃道吉日……他在入世和出世間平衡有度，有時候甚至看起來有點八面玲瓏。

只有在一起喝酒時，唐老師才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他骨子裡執拗的文人本性。無疑，他是今日還殘存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對傳統文化珍愛有加，寄情山水，舞文弄墨，風花水月；一方面又憤世嫉俗，悲天憫人，蔑視權貴，針砭時弊。最讓人敬佩的，唐老師並不迂腐，也不是常見的空談主義者，而總能積極躬身世事，以一己之力介入現實。也許是因為幾杯下肚，又或許是因為跟我的關係越來越熟悉了，他說話也越發直率起來，他冷不丁地批評著高速公路建設：

「你們修高速公路，其實對我們老百姓沒什麼好處，我們村連個出

口都沒有，就是從這裡路過而已。好多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過路費又收得很高，但是當官的就是喜歡搞建設，因為那樣既有政績，又能藉機將大部分的錢搞到手。」

他甚至對著攝像機直言不諱地批判起國家來：「現在這個國家一切都是向錢看，為政者只顧自己，底層者麻木不仁，傳統喪失，道德淪喪。如果還不改變的話，現在的所謂盛世就是末路狂歡。」

這樣鋒芒畢露的話語聽得我暗暗驚訝，卻心有戚戚。實話說，唐老師是我來懷化後碰到的唯一一個心氣相投的人。無論在美學觀還是價值觀上，我們都有著不少相似處。

「現在這個世界，我覺得一切都太快了。為什麼要那麼快呢？應該慢一點、再慢一點。」他並沒有看著我，而是把目光投向面前的一棵古樟樹，這使得他看起來像是在自言自語。

「我倒是覺得原來的古驛道很好，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讓人喪失了很多趣味和情調，像古代的林則徐他們經過這裡，就是騎個馬，或坐個轎子，一路慢悠悠的，山山水水的看過去，那樣好悠閒。現代人就不可能了，只要上了車，就身不由己，沒有了過程，只有起點和終點。從人生的意義上來說，這是最大的喪失，就是喪失了整個過程。」

唐老師再次顯露出他獨到的思考力。當整個社會都在追求速度的時候，他卻在宣導一種不合時宜的「慢生活」。這種「逆潮流」的古典價值觀，使他看起來像一個時代的「異類」，但卻讓我為之動容。

他涉獵很廣，尤其在湘西文化的知識上，宛如一本活詞典，各種風土人情，歷史典故，現實境況，他均熟稔於心，隨口而來，出口成章。許多關於中夥鋪及湘西這一帶的歷史，都是他介紹給我的。他曾帶我前往偏僻的鄉間，走一小段倖存至今的古驛道，也熱情地帶我參觀懷化境內的一些古村落、古城鎮。甚至，唐老師還建議我拍攝辰溪籍名人馬公武先生的紀錄片。馬公武的故事，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唐老師查閱史料，搜尋遺跡，尋訪故人，從時光遺留的碎片中拼湊出歷史的真相。

馬先生留學日本七年，在日本士官學校學工兵科三年，在慶英大學學經濟四年。回中國後，在李濟深手下作師長，因與蔣介石不和，參與反蔣的福建事變，被蔣關了四百零八天後返回辰溪老家，棄槍拾筆。一九四四年，他散盡千金，創辦當地有名的楚屏私立學校，從此竭力投身教育，宣導教育救國，還曾利用自己的威望保護過一些地下共產黨人。然而在新舊政權替換後的一九五○年，他連同三十二歲的長子被中共辰

溪政府以「學霸」之名鎮壓處決了，時年五十三歲。其創辦的楚屏私立學校及其家產悉數收歸國有。他的後人也在漫長的政治鬥爭年代，歷經磨難，身世淒涼。

「一個人，哪怕是對國家對民族有功的人，在專制制度下，都難免被冤屈，被小人滅掉。」講到馬公武先生及其後人的這段傳奇人生時，唐老師唏噓不已，悲憤難當。「這不是馬公武一個人的悲劇，更不是某一個集團的悲劇，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劇，這個悲劇還會延續著，如果我們不警醒的話。」

中國底層民間還隱藏著這種耿直而良善的知識分子！我感到暗暗驚奇。而這種心氣相投之感，也很快就衝破了我刻意築就的防線，趁著酒勁，我向唐老師坦承了自己拍攝的真實目的。我告訴他，我正在做的片子，絕非高速公路的宣傳片，而是想記錄下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遷故事，藉此反思它對人的生存境況及道德人心、傳統文化的影響。這是我來懷化後唯一一次向人說起。但唐老師聽了我的交底後，卻並沒有顯得吃驚。

「我就猜到你不會只是給高速公路做一個宣傳片。」他笑了笑。

我也鼓勵唐老師，將他所知所感的各種湘西典故和故事整理成書，書名也許可以叫《消失的湘西》。如能如願，那也算是他送給這個正在消失的家園的一首挽歌吧。他聽了我的建議，卻笑而不語。

二○一一年六月十九日，農曆五月十八，新留雲寺竣工慶典暨菩薩上座開光儀式隆重舉行。當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但還是有無數鄉民冒雨趕來參加這一盛會，將留雲寺堵得水泄不通。唐老師打著雨傘，站在門口迎接大家，寬厚的臉上帶著謙卑的微笑。他的身後是一塊一人多高的石碑，上面鐫刻了他親筆寫的《重修留雲寺碑文》。

粟師傅已經為煥然一新的菩薩舉行了上座儀式—他當場宰殺了一隻公雞，將雞血灑在神祇腳下。這樣的道教或民間儀式明顯和佛教的不殺生教義相違背，但並沒有人指出這點，被塑好了金身的菩薩們也緘口不言。在四面漏風的簡易窩棚裡孤獨地度過了一年時間後，釋迦摩尼佛重新端坐在新落成的廟宇裡，看起來既威嚴又慈愛，接受著村民們虔誠的膜拜。新落成的千手觀音殿最受矚目，大家都來爭相一睹這具整個辰溪縣最大最高的千手觀音之風采，當然沒幾個人知道它出自一個違章而建

的嘈雜而逼仄的窩棚工廠。人潮洶湧，報導新寺落成的當地電視台記者也被擠得踉踉蹌蹌，他儘量站穩腳跟，費勁地將鏡頭對準了「回頭是岸」的古碑。它已經被重新砌進了觀音殿的正牆上。為了慶祝新寺落成，唐老師還請來一個和尚進行祈福儀式，他敲打著木魚等佛教法器，唱誦著經文，大雄寶殿裡香霧繚繞，佛樂聲聲。在廟宇一側的空地上，村民們正圍著欣賞傳統的辰陽高腔、滑稽戲片段及現代的流行歌曲聯唱，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式的混搭場景，佛教與道教、古典與現代、俚俗與流行交織在一起，琳瑯滿目，難解難分。

在觀音殿裡，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千手觀音的蓮花寶座上，正面寫著一行醒目的黑色毛筆行書：

黔城神像雕刻工艺厂　粟吉成 138744093**

顯然，這位有著精明商業頭腦的菩薩雕刻師在適時地推銷自己，而並不管這樣的方式是否有點不合時宜。這樣的「廣而告之」看起來多少也給人一種錯覺，以為這個叫「粟吉成」的人，是觀音菩薩在人間的聯繫人，彷彿信徒們只要撥打這個電話，就可以向神靈一吐衷腸。

高速公路指揮部的孫副指揮長和劉書記帶著兩個隨從來了，經過唐老師多次談判，據理力爭，又爭取到高速公路方的補充款額十多萬元，累計六十萬。既然「澰懷高速」這四個字都寫入了《重修留雲寺碑文》，他們不能不來。一個隨從掏出香火錢準備交給工作人員，當他看見我在一旁拍攝時，馬上轉向鏡頭，微笑著將十張百元大鈔又數了一遍，然後丟進香火箱裡。

孫副指揮長和劉書記朝大雄寶殿走去，在一塊空閒的蒲團前，孫副指揮長正準備跪拜，但一抬頭，他發現我在一旁拍攝，就趕緊朝我走了過來。

「這個不要拍了，你知道的，拍了不好。」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劉書記也叮囑我，「你先關一下機，我們拜完了你再拍。」

他們一定是共產黨員—其實劉書記的稱呼就暴露了這點。共產黨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它的紀律裡嚴禁黨員信仰宗教，且輕蔑地視宗教為「精神的鴉片」。在確定我已關機後，這兩位共產黨幹部才重新回到蒲團前，彎下雙膝，雙手合十，念念有詞，對著面前的三尊大佛頂禮膜拜，臉上露出非常虔誠的神態，看起來和旁邊的村民沒有什麼兩樣。

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會忌諱我拍到他們「吸食精神鴉片」的場景，部長楊保國就是一個例外。他也是一名黨員，今天也受邀前來出席留雲寺的慶典。

將項目部給的五張百元大鈔丟進香火箱後，楊部長說：「我希望留雲寺的菩薩能保佑我們在這裡施工風調雨順，平安無事，保佑我們溆懷高速公路順利修成！」捐過香火後，楊部長還從工作人員手裡要了一張齋飯票。「我想到這裡吃頓齋飯，我是個見佛拜佛，見廟拜廟的人。」他坦然地說。

楊部長看起來很有佛緣，不但五官身材長得很像憨態可掬的彌陀佛，脖子上還掛著一尊金燦燦的觀音像，右手腕上戴著一串大佛珠。對楊部長而言，共產主義和佛教並不衝突，或者說，至少他平衡得很好。而他的辦公桌上，常年擺放著一尊鍍金的財神爺和一尊全身長滿金疙瘩的金蟾蜍。在財神爺和金蟾蜍的旁邊，還懸掛著一張毛澤東畫像。當他打開電腦，屏幕上就會出現一張巨大的美女寫真照。

所以，當楊部長跪倒在新大雄寶殿裡，如同一個標準的佛教徒般虔誠地叩拜時，視我的攝像機和黨的戒律如無物。而當他走出大雄寶殿，當地電視台的記者獲悉他是高速公路施工方代表後，要求對他進行採訪。有著很強表現慾的楊部長欣然應允了。

「我們來這裡，是為了給當地老百姓修一條致富路，是為了給路橋公司和老百姓之間架一座友誼的橋樑。這座廟不但是物質文化遺產，也是我們施工單位與當地老百姓和諧友誼的見證。」像專業的新聞發言人一樣，楊部長昂首挺胸地站在大雄寶殿的走廊裡，聲情並茂地說。「首先，我代表施工單位，向政府表示感謝，其次感謝懷化人民，感謝中夥鋪的老百姓，在這裡，請允許我向你們鞠上一躬──」他說著，就面向分別來自市縣電視台的兩台攝像機，深情地鞠了一躬。看起來，他已經迅速從佛教徒的身份切回了共產黨員的身份，他的表述和肢體語言雖然有點扭捏作態，卻展現出了高超的政治素養。讓第三台攝像機後的我目瞪口呆，要不是我已經知悉他只是十四標的一名小小的安保部部長，一定會以為他是省交通廳派來的高官。

「我們將會盡最大努力，將這條路修成精品工程與和諧工程，從而用我們和諧的音符，去創造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的湘西大開發！大改造！大建設！」他揮了揮手，用三個「大詞彙」圓滿地結束了這次訪談。

下午，香客們逐漸散去，誦經的和尚經過一上午的誦經法事後，脫下了金光閃閃的僧袍和僧帽，坐在大雄寶殿的長廊裡抽菸。他有著粗壯的身材和肥胖的臉龐，脫下了僧袍後，像個五大三粗的當地農民。他看見我在一旁拍攝，熱情地發給我一根菸。

「謝謝，我不抽菸的。」

「哦。」他將菸收了回去，突然問我，「你這個機器是用磁帶的？還是用卡或者硬碟的？」

「磁帶的。」我暗暗吃驚。如果說，一個和尚在寺廟裡給你遞菸還並不讓人太吃驚的話，那麼還有什麼比一個和尚給你敬菸後又問你一個有關攝影機的問題更讓人吃驚呢？

「哦，我的也是磁帶機。」他說，「前不久買的，SONY的，小攝像機，但現在還不知道怎麼用。要是早知道你在這裡，我就帶過來要你教我一下了。」

「你打算用它拍什麼呢？」我好奇地問。

「我買它是為了拍攝佛教儀式。」他說到，「你知道的，我們經常會做一些法事，唱經或者念經，我覺得有必要將它記錄下來做成光碟。」聽他這麼一說，我更為他這種自覺的紀錄精神而感到驚訝。我甚至在猶豫要不要跟面前的這個人談談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說不定他以後會成為中國的第一個僧侶紀錄片導演呢。我於是敬仰地詢問了他的身份。

他是辰溪本地人，法號「雙歸」，現在是吉首某地佛教協會的會長。當介紹自己是佛教協會會長時，他明顯有掩飾不住的驕傲。「我是正宗中國佛學院畢業的，這在佛教協會並不多見。」他深深抽了一口菸，很快從他的鼻孔裡瀟灑地噴出一股煙霧。那是藍色硬盒的「芙蓉王」，價格不菲，三十五塊人民幣一包。

他可能突然意識到什麼，馬上笑了笑說，「原先我可是很講究戒律的，只不過現在沒辦法，我現在不是搞工程管理嘛，經常要跟世俗世界打交道，他們經常會發給你菸抽。你知道的，中國人都興這個。」

「何況，佛教也要與時俱進嘛，如果老是遵循著原來那一套清規戒律，那就會跟社會相脫離了。」他繼續為自己辯解著，又瀟灑地抽了一口菸。

「嗯，我也覺得有時候形式不重要。」我附和了他的說法。

「那是。我覺得現在的觀念應該更新，因為時代已經變了。」他說，「我們佛教協會打算在當地建一座新的寺廟，比這留雲寺大多了！現在正在招標呢。」

「我就負責這個寺廟的建設工作，所以做完了這邊的法事，我還得趕緊回吉首去，那邊還有好多事情在等我。」

雙歸和尚非常健談，但我取消了和他談獨立紀錄片的想法。

這時候，粟師傅從長廊的另一頭走過來，他走到雙歸和尚面前，冷不丁地從兜裡掏出一包菸來塞到和尚的手裡──那仍然是一包藍色的「芙蓉王」，應該是唐老師請他做上座儀式的報酬之一。

「師傅，我敬你一包菸──」粟師傅用他特有的毛主席口音說，「不成敬意啊──」

雙歸和尚覺得有點意外，但他接下了菸，「哎喲，你怎麼這麼客氣啊，我還沒發菸給你抽呢。粟師傅說，「我覺得我們在這裡認識是緣分呢。我來做上座儀式，你來做誦經法事──，我們都是有連貫關係的，這難道不是緣──分嘛。」

「那是那是，我們是一個系統的。」雙歸和尚連聲附和，「你有名片沒有？」

粟師傅掏出那張世界地圖和握手姿勢，遞到和尚手裡，「這是我的名片，我姓粟，我在黔陽有一個雕刻廠，還請多關照我的生意，可以打這上面我的電話。」從「緣分」到「生意」的轉變，竟然來得這麼迅疾，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沒問題，我們佛教協會自己也會建廟。另外，我還有好多徒弟在佛教系統裡有關係。有需要就找你。」雙歸和尚回答得很爽快，「上次我給一個雕刻師傅介紹了一筆大業務，幾座廟的菩薩製作，造價七十多萬，後來又增加了五十多萬，總共一百二十多萬。過年的時候，他拎來好幾條菸給我拜年。現在他家裡都買了兩部車了。」

在雙歸和尚講述時，粟師傅充滿憧憬地頻頻點頭。「那好嘛，有業務你一定找我，你問唐老師就知道我的水準，那個千手觀音是我親自做的，我這門手藝是祖傳的，做了幾十年了，名聲在外。」

兩人交換了手機號碼，客氣了一番後，粟師傅起身告辭，這樁以佛祖名義在佛祖面前進行的公關活動圓滿結束。粟師傅離開時，沒忘順手帶走那隻獻祭的公雞。這也是他的報酬之一，今晚會成為他的下酒菜。

次年春天，龍門溪大橋的主體框架已經巍然屹立起來了，許多帶著安全帽的民工趴在上面，電焊槍發出的刺眼光芒時不時閃爍在污濁的河面上。

我再次走進新留雲寺，寺廟旁邊新栽的林木已經很茂盛，唐老師親手移栽過來的幾株櫻花正熱烈地開著。門口靜謐無人。我站在那座一人多高的石碑前，再次端詳唐老師親自撰寫的《重修留雲寺碑文》，其中一段寫道：

歲月流轉，人事代謝，古寺屢廢屢建……至本世紀初，地方善男信女，於靈龜峰巔，修復古寺，已歷八載……但因漵懷高速，過留雲寺，古寺搬遷，至山腰平地。然善信者，不怨尤，知大義。購土地山林，重新構建，古橋石崖古寺，三者錯落山水間，保地方古跡，續一方風水。

因為預算的問題，大雄寶殿和千手觀音殿之間的那口放生池，仍然乾涸著，裡面已經長滿了齊腰深的雜草。寺廟裡也空寂無人，只有風聲偶爾吹得簷角上的風鈴叮噹作響。大雄寶殿裡，鍍金的菩薩們威嚴而慈愛地俯瞰眾生。我注意到，就在正中間，釋迦摩尼佛祖面前的供桌上，擺放著一張被玻璃框架裝起來的紅色獎狀，上面寫著：

留云寺：
被评为二〇一一年度和谐寺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
辰溪县宗教事务局

二〇一二年三月

第三章

老何與老姜

重慶來的挖樁人

二○一○年夏日的一天，陽光曝曬，天氣格外炎熱，我拎著攝像機在工地上轉悠，看見田野間的鄉村公路上遠遠地來了一行人，大概有二十幾號人，男男女女，肩上扛著挑著、手上拎著拖著各種大包小包，其中有好多色彩鮮豔的大編織袋，裝得鼓鼓囊囊。隊伍中有表情木訥的老農，也有穿著牛仔褲留著時髦髮型的鄉村少年，還有懷抱小孩的年輕女人。當他們走近時，我聽見了吵吵嚷嚷的四川方言。一問果然是重慶民工。

「這些都是我的人，是我將他們帶過來的。」一位五、六十歲左右的老漢湊過來微笑地跟我搭腔，他嗓音較為嘶啞低沉，咧嘴微笑時，露出一顆銀光閃閃的假牙。「我們是專幹挖樁的，之前在福建的武夷山挖樁，給中鐵四局打工。」

老漢個子不高，極為精瘦，皮膚黝黑，而和他的農民氣質略顯混搭的是：他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穿著一條米白色西褲。和我說話時，他不斷地打量著我手中的攝像機，閃亮的鏡片後，透出一絲警惕的眼神。但也許出於初次見面的禮貌，或者因為初來乍到的小心，他並沒有問我是幹什麼的。

他們徑直走到工地旁的一棟民居前──這裡是楊柳灣大橋工程的包工頭和民工們的租住地，兩年後，規劃中的楊柳灣大橋將跨過屋後。他們卸下大包小包，擦著臉上的汗水，好奇地觀望著這片陌生的環境。領頭老漢很快從旁邊的雜貨店裡買了冰凍礦泉水一一分發給大家。他冷不丁地靠近我，出其不意地朝我的攝像機遞來一瓶。我在尋像器裡看見了一瓶特寫鏡頭的「娃哈哈」牌礦泉水──上面還滴著冷藏凝結的晶瑩水滴。

「喝瓶水！」畫外響起老漢低沉而熱情的嗓音。

這一時讓我產生了拍攝礦泉水廣告的錯覺。我趕緊放下攝像機，本能地推辭著，他拿著礦泉水的那隻手青筋畢露，堅持不懈地朝我挺進：

「來嘛，來一瓶！」他友善地朝我微笑，再次露出了銀色假牙。

我不好意思再推辭，連聲向他道謝。我擰開瓶蓋，和屋簷下那些乾渴的重慶民工一樣，咕隆隆地一飲而盡。多年以後，我都覺得，這是我在這個夏天喝過的最舒爽最難忘的一瓶水。

老漢名叫何澤富，來自重慶巫山縣，是這支挖樁隊的領頭人，而他前來投奔的湖南包工頭，叫陳老闆。當他們相見彼此握手時，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比較得出包工頭和民工頭的差別：陳老闆比老何小十幾歲，他大腹便便，滿臉肥肉，鑲嵌著兩只小眼睛。

在來懷化之前，老何一直在武夷山挖樁，當地正在修建一座橫跨河流的高速公路橋。不巧的是，福建正值雨季，能開工的好天氣微乎其微，大部分日子裡，大家都是窩在濕漉漉的房子裡打牌聊天，无聊地打發時間，也在浪費金錢—因為民工隊是按工取酬的。正在萬般無奈之時，老何幸運地接到了包工頭陳老闆的電話。陳老闆不是第一次和老何共事。他們曾經在張家界的挖樁工地合作過，也知道這支重慶挖樁隊的吃苦耐勞。當他在中夥鋪承包了挖樁工程後，就打電話給老何，為此他還支付了老何的隊伍從福建到湖南的路費—他們在福建分文未賺，早已囊中空空。對於陳老闆這一慷慨之舉，老何非常感激，覺得他這個人滿講義氣。

讓老何有點意外的是，陳老闆並沒有將他們安排住進這間紅色瓷磚民居裡—這裡已經被幾個包工頭和另外的施工隊搶先租住了。他們被帶到屋後一個臨時搭建的工棚旁，比鄰豬圈，走過去還能聽到豬的哼哼聲。這是種在建築工地上常見的工棚，由簡陋的鐵架子搭成，覆蓋著粗糙的石棉瓦，再圍上紅白藍三色彩條布。在法國，「紅白藍」象徵博愛、自由、平等，但在中國，「紅藍白」三色則是民工的LOGO，是工地底層最常見的色彩，散發著勞動者的粗糲氣息。這種廉價的塑膠彩條布遍佈工地，一會是遮風擋雨的工棚，一會是分割混居空間的簾子，一會是裝滿雜物的行李包—老何的隊伍從田野裡逶迤走來時，我首先看見的就是這三色塑膠布行李包。

而工棚內，又分隔成了好幾個逼仄的空間，每一間大概就是七八個平方米，泥土地面，一張床，再放上一張桌子，就幾乎已無轉身之地。雖然離想像的居住條件有一定差距—在福建時至少還能居住在活動板房

裡──但這撥重慶民工卻很快接受了現實。確實，連尊貴的釋迦摩尼佛祖都要臨時容身簡陋窩棚的時代，一夥低賤的民工住進窩棚又能算得什麼意外呢？

他們被安置進工棚後，已經飢腸轆轆。但是當他們準備做飯時，突然發現窩棚裡竟然還沒有通電，他們雖然自帶了油膩膩的電飯煲和電磁爐，但根本就起不了作用。面對民工們的詢問，陳老闆攤了攤手，說：「沒辦法，電工還沒有過來接電，你們先到小賣部去買點餅乾或泡麵吃吧，晚上應該就能弄好了。」

「日你媽，老子坐了兩天一夜的車都要餓死了想吃點熱東西都沒得！」在陳老闆走遠後，老何迅速地發洩出一句壓抑片刻的抱怨。

他語速極快，帶著重慶方言特有的韻味。這句冷不丁爆出的粗口，讓我有點吃驚。這句話和他的金絲邊眼鏡、白色西褲所帶來的少量文雅氣質有點不太相符。但很快我就發現，這樣的句式和用詞正是老何標準的口頭禪。在我和老何相處熟悉之後，「日你媽」、「你媽逼」、「老子」、「格老子」這樣的標準「川罵」更是肆無忌憚地頻頻出現，透露出一種「幹嘣脆」的粗糲、豪爽和真實。這正是我喜歡的風格。我拍的不是主旋律電影，不用擔心髒話會被審查刪去，所以每逢老何飆髒話，我仍然波瀾不驚地錄下來。

如果你知道老何他們是如何從福建輾轉來此、又是如何飢腸轆轆，就會理解他何以口出髒話。這趟旅途，他們坐了兩趟硬座火車。武夷山沒有直通懷化的火車，必須繞道江西鷹潭換一趟車。但這還不是他們的全部行程，他們還要坐兩趟巴士，外加一次三輪車和一次摩托車。為了省錢，大夥在火車上捨不得買二十塊錢一盒的便當，只胡亂塞了點乾糧充饑。他們以為堅持了駐地，就能吃上熱飯熱菜，卻沒想到是這個結果。

在略顯侷促的窩棚裡，老何一家人只能先用開水泡麵充飢。他的小兒子小何，就是隊伍裡那位穿著玫紅色T恤的年輕人，和他的妻子忙著泡麵，而老何兩歲多的孫子陽陽一直哭鬧，似乎對這個新地方充滿了抗議。

這一家人從事橋樑挖樁的時間並不太長，至今只有兩三年。最初，老何在家鄉種莊稼和煙草，還當過村幹部，而在中國經濟迅速轉型的背景下，他很早就擺脫了農民的身份。很快地，他發現自己幾乎什麼都能做：他去河南採過礦，他做過古董生意，他也曾參與因三峽水庫而被迫

遷到巫山新城的移民安置。最初，老何有點懊惱自己的家沒被列入移民，因為他聽人說移民之後可以發一筆小財，但後來他發現，那些移民親戚的新生活並未像政府承諾和宣傳的那樣美好，甚至有些麻煩不斷時，他又有點暗自慶幸……但留下來又能怎麼樣呢？田地早已經荒廢不種。算起成本和產出，種田這門古老的營生已經無法養活一家人了。

不知什麼契機，在三年前，他變成了這支挖樁隊的帶頭人，他的團隊多半是和他同村的老鄉，也有不少鄰縣巫溪縣人。而他的手機裡，則保存了許多包工頭的電話號碼，他將這些能給他帶來工作和賺錢機會的人一律命名為「老闆」：張老闆、陳老闆、肖老闆、李老闆……只要電話打進來，老何自動語音報讀的手機就會一字一頓地響起：陳─老─闆─來─電，陳─老─闆─來─電……老何就知道，自己去往異鄉的「淘金」之旅又該開始了。

一碗泡麵下肚後，老何的疲倦和焦慮散去了不少，他坐在幽暗的窩棚裡，慈愛地看著孫子在地面上低頭玩耍。「汪汪汪──」陽陽手中的一隻黃絨毛的電動玩具狗發出叫聲，一邊叫一邊滑稽地抖動著身軀。老何笑了起來，眼睛眯成了一條縫。此時一列火車長嘯著從不遠處駛來，發出哐噹哐噹的聲音，將電動小狗的吠叫聲淹沒了。陽陽抬起頭來，好奇地看著這列正從山谷裡經過的火車。夜色降臨，車窗裡的燈已經亮了，隨著火車的移動變成一串光的軌跡。

好在這是老何和工友們第二次來湖南，他們並沒有覺得有太多不適。七月份的湖南雨水稀少，天氣晴朗，正是挖樁的好季節。經過一個晚上的休整後，第二天，他們正式從陳老闆手裡分領了各自的工作地盤，開始挖樁了。樁位的分配是通過抓鬮來決定的。樁基所在的地質結構不一，挖掘的難度和工價的標準自然也不盡相同。誰要是碰上了不好挖的石頭樁或溶洞樁，就只能自認倒楣。

「挖樁」是他們稱呼自己工作的通俗叫法，其實就是給高速公路大橋的橋墩挖地基。這些直徑大概兩、三米、深度幾米到二、三十米不等的圓形樁井，灌注混凝土後，就是橋墩的地基。而地基的優劣則決定了大橋的牢固程度。挖樁通常有兩種方式，一種叫「機械樁」，一種叫「人工樁」。機械樁，顧名思義是利用機械來進行。我在工地上見到過這種大型挖樁機，有著長長的鋼鐵杠桿臂膀和堅固碩大的鑽頭，由專人

靠電力操作。而人工樁就是藉助原始的人力，揮舞著鐵鎬，一寸寸地往地底刨進。碰到石頭地，還得使用電動鑽機打碎石頭。碰上最堅硬的地質，還得藉助爆破，然後再將泥土或碎石塊，一桶一桶地從樁井裡提出來。老何他們幹的就是這種人工樁。在來到工地前，我完全想像不到，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大橋，竟然是老何們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鎬一鎬刨出來的。

在工地上，挖樁作業基本上以家庭為單位，這讓人想起「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或「夫唱婦隨」這樣的說法。當然也有打單的民工臨時組合的搭檔。老何和小何就是典型的父子兵，父子倆輪流下井挖樁和倒殘渣，如此周而復始，直到這個樁井挖到規定的深度。老張家和老劉家都是夫妻搭檔，丈夫擔負更為艱辛的挖樁，妻子通常在地面開動捲揚機，吊接和傾倒殘渣。

捲揚機，又名吊機，是一個類似轆轤的電力機械，用鋼絲吊繩連著一隻裝渣土和碎石大的鐵桶，由井上的搭檔牽拉起來倒掉。這隻大鐵桶也是挖樁人的「升降電梯」，他們就是站在這只鐵桶裡被運進運出。回想起來，我最早聽說「捲揚機」這個詞彙，是十六年前好友樂夫寫給我的信件裡：

海彬他們工地打山洞，經常傷人，塌下來了，還好他跑得快，結果砸斷他的腿了。我們聽到他的喊救聲，才將他從亂石中拉出來，很靚的小伙子，可惜了……我倒不用擔心，在上面開捲揚機，我們工地是挖抗滑樁，十八米，才合規的，比打洞子更危險……幹了一個月的重體力活，幾乎是挺下來的，從沒有請假休息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樂夫高中畢業後，跟著姐夫去了廣西百色的汪甸瑤族鄉，在中鐵二局承包修建的公路工地打工。和我的另一位好友斌和一樣，他也會經常給我來信，敘述他親歷的工地生活。

但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才親眼見到「捲揚機」，之前我完全想像不出它是什麼東西。信裡的另一個詞彙—「挖抗滑樁」，我也是一樣陌生。來了工地後才知道它就是挖樁的一種，主要為了對付地質滑坡，用樁柱深入到穩定地層，從而產生阻滑力，藉以對抗滑坡等地質災害。這種在滑坡地段進行的挖樁，顯然更有危險性。直到此時，我才知道原

來好友當年的工作是如此危險，這多少讓人有點震驚。但在樂夫的來信中，他只用寥寥數字寫到了自己在地面上開捲揚機，至於他的搭檔，那個藉著他的捲揚機的升降深入到危險的地底埋頭挖樁的人究竟是誰？樂夫卻是隻字未提。事隔經年之後，當我想起好友，和他未及言說的地下搭檔時，我的腦子裡總會浮現出一個模糊的面孔，似乎像老何，但又不怎麼像。

我問過項目部的施工員，為什麼還要採用這種原始的人工挖樁？施工員給我解釋，機械樁體型太笨重，受制於地形，狹窄的地方騰挪不開。另外，機械樁必須要建有泥漿池，這種泥漿池往往是全工地最為危險的地方。一旦不小心誤入其中，就會遭受沒頂之災。不少工地上經常傳出有人墜入泥漿池斃命的慘劇。

「當然，很多包工老闆之所以採用人工樁，」施工員笑了笑說，「僅僅是出於成本的考慮，你知道的，中國的勞動力非常廉價，僱請他們遠遠比租用機械便宜。」

每天，在噪音隆隆的楊柳灣大橋工地，我都能看見那群「廉價勞動力」在彎腰勞作。正值最炎熱的七月份，男人都光著膀子，穿著短褲，下井的人甚至只穿著一條普通的三角內褲，但還是汗如雨下。婦女們不能這麼隨意，再炎熱難耐，她們依舊穿著一條骯髒而破舊的長褲。

脫掉了上衣的老何露出了乾癟的身軀，滿身的排骨，皮膚黝黑，沾滿塵土和汗珠，但他依然戴著那副標誌性的金絲邊眼鏡，看上去有種滑稽的效果。相比之下，小何雖然瘦小身材，但身上還是有不少結實的肌肉，看起來協調很多。看到我走近，老何停下手中的鐵鎬，扶正了一下鼻樑上正在下滑的金絲邊眼鏡，喘著粗氣對我說：「日你媽，好多石頭哦！硬得像鐵一樣，老陳這雜種將我給坑囉！」

此地的地質結構異常複雜，除了石頭多、石質硬、水量大，還有不少不規則分佈的溶洞，後者是挖樁人最怕碰到的。但「滿講義氣」的陳老闆並沒告訴實情。之前曾有兩撥來自陝西和湖北的挖樁隊在此工作，因為吃不消這裡的地質構造，先後知難而退，所以陳老闆才想到要老何的隊伍過來應急。

除了討厭的石頭，破爛不堪的勞動工具也在拖後腿：大多鏽跡斑斑、臨近報廢狀態：捲揚機不太俐落，鎬和鑽都遲鈍不堪，模板也變形了……更讓人不能接受的，是陳老闆圖省錢，不但不更新工具，或安排專門維修，竟然還要民工們自己解決……這些因素的存在，自然雪上加

霜地影響了工作進度。

老何對此坐立不安。三天過去了，父子倆人只挖下去不到五十公分，而正常情況下一天就能挖八、九十公分。在老何的挖樁史中，這屬於非常罕見的失敗經歷，甚至可以說是對其職業生涯的小小侮辱。但更重要的不是聲譽，而是利益：挖樁是按量計酬的。陳老闆開出的價格是每米五百五十塊錢。按這個價格，這三天，他們賺不到三百塊錢。分攤到父子倆身上的話，每人每天不到五十塊錢。

即便是在普通的鄉村裡，一天的人工價也是八十元左右。而那些有特殊技能的勞力，比如說木匠，泥瓦匠，漆匠，一天的工價多達一百五十元。挖樁既算一項特殊技能，同時還屬重體力活，按理應該比手藝人拿的還要多一點才算合理──這也是吸引老何那樣的農民放棄務農、背井離鄉來到異鄉挖樁的重要原因。出現這樣的情況，老何坐不住了。

第四天，老何瞅準機會，將前來工地的陳老闆截住了，提出要漲工價。「石頭多得駭人，幾天來我們才挖那麼一點點，這樣肯定搞不下去。」老何指了指腳下的樁井，「再說，來之前你在電話裡沒有告訴我是殘樁，要不你開的那個價，我和工人們絕不會答應。」老何在談及他的隊伍時，從來不像大多數人一樣習慣說「民工」，而是使用「工人」一詞，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表述，透露出耐人尋味的身份認同。

陳老闆停頓了一下，爽快地說，「好吧，給你加五十吧。」

「五十肯定不行。相比於這個難度，太少了。」

「哎喲，老何，我給你的這個價已經算可以了，上次來的陝西隊，我還只給五百呢。我都給你加到六百塊了，你還不滿足？挖樁哪有不碰到石頭的嘛。咱們的交情再說這個就沒有意思了。」

「交情是歸交情，但是，事實還是事實。老陳，你應該知道我們重慶人做事的風格，一般情況下寧可自己吃點虧也不會找你囉嗦。」老何停頓了一下，「但是，我不可能總是吃虧嘛，我一家老少要等著我吃飯呢，你體會一下我的難處嘛。」

陳老闆不說話了，他臉色鐵青，狠狠地抽了一口菸。「那你說要加多少？」

「特殊的石頭殘樁要加一百五十。」老何綿裡藏針地說，「少了七百我們做不了，只有走人。」

「好吧，我知道了，但這個事我做不了主，我得跟老龍和老肖商量後才能答覆你。」陳老闆悻悻地走了。

老龍和老肖是陳老闆的合夥人。老龍並不老，只有三十歲，但他是比陳老闆更大的老闆，這項挖樁工程就是他從項目部承包下來的，據說和「影子老闆」毛總是親戚。工程圈裡沾親帶故的情況非常普遍，此外工程項目層層轉包也是禁而不絕，有資質的大公司奪標之後，很快就會轉包給不同的工程隊，工程隊又會轉包給更小規模的民工隊。像老何這種規模的隊伍，就處在食物鏈的最底層，賺的完全是「一份力一分利」的血汗錢。越是上游，拿的利潤就越大。這幾乎是整個工程界公開的祕密。

過幾天，我又去了老何的工地，他們正在對井下的石塊層進行爆破。所有的民工都暫停了手中的活計，集中在遠離樁井的一個小土包上，全都齊刷刷觀望著前方—好似在等待某個大人物出場。小何在工地的另一邊扯著喉嚨喊著，「放炮啦—放炮啦，不要過來啦—」他一邊喊，一邊吹著哨子，發出長長的尖銳呼嘯。老何手中拿著一個簡陋的褐色塑膠盒（引爆器），按下了按鈕。砰砰的爆破聲傳來，有點沉悶，濃煙和塵土從樁井裡騰空而起，石塊飛濺。許多輕巧的小碎石飛落到了菜地裡，發出連續不斷的砰砰聲。

但有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特立獨行」，劃著美麗的拋物線朝我們站立的方向飛來，人們發出一陣夾雜著興奮和慌亂的驚呼，趕緊朝後跑。但很快，因為後勁不足，「特立獨行者」在剛才大家站立的小土包上急劇地墜落下來，砸出一個小小的凹坑。人們爆發出一陣爽朗而開心的大笑，好像在嘲笑它不爭氣提前投降了一般。我按捺住內心的驚恐，「你們不怕被飛過來的石頭砸到嗎？」

「怕啥子嘛，砸不到的！它們飛不了那麼遠的。」老何斬釘截鐵地回答我。

「可是剛才那塊石頭不就朝這邊飛了過來嗎？」

「但是你看它最後不也掉下來了嘛！」

老何的邏輯力很強大，以至於我一時不知道如何接話。我又問他：「那石塊砸到菜地裡，主人不會來找你們麻煩嗎？」

「沒事啦，這個是不可避免的。即便他們來找麻煩也不關我的事，項目部有專門負責這種事情的協調員，大不了賠他們點錢就是。這麼大的工程，你說這點小代價算啥子嘛！」

這座全長七百五十六米，最大橋高三十二米的楊柳灣大橋，初步造價已經高達五千五百多萬元—這還不算後邊因為「工程變更」而增補的款項。與之相比，在他們的眼中，幾棵白菜和青菜的犧牲確實壓根兒就算不了什麼。

因為爆破的採用，樁井看起來比早幾天有了不少進展。我問老何提價的事情怎麼樣了。「提了一百五十，每米七百啦。」老何看起來心情很好，又補充了一句：「總的來說，老陳這個人還是滿講義氣的。」

我差點笑出聲來。就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老何對陳老闆的口頭評價幾次峰迴路轉：先是「滿講義氣」，後來變成了坑人的「雜種」，現在又回到了最初的評價「滿講義氣」。我在心裡暗自祝願這個評價是老何的蓋棺定論。

問題也隨之而來。老何和老張的石頭殘樁提高了價格，但老劉和老姜等人的樁井，據陳老闆實地勘測，並沒有什麼石頭，所以仍用原來的價格計算。這引起了老何隊伍的分裂，讓他始料未及。

對此表示異議的是平時沉默寡言，看起來老實巴交的老劉。他認為既然大家都是一塊出來的，就應該有難同當，有福共享。老劉接著揚言要開始罷工，甚至，他在背後傳話，懷疑老何從中搞鬼，「貪污」了一百五十元，認為陳老闆給所有人的樁價都是七百元。有關「貪污」的傳言很快就傳到了老何的耳朵裡，他不由地暴跳如雷：「日你媽，竟然說我貪污！如此血口噴人敗壞我的名聲！」

「小張你可以去巫山縣打聽打聽我老何，我老何到底是什麼一個人，我怎麼能幹出這種事情來的嘛，開玩笑！」中國無疑是個貪污盛行的國家。關於貪腐的傳聞不斷流傳於坊間，甚至見諸媒體報導，越是位高權重者，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貪腐，媒體稱之為「大老虎」。但我真沒想到，此刻它還能以這樣一種方式，跟老何這樣的無權無勢者聯繫在了一起。面對我的攝像機，老何又憤慨，又委屈。

「老子辛辛苦苦帶著這個隊，風裡來雨裡去，無時無刻不為大夥操心操力，為了和包工頭聯繫交涉，真是電話都打爛了，電話費都花了老子幾千塊錢。他不但不領老子的情，竟然還要這樣污蔑老子，日你媽真是太氣人了！」

「至於這個價錢，說實話小張，我覺得陳老闆他們的方案也是合理

的，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嘛，這個咱們要講道理，實事求是，將心比心。他要是覺得吃虧了老子可以跟他對換嘛，他來挖我的樁就是了，實在不願意幹，可以走人嘛，我又不會攔著你。」老何越說越激動，語速也越來越快。

「那你跟他好好解釋唄。」我建議老何。

「我跟他講了他就是不聽，他就是一豬腦子，攪屎棍！平時就陰裡陰氣的。當初我本來不太想帶他出來，我是看他可憐，他家裡滿貧困，欠了十多萬的債，一直過來求我帶上他。這次我鐵了心要和他鬧翻了，我已經聯繫好了陳老闆，非得和他當面對質不可，將情況說清楚，還我清白。」老何臉漲得通紅。

我不斷安慰老何，說應該過幾天他想通了就沒事了。但老何依舊不能釋懷，「你說出來一塊幹活的鄉里鄉親的，竟然還不團結，還互相殘殺，給外人看把戲何必嘛！日你媽的！」他狠狠地說。

當我離開老何，經過老劉的樁井時，看見被老何罵做「豬腦袋」和「攪屎棍」的老劉，正站在一隻鏽跡斑斑的鐵桶裡，被他老婆用捲揚機一點一點吊出井外。他光著上身，只穿著一條三角內褲，滿身泥土和汗水，臉上蒙著厚厚的灰塵，像戴著一副只露出兩隻眼睛的面具。我微笑著跟他點頭示意。他有點拘謹，面無表情地點了點頭，很快就將視線轉移到了別處。

老何一家的壞運氣

壞運氣來得太突然，彷彿是小何一鐵鎬刨來的。回想起來，那一天跟往常並沒有什麼不同，天氣依舊悶熱不堪，一大早鳴蟬就在鐵軌旁邊的雜樹林裡嘶叫不停。老何父子胡亂地吃完早飯來到工地上，頭頂上的太陽就已經變得有點毒辣，儘管父子倆都戴著安全帽，但腦袋上還是能感受到一股炙烤般的燥熱。直到下到井底，光著膀子的小何才稍微感覺到一絲沁涼。他正了正安全帽，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掄起鐵鎬就開始彎腰刨地。

大概刨了十幾鎬後，小何一鎬刨到一個石塊，隨著哐噹一聲，他手中的鐵鎬被一個強大的反作用力震得反彈，他還來不及感受到虎口的疼

痛，一股粘稠的流泥馬上從石塊下噴湧出來，很快打濕了他的解放鞋，向周圍漫延。小何怔了兩秒鐘，就敏捷地跳進鐵桶，「快升起來，有流泥！」他仰頭朝井上大喊，一邊使勁搖晃著桶上的井繩。老何聽到後，趕緊開動捲揚機的電源，將小何升離危險的井底。站在上升的鐵桶裡，小何清楚地看著腳下的流泥一點一點地漫延開來，吞沒了他來不及帶出的鐵鎬。泥漿在飛速地升高，沖蕩著井壁，發出刷刷的聲音。

父子倆都冒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是兒子在井底挖樁，要是換上一把老骨頭的自己，反應沒有這麼快，指不定被溶洞里湧出的流泥淹沒了也不好說。「日你媽，幸虧老子運氣還不錯，要不就完蛋囉！」老何向我講述這段經過時，似乎還顯得有點驚魂不定。

漵懷高速公路橫貫於湖南中西部的雪峰山脈，境內重巒疊嶂，地質條件非常複雜，不少地方遍佈岩溶區和煤層採空區。它們是挖樁人的剋星，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它們吞噬生命。危險不光降臨在老何父子身上，它也像無聲的陰影一樣頻頻地光顧著這片土地。不斷有挖樁隊的民工向我抱怨地底下暗藏著溶洞，有好幾個工地甚至發生了垮樁事故。我也親眼見過一口樁井突然垮塌，空心的樁井被瞬間冒出的流泥填滿。幸運的是，那時正值中飯時間，挖樁人小張已經離開了，因而逃過一劫。小張來自湖北，二十五歲，十七歲開始就去了山西，在當地的小煤窯挖煤，結果遇到煤窯冒頂，被石頭砸斷了左腿，他告別了七年多的挖煤生涯，改行挖樁，他認為這比挖煤相對安全，沒有瓦斯和冒頂。但沒想到危險依然存在。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驚魂不定的老何父子都在竭力對付險情。他們調來抽水機日夜作業，從井內抽出大灘大灘的泥漿。陳老闆也將這個突發情況彙報給項目部。項目部很快就派了專業的施工技術員，前來實地勘測，並提出了新的施工方案。

這個突然出現的溶洞，對於老何來說意味着危險，但對於項目部來說，卻很可能因禍得福。因為這牽涉到工程界另一個公開的祕密──「工程變更」。「工程變更」是一個工程術語，權威的「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有專門的解釋，對於我這樣的外行來說，這個術語晦澀難懂。我想，即便是對於項目部的領導來說，它也同樣拗口。然而重要的不是這個術語有多專業，而是這一解釋的最後一句：

工程變更一般伴有費用變化。

說白了，也就是遇到了施工條件變化之後—比如說老何挖出了溶洞—承包方可以用「工程變更」的名義向業主方申請，增加施工費用。

在中國，有很多工程如果單憑中標時的標的價，施工方可能掙不到什麼錢，而在施工後不斷申請變更，就能贏利或者贏大利。所以施工方總要千方百計地申請變更藉以增加費用。雖然高速公路的主管部門不斷發出各種《通知》，進行規範和管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正是中國特有的管理方式。施工方怎能輕易放棄「工程變更」這塊肥肉呢？二○一二年四月份，我在項目部的通告欄上，看到一份當月頒發的文件，名為《湖南省婁底路橋建設有限公司項目目標管理及考核辦法（試行）》，在「成本與效益」這一小節裡，明確寫到：

3、想方設法多做變更，創造最佳效益。

看來這家公司比較少見地坦誠，明確地將業內的潛規則寫進公司規章，並開誠布公地要求員工遵守。現在，壓根兒不需要「想方設法」，「創造效益」的機會就降臨了—只有初中文化的小何怎麼也想不到，當初令他膽戰心驚的那一鐵鎬，居然挖出了一家有著「國家公路施工總承包一級資質」的大型路橋公司夢寐以求的「最佳效益」。

項目部很快打了申請變更的報告，送達上級。我並不知道這次變更可以創造出多少「效益」，但肯定的是，這些效益和老何一家無關。老何父子正埋頭抽乾泥漿和流沙，並為今後所要遭遇到的危險而發愁。

老何家的壞運氣還遠沒有結束。有一天早上，我在工地上碰到了小何，他情緒激動地告訴我，昨天半夜一點十分左右，他的房間進了小偷，放在床頭的包被盜了。

「我的身份證、小孩的出生證明、還有銀行卡等其它東西都在包裡。幸好包裡沒有什麼錢，你知道我們剛從福建過來，還沒賺到錢。但是證件和卡丟了也很麻煩。」小何說，「這個地方已經被偷了好幾次了，因為我們住宿的地方連門都沒有，就用油布蒙一下，起不了什麼作用。」

被盜現場，也就是小何一家三口的簡易工棚裡光線幽暗，擺著一張掛著蚊帳的床和一張桌子，旁邊胡亂地堆放著鍋碗瓢盆和電磁爐等雜物——顯然這裡既是臥室也是廚房。小何的老婆帶著小孩在房間裡，她平時只負責做飯、洗衣服和帶孩子，並不上工地。

「小偷走到床頭來拿包的時候，腳踢了一下我小孩放在床邊的玩具，我聽到響動睜開眼睛，發現床邊有一道黑影，然後很快就竄了出去，駭死我啦……」她在講述時還顯得有點驚魂未定，「這些小偷真是膽子太大了……」

「這些強盜，真是太壞了，壞死了！」小何氣憤地說。他在講述時用了「強盜」一詞——也許這詞比「小偷」更能表達他的氣憤之情。「我們最擔心的是他將我小孩偷走了，那樣就慘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們趕緊做了一扇門裝上。」小何指給我看。那是一扇簡易的木門，從質地和做工看來，它除了能帶來一點心理安慰，恐怕起不了什麼實質性的防盜效果。

幾十米遠外的另一個工棚里，老何和老姜合住一間。我走進去後，他正病懨懨地坐在床頭。

「昨晚上我發高燒，燒得跟炭火一樣。天亮後去買了兩包藥吃，現在好一點了，但還是喉嚨痛，腦袋疼。」在四面通風的工棚裡，老何用非常低沉的聲音說，「我年紀大了，持續幹重體力活有點吃不消了，再加之昨晚我去追小偷，受了風寒。」

說到被盜事件，他的聲音隨之高亢起來，「我們竟然住進了一個賊窩，日你媽，我們在這辛辛苦苦做工賺一點血汗錢，這種沒良心的賊骨頭也下得了手！」

他突然神神祕祕地指了前邊一下，壓低聲音跟我說：「就是前面那棟房子的房東幹的！」老何看我有點吃驚，接著說，「昨晚我們追出去後，就發現他站在自家的門口，除此之外根本就沒看到賊的影子。另外，今天早上他建議我們去鐵路旁邊找找包看看，我們過去一看，包包果然就放在那裡的一塊石頭上，裡面的東西不見了，但拉鍊還是拉得很好。」

「最大的疑點，是今天我們報案後，鄉派出所的警察來實地調查，他家卻一直關著門，沒有任何人出來。後來警察一走，他才出來，神情很不正常。」老何繼續分析案情。

「總之，通過各種證據分析，我基本上可以判斷就是他幹的。小

張，我跟你說，我老何的判斷力和分析能力還是不錯的。」老何自信地說。此刻他看起來不像一個被盜的挖樁人，更像一個斷案如神的福爾摩斯。

「那龜兒子一看就不是個什麼良民，是為非作歹的人。」老何停頓了一下，氣憤地說，「那龜兒子上次還偷看我兒媳婦的奶子！我兒媳婦蹲在地上做事，他就湊過去鬼鬼祟祟地往衣領裡看。」他邊說邊模擬了一個偷看的動作，「就是這樣的，偷看。一看見我來了狗日的趕緊就走開了。」

「小張，這個事只有你知道就行了，我還沒有告訴我兒子，我怕我兒子知道了會去打他。你說我們出來是求財的，鬧出啥子來也不好嘛。何況強龍都難鬥地頭蛇。這個道理我們還是懂的。」老何的神情顯得相當落寞與無奈，但只持續了幾秒鐘馬上又變得義憤填膺起來：「要是換在我們重慶的地盤上，你信不信老子我打斷他的腿！」

老劉和老何的矛盾也在加深，在包工頭和工友的挽留下，老劉並沒有離職，但他和老何都到了彼此照面卻不說話的地步。有時候，老劉在和別的工友有說有笑，一看見老何過來，立刻臉色鐵青，朝一邊轉去。目睹老劉的「變臉」，老何的肺都快氣炸了。

「日你媽！老子真是瞎了狗眼，竟然將這種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狼心狗肺的人喊來！」在複述這令人氣憤的一幕時，老何跺著腳，一連用了好幾個成語，藉以發洩對老劉的恨意。

無論何時，老何的表達能力在民工中都首屈一指，鮮有人及，且並不因為受到不良情緒的影響而有所降低。我曾經特意問過老何的文化程度，我說，「老何，看你字寫得滿不錯的，你應該讀過不少書吧。」

「哪裡哪裡，我可沒讀過什麼書，就念了幾年小學，哪能跟你們現在的年輕人比啊。」老何卻很謙虛。

「是嗎，看你的字寫得還是比較有文化的，不說的話，絕對不知道是一個念過幾年小學的人寫的。」我曾要求老何在我的場記本上寫下了他和兒子的名字。他的字跡竟然有點架子和氣度。

老何馬上又得意了起來：「那是，別看我現在挖樁，我好歹以前也是做過幾年幹部的人。」

上世紀八○年代，他曾被鄉政府選撥做了兩年駐村的計劃生育專職

幹部。此外，在朋友的介紹下，他還曾去貴州某地的殘疾人聯合會工作過。「你信不信？鄧樸方都和我照過相！」老何驕傲地說。鄧樸方是鄧小平的兒子，在文革期間被迫跳樓而變成殘障，後來成為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主席。老何的講話很藝術，他不說「我和鄧樸方照過相」，而是說「鄧樸方和我照過相」。這是兩種截然不同意義的表述，後者聽起來讓人完全忘了他只是殘聯某區域分部的一名無關緊要的臨時工。

講起他光輝的過去時，老何鏡片下的眼睛裡便露出熾熱的光芒來，「我跟你說，小張，八○年代的時候我本來都成了預備黨員……」

「後來呢？」我問。

「後來因為超生嘛，就被處罰了。日你媽的，老子的預備黨員也就被取消了！」

計劃生育幹部後來自己也違反了規定，這聽起來比較富有戲劇性。老何指著不遠處的小何—他正在水龍頭下陪兒子玩水—說，「就是超生那個小子嘛。那是八五年，沒想到一晃就二十多個年頭過去了，難怪我們都老了，半截多入土的人囉。」老何育有兩兒一女，大兒子在河北打工，女兒早已嫁人生子，只有這個超生的小兒子跟在老何身邊，和他搭檔著攻克一個個蘊含著流沙、泥漿的危險樁井。

正值收工後的黃昏，老何滿身泥水地坐在低矮的馬紮上，一縷夕陽從三色窩棚的頂上投射過來，照得他臉上呈現出難得的憂傷和寧靜。但很快，他的情緒又重新高漲起來，「小張，歡迎你下次去我們巫山的大昌古鎮和小三峽玩，你只要給我打電話，我一定去接你，給你做嚮導，做解說。」

「我們小三峽中外聞名，李鵬在那裡有個題字，叫『天下絕景』。從毛澤東、劉少奇到鄧小平、李鵬、江澤民，幾代領導人都去過我們那裡。現在中央又安排薄熙來這麼一位有魄力、親民愛民的領導作我們重慶的總書記，以後我們那裡會開發得越來越好。」他咧嘴笑了起來，露出了招牌式的閃亮銀牙，彷彿有關挖樁和家事的煩心事都煙消雲散了。

杯酒釋恩仇

接下來的八月份，老何的壞運氣還在延續。有一天晚上，他挖的另一

條溶洞樁井突然崩塌了，掩埋了正在抽排泥水的水泵在井底。陳老闆和龍老闆認為責任在於老何，不但不支付他挖掘這條樁井的薪酬，還要他賠償水泵，從他還沒結算的工錢裡扣去賠償費一千元。

當時我正在西藏的納木錯湖，突然接到了老何的電話，他問我何時回工地，因為他要辭職不幹了，希望走之前和我見一面。「哎喲，你走這段時間發生了好多事情，我挖的一條樁還垮掉了，跟包工頭吵了架。他們太不厚道了，還要扣我工資，現在快兩個月沒發工資了，連生活費都不肯借支……」三天後，當我乘坐火車返回懷化時，老何去意已消。他很不好意思，一個勁地握住我的手表示感謝。但依舊氣氛難平：「日你媽！出現了溶洞塌了怎麼能怪我嘛，還要扣老子工錢真是天理不容啊！」

「這樣的突發事件，勞動合同裡有寫到如何處理嗎？」我問老何。但是我有種預感，可能情況不會如我想像的那樣。

果不其然，老何說，「就是沒簽合同嘛，以前我提出要跟他們簽協議，他們老是推脫不簽。」

這樣的回答並不奇怪。像老何這種散兵游勇式的民工小團體，和陳老闆這樣的沒有法人資格的包工頭之間，僱傭關係更多基於口頭約定或行規，靠雙方自覺遵守。如果不發生事故和糾紛還好，一旦發生，就基本上權責不清，而沒有文化、法律意識淡薄的農民工則處於弱勢地位。

「不過，我不怕他們，他們要是真將我老何惹毛了，我就將他們做的黑心事捅出去！」老何神神祕祕地跟我說，「小張你知道，他們的屁股是不乾淨的，要是不苛刻我，我就當做沒看見。如果真要跟我弄糟了，我就將這些捅出來，我會告到你湖南省政府去，格老子的，無論你多大的官多大的勢力老子也不怕你！」他情緒激動，講著講著又說起「狠話」來。

「他們的黑心事」和「屁股不乾淨」，指的是老何曾目睹龍老闆的一支民工隊在灌注樁基時蓄意偷工減料，這樣將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品質和安全隱患。

聰明的老何馬上就倒戈一擊，他故意揚言要去舉報──顯然，舉報問題是假，提升談判籌碼是真。老何的「狠話」傳到了包工頭們的耳裡，他們不敢掉以輕心，主動找到老何談判，態度緩和了很多。他們執意挽留老何，不但付了拖欠的工資，還承諾如果老何的隊伍將所有的樁都如期挖完，扣下的賠償水泵的一千塊錢也將會退還給他。老何一聽，頓時

舒了一口氣。

這是一次典型的中國式較量：在一個行業內部，所有人都是明察秋毫的聰明人，所有人都暗暗懷揣著自己的祕密武器，但平時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個人自掃門前雪，大家心照不宣，合力掩蓋真相，藉以維持行業的潛規則和利益均衡；偶而有人圖窮匕見，也只是為了維護一己之私，並非為了真正的公平和正義。而一旦達到目的，大家就再次合夥掩蓋問題的真相，就好似它根本就未曾存在過一樣。類似情況在工地上並不鮮見。暫時達到了目的後，老何權衡再三，努力淡忘垮樁引起的這段不愉快經歷，留下來努力重新挖樁。我很難苛責他，在這個充滿了不公平的生態裡，對這個微小如芥子般的小人物，你反而會讚賞他的智慧和生命態度。

時間已經進入了八月下旬，太陽還是毒辣辣的，氣溫高達近四十度。我每次經過工地，還是能看到老何光著膀子，渾身大汗，在樁井上手忙腳亂地吊接那只鏽跡斑斑、骯髒不堪的鐵桶。老何赤裸的上身皮膚黝黑了不少，顯得比來的時候更瘦弱了。

有一天，老何鄭重地邀請我明天晚上去他兒子的工棚裡吃飯。我有點吃驚，我跟老何相識了這麼久，雖然看起來已經無話不談，但除了接受過他的一瓶礦泉水「賄賂」外，好像還沒有達到彼此要請客吃飯的地步。

「你明天一定要來，我還叫了龍老闆，說了你要來吃飯，他才答應了。老陳回老家了，要不也會叫上他的。」我更加吃驚，怎麼還叫上龍老闆了？並且先斬後奏說我要出席何家「晚宴」？這是弄得哪齣戲？

「小張你真是我碰到的少見的好人，一直都幫著我們，所以想請你吃頓便飯，表示感謝。明天也是我兒媳婦的生日，大家來這工地勞累了這麼久了，正好就藉著這個機會好好聚餐一下。」老何的表述聽起來多少有點像外交辭令，但我還是聽出了其中的真誠，並為自己根本就沒幫過他們什麼而慚愧。

「另外，我叫上老龍的緣故是想調和一下跟他們的關係，這個也不瞞你說，」老何很坦誠，「前陣子發生了那麼多的事，老跟他們磕磕碰碰，甚至為了塌井的事還跟他吵了架差點鬧僵。我想既然還要留下來在他這裡做事，就沒必要搞得關係這麼緊張，於是正好藉你在這裡的機會

將他也喊來，一起喝杯酒，杯酒釋恩仇嘛。」

老何說出的最後這個成語，更加讓我對他刮目相看。不光是因為他的談吐魅力，而更嘆服於他這種為人處世的傳統智慧。老何身上有著典型底層人士的堅韌、精明甚至狡黠，哪怕是在複雜微妙、危機四伏的人際圈子裡，也能做到力挽狂瀾，遊刃有餘，平衡有度。如果說我最初還對老何擅自將我作為邀請龍老闆喝酒的籌碼而略有抵觸，那聽完老何的「交底」後，我反而對老何的這場「杯酒釋恩仇」的家宴充滿了期盼。

次日下午，我早早地趕過來。窩棚裡散發出辛辣刺鼻的菜香味。主廚的是今日的壽星、老何的兒媳婦，她繫著圍裙，正在麻利地燒著一條魚，小何在一旁打著幫手。老何光著膀子坐在小馬紮上擇蔬菜，而兩歲的陽陽在兀自玩著手機。因為天氣太熱了，小傢伙身上光溜溜的，啥也沒穿，一邊聽著手機裡播出的音色刺耳的歌曲，一邊搖擺著自己的身子：

什麼樣的節奏是最呀最搖擺？什麼樣的歌聲才是最開懷？

老何招呼我在床上坐下。在農村，那個不同尋常的座位相當於「上座」。我跟壽星說了生日快樂，她回頭向我靦腆地笑了一下，然後往鍋裡撒下一大把花椒，屋子裡馬上又彌漫著一股嗆人的麻辣味。

「你說巧不巧？今天竟然也是龍老闆的生日，和我兒媳婦同一天生日。剛才我催他過來，他在電話裡告訴我的，聽起來他今天心情很高興，這個真是太有緣分了。」

小木桌已經支起，做好的菜一一擺在桌面。川味草魚之外，還有燒鴨子、臘肉臘豬腳、肥腸、泡菜等菜肴，真是一頓豐盛的晚餐。老何還邀請了其他工友們來吃飯，但「豬腦殼」老劉一家自然不在邀請之列。

當一切準備就緒時，今天晚宴的主角龍老闆就到了。老何熱情地招呼他緊挨著我坐下。在落座之前，龍老闆還笑容可掬地和我客氣地握了握手。我叫他龍總，而他就叫我張總，聽起來似乎是世界五百強企業中的兩巨頭在此會晤，在這個狹窄的、散發出濃烈川菜氣味的窩棚裡。

龍老闆叫龍贏鋒，人很年輕，才三十出頭。他衣著樸素，皮膚黝黑，只有左臉上的一道疤痕，使他依稀有點凶戾之氣。在挖樁民工的眼裡，他才是楊柳灣大橋的最大老闆和衣食父母，陳老闆，也還只是他的一個小合夥人而已，至於老何的隊伍，則只是他掌管的偌大民工隊伍中

的一支，此外，還有其他來自湖南、陝西、廣西、雲南等地的民工隊在給他幹活。龍老闆原來是婁底路橋公司的員工，所以他和項目部裡的好多人曾經是同事。大家私下裡都說，他是項目部最大的領導毛總的親戚和「嫡系部隊」。總之，三十歲的龍老闆年紀輕輕，手上就擁有不少利潤豐厚的工程項目。他在海南還有一個市政公路項目同時開工。他自己也偶爾從懷化飛去海南實地察看。

「來，開吃！祝龍老闆生日快樂！」老何打開了幾瓶雪花啤酒，在座男士各一瓶。大家紛紛附和著，將手中的酒瓶舉到餐桌上方互相碰撞了一下。在清脆的哐噹聲中，這頓不同尋常的生日晚宴正式拉開了序幕。

龍老闆很細心地向小何老婆敬酒。「來，我敬你一杯，做民工的家屬真不容易。」小何趕緊把自己的瓶酒塞到老婆手上，將她推到龍老闆面前。龍老闆豪爽地舉著酒瓶，和她的酒瓶碰了一下，「祝你越長越漂亮！」小何老婆慌亂地抿了口酒，靦腆地笑著，不知道怎麼回應面前這位和她同一天生日的大老闆。

當兩位壽星互相敬完酒後，老何端起自己的酒瓶，砰地站了起來，表情鄭重地對著龍老闆說：「龍老闆，我敬你一杯！」

一看這架勢，我知道，當夾菜、品菜及互敬生日酒這樣無關痛癢的熱身程序過後，這場酒席就要進入它最核心最重頭的部分—「杯酒釋恩仇」了！

「老何你坐下，坐下，別搞這麼客氣。」龍老闆顯得很平靜，他沒有動面前的酒瓶，「應該我敬你們，你們做的工作很辛苦，也很關鍵，但最後的效果外人看不見，你的樁挖得再好，一灌上水泥後全都看不到了，所以你們是默默無聞的幕後英雄呢。」他用筷子指了一下我的攝像機，「這個他看得最清楚。」

在龍老闆的表揚下，老何開始了他事先準備好的表白。「龍老闆，感謝你對我們一直以來的關照和幫助，我老何這個人脾氣不太好，有時候說話做事情都比較急躁，但絕不是故意要跟你對著幹，這個要請你多多包涵，不要計較。」老何充滿真誠地看著龍老闆。

「哎呀老何，計較了就不會到這來了，你別太客氣，喝酒喝酒。」龍老闆端起酒瓶，伸過去，準備跟老何碰杯—不對，是碰瓶。

但老何卻沒有伸出酒瓶，他依然沉浸在參雜著懺悔和自詡的表白中，「我老何這個人，就是脾氣不好，但我這個人是沒有壞心眼的，這

個你可以去問問大家。」他說到這裡，將眼神從龍老闆身上移開，環視著他的工友們和我，彷彿希望我們在這個時候及時挺身而出，去證實他的「自我判斷」。

我沒有說話，低頭喝了一口酒。老龍將端起的酒瓶又放了回去。

「對，老何這個人就是脾氣不好，人還是個好人。」來自巫溪的老姜開口說話了，關鍵時刻，這位樸實的室友沒有讓老何失望。

得到了老姜的呼應，老何像鼓了勁似的，沙啞的嗓音變得更高亢了：「就是嘛。所以請龍老闆不要計較我，我們能走到一起來就是緣分，本來之前還有常德的老闆想要我帶隊伍過去，但我說既然在你這做了，哪怕有困難，也要做完做好。希望接下來我們繼續好好合作，將這個工程圓滿完成！」老何又重新將手中的酒瓶向龍老闆伸過去。

「那是，在中國從事挖樁的人應該有幾十萬，但我覺得，最厲害的還是你們重慶四川人和陝西人。我請你們來就是看重你們的經驗，也會尊重你們的經驗。」龍老闆又重新端起酒瓶，這次終於和老何的酒瓶，哐噹一聲碰上了。「但如果你們覺得我這口水塘太淺了，養不起你們這些魚，那就沒辦法了。」

「哪裡，你說這個話就見外了。」老何緊繃的表情不見了，他開心地咧嘴笑了起來，「我乾了，你隨便，慢慢喝。」他仰頭一口氣就喝下了剩下的大半瓶酒。酒沫從他的嘴角流下來，直往下巴淌去，老何也顧不上擦。

龍老闆看著老何乾了，也仰頭一口氣咕咚咚喝著瓶中酒。他似乎有點費勁，臉上充滿了難受的表情。小何趕緊給他遞過去一張餐巾紙，他接過去，擦了擦嘴又接著喝。老何看著他，「沒事，慢慢喝。」

「我這個人也是脾氣不太好，所以老得罪人，這個張總知道。」他將酒瓶放在桌上，向著我笑了笑。我見證過龍老闆好幾次發脾氣，他發起脾氣來雷霆萬鈞，顯然和老何的抱怨不在一個級別。民工們一般都有點怕他。

「但我自認為自己絕不是黑心老闆。」藉著酒勁，龍老闆也開始了真誠的自我表白，「我這個人很重感情，真的，希望我們……怎麼說呢，我們多增加瞭解，也希望你們理解我。今天我感到很開心，為什麼呢，民工能請我一塊吃飯聚會，證明大家還看得起我這個老闆，就這麼一種感覺。」

「你龍老闆來和我們一塊吃飯，也是看得起我們民工。」小何接著

龍老闆的話茬說。

「來，我們都是一家人了，乾杯！」龍老闆爽朗地說。他將酒瓶高高舉起，在座的所有民工也趕緊舉起酒瓶和他哐噹碰了一下。透過我的尋像器看去，大家舉瓶相碰、仰頭喝酒的動作出奇地整齊劃一。在昏暗的燈光下，這狹窄工棚裡呈現出賓主皆歡的溫馨和睦。在啤酒、川辣、打趣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表揚和自我表揚的共同催化作用下，這場肩負著「杯酒釋恩仇」的家宴終於圓滿地落下了帷幕。

本地幫和外地幫

因為接下來項目部有一個會議，龍老闆要去參加，我正好坐他的車一塊去拍攝。老何客氣地將我們送出門，龍老闆麻利地發動了他的獵豹吉普，蹭地駛入了夜色中的鄉村道路。

「你沒事吧，喝了酒開車。」我說。

「沒事！喝這麼一點酒！」老龍笑了笑。「以前我喝了好幾瓶都照樣開車。」

在中國的鄉鎮甚至是小城市，駕駛人的交通規則意識都很淡薄，酒駕甚至醉駕的情況非常普遍。而在鄉村，根本沒有交通警察的執勤，所以更是沒有誰會主動自律。我有一個搞工程的朋友，新買了一輛豐田車，他非常喜歡這部新車，唯一的不滿是這輛車的自動警報性能：當駕駛人不繫安全帶時，它就會響起嘟嘟嘟的警示聲。後來他買來一個特製的金屬搭扣頭，每次一上車，就將它插進車座上的安全帶扣孔裡，警示聲馬上就停息了，而他則開心地將手搭在方向盤上，看著這款僅值十塊錢的小東西成功地欺騙了電子警報器，哈哈大笑起來。他自信而樂觀的樣子，讓人完全相信整個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此刻的龍老闆也正是這樣的表情，似乎有點不屑於我不信賴他的駕駛技術。於是我只好閉上嘴，徹底地將我的安全交給了這位酒駕的年輕有為的龍老闆。

在車上，龍老闆還接到了好幾通電話，聽起來都像是手下向他打來的。在他的手下有四、五支民工隊正同時為他工作，每天他必須用這樣的「遙控」方式處理一些麻煩事，及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你別搞得沒名堂，這種小事都做不好我請你來幹什麼，啊？」

「明天去懷化市買點安全帶回來，項目部通知上面過幾天要檢查……」

「你們真是無法無天了，沒將我龍老闆放在眼裡……」

他一會粗魯地用方言罵罵咧咧，一會簡明扼要地發出指令。他一邊打電話一邊開車的樣子，頗有幾分運籌帷幄的風度。在接通電話之前，龍老闆的手機來電鈴聲會響上一陣，它是中國的傳統名曲「梁祝」，一支淒婉悠揚的小提琴協奏曲，表現了一個廣為傳說的古老愛情悲劇。在龍老闆的電話裡，它只是一個引出各種紛亂之事的序曲。我推測龍老闆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用「梁祝」做手機鈴聲的包工頭，也是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將「梁祝」的悲劇性轉換成喜劇性的人。

你在工地上很少會聽到梁祝。老何的手機答鈴是《傷不起》，陳老闆的是《最炫民族風》，而小何的是《月亮之上》，他偶爾也會換成《愛情買賣》。這些都是最時髦、最勁爆的流行歌曲，而演唱者是「鳳凰傳奇」和「慕容曉曉」這樣的流行樂「超級之星」，然而嚴格說來，她們只是中國的底層「超級之星」。這些歌手因為所唱歌曲表意直白、情緒高亢、節奏明快，而成了中國底層民眾的最愛。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無論我走在哪裡：在硬座火車上、在往來鄉鎮的巴士裡、在工棚裡、在雜貨店、在早餐店、在椿井邊，甚至在項目部的辦公室裡，我都會時不時與這些歌曲相遇。它們播放的頻次不會少於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我甚至想，如果進行全民公投，在《義勇軍進行曲》和《月亮之上》這兩首歌中選出新的國歌，後者肯定輕而易舉地獲勝，成為當今中國當之無愧的新國歌。

我在呼喚，月亮之上，
有多少夢想在自由地飛翔
……
生命已被指引
潮落潮漲
有你的遠方
就是天堂

為什麼不是它呢？「夢想」和「天堂」等美好的字眼，和中國政府正在宣揚的「中國夢」似乎有著某種內在的呼應，使它更具備了成為一

首新國歌的潛力。

雖然我必須承認，我的耳朵已經被這首潛在的「國歌」狂轟濫炸得生了繭，但無論如何，與老何的答鈴相比，它還沒讓我生厭。每次，我給老何打電話，在他接通手機之前，我都不得不耐著性子先欣賞一段他設置好的「神曲」：

傷不起，讓你傷不起，
我傷你傷你傷你傷到昏天黑地。
電話打給我，美女摟在我懷裡，
你恨我恨我恨我恨到心裡血滴。
傷不起，讓你傷不起，
我算來算去算來算去把你拋棄。
良心你沒有，我的良心也叼走，
你恨我恨我恨我恨到難以忘記。

從「月亮之上」到「傷不起」，有時候只是兩通電話的距離。被轟炸久了，龍老闆的「梁祝」讓這個夜晚變得格外不同。就在我胡思亂想之際，項目部到了。

「老何這個人就是嘴巴子討嫌，其它都還可以。」下車的時候龍老闆突然發出一句感慨，然後快步走進項目部的會議室。

會議室裡燈光昏暗，烏煙瘴氣，包工頭們並肩坐成一圈，幾乎人手一支菸地吞雲吐霧。項目部的副總經理周總是這個會議的召集者和主持人。周總是一名橋樑工程師，他長得方頭方臉，大腹便便。他是懷化本地人，以前在懷化路橋供職，不屬於婁底路橋公司的職工，是項目部聘請來的。

「這裡我要點名批評楊柳灣大橋的挖樁工程，進度太低，一個月才挖幾根樁？而且事故頻發。」在會議開始後，周總厲聲說，「我不能由得你再拖我們項目部的後腿。」他一邊說，一邊目光嚴厲地掃視了一眼龍老闆，臉黑得像包公。

正在抽菸的龍老闆怔了一下，他感受到了來自周總的淩厲目光。「這個不能完全怪我，大家都知道，這裡的地質條件太複雜，地底下溶

洞太多，民工隊也在加班加點，但也只能完成這麼多。」龍老闆酒紅著臉，辯解說，「我何嘗又不想加快進度呢？」

「不要講那麼多客觀因素，這是跟一個人的管理水準有關的。」周總很不耐煩地打斷了龍老闆的辯解。他繼續鐵青著臉說，「同樣的地質條件，你交給我來搞，你看我搞的比你好嗎？量肚子吃南瓜，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就不要做那麼大的事！」

我聽得暗暗吃驚。因為在信奉「以和為貴」的中國，這樣嚴厲的指責非常罕見。一般來說，這種公開會議上哪怕要批評人，也不會尖銳到完全否定一個人的能力。尤其在吃大鍋的工程行業，人際關係錯綜複雜，如果不是萬不得已，誰也不會為了維護公家利益而去得罪個人。

全場鴉雀無聲。龍老闆的酒也被驚醒了一半，他意識到了今晚周總來者不善，趕緊迫使自己從剛才老何的家宴營造的和睦氣氛中抽身而出，切換成「戰鬥模式」。他不再示弱，帶著一點啤酒的後勁，開始反擊：「周總，話不要講得那麼難聽囉，我有沒有能力也不是由你說了算的……」

「那由誰說了算？一切要看你做的事情，由事實說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做事情怎麼啦？我盡心盡力，問心無愧。」龍老闆滿不在乎地搖著腿，又抽起手中的菸來，「你要是覺得我的隊伍不行，就清退我！」

「反正，如果這個月內你再不按計劃將所有的樁都挖好，你就不要再挖了，我就派機樁隊進場，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而亂了總體的規劃，我醜話說在先。」周總向龍老闆下了最後通牒。

龍老闆說，「行，你不就是想要機挖隊進來唄，你想進來就進來吧。」會議不歡而散。

這不是龍老闆和周總第一次正面交鋒，每個人都知道這兩人之前就結下了不大不小的梁子。事出龍老闆手下的鋼筋班。這支鋼筋班負責整座楊柳灣大橋的鋼筋焊接，民工全是他從老家帶來的「嫡系部隊」。有一次，項目部的施工員小楊安排樁機設備時，他們不准小楊將設備卸在工地上，說這是他們的地盤。小楊剛從交通學院畢業，年輕氣盛，不諳人情世故，於是和鋼筋班起了衝突。對方當即喊了十多個民工將小楊團團

圍住，威脅要「搞死他」。

按理說，這是一起惡性的民工圍攻施工員的事件。施工員只是在執行項目部的指令，沒有理由遭到惡意圍攻。但當小楊向毛總反映完情況後，毛總只是勸他息事寧人，對於民工隊的過錯和處理方式，這位老總幾乎隻字不提。小楊一時心裡非常不平衡，第二天開始他就稱病賴在宿舍裡，不再上工地。我拎著攝像機走進他宿舍後，他還憤憤不平。

「我真是第一次見過這樣的老總，不幫著自己的施工員而幫著外面的民工，難怪他們才這麼倡狂，這樣的工地我真沒法幹了！」

「不過我知道他們是穿一條褲子的。」小楊停頓了一下，壓低聲音對我說，「那個龍老闆和毛總是親戚，所以他才護著他們。」

「要不是他們是親戚，這樣的爛施工隊伍，根本就不可能承包到工程，要技術沒技術，要經驗沒經驗，要管理沒管理，要規矩沒規矩。」小楊一連說出好幾個排比句，「還那麼囂張，以為我怕他們不成。」

「他們那天要是真打了我，我絕對不會放過他們。」小楊恨恨地說，「你想想看，我是懷化本地人，我還怕他們這些外地人不成。真要惹毛我了，我立馬回去叫幾車人過來收拾他們。不瞞你說，我哥就是在麻陽道上混的，從麻陽到這裡，幾十分鐘的車就到了。」小楊是項目部職工中少有的懷化本地人。經他的自我介紹，我才想起這點。我說：「哦，你原來是懷化人，周總也是懷化人啊。」

「對，我就是周總帶來的，他是我師傅。」小楊回答我。

在這次衝突事件之後的一次大會上，周總第一次發了脾氣，開始回擊。「真是無法無天了，施工員你們也敢圍攻。我搞了一、二十年工程了，真的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情況，項目部還得聽民工隊的，你們想怎麼搞就怎麼搞？」周總梗著脖子，厲聲地質問著。

「還動不動就要打人家，我告訴你，別以為你厲害，我可不怕你們，搞工地以來我跟人打架就沒打輸過。」周總越講越氣憤，兩眼裡冒著凶光，語調升高了八度。

坐在周總斜對面的龍老闆，嬉皮笑臉地站起來丟給他一根精品芙蓉王，「周總，別生氣了，抽根菸，我代表鋼筋班向你道歉。」

「不是向我道歉，是要向人家小楊道歉，這下人家都不敢去你的地盤上班了，你看怎麼辦？」周總仍然繃著臉，沒有接龍老闆丟過來的菸。

「好呀，我明天親自去給小楊道歉，」龍老闆說，「那不是我的地

盤，是你周總的地盤，我是歸你管的。」

「我管不了你，你才是我的上級，我是你的民工隊。」周總話裡有話地挖苦著龍老闆。

因為仗著和毛總的特殊關係，龍老闆的鋼筋班果然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幾天後小楊果真就捲起鋪蓋走了，去了懷化市的另一個工地。小楊走後，周總和龍老闆的樑子就這樣結下了。當然，龍老闆自己並不認為他和周總的樑子只是因為小楊，實際上還是利益之爭。因為周總在懷化有一支機挖隊，曾向項目部提出挖樁的要求，但項目部首選人工樁的方案，所以他一直心裡不平衡。

「藉著我的人工樁效率不高的藉口，他想安排機械樁進來，搶佔我的生意。」龍老闆笑了起來，臉上帶著充分的自信。「可他做美夢哦。」

結果證明還是龍老闆贏了。十月份的時候，龍老闆的人工樁還在繼續作業，周總的機挖隊卻不見了蹤影。沒過多久，項目部的人告訴我，周總也辭職走了。

壞運氣輪到了老姜

一旦進入了十月份，氣溫明顯比之前要降低了不少，整個季節變得澄明爽朗起來。稻田裡的稻子也熟了，從楊柳灣的山上一眼望去，一片金黃，農民們傾巢而出，開始收穫。秋天也是最佳的施工季，但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看起來美好的秋天，無論對於老何，還是對於項目部，都是一個難忘的多事之秋。

「杯酒釋恩仇」的效果並沒有維持多久，老何再次和龍老闆發生了不快。樁井裡的溶洞有增無減，導致效率出奇的低下，來到懷化這麼久了，他和兒子總共才挖了三根樁，最慢的時候一根樁挖了整整兩個月，其中還垮了一根，算起來賺到手的錢少得可憐——一個月才掙了區區七百五十塊。而陳老闆和龍老闆不斷地催促著老何，警告說不按規定期限完成就扣下工錢，額外的「帶班費」就更別想了。老何急了，就去項目部反映情況，由此徹底激怒了龍老闆。

「他竟然叫我滾，我說你有什麼權利叫我滾，工人拚死為你幹活，

到頭來你不但盤扣工人，還叫工人滾。你究竟是一個什麼暴君！」老何說起這幕來就感到氣憤難當，「包工頭和民工本來是魚水關係，但像他這樣的暴君，就是將整個北京城承包下來，也不會有工人願意給他幹活。」老何的比喻和類比再次顯露出他非凡的口才。

但正面交鋒之後，為了拿到全部工錢和帶班費，還有被扣掉的一千塊水泵賠償款，老何最終還是忍氣吞聲地留了下來。但小何不願意繼續受氣，他由此和老何鬧了意見，一氣之下，帶著妻兒去了湖南的另一個工地。和他一塊走的還有其他幾個年輕人。當初和睦相處的隊伍如今四分五裂。只有老姜等幾個工友留了下來，陪著老何處理這不可收拾的殘局。

現在，老何的挖樁搭檔從小何變成了老姜。也許是老何的壞運氣傳染給了老姜，這一次，輪到老姜成了最大的倒楣蛋。他在井底加固井壁時，一塊石頭毫無徵兆地掉下來，砸中了老姜的肩部和腰部，他發出了痛苦的喊叫，倒在井底。老何嚇壞了，手忙腳亂地將他運出來，鮮血從老姜的身上汩汩而出。老何趕緊報告陳老闆，叫來車將老姜送到四十公里外的懷化市醫院。

我獲知消息後，趕去醫院看望老姜。在病房裡，老姜臉色蒼白，閉著眼睛，一動不動躺在病床上輸液，胸口還插著引出淤血的導管。老何伏在他耳邊告訴他我來了，他費力地抬了抬眼皮，帶著感激的神情哼了兩聲。我叮囑老姜先不要太擔心，好好養傷，身體為重。

老何從病床底下翻出老姜的X光片，舉在眼前，指著其中的一處黑白的骨骼圖說，「看，這裡，斷了一根肋骨！」他的臉上愁雲密佈。看到這樣的場景，我一時充滿了心酸，我想起了我在北京剛看過的畫家劉小東的展覽，其中一幅是他曾經的兩位老同學—如今已經失業—在路上相逢，一人拿出剛從醫院拍回來的X光片給另外一人看。畫作捕捉了兩人站在荒草叢生的小路上舉著X光片仔細端詳的瞬間。作品名叫《肋骨彎了》。那幅畫作從名字到內容都有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憂傷。但眼前的這一幕更加打動我，面前這兩位民工，我前陣子見他們的時候還生龍活虎，天天揮汗如雨勞動著，此刻再見，一個成了傷者，一個成了陪護。

「日你媽陳老闆還說這是我們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要我們後果自負。」老何說，「這難道不是工傷嗎？我們又不是在玩耍的時候受的傷。國家這麼大的工程，連個工傷事故都負擔不起？」

「這些黑心子，只想著賺錢，從不管工人的死活。」老何說，「小

張你不知道當時老姜的那個樣子，人整個都暈過去了，我抱著他往車上跑，眼淚水都流出來了。」老何複述著當時的場景，眼睛裡淚光閃爍。

「小張你能不能給我買本有關工傷賠償方面的法律書？看這個樣子，可能還要和他們打官司。」老何焦慮地說。

「唉，這位記者，你也要報導下我們啊，幫我們講講理啊。」一看我在拍攝老姜，隔床病患的家人將我當做了記者，過來向我憤怒地投訴。原來老姜旁邊的病友六十多歲，是懷化本地人，因為在建築工地幹活和人發生糾紛，被對方用磚頭將腿給砸斷了。我聽了一會他們的敘述，很抱歉地告訴他們我並不是記者，我說我只是老姜公司的攝影，來拍攝一下他工傷的情況—很抱歉我向他們撒了謊，但即便我說出真話來，說我是一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對他們也於事無補。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曝光的記者，最好是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因為所有的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中央領導會看那檔欄目。在好多類似的情況下，我都為我不是一個「焦點訪談」的記者而感到深深慚愧和無力。

他們露出失望的神色，坐回病床旁沉默不語。一會護士過來給老姜換藥，我跟她自我介紹說我是老姜公司的人，問她能否拍攝一下老姜接受治療的場面留作資料。年輕的小護士爽快地答應了。我正在拍的時候，又進來了一位大夫給老姜做例行檢查。他大概四十歲的樣子，穿著沒繫扣的白大褂，露出了裡面的軍裝。

「操，你再拍我攝像機都給你沒收你信不信？！」他一看我在拍攝，也沒問我是誰，以及為什麼拍，衝著我就罵開了去。

我當然信。這是一所軍方醫院，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35醫院。中國的軍方醫院均以數字編號命名，其中以在北京的301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最為著名，中央的領導人都在那裡看病醫療，而他們通常也在那裡去世。在中國，普通民眾跟軍人打交道總是需要格外的謹慎，哪怕他們面對的是身穿白大褂號稱「白衣天使」的醫生，裡面的戎裝也曝露了他的另一個真實身份。為了保護我的攝像機，我趕緊關了機。我跟這位年輕的部隊醫生解釋道：「抱歉哦，我只是在拍攝民工受治療的情況，沒有別的意思。」

「管你拍什麼，反正不能拍。這是部隊醫院！」年輕的軍人大夫不依不饒。

我只得將攝像機放進攝影包收起來。當我轉頭時，發現剛才向我投訴的病人和親屬都在靜靜地看著我，目光裡充滿著同情。我再次為自己不是一個如他們所願的「焦點訪談」的記者而感到深深慚愧。

我和老何暫時告別老姜，回到工地。昔日熱鬧的挖樁工地上一片蕭條，樁井旁泥漿遍地，寂靜無聲，並沒有人在施工。前些天一陣突起的大風，將工棚上覆蓋著的彩條布全部吹成了碎片，襤褸不堪，從工棚裡可以直接看到天空。剩下的幾塊被風吹得簌簌抖動，像一隻隻正要撲騰著飛走的風箏。經過一個夏天的日曬雨淋，塑料布上曾經鮮豔的三色，也已經暗淡模糊，不辨色彩，只剩下骯髒一片。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待在這裡也是虧，還不如走。要不是老姜這樣，我也想走了。」老何坐在破破爛爛、空無一人的工棚裡，歎了口氣。「你看工棚都爛成這樣了，一下雨被子都打濕了，也從沒人來過問過，毛主席時代，衣食住行、油米柴鹽都是大的事情，可到了現在，他們根本就不關心工人的死活。」老何講著講著，又變得相當氣憤，「日你媽，這不跟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了嘛。」

這個毛時代的過來人，與其說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來自於想像，還不如說是來自於他曾經受到的黨的教育。在這套教育理論裡，「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定義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時至今日，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抑或是集工人和農民於一體的「農民工」，早已不再領導國家，反而被這個發展的時代所迅速拋棄，淪為社會的最底層。毫無疑問，老何就是身處最底層的人，就像他挖的樁井是整座高速大橋的最底層一樣。

我們一起去看那口老姜出事的樁井，它緊靠著一片水田，儘管現在已經蓋上了一塊木板，還是能聽到裡面有流水響動的聲音。樁井旁淩亂地堆放著一些施工材料和工具，蒙著厚厚的灰塵，一輛運送渣土的手推車側翻在地。

「這一片全是出問題的樁井，那邊還垮了一個，模板、鐵鎬和水泵全被埋在裡面。」老何指著工地說，「這本來就是個爛工地，我們就是被騙到這裡來的。」

「其實這樣的地質根本就不應該用人挖樁，早就應該用機器。但他們覺得工人更好剝削，能騙一個就騙一個。」老何氣憤地說。他臉上掛

滿著愁容，過去的爽朗和樂觀不見蹤影，我很久都沒看到他那顆一笑起來就銀光閃閃的標誌性假牙了。

後來的幾天，當我走進老何的工棚，都發現他正坐在昏暗的床頭，翻看著我買給他的《工傷賠償完全解決法律手冊》，專注凝神地看著，邊看還邊用一支筆在上面寫著什麼，連我的到來他也沒有察覺。他專心致志的樣子，像一個正在緊張複習功課準備迎接大考的學生。

「如果他們不賠償老姜的受傷，這個官司哪怕是打到北京去，我老何也不會善罷甘休。」老何闔上書本，咬牙切齒地說。

老何有所不知的是，這樣的小工傷事故，別說將官司打到遙遠的北京去，就是連傳到近在咫尺的項目部，有時候也有相當難度。儘管有明文規定，工傷事故一定要層層上報，但除非事情鬧得特別大，「紙包不住火」了，要不包工頭一般會竭力隱瞞這些對他們不利的消息，他們更傾向於和民工「私了」。項目部對此也樂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安保部部長楊保國眼中的「安全」，毋寧是一直掛在牆上。他在會議室的外牆上，掛著一塊他親自設計製作的警示牌，用來統計平安施工的天數，牌子上畫著一口紅色的古典式大鐘，配上文字：

警钟长鸣 平安生产管理无事故 累记　天

那是年初第一個省級檢查團來項目部檢查的時候，楊部長將它精心掛在了檢查團的必經之路上。自從它被掛上牆以來，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大半年，儘管工傷事故時不時爆發，但它的「天」前永遠是一塊未知的空白：

累计　天

它彷彿是俏皮的楊部長故意留給大夥猜測的謎語。至於老姜的傷痛、老何的悲憤及其他民工的擔憂，都通通被隱匿在那處深不見底的空白裡。

就在老姜受傷的前一個月，楊部長代表十四標項目部去參加了業主方組織的一場勞動知識競賽，主題是關於高速公路如何進行精細化的施

工。競賽舉辦地點是在懷化市廣電局的豪華演播廳裡。除了請電視台主持人主持外，省交通廳和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等一干領導也親臨了現場。楊部長和另外兩名年輕職工組成了十四標參賽隊閃亮登場。他們必須在聚光燈璀璨的舞台上，回答一個個有關精細化施工知識的填空題或選擇題。

在搶答環節中，博聞強記的楊部長卻被一道題難住了。

承包人應設立安全生產管理機構，配備專職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其人數按照每（　　　）元施工合同額一名的比例配備，不足的至少配備一名。

在主持人的追問下，楊部長撓了撓頭，沒有回答出來，失去了寶貴的十分。我在一旁拍攝，對楊部長回答不出感到萬分詫異。這道題完全屬於楊部長的專業範疇，按理不至於將他難住。我寧可相信是楊部長不願回答這道題，也不願接受他是真的不知道。

標準答案是：每（五千萬）元。按這個標準，十四標段應該配備四名專職安全生產管理人員。但很遺憾，項目部只有楊部長一人，外加兩條命運坎坷的狗。

現在，對於老姜的受傷，老何也充滿了愧疚。他時不時去醫院裡看望老姜，陪著他說一會話。老姜每天所需的醫藥費仍然由陳老闆匯來，但他本人只來醫院看過老姜一次，並沒有談到善後處理的問題。龍老闆卻一直連個人影都沒見著，據說他對老姜的受傷很是惱火，揚言所有的問題要陳老闆和老姜自己解決。讓老何覺得稍微欣慰的，是老姜的病情恢復得還不錯，除了偶爾咳嗽出血絲，很快就可以坐起來吃點東西了。

「我挖樁六、七年了，還是第一次上這樣的當。」老姜坐在病床上，胸口上綁著繃帶，臉色蒼白，用極其虛弱的聲音跟我說，「我真是倒楣。」

「早知這樣，我寧可在福建武夷山的雨季裡乾耗著，也絕不會到這裡來。」老何後悔地說，「這一切都是我的錯。」他的訴說非常低沉，像喃喃自語，眼神裡充滿了疲倦和無力，過去的自信蕩然無存。

第四章

中國式博弈

工地上演「黑幫電影」

就在老姜住院的這段時間，二○一○年十月九日，項目部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它和縣公路局的矛盾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這是它進駐懷化以來遭遇到的最大危機：在王家坡大橋工地上，雙方人員發生了爭吵、互毆，對方突然叫來「打手」幾十人，持刀砍傷項目部十多人。其中重傷住院者八人，頭上、四肢、軀體上都挨了好幾刀。最嚴重者雙手雙腳被砍斷，生命垂危，地方醫院不敢留治，最後緊急轉送長沙的大醫院搶救。而這一切，均發生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聽起來是否像是一部黑幫電影中的火拚情節？但這是真真切切的現實。要完整地敘述這場衝突，需從項目部和當地公路局的矛盾講起。

項目部一進駐到中夥鋪，就被辰溪縣公路局和交通局盯上了，這是因為，溆懷高速公路基本上和省道相伴而行，時不時還要交叉橫跨它。所以，建設高速公路用的車輛和工程機械必然要在省道上頻繁活動。而這些頻繁在省道上出沒的車輛，是否超載、是否破壞了道路設施和標誌、是否破壞了環境和衛生，有一個叫「路政執法大隊」的機構專門負責檢查，它是辰溪縣公路局下設的。此外，交通局下屬的「運政稽查大隊」，則負責查處往來車輛是否無證駕駛。這就是雙方矛盾的來源。

有一次，孟總突然接到施工隊的電話，說他們運送混凝土的罐車被「運政稽查大隊」扣留了，叫他快來解決。孟總緊急驅車去往現場。孟總名叫孟至強，屬虎，將近五十歲，他的主要職能是協調各種衝突工作。每個標段的項目部，都會有一名像孟總這樣的主管協調、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副老總，他們的工作往往集「公關先生」和「滅火隊長」於一身，既要和當地的政府部門搞好關係，也要頻繁和當地民眾、甚至民工打交道。這兩方面的工作都不輕鬆，經常讓人頭疼。但孟總在這方面的經驗非常強大，人如其名。

在王家坡大橋工地附近，一輛罐車被扣停在路邊。旁邊還停著一輛白色麵包車，車頂裝有紅色警燈，車身刷著幾個醒目的大字：「中國公路」。幾個穿著白色制服、戴著白色大蓋帽的人正在和民工司機爭執著什麼。看到孟總到來，他們轉過來，嚴肅地向他說：「你們的車輛一直沒有辦理運營牌照，司機也沒有從業資格證，按規定這是無證經營，屬於被治理的範疇，不准上路的。」這種鄭重地闡述執法理由的開場白，我看過多次。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他們是新來的施工隊，不清楚這些。到時我會協調好的。」孟總笑著臉，給在場的每一位執法人員遞上一根藍芙蓉王香菸，「麻煩你們先放行，這一車混凝土不馬上澆築的話就會廢了，這個損失就大了。」

為首的大蓋帽看起來比較好說話，聽孟總一說，便鬆了口：「那你們趕緊去辦啊，這次就算了，但下不為例啊。」很快他們坐上了白色麵包車走了。

「娘希匹，這些人都是來敲竹杠的！」執法隊剛走，孟總就罵出聲來：「高速公路就像一塊唐僧肉，誰都想吃上一口，所有的權力部門：交警、運管、路政、稅務等都想來分肉吃。」

「是嗎？」我充滿了疑問。我覺得他們的表現還算不錯，實在看不出背後潛藏的勒索動機。

「可不是嘛，他們就想著怎麼給我們罰點款，辦那個什麼運營證，也是要向他們交錢的。」

「哦，那按照規定還是得辦吧。」

「辦是要辦的。但他們不能直接扣我們的車。他們沒這個權力！要扣，也要先經過縣指揮部。」

孟總所講的「縣指揮部」，是辰溪縣政府設置的一個臨時性機構，目的是保證境內高速公路的順利施工。溆懷高速公路是過境該縣的第一條高速公路，在辰溪縣境內達二十七多公里。中國有句俗話：要想富，先修路。地方政府非常看重這個工程，認為可以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因此抽調不同部門的人員，組成了縣指揮部。辰溪縣公路局和交通局的行政執法，必須通過指揮部。在中國，幾乎每一條在建的高速公路都會催生出這麼一個政府部門，而且和官僚體系的層級一一對應：懷化市有市指揮部，下面則有鄉指揮部。指揮部的核心工作包含土地徵收和理賠，及負責施工安全、維護施工秩序、及時處理突發性事件等。而按照

中國的政治生態，如果當地的執法部門動不動就來工地「找茬」，原因一定是指揮部沒有協調好複雜的利益關係。

「據說現在我們的業主和市指揮部的關係處理得不好，所以底下就不太好做事。」從孟總的這番話中，我依稀嗅到了一絲「山雨欲來」的不祥氣息。當類似的事件不斷上演後，我更加堅信了之前的預感──總有一天，更大的衝突會不可避免地發生。

這個矛盾是因為利益的轉移和分配而引起的。對於這條舊時代的省道來說，興建中的高速公路顯然是它不得不臣服的對手。一旦修成，它們即便不會面臨被徹底取而代之的危險，也多少會失寵。而且，這對冤家對手的行政主管前者隸屬「高速公路管理局」，後者隸屬「公路管理局」，兩者是平級關係。光從名稱上就能一窺中國官僚系統的邏輯混亂──讓人以為「高速公路」不是「公路」，如同「白馬非馬」般可笑。類似的邏輯混亂還有：中國有一個「交通部」，還有一個「鐵道部」──嗯，按他們的邏輯，鐵道交通不屬於交通。當然，我心裡清楚，之所以造成這種混亂的機構劃分局面，與其說是中國人的邏輯有問題，還不如說是權力分配使然。在這樣的權力劃分和現實語境下，比之普通的公路，「高速公路」的身份優越感昭然若揭。但有趣的是，到了更高級別，高速公路局和公路局卻擁有共同的「婆婆」──省交通廳。正是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釀成了「十月九日事件 」，並讓這起慘劇的處理過程，充滿了戲劇效果。

那一天是二○一○年十月九日──所以在各類文件裡，這起慘劇又被叫做「十月九日事件」。事件發生時我不在現場，當時我正在懷化市的535醫院看望被石頭砸斷肋骨的老姜。但巧合的是，「十月九日事件」中的傷患民工也被送到了這所軍方醫院緊急治療，其中一位叫吳磊明的年輕民工，正好住進了老姜的病房，成為了他的「鄰床病友」。我在拍攝老姜時順便就將鏡頭轉向了他！

當時，他的左側腰部被砍了一刀，斷了三根肋骨，已經縫好針並包紮著繃帶，躺在病床上，他用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向我講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我剛去王家坡大橋，不一會，他們就來了二、三十個人，拿著這麼長的刀向我們衝過來。」他艱難地伸出雙臂，比劃著那把刀的長度，

「這麼長的砍刀，大概有一米到兩米長。」

「他們是什麼人？」

「公路局喊過來的人，應該是黑社會。坐了兩輛麵包車趕到現場，每個人手裡都拿著砍刀，氣勢洶洶。」

「那你怎麼不跑？」

「我當然跑了，還沒來得及跑遠，就被砍了一刀。我只覺得一陣疼痛，感覺有血湧了出來，但不敢停，繼續跑，才避開那個砍我的人。」他還有點驚魂未定，「幸好我戴了安全帽，要不頭都會被砍破。他用一把長刀，一刀砍上我的頭，被我的安全帽給擋住了。」

「他們怎麼要砍你呢？」

「他們打架啊。」

「誰跟誰打架？」

「土方隊和公路局的執法大隊。執法大隊說土方隊的推土機軋壞了他們的路面，就搶走了推土機的鑰匙，不准它再施工。土方隊的包工頭就和執法大隊的人吵了起來。

「那你是土方隊的民工嗎？」

「不是，我是龍贏鋒那邊的。」龍贏鋒就是與老何「杯酒釋恩仇」的龍老闆。「我昨天才到，只做了一個上午的工，中午就被砍了。你說我倒不倒楣？」他鬱悶地說。

吳磊明一九八一年生人，現年二十九歲，但看起來似乎已經四十好幾。他曾經在煤礦挖煤，不幸遇到了瓦斯爆炸，雖然撿回了一條命，但全身深度灼傷，幾乎被毀容。他脫下上衣，展示他被砍的刀傷部位時，露出了被灼燒留下的舊疤痕。如今舊傷剛癒，新傷又添，新舊傷疤並排著佈滿了他倒楣的軀體，讓人看了觸目驚心。他之所以跑到相距好幾公里的吵架現場，是龍老闆的召集。龍老闆則是接到了項目部領導的電話，要大家趕緊去支援。等吳磊明他們坐著卡車趕到時，現場已經圍了好多人，雙方已經爆發過一輪衝突了，情緒都很激動，陷入僵持。項目部的孟總、縣指揮部的余副指揮長和當地派出所的三名警察也在現場調解，但都無濟於事。土方隊人多勢眾，將執法大隊的人和車團團圍住。

就在這時，執法大隊的一個人憤憤地說，「你們有種就等著，我們的人馬上就要來了！」然而大家都沒有當真。誰知沒過多久，兩輛麵包車疾馳而來，停車後，立即從裡面衝出二、三十號人，手持長砍刀衝來。大家紛紛逃竄，腿腳慢的人很快被砍翻在地。項目部的幾輛車也被

砸得稀巴爛。幾分鐘後，那夥「砍刀黨」就迅疾地撤離了。而民工共有八人傷勢嚴重，被送至535醫院。其中有一人雙手雙腳都被砍斷，迅即被轉送到長沙的一家大醫院。

我無比震驚，告辭了吳磊明和老姜，迅速地帶著攝像機去尋找其他幾個傷者。在另外一間病房，項目部的幾個工作人員圍坐在一張病床邊，床上躺著一位男子，雙目緊閉，頭上包紮著厚厚的繃帶，幾乎只留出眼睛和嘴巴。

「你要是將砍人過程拍下來，我敢保證它比香港黑幫片還精彩！」看見我的到來，項目經理的專職司機王榮亢奮地說。他是一位文藝愛好者，為我沒有拍到這個現實中的「黑幫片」而感到深深遺憾。

「幸好他不在現場，要不他肯定也會被砍了，攝像機也許都被砸了！」一名測量員卻持不同意見。

「對對。他們絕對會砍拿攝像機的人，因為他們是有備而來的，絕對不能留下證據在我們手裡。」其他的人都認同這種觀點。聽了他們的對話，我的心情非常複雜和矛盾。對於一位拍攝現實題材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在現場━事件的現場，現實的現場。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了。而我卻很不巧地缺席了，但同時，我又暗含一絲慶幸，他們說得很對━如果我在現場，說不定我此刻正身纏著厚厚的繃帶，像具木乃伊般一動不動地躺在醫院裡。憑這幾年深入民間的拍攝經驗，我深知一旦有這種暴力衝突發生，手持攝像機的人往往會首當其衝地遭到打擊。

躺在病床上的傷者叫張懷育，五十來歲，是土方二隊的一名小包工頭。因為年紀大了，加之身材偏胖，他沒來得及跑掉，被人追著朝後腦勺砍了三刀，馬上就倒在水坑裡。兇手還不滿足，又朝著他的背部連砍數刀。最嚴重的一刀砍在後腦上，深及顱骨，腦組織都流了出來，差點要了他的命。到醫院後搶救了好久才脫離危險，此刻還處於半昏迷的狀態中。

「那些人真是滿兇狠，他不是砍一刀就算了，他是補刀的！由此可見他們不是嚇嚇我們，而是真往死裡弄！」王司機負責開車送老張來醫院，他分析說，「你不知道當時那個場面有多嚇人，送他來醫院的路上，他一直流血不止，我車上的座位下全部是血！那個血有好大一灘，

我洗了好久才洗掉。」

「如果當時我在現場，見到他們如此砍我的爸爸，我一定會開車撞死他們。」傷者的兒子看著病床上的父親，咬牙切齒地說。小張今年二十歲，也是項目部的司機。他的眼神裡放射出無可遏止的仇恨。這個秋天對於老張一家來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倒楣之季。老張被砍傷的第二天，小張就遭遇了車禍，幸好只有車撞壞了，人並沒有多大的事。但更大的悲痛還在後頭，老張的侄子──小張司機的堂弟，今年才十九歲，在婁底路橋承包的另一條高速公路的某攪拌場幹活，結果就在不到一個月之後，在一起工地事故中身亡。家屬只得到了公司三十多萬的賠償。

王司機領著我分別找到另外幾個傷者。一位叫曾江源的老者右手中指生生被砍斷，斷指現已被接上，裡面打著鋼釘。此外，他的左肩胛和背上也被各砍了一刀。他是本次受傷者中年紀最大的，大概六十來歲，曬得烏黑的臉膛，一副典型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工模樣。「四個人拿著馬刀朝我包抄過來，我來不及跑，就被砍了幾刀。」他回憶起這恐怖的一幕，發愁地說，「還不知道這根手指能保得住麼，要是保不住怎麼辦？我以後怎麼幹活？」

「你這麼大年紀，怎麼也去吵架現場呢？」

「沒辦法，是包工頭要我們去的。我要是知道會被人砍打，我死也不會去。」他的斷指一直舉著，雪白的繃帶下滲出暗黑的血跡。其他幾個人上下肢、肩胛骨、背部、腰部、腦部等不同部位都挨了好幾刀。一個叫胡克元的瘦小民工，不但腦袋和背部各被砍了一刀，左腿下肢骨頭也被砍斷。

我還在醫院裡見到了土方二隊的包工頭王賤民，他正在探望手下的受傷民工。這個男人有著奇怪而讓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線」和「風暴眼」。當時正是他的施工隊在施工，被路過的公路局局長田正明以違規之名勒令停工，但他們不肯，所以田遂從辰溪縣城叫了執法隊過來，將推土機的鑰匙強行拔掉。王賤民便和他們發生了衝突，從而最終釀成慘劇。

王賤民臉上也掛了彩，但看起來比較輕微，主要是一些皮外傷。「砍刀黨」出現的時候，他跑得快，逃過一劫。「我這點傷算不了什麼，我最擔心的是張光求，他最慘，不但腦袋上挨了刀，雙手雙腳都被砍斷了，現在還在長沙湘雅醫院的搶救室裡搶救，還沒脫離危險。」王賤民憂心忡忡地說。他所說的張光求，是他手下一名四十多歲的民工，

我之前在工地上曾拍到過他勞作的場景。一想起我拍下的勞動影像很有可能成為他的「絕唱」，我就不寒而慄。

中國式博弈

黃昏時分，我坐上王司機的車緊急趕回四十公里外的項目部。雖然車內已經被清洗乾淨，但我仍然全身不安，一路上腦海中不可遏止地浮現出受傷民工被送往醫院的場景：他們痛苦地蜷縮在車廂後座，血流不止……我彷彿還能聞到殘留在車內空氣中的血腥味。

「他們完全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要不怎麼能那麼迅速地就召集到了那幫人趕了過來，並且如此訓練有素。」王司機說，「堂堂的國家機關，竟然僱兇殺人，並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還有警察和指揮部的人在現場。官匪結合，這個性質太惡劣了！」

項目部已經亂成一團。總公司火速派來了一位副老總和一位律師，他們正在商量下一步對策，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沉重而焦急的神情。辦公室裡燈火通明，煙霧繚繞，印表機在一刻不停地加速運轉，不斷地往外吐出各種資料──他們需要將這次慘劇馬上匯報給上級部門：除了業主公司和各級指揮部外，最重要的，還要報給市縣兩級的「六大家」權力部門──黨委、政府、人大、政協、政法委、公安局。它們能決定這起事件的最終處理結果。

孟總一看我來了，說：「哎喲，你要當時在就好了，就可以將殺人現場給拍下來！」他的感歎跟王司機雷同，但目的卻截然不同，「這樣就可以給我們當證據了，現在律師說我們的證據不足，現場連張照片都沒有拍。對方將我們圍攻他們的過程錄了像，但他們殺人的時候就不拍了。操他媽的，現在形勢對我們很不利。」工地上發生了這種惡性衝突事件，善後的工作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孟總肩上。

「不過，事情來得確實太突然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我都沒想到要拿出手機來拍張照。」孟總遺憾地說。他當時也在現場，目擊了全部過程。

「我日你娘的，看到那樣的場面……真是感到相當的難過。」在向我複述當時的場面時，他還心有餘悸，「我雖然自己沒受傷，但心靈上

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他苦笑著搖了搖頭，臉上露出自嘲和傷感的神情。這位屬虎的副老總，性格剛毅、氣場強大，之前總是出現在各種糾紛現場，哪怕面對再難纏的局面，他也總是虎虎生威，叱吒風雲，遊刃有餘。這可是我第一次見到他變得如此虛弱。

「現場有一個圍觀的民工用手機拍了一段，可惜不太清楚。」孟總說。隨後我看到了那段視頻，只有短短的一分二十秒，視頻裡，一些穿著白色襯衫的人在追趕其他人，畫外有人發出驚呼聲。因為影像模糊而抖動，加之拍攝者距離砍人現場較遠，並沒看到他們砍人的瞬間，甚至連他們手中持刀與否也看不太真切。但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還是對拍下這段視頻的民工兄弟心生敬意。

總公司派來的李副總，此刻正在指導如何字斟句酌地修改情況匯報——這份報告將星夜疾馳地送往懷化市的黨委和市政府。李副總是辦公室主任老李的哥哥。他是當地黨報的一名資深記者，另一個身份是改制後的婁底路橋公司的一名股東。

「這麼寫不行，沒有震撼力，必須再仔細修改！」李副總大手一揮，斬釘截鐵地說，「一定要寫得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和挑撥性！」

「另外，必須為指揮部官員和派出所幹警開脫責任，所以，將『他們相繼趕到現場』改成『他們迅速趕到現場』。為什麼用『迅速』替代『相繼』呢？改一個形容詞，意義就大為不同。」李副總說得興起，開始手舞足蹈起來，看起來他不像在修改一份報告，而更像在做一場有關公文寫作的演講。「『迅速』是指他們火急火燎地趕到現場，表明了他們積極對待這起事件，這樣就撇清了他們的責任，不至於給他們難看。」

「寫這種東西，一定要有條理，有時候還必須耍點小聰明，玩點文字遊戲。」他朝佘總總結說。他這番短短的講話，顯露了身為黨報記者的高超專業素養，獲得了辦公室裡的其他人欽佩的眼光。

「現在的領導，出了事都想著推卸自己的責任。這樣寫，就不會得罪他們，不至於讓他們幫著對方說話，畢竟我們接下來還要在這裡幹上三年多。」李副總補充說。相較於他遣詞造句的功力，他審時度勢的能力顯然更讓人佩服。他還細緻地叮囑大家說，「從今晚開始，項目部一定要安排人員二十四小時值班，大門切記要鎖嚴實，大家平時不要單獨外出，以防萬一。特殊時期，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千萬不要大意。」

「媽的，修高速公路就跟打仗似的，動不動就搞死人。」孟總感慨地說。

說這是一場戰爭雖然誇大其詞，但它對項目部的打擊確實非同小可。這場衝突不僅破壞了他們平日的安全感，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驕傲的自尊心。之前，十四標項目部的領導層一直認為自己的「路地關係」在各兄弟標段中處理得最好。「路地關係」是修路者所熟知的行業術語，指修路方和當地人（包括當地政府）之間的關係。和中國人信奉「天時地利人和」的古典成功哲學一樣，修路者尤其認為「人和」即路地關係是工程順利開展的關鍵。

項目部一來到中夥鋪村，就宴請當地村級和鄉級的幹部們喝了一頓酒，算是拜了碼頭。另外，他們和縣指揮部的關係也經營得不錯。此外，他們還有一個獨門祕笈，就是在當地有貴人相助。貴人是何方神聖？乃是項目部佘總經理的表弟，姓陳，是一名成功商人，靠開煤礦和辦學校積累了大量財富，據說在當地的政商兩界、黑白兩道都吃得開。我剛到項目部來的時候，好心的王司機曾鄭重地將陳姓商人的大名告訴了我，叮囑我如果不幸碰到別人找麻煩，報出陳總的名號就會逢凶化吉。儘管至今我都沒有機會使用他的名頭，但卻一直將這個名字爛記於心，彷彿帶著一尊辟邪的關公在身。

有了這層關係，項目部認為自己的工地一定也會驅邪避鬼。果然，自開工以來，項目部儘管有些小麻煩，但大體上一直平安無事。佘總和孟總等對此都覺得很驕傲。但沒想到厄運突然在這個秋天來臨，之前的良好局面功虧一簣。

「貴人」陳總及時地來到了辦公室。他人很年輕，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顯得文質彬彬。當他轉頭看到我的攝像機時，突然露出毫不掩飾的厭惡表情。「你幹什麼？不要用這個東西對著我！」他皺著眉頭，用命令式的口吻對著我說。

一時間，我有點擔心他會像醫院的軍人大夫一樣要「沒收」我的攝像機。我甚至本能地想，我要不要像王司機所說的那樣，立刻報出他的名號來化解麻煩？但我一想到可能給我造成麻煩的人，就是我要報出名號的那個人，就禁不住啞然失笑。這顯然是一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無解悖論，還帶著幾分「大水衝了龍王廟」的荒謬感。但好在這

種擔心是多餘的。孟總很快解釋了我的身份，陳總不再吱聲，對孟總神神祕祕地招了招手，將後者喊進食堂的小包間，兩人關上門「密謀」起來。

「據我獲得的可靠信息，縣委縣政府昨天晚上開會開到了十二點，各個常委、公檢法領導全部參加了，就為了統一思想。」他扶了一下鼻樑上的金絲邊眼鏡，慢條斯理地說。在黨的政法委的統一領導下，中國的公安、檢察和法院經常會為某個案子共同召開案情會，這是一種中國特色。它們可不稀罕什麼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還有，有社會上的爛仔向我報信，砍人的兇手全部逃出了辰溪。」

「我的意思，是一定要產生高壓態勢，讓更高一級的市裡或者省裡來人，直接在這裡蹲點，這樣才能壓住他們。光靠他們自己處理不行。」他敲了敲桌子，高屋建瓴地對孟總說。

「所以孟總啊，我們一定要考慮清楚，接下來如何安排如何行動？如何化被動為主動，這個很重要，你說是不是？」

「那是，我就擔心當地政府偏心，只幫著自己縣裡的公路局，這樣這個事情就一定得不到公正的處理。」孟總提出了顧慮。

兩個人面面相對，神色凝重，小包間裡的空氣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莊嚴。這樣的場景讓我想起了「運籌帷幄」這個成語，再次產生了這是一場戰爭的錯覺。

走出密室後，孟總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跟他驅車去辰溪縣城。他要去見縣高速公路指揮部的余副指揮長，當時他在現場，目睹了整個砍人事件。他希望我將此次見面偷拍下來，如果余副指揮講了些案發時的情況，就可以作為有利於項目部的證據。

「為什麼要偷拍？既然他當時也在現場，他就應該有作證的義務，尤其他還是指揮部的官員。」我提出了疑問。

「義務？小張你真是太單純了，」孟總一聽我的話就笑了。「他怎麼可能幫我們說話啊，他肯定只幫著他們辰溪自己人。」

孟總的話提醒了我，這次糾紛不僅是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之爭，還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爭。而理解後者對於把握這個事件的走向和結果很有幫助。在中國，很多情況下某個觀點的形成並不是針對事實本身，而是首先會考慮到一些外在因素，比如說身份、地域等。所謂的「站隊」就是這個意思。尤其在官場，這樣的情況特別普遍。

「余副指揮長之前是縣裡一個什麼局的副局長，他自己也是官場的

人，當然不會得罪公路局。」孟總說，「他們是穿一條褲子的，指望他幫著我們這些外地人說話不現實，所以看我能不能套出他一些話，你將它偷拍下來當做證據。」

我理解了孟總的良苦用心。但我表示偷拍不可能，因為我並沒有偷拍設備，偷偷錄音還差不多，因為錄音筆相對比較隱蔽，不易察覺。孟總同意了。我們從楊保國那借到一支錄音筆，連夜驅車來到辰溪縣城。余副指揮長在一個茶樓裡等我們，他很斯文，說話輕言細語。然而，似乎他已經有了防備，無論孟總怎麼套他的話，他幾乎都不複述事件現場的細節，更不表態。他惜字如金，好像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只是一個事不關己的外人。他只透露了一則已經不新鮮的資訊，就是縣裡已經召開了會議，正進行查處。當孟總追問他領導們具體在會上說了什麼，他很快又守口如瓶。我摸了一下口袋裡的錄音筆，知道今天的偷錄行動徹底失敗了。

孟總失望地告別了余副指揮長。走出茶樓時，他朝著漆黑的夜空憤憤地罵了一句：「老狐狸，果然滴水不漏！他們一定已經統一好了口徑，看來從他們這裡搞名堂是沒戲了。」

「得另起爐灶！」孟總堅定地說，他眼中的失望很快就不見了。

第二天清晨，天色濛濛已亮，我起床時發現外面下雨了，而所有的人都已經起來，三三兩兩地站在院子裡，輕聲地說著什麼，神情嚴肅。幾個頭兒的眼裡分明還殘留著血絲—顯然他們昨晚沒怎麼睡好。項目部的大門外，停了兩輛掛當地牌照的巴士。老李告訴我，今天要召集民工們去縣政府上訪、喊冤，那兩輛巴士是「貴人」陳總租來的。

他叮囑我，「但你不要說出去，你只能說是受害的民工家屬自發組織的。」只有這樣，才能既「給當地政府施壓，如果捅了簍子也能免除項目部的責任」。

「一會民工們就會來了，我們昨晚已經通知他們，連夜趕製好白色橫幅。」老李詭祕地笑了笑，「伸冤的橫幅會在縣政府門前拉起來。」

我預感到今天的上訪陳情，將不同尋常，但如何順利紀錄下來，確是一件讓人頭痛的事。在中國，關於民怨上訪，政府極為敏感，肯定會出動大量警力或保全。一個正式記者的拍攝都不太可能，何況我一個沒有身份的獨立紀錄電影人，尤其還是一個當事方的「臥底」。若用正常手段去拍攝，幾乎沒有可能。這種情況下，拿攝像機的人會首當其衝被防備。我馬上考慮到了偷拍，我的攝像機太大，隱藏起來拍攝幾無可

能。項目部的小DV應該正好，那是一台SONY牌的「掌中寶」，個頭相當輕巧，雖然畫質可能不太好，但這種情況下，紀錄就意味著勝利，我果斷地降低了技術要求。老李爽快地同意了，這正是他的意圖。他想要我潛入上訪民工中，拍下一些視頻作為證據。「以防萬一──指不定今後還會和他們發生什麼糾紛呢，打官司也完全有可能。這事兒不是這麼容易塵埃落定的，總要多做防備為好。」

我在裝「掌中寶」的小包上挖了一個小洞，剛好對著鏡頭，這樣不用拿出來就可以偷拍。現在最大的問題變成：如何在不看尋像器的情況下對準拍攝對象呢？我之前並無此類經驗，這也是我第一次正兒八經的偷拍。我把裝有「掌中寶」的小包，隨意背在肩上，換了幾個位置，發現勉強能對準拍攝對象。如果再多幾次訓練，培養出「手感」，猜想順利拍攝應該不成問題。

然而這個時候，民工們已經陸續抵達。一個副老總和幾個施工員帶隊，大家紛紛登上巴士。我根本就沒有時間臨陣磨槍了，也趕緊背著新鮮出爐的偷拍包，潛入其中一輛。巴士上，大夥都沉默不語，氣氛有點低沉，甚至略帶風蕭蕭兮易水寒式的悲壯。這是大夥第一次上訪，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意外。巴士慢慢駛出中夥鋪，在路邊停靠了幾次，依次有住在附近工棚的民工登上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表情漠然。

龍老闆也上了車。他的臉上還留著幾道細小的傷痕，及一塊細長的血痂。他看見了我，尷尬地笑了笑。

「龍總，你也受傷了啊。」我問他。

「我還算運氣好的，要不也躺在醫院裡了。」他挽起了左手的衣袖，「你看，這裡被砍了一刀。」手臂上有一道筆直的新鮮傷痕，擦著紫藥水，但並不嚴重。「幸好那把刀有點鈍，另外多虧我躲得快。」他咧嘴笑了笑，有點自嘲的意思。

施工員講了幾點注意事項，他把這次上訪歸納為十六字箴言：團結一心，聽從指揮，見機行事，不要害怕。我聽了這番話，感覺坐在巴士裡的，根本不是去伸冤的民工，而彷彿是奔赴戰場的士兵。

王家坡大橋工地一片安寧，當巴士經過「十月九日事件」的事發地時，你絲毫看不到前兩天腥風血雨的影子。工地上見不到一個人影，幾

根尚未完工的橋墩兀自聳立，道路兩邊，雜亂堆放著各種施工材料和器械。彷彿與這番冷寂唱反調，一塊紅底黃字的大型宣傳牌刺眼地矗立在工地上：

指点江山，翻新山河，令山河流金溢彩
热爱怀化，建设怀化，让怀化繁荣昌盛

歷經細雨的洗滌，上面的字眼顯得格外醒目。這是楊保國的傑作，他最擅長用醒目的紅黃兩色製作文宣條幅，這是因為紅黃色是中國國旗的顏色，而楊部長是一位共產黨員，如同他的名字，他也是一位愛國者。他甚至曾提議在項目部的大門口懸掛國旗，每週升降。很不幸，他的愛國提議被佘總否決了，佘總認為，項目部就是項目部，不是黨政機構。此刻，在上訪者看來，這個招牌流露出的斐然文采和愛國情懷，也像他的國旗計劃一樣，多少有點不合時宜。

車輛很快就駛入細雨濛濛中的辰溪縣城，這是一座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古城，位於煙波浩淼的沅江之畔。二千多年前，仕途落魄但心地高潔的詩人屈原被放逐時，便是從洞庭湖溯沅江而上，在辰溪多次停留。《楚辭．涉江》中云：「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辰陽便是如今的辰溪縣城，但如果不藉助古籍的提醒，在如今的現實中，辰溪縣已經看不到任何歷史的影子了。許多現代建築甚至高樓大廈矗立著，嶄新而粗鄙，繁榮而淩亂，跟中國任何一座小縣城沒有什麼兩樣。唯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市中心的山寨版「天安門廣場」：一個空曠的廣場，一端矗立著一座仿古建築，斗拱飛簷，紅牆金瓦，城樓上也裝飾有漢白玉欄杆。乍看上去，非常類似「天安門」，只不過規模要小很多。天安門，在中國並不稀罕。據說在山西、寧夏、重慶、陝西等地都有「山寨天安門」。甚至在江蘇一個現代農村裡，華西村版的「天安門」像真正的天安門一樣高，氣勢宏偉，門前還架設「金水橋」，高聳著象徵皇權的「華表」。這些滑稽的「克隆」建築物，體現了地方執政者「土皇帝」般的權力幻想。也有可能，是身居偏遠的他們在用這種獨特方式和中央權力保持著某種神祕的呼應。我不禁想，曾被帝王無情拋棄的屈原，如果再「夕宿辰陽」，看到這樣的景致，會作何感想？

就在胡思亂想中，巴士在離縣政府還有一站地的地方嘎然停下，民工們全部下了車。四、五十人打著傘井然有序地向最高權力機構—縣委縣政府步行而去，有人手裡拿著捲好的白色橫幅。我背著「偷拍包」，混雜在隊伍中。我已跟一位穿著髒兮兮米黃色工裝的民工調換了上衣，相信此刻看起來就是一位道地的民工。路邊的行人紛紛駐足，好奇地打量著我們—可能在心底猜測，這麼一大幫子人大清早的要去幹什麼。我懷著既興奮又擔憂的心情，頂著他們的眼神走了過去。

很快就看到了縣委縣政府，大門宏偉，掛著好幾塊燙金的招牌，提醒著這裡是權力中心。大門頂上，還懸掛著幾盞大紅燈籠，上面的福字寫著「慶祝國慶」，因為國慶日剛過去沒幾天。有三三兩兩的上班人群，正從大門一側的小門出入。副總低聲地發了一聲令，人群就朝大門魚貫而去，迅速地將大門堵住。兩個民工立刻展開白布條橫幅，上面寫著「強烈譴責辰溪縣公路局無視國法，將我高速公路民工砍傷！」墨汁飽滿，似乎剛剛寫就，還在流淌。我夾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趕緊用傘做掩護，將「掌中寶」開了機，再放回攝像包裡，暗自祈禱今天的首次偷拍能圓滿成功。

然而，我還來不及調整好偷拍包的機位，去拍下那條橫幅時，大門裡就衝出來幾位身穿保全服的人，他們身手敏捷、訓練有素，三下五除二，就將那條倒楣的橫幅給撕扯下來—看上去他們已經見怪不怪。人群中發生了第一次騷亂，大家紛紛圍著保全，想要回橫幅，然而他們聽到的是保全的喝令：「大家馬上離開，不能堵住大門，否則後果自負！」

這時候，大門內側一間掛有「辰溪縣信訪局」牌子的辦公室裡，走出一位官員模樣的中年男子。他聲色俱厲地告訴大家，國家對上訪是有嚴格規矩和程序的，不能聚眾鬧事，不能打橫幅標語，尤其是不能堵住政府大院的大門。民工們七嘴八舌地回應著他，說我們的親屬被砍傷了，我只能來找你們政府伸冤。還有人不斷地說「你們辰溪公路局太黑了一定要嚴懲兇手」云云。

中年男子說，他知道了這起事件，縣裡也已經開了會，縣委書記和縣長都親自做了迅速查處的指示。「民工們，請你們回去耐心等待處理結果，一定會給大家一個公正滿意的答覆。」當他說出「公正滿意」這四個字時，原本安靜下來的人群又爆發出一陣竊竊私語。大家你一嘴我一言地埋怨起來。

「公正滿意？我才不相信你們呢，你們是官官相護。」

「你們當官的還跟黑社會有關係，光天化日之下還砍人。」

「你們辰溪是個出土匪的地方。」

「你們不交出兇手我們就不回去。」

「他們拿的刀都有這麼長。」有人甚至開始向圍觀者比劃起砍刀的長度。

大門外，圍觀人群越聚越多，場面似乎再度失控。中年男子的臉色變得難看了，他皺著眉頭說，「你們誰是為主的？」

龍老闆反應很快：「我們沒有為主的，我們都是受害者親屬。我們是自發一塊來的。」顯然，他對政府一貫的「擒賊先擒王」的戰略有所警惕，「難道你還想抓我們為主的嗎？」

「不是這個意思，你們這樣說話，我聽不清楚，能不能選五個代表到我辦公室來，跟我具體商談？」

龍老闆猶豫了一下，問起他的身份。中年男子自稱他是縣信訪局局長兼縣政法委副書記──信訪局和政法委都是獨特的中國式行政機構，前者的功能是接待上訪的訪民；後者不算是政府機構，而是黨的機構，某種意義上，可以解釋為黨主導司法、公安、檢察的機構。中年男子循循善誘，說他理解大家來上訪的心情，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堵住政府大院的門。他希望大家先將大門讓開，然後再去談判，他也一定會詳細紀錄大家的要求，匯報給上級部門。

混雜在民工隊伍中的幾個施工員和龍老闆迅速交換了一下意見。他們秉著見好就收的原則，答應了信訪局長的要求。民工們很快就將大門的通道讓了出來。幾個施工員和龍老闆，跟著信訪局長走進大門旁邊的一間辦公室──看起來就像縣政府的一間傳達室，空間不大，裝修簡陋，門口兩側分別掛著「辰溪縣信訪局」、「中共辰溪縣委縣人民政府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的金字招牌。我和另外幾個民工也趁勢跟著進去了。

在談判開始前，我選定了辦公室角落處的一把沙發坐下。這個角度不錯，應該比較適合偷拍，它離局長坐的辦公桌有一定距離，旁邊還有個辦公櫃，沙發上還坐了另外兩個民工，從而可掩護我的攝像包。我看準角度，隨意把包放在腳下，一句話都沒說，心情有點緊張。

這其實不是一場談判，而是一場冗長的複述和虛假的記錄。龍老闆和一個施工員是主角，他們複述了一遍案發的情況，並提出要求，必須嚴懲兇手、救治傷者、賠償損失。而信訪局長一邊聽，一邊在本子上紀錄著什麼。今天，龍老闆的演技非常高超，口才也很不錯，當信訪局長

問起龍老闆的身份時，他謊稱自己是一名傷者的侄子，得知噩耗後，剛從老家趕到懷化。他出色地扮演了一個受害者家屬的角色，一會義憤填膺，一會悲傷失望，一會又理智冷靜，這讓我很是吃驚。有那麼一小會，我以為他真的就是前來為受害農民工討回公道的鄉村親戚，而不是那位脾氣暴躁的包工頭老闆。

我出神地看著他的表演，突然門外一陣騷動。往外望去，有輛車駛進縣委大院，停了下來，當車門打開時，下車的竟然是項目部的孟總。原來，他接到了縣政府的緊急電話，命令他趕過來協調這起群體性事件。

很顯然，和龍老闆一樣，他也只是一個演員。薑還是老的辣，他馬上就搶了龍老闆的戲份，成為新的焦點。他先是裝作一副吃驚的樣子，問這些民工為何跑到這裡。而農民工則裝作很氣憤地圍住他，紛紛責怪他沒有保護好他們受害親屬的安全。他「狼狽」地衝開民工的包圍，「逃」進縣信訪局辦公室。

信訪局長面向孟總時，表情變得更加嚴肅，他依舊無關痛癢地傳達了縣委縣政府的幾點意見和要求。「這個事件正在協調處理，等結果出來一定向你們反饋。」一按照什麼規定處理，何時出結果，都一片模糊。地方共產黨的「新語」通常和現實感無關，只是一個虛假的立場。孟總聞此，面露難色，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但此刻我毋寧相信是真表情。他闡述了這起突然而至的「慘劇」，如何將項目部乃至婁底路橋公司置於最麻煩之境一受害者還在醫院，重傷者尚未脫離險境，每天的治療費都高達幾萬元，民工人心惶惶，工程被迫停工。另外，受害者的家屬也頻頻施壓。最後，他總結說，「如果縣政府不能公正及時地處理好，老百姓肯定不會善罷甘休。那樣的話，還有更大的麻煩在等著大家。」

最後一句話正是孟總和項目部領導的策略。他們唯一能拿來要脅辰溪政府，以免他們包庇自己的公路局一方，導致事件處理不公的工具，就是這些被組織、被操縱的「老百姓」了一在雙方的利益糾紛中，他們不但充當替罪羊，還常常被當做棋子，「挾天子以令諸侯」。

然而孟總也秉持見好就收的原則，當局長再次重申了「秉公辦事、依法處理」的態度後，他開始向聚集的民工喊話。他的態度極其誠懇，他「懇請大家相信政府、相信黨」，呼籲「大家保持克制冷靜，回去耐心等待縣裡的處理」，並承諾「一定會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合理公正

的交代」。這番精心準備的演講詞新鮮出爐後，他的表演時間已經結束。這也意味著今天的上訪演出接近尾聲。

民工們紛紛散去，他們三三兩兩，步行回到等候在路邊的巴士。「受害者親屬代表」龍老闆並沒有上車，他頻頻回頭，似乎在等候著什麼。當孟總的車經過時，他招了招手。他很快上了車，兩個「最佳男演員」一前一後坐著，彼此都如釋重負。車輛朝來時方向一路奔去，濺起一屁股骯髒的水花，將這座「古城」裡的山寨版天安門拋在身後。這齣戲看起來終於圓滿地告一段落。

我回到宿舍，檢查今天的偷拍，發現對於我來說，卻不夠圓滿。效果實在是差強人意，也許因為臨陣磨槍，缺乏經驗，也許因為設備簡陋，加之心情緊張，拍下來的影像大部分取景錯位，晃動不堪，像出自一個第一次使用機器的新手之作。這讓我感到沮喪而充滿挫敗感。

但容不得我花更多的時間來檢討自己，孟總很快就指派了新的任務，在接下來的兩天，我將跟著他走訪和拍攝當地的見證者。

要想找到願意作證的見證者絕非易事。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還有人擔心，作證後會遭到另一方報復，所以大多數人面對我們的尋訪唯恐避之不及。後來，多虧本地人老陳的穿針引線──老陳是項目部的碎石供應商和攪拌場建設的承包商，也是項目部的「貴人」陳總的胞兄──我們終於找到了六個本地人，願意面向鏡頭講述事件經過。其中五個是農民，還有一位是小學教師。孟總總算舒了一口氣。「如果上級協調處理不公，項目部做好了不惜和公路局打官司的準備。」這些見證者的講述，屆時就成為有力的呈堂證供。另外一方，辰溪縣公安部門的調查、取證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開展。自從上訪請願事件發生後，他們首先來到工地上，帶走了當事人王賤民。兩天後，項目部才接到通知，說他已經被刑拘，因而轉入了看守所。但砍人兇手只有一個落網，其他人員全部外逃。

除了王賤民，推土機司機易海也被警方帶走了──當初就是他駕駛的推土機，被路政大隊拔掉了鑰匙。歷經二十四小時的審問後，他被放了回來。我隨後在他租住的昏暗民房裡見到了他。

易海來自安徽，性格謹小慎微，看起來還沒有從這段黑色遭遇中擺脫出來，像隻驚弓之鳥，他膽怯地看著我的攝像機，吞吞吐吐地講述他在刑偵大隊的遭遇。

「他們給我做了筆錄，問我當時發生衝突的情況。」他坐在凌亂的

被窩裡說，「問完後，他們讓我在筆錄上按了手印，還舉著一張紙牌靠在牆邊拍了照。牌子上寫有自己的名字。」

「我連派出所都沒進過，沒想到來了湖南，竟然去了這種地方，一想起這個我就覺得很鬱悶。」他愁眉苦臉，唉聲歎氣，「我自始至終都沒有動手打架，他們拔走我的鑰匙的時候，我也很配合他們。我只是一個給老闆打工的人，我犯不著因為工作去和別人爭吵，尤其到了這麼遠的外地，我很注意這一點。可他們還是要將我帶走，並且沒有出示任何傳喚手續，就讓我在審訊室的凳子上乾坐了一夜。」易海說，「你們湖南怎麼會這麼亂？人家打架充其量就是用手用拳頭，你們這裡竟然用那麼長的砍刀！」我一時無語，我是湖南人，卻無法回答他這個安徽人的疑問。

他沉默地看著窗外。遠遠地，可以看到王家坡大橋工地。細雨過後，南方的鄉村看起來一片祥和寧靜。

兩天後，我跟孟總去看守所見王賤民，通行的還有王賤民的老鄉工友。透過「貴人」陳總的相助，項目部輾轉聯繫到了看守所所長，才允許我們給王送去錢物。我們來到高牆阻隔的看守所外，當高牆的鐵門打開時，所長自己走出來。他人還算客氣，卻並不允許我們進去探望，只接了我們帶過去的衣物和錢，說一定會照顧王賤民，「今後會安排他和看守所的幹部一塊吃飯。」

在返程的車上，孟總如釋重負地長舒了一口氣。「找了關係就是不一樣，誰敢打和幹部一起吃飯的人呢？繳了這兩千塊錢就放心了，要不他在裡面，一定會被打得很慘，錢是小事，可不能讓人吃虧。」孟總突然扭過頭來，衝著後座同去的工友嚴肅地說，「你回去後，不要跟人說起我們找了關係，我擔心走漏了風聲，如果讓公安局方面知道了，就會更換看守所，那樣就麻煩了。」

又過了一天，王賤民的家屬一行從老家趕到了項目部。這夥人情緒都很激動，王賤民的老婆不斷地哭訴，王的一位親戚大聲訓斥項目部不負責任，將王當做替罪羊。他是長沙某公務機構的一位官員，見多識廣，氣質不凡。包括孟總在內的領導，都不斷地向他解釋和道歉，說已經打通了關係、給王送去了錢物，應該沒有大礙。在項目部領導處理民工糾紛上，這是我所見過態度最好的一次。對於那些沒有文化、沒有「背景」的民工及親屬，他們的脾氣從來沒有這麼好。

公安局繼續來工地取證調查。公路局提供了糾紛時的視頻，裡面出

現了施工方手持鋼筋條和撿拾石頭丟擲對方的鏡頭，這顯然對項目部十分不利。然而，他們很快商量了新的對策。調兵遣將的龍老闆突然失踪了，隨同不見踪影的是他那輛被砸的獵豹車。有人說他躲回了老家，還有人說他根本就躲在懷化市內的「熱帶雨林」洗浴中心。他的失蹤讓項目部領導鬆了一口氣。他躲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警察無法找到他。

總之，警察們分別去找視頻中出現過的民工，談話問訊，但幾乎已問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了。突然，這件事情表面上似乎暫時凝固了起來。

然而，在另外一個戰場，當事雙方的「戰爭」卻迅速升溫。它就是輿論戰。楊保國部長臨危受命，在李副總的指導下，親自主筆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紅網」的「百姓呼聲」論壇裡。「紅網」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重點新聞網站。這篇文章的標題和內容，都足夠引人注目：

辰溪縣公路局局長田正明振臂一呼砍殺民工

楊保國不愧是項目部第一才子，這位前中學語文老師雖然棄文從工多年，文筆卻依然不錯。這篇文章體現了他訓練有素的敘述技巧，開篇即聲情並茂，娓娓道來，引經據典，讀來引人入勝：

從懷化沿S223公路東行至六十六公里處南進，迷茫的大山裡，僅存的吊腳樓上依稀可見當年剿匪時留下的累累彈痕，讓人油然地想起毛澤東的詩詞「彈孔前村壁」。數十年過去，曾經波瀾壯闊的湘西剿匪早已隨風吹雨打遠去，或許是傳承著過去彪悍的民風，而今的辰溪依然在上演著暴戾兇橫的刀光劍影。

二○一○年十月九日中午，在溆懷高速十四標（王家坡立交橋）施工路段，南面站滿了圍觀的群眾，路段的東端一夥數十人組成的團夥與西端施工的民工對峙著，一會兒雙方開始互投石塊，很快，東端的那夥人裡馬上有人統一發放砍刀長矛等兇器，緊接著其中一人高呼衝啊！殺啊！

這位振臂一呼的漢子就是辰溪縣公路局局長田正明。隨著喊聲，東

端的人群很快朝西端的民工追殺過去。十多分鐘後，十多名施工人員被砍到在血泊中。

田正明，莫非是今日辰溪之山大王？作為辰溪公路局局長的田正明何以對手無寸鐵的民工狠下殺手？

文章還指出，公路局前來高速公路施工現場執法，宗旨只是「收錢」。文章結尾處，將幾名受害者的傷情詳細地列了出來，並配上了受害人在醫院病床上展示受傷部位的照片。

很快，這篇圖文並茂的勁爆雄文，在網路上的點擊率立即衝高，並被迅速傳播到了「天涯社區」、「中華論壇」、「西部網」等知名論壇，引起了網民們的關注。近些年，中國的國家執法人員向民眾暴力執法的情景屢出不窮，其中尤以城管對小攤販、拆遷部門對被拆遷戶的暴力行為最為普遍。這樣的事件雖然在被嚴格審查的官方媒體上鮮有報導，但在網路媒體上卻傳播迅速，且每每能激起廣泛的反響。

面臨對手製造的輿論壓力，辰溪縣公路局不敢怠慢，迅速進行了短兵相接的反擊。很快，同樣在「紅網」等網站上，出現了一篇以路政工作人員身份發出的帖子，標題也絲毫不遜色於前一篇「槍文」。

湖南辰溪：路政執法人員依法維護路產路權
「強硬」後台包工頭反咬一口裝受害

這還只是主標題，這篇文章還有一個更易引起讀者同情的副標題：

——國家行政執法工作人員遭遇的尷尬：沒錢打點，被害眼看成被告

文章的開篇同樣有情有理，同樣宣稱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

人說頭頂三尺有青天，可是現在世道混亂，天理難申，日前發生的一件事更是讓我不吐不快。也希望說出情況真相能讓我得到來自大眾的聲援，感受到世間尚有正義的力量。

事情由來：

我是湖南省辰溪縣公路局的一名普通的路政執法人員。十月九日，國慶假期結束後上班的第二天，我和另外四名路政執法隊員一起進行日常巡路。在小龍門中學附近見到了正在施工的溆懷高速十四合同段工作人員。他們用履帶車任意輾壓新修的公路，在有效路面上傾倒渣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的有關規定，我們幾名執法人員上前進行制止。在制止過程中，我們遭到了十四合同段二十多個民工的阻撓，隨後還對我們進行了圍攻和激烈的毆打……我們五個人被對方二十多人抓住摁在地上又打又踢……

這篇文章的手法和對手如出一轍，將路政執法大隊工作人員的受傷照片和被砸壞的路政車輛照片附在文後。但對於「砍刀黨砍殺民工」這個最核心的情節，該文卻含混地一筆帶過：

當時，施工方組織了兩大卡車的施工人員，手持同等規格的鋼筋鐵條，先向我方人員投石挑釁，又在後來的混亂中持械傷人，在已經失控的混亂情況中，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夥手持砍刀的小混混，使得情況更加複雜，也最後導致了施工方四人重傷五人輕傷的慘重後果。

「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夥手持砍刀的小混混」，這顯然是一句缺少說服力且令人莞爾的托詞，因為「手持砍刀的小混混」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的外星人。顯然，這兩篇來自當事雙方的文章，均竭盡所能地各執一詞，皆只從利於自我的角度去表述，而對於一些基本的事實和邏輯，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模糊處理。在中國，因為公權力部門的公信力逐漸下降，加之缺乏獨立公正的第三方調查機構，及獨立的媒體和司法監督，許多糾紛最終都變成了這樣的「羅生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民眾只能背負「不明真相」的宿命。

口水戰在不斷地升溫。項目部的年輕施工員紛紛申請了新的ID，化身為一個個「馬甲」投身到激烈的口水戰中。

「昨晚上我一個人遭到了四個ID的攻擊，他們張口閉口就罵我，我一個人孤軍奮戰，卻孤掌難鳴，反擊不過他們。」在野外的露天工地上，項目部工程科的小蔣說起來非常興奮，他用「奮戰」、「反擊」等詞，再次應驗了這起衝突如同一場戰爭，但他眉飛色舞的神情卻讓人一度以為，他只是在談論最近新玩的一款電動遊戲。「他們一看就是公路

局的人，這個時候應該有人來幫我。」

「好，我去幫你。憑我的口才，他們一定罵不過我。」楊保國自信地說。

中國的網路媒體看起來似乎自由開放，但隨著維穩時代的來臨，自由言論越來越變成了泡影。官方嚴格監控網路上的言論，一些不利於政府或讓政府難堪的敏感話題──比如說文革、六四及強拆和高層腐敗等等，通常會變成「敏感詞」而無法刊載，或者是隱晦發布後就迅速刪除。你在中國境內，通常看不到一些涉及「不友好」的國外網站──比如美國之音等及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

政府最有「中國特色」的武器是，各級政府的「網路輿情監控機構」會招募數目龐大的「網路評論員」。這些「網評員」被民間嘲諷為「五毛黨」，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在網路上發表有利於中國政府和相關部門的言論，攻擊抹黑那些針對政府的批評者，從而「引導所謂輿論導向，消除各種事件對政府造成的負面影響」。「網評員」每發一條言論，便能從政府那領到五毛錢的報酬。

楊保國部長和「五毛黨」的口水大戰，很快就被高效運轉的「輿情監控機構」視為工作的重點。為了所謂「澄清事實，消除不良影響」，懷化市政府動作迅速，在最先登載「十月九日事件」的「紅網」上，出示了一份處理結果說明。他們成立了由縣公安局局長親自率領的專案小組，並要求司法介入。此外，在懷化市的級別，政府也成立了兩個調查小組，一個負責調查刑事案件和司法責任，一個負責追究執法部門的行政責任。很快，兩個調查組得出了共同的結論：「十月九日事件是一起由於不文明施工、不文明執法引起的惡性刑事案件」──這一結論看起來有點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但平心而論還算公允公正。

但悲哀的是，這一事件最終未能走進法庭，「公允公正」只是一個表面的假象。無論是公安機關的調查記錄，還是我拍攝的六個本地人的證言，最終都沒有成為法庭證據。後者靜靜地躺在我的電腦裡，只能成為紀錄片的素材。這是因為，這件事遭遇了一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處理方式──「私了」。

我對這樣的結果並不感到吃驚。在中國，「私了」本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種處理糾紛的方式，更何況此案最後「驚動」了某些高層。婁底路橋公司的毛董事長，甚至請出一位婁底市的副市長。這位副市長親自出馬，專程來到懷化市協調此案。另外，湖南省交通廳也介入此事。如前

所述，高速公路施工單位所屬的路橋公司及高速公路管理局和它們的「敵手」辰溪縣公路局，擁有一個共同的「婆婆」省交通廳。所以，此次衝突屬於「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的「人民內部矛盾」。在這個「穩定壓倒一切」的「和諧社會」裡，自然要進行「內部處理」──在中國，「私了」就是這樣而來，它往往是公權力介入的結果，準確說，應該是「公了」的暗箱操作版。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當事雙方在懷化市的一家賓館裡，簽署了一份《刑事和解協議書》。結果是，乙方辰溪公路局向甲方十四標項目部賠償損失，除了支付受傷人員的醫藥費及人身損害費外，還將賠付停工費和相關事件處理費，總共七十多萬元。協議書還聲明，待各傷者的傷殘等級鑒定出來後，乙方還要全額承擔他們的殘疾賠償金，那也不是一筆小數目。但協議書的最末提到，甲乙雙方都要免除對方的刑事責任。

為了符合協議，幾天之後，孟總去了一趟535醫院，他和傷者們簽了一份「本人自願承諾免除對方人員的刑事責任」的《承諾書》。於是，「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夥持砍刀的小混混」及他們的「幕後指使人」就這樣獲得了「赦免」。衝突雙方的較量終於告一段落。

「十月九日事件」的發生誘因、較量方式和處理結果彰顯了一條典型的中國式博弈路徑：利益──暴力──宣傳──私了。矛盾始於「利益」，經過「暴力」和「宣傳」的激勵較量，最後出於「維穩」的考量終於「私了」。這樣的路徑某種程度暗合了這個國家的傳統和現實。

即使在溆懷高速工地上，「十月九日事件」也並非孤例。就在它發生前幾天的十月五日，溆懷高速公路第三標段也發生了一起衝突，這次是施工方和當地村民發生糾紛，引發雙方大規模鬥毆，最後動用了長刀、鋼釬和鋼管，導致兩死、十來人受傷的慘劇。這起慘劇和「十月九日事件」有著許多驚人一致的地方，當地派出所的警員和高速公路指揮部的工作人員也在現場，卻無能化解慘案的發生。警員最後對天鳴槍，但他們發射完了槍中的子彈，也沒能制止血灑工地、屍橫山野──聽起來這一幕是不是更像香港黑幫片呢？

難以癒合的傷口

只有活著的傷者和親屬們還要繼續忍受煎熬。一個月過後，「十月九日事件」的受傷者終於可以下樓，到醫院的院子裡曬曬初冬的太陽了。他們在攙扶下顫顫巍巍走下樓梯，有人拄著拐杖，纏滿繃帶的腿腳依舊僵硬；有人指頭裡的鋼釘依然寒光閃閃，更多人身體上的傷痕新鮮如昨。至於那位受傷最重的張光求，我卻一直沒有見過他，據說他輾轉換了好幾間醫院，至今還躺在病床上。

他們沉默地坐在在醫院花園的小涼亭裡，涼爽的西南風從頭頂徐徐拂過。天空看起來顯得略微遼闊和高遠，似乎和一個多月前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好像也並沒有在病床上躺了那麼久，回想起來，一切都像一場夢。不管怎樣，那個多事的秋天完全過去了，現在已經進入了初冬。工地上的冬季施工還在揮汗如雨地進行，但已經與他們無關。他們知道這個事件最終會怎麼處理嗎？當我問起這個問題時，每一個傷者都茫然地搖了搖頭。「十月九日事件」的賠償協議對於他們是保密的，具體的賠償數目連項目部裡的普通員工也不清楚。腳部纏著繃帶、拄著雙拐的胡克元在我的鏡頭前苦笑了一下，「相信項目部會為我們做主的吧。」

老姜的傷口幾乎痊癒了，他剛辦理了出院手續，然而老何卻已經別他而去。老何等待無望，內心備受煎熬，他趁著老姜的侄女婿過來接手照顧他後，一個人鬱悶地回了巫山老家。無疑，這次湖南之行對於他來說，是一次名符其實的黑暗之旅。在兩個月中，他總共才挖了四條樁，還垮了一條。離開時包工頭龍老闆和陳老闆還是扣了他水泵的錢，許諾的「帶班費」也一分未給。「算起來，這一趟我總共虧了幾千塊錢，日他媽的！我以後再也不會去湖南挖樁了！」

老姜的性格卻和老何截然不同。他哪怕有再多的焦慮和擔憂，也只會靜靜地坐在病床上，一言不發，目光似乎停留在牆壁那虛無的白色中。經過一個多月的住院，他明顯消瘦了不少，眼窩深陷，蠟黃的臉上充滿著憂傷。隨著出院的日子日漸臨近，他最擔心的是能從龍老闆那裡得到多少賠償。能說會道、善搞關係的老何最終都鬥不過龍老闆，口拙的自己哪裡有底氣去和他談判呢？還好，他的妹夫和小兒子都趕過來看他，龍老闆也答應賠付老姜包括誤工費、陪護費在內一共三萬元錢，前提是他先辦理好出院手續。

歸心似箭，他隨即買好了當晚一班從懷化去宜昌的車票，是凌晨一點多的火車。他們要回到巫溪老家，必須轉道宜昌坐船或坐長途汽車去巫山，然後再從巫山的大寧河轉小船到巫溪境內，最後再坐汽車和摩托車回到大山深處的家。回家的路途仍然和來時一樣遙遠而艱辛。老姜和老何儘管親手挖出了一條條現代化的高速公路，但很少有機會親身享受，他們往往選擇成本低廉的普通火車或普通公路客運，不斷地和這些高速公路擦肩而過。

我在火車站旁邊的餐館，給老姜三人餞行。從老何這支隊伍來到湖南的第一天起，我就跟他們相遇相熟，到今天，隊伍中的最後一個人老姜也要離開湖南了。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裡，發生了太多不平靜的事，所幸我的攝像機紀錄了這一切。我不但是一個見證者，也是一個親歷者。我由衷感激老天安排我遇見他們，從而得以在這條朝天的大路上，讓我的時光和他們的時光短暫重疊，這是如此珍貴的一段。

老姜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這是他受傷以來第一次笑開臉。他心情大好，突然不那麼口拙了。他跟我說起巫溪老家，之前他一直種菸草，因為收入不高，活兒又累，所以才出來討活路。他的妹夫至今還留在巫溪的大山裡。而小兒子姜偉和父親一樣，選擇出來「討活路」，在東莞一家房產建築工地搭鷹架，每個月工資兩千多。他今年只有二十歲，一幅聰明伶俐的樣子，但話語裡有著和他年齡不相符合的滄桑。

老姜充滿慈愛地看著他，扭頭跟我說，「他的適應能力歷來很強，他哥哥就差一些。」老姜的大兒子今年二十三歲，也曾出去打過幾年工，但不太習慣城市的生活，後來回到了家鄉。剛找了一個鄰村的女朋友，想結婚，但沒有錢。「我出來挖樁就是想給他多湊點錢明年結個婚。沒想到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老姜舉起酒杯，裡面是白開水，和我碰了一下—他有傷在身，喝不了酒，只能用白水代酒敬我，「幸虧有小張你一直在幫助我們，還沒有出什麼大的亂子，真的很感謝你。」他將杯中白水一飲而盡。我很不好意思地回敬了他們，我根本就沒做什麼，我大多數時候都無能為力，左右為難—這其實也是一個獨立紀錄片導演面對鏡頭裡的困境時最普遍的境地。

晚飯過後，我們去了火車站。偌大的候車室裡只開了幾盞昏黃的燈，一片幽暗。等待夜行火車的旅客在椅子上三三兩兩聊著天，或者打著瞌睡。我們坐在候車室的椅子上，等凌晨一點的火車到來。

「老姜你要回家了，你老婆會很高興吧，這麼久沒回去了。」我隨口問道。老姜沒有做聲，在幽暗的燈光下，他的神情看起來格外黯淡。過了好一會，他才回答我，「我老婆不在家。」

「哦。她也是在外面打工嗎？」

「對的，她自從去廣東打工，有好多年沒有回家了。」

他尷尬地向我咧嘴笑了一下，「她說她不願意再回來了。」

我暗暗吃驚，沒有預料到隨口一問竟然有這樣的答案。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只好岔開話題，叮囑老姜要以養傷為重，不能再幹重體力活了。

凌晨的火車終於到了，這是一輛施設最為簡陋、票價最為便宜的老式綠皮火車，轟鳴噴氣聲中，老姜三人匆匆上了車，緊緊地擠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火車徐徐駛動，他們透過車窗向我揮手告別。鏡頭裡，這班夜半歸途的火車慢慢地遠去，駛入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

在醫院住院的民工們也要回家了。他們的傷殘鑒定結果紛紛出爐，吳磊明、胡克元與曾江源被鑒定為「九級傷殘」；張懷育和王又發被鑒定為「八級傷殘」；禹西湖被鑒定為「七級傷殘」。至於最嚴重的傷者張光求，他要在六個月後才能出院接受鑒定。最後因「左手功能完全喪失」，被鑒定為「五級傷殘」。

初冬時節，經過幾場冬雨，天氣變得更涼了。孟總帶著公司的律師來到醫院，向傷者們傳達了接下來的安排：出院後，公司先向每人借支一筆錢，大家回老家等待最後的賠付。每位傷者都拿到一份《承諾書》，上面承諾說，三個月後就會支付所有的賠償。手拿著這份有公司幾位老總簽名的白底黑字的《承諾書》，這些被捲進不幸的民工們儘管心裡還稍有忐忑，但最終還是聽從了公司的安排，帶著累累傷痕，回到了各自老家。

我再次見到他們，是在半年後。胡克元、王又發、禹西湖等人突然結伴出現在項目部，胡克元的腦袋上有一塊地方寸草不生，露出醒目的傷疤；王又發和禹西湖的手臂均蜷曲著，不能順利的施展，手臂上的傷疤

清晰可見。王又發的手臂裡還有一塊用以矯正的鋼板，有待第二次手術才能取出來。同來的還有張光求的老婆──她說張光求至今依然躺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需有專人照顧。

此時距公司承諾的賠付期已經過去了很久，但他們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連醫藥費和二次手術的錢都沒有了。他們打了很多次電話，給孟總和項目部領導，但得到的答覆都是：辰溪縣公路局還沒有支付公司賠償。六個月已過，這紙白底黑字的《承諾書》好像被項目部遺忘了一般。

「辰溪縣公路局遲遲不肯支付賠償款，你們找我也沒辦法。」孟總兩手一攤，又給出老生常談的答覆。

他說的是實話。圍繞各傷者的傷殘賠償，婁底路橋與辰溪公路局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公路局要按農村人口標準賠償，總價為三十多萬元，但婁底路橋申請城鎮居民標準的賠償，總價為七十多萬元。理由是傷者均是長年在外務工，月收入都是三千元以上，遠遠超過農村人口的收入標準。在中國，對各種傷亡事故的賠付，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對城裡人的賠付要比鄉下人幾乎高出一倍；此外，賠付標準還跟傷亡者所在地域有關──對經濟發達地區的人的賠付也要比不發達地區的賠付高。這種「同命不同價」的狀況明顯是一種歧視和不平等，但卻被堂而皇之地寫入國家的律法裡。

傷者自然不知道這些內情，而孟總對他們的貿然來訪也感到惱火。在會議室裡，他們七嘴八舌憤憤不平，張光求的老婆甚至哭出了聲。「我們家那口子還躺在病床上，現在連用藥都沒錢買了。」她一邊說，一邊哭，壓抑的哭聲在幽暗的會議室裡聽起來讓人如坐針氈。

幾天後，來訪事件升級了。受傷民工從附近工地上弄來一輛破舊的大卡車，正正端端地停在項目部的大門口，然後熄了火，拔掉鑰匙。這樣，這輛大卡車堵住了唯一的出入通道。項目部的工作立刻處於癱瘓狀態。孟總很快聞訊趕來，他火氣出奇地大，厲聲地訓斥胡克元和王又發，甚至指著他們的鼻子警告他們立即將車開走，不要將事情鬧僵了。

但孟總的強硬態度並沒有產生良好的效果。民工們不再聽他的，事情陷入了僵局。孟總一氣之下，親自爬上駕駛室，試圖發動車輛，但無功而返。滿頭大汗的孟總威脅著要打一一○報警，胡克元看起來一點都不懼怕，他說，「好啊，你趕緊打吧，我還巴不得你打呢，他們砍傷了我們還不給錢，我們正好要去報警，當初你們要我簽署的免除刑事責任

的承諾我們宣佈作廢，乾脆將這事鬧出去得了。」

這句話等於點到了孟總的軟肋，他立刻不再吱聲了。無疑，這起事件的處理是不太能見光的，當地警方肯定也不會攙和進來。

不能出工的員工們圍在大門口圍觀著，臉上有掩飾不住的興奮。不一會，佘總出現了，他命令員工們將這輛討厭的車推開，傷者們見勢不妙，馬上一屁股坐到卡車的輪胎底下。張光求的妻子也坐在卡車的車尾，一邊哭一邊抹著眼淚。正在緩緩滾動的輪胎眼看著就要朝他們的身軀滾去，項目部的人立即就不敢再推車了。佘總氣得不行，再次命令大家將這夥鬧事的「刁民」拉出去。

「你們還站著幹什麼？趕緊去拉開他們！難道任著他們在這胡鬧嗎？」佘總衝著圍觀的員工氣急敗壞地喊叫著，臉色異常地難看。

員工們於是再次一擁而上，走到車廂底下拉扯著幾位堵門的傷者和家屬。因為他們人多勢眾，很快就將勢單力薄的禹西湖架走了，只剩下王又發仍然在頑強地和眾人對抗，他用受傷的手臂緊緊地抱住車輪，任憑許多雙手拉扯也不肯鬆開。王又發滿頭大汗，臉脹得通紅，這位四十多歲的粗壯漢子平時沉默寡言，這時候幾乎要哭出聲來：你們別拉我的手，裡面還有鋼板，弄壞了你們可要負責的！他這麼一喊，好多人就不敢再去拉他。就這樣，那輛大卡車停在大門口整整一天，員工們等於迎來了一個意外的假日。他們很快喪失了圍觀熱鬧的熱情，紛紛回到辦公室佔據著幾台電腦上網玩遊戲、看電視劇或聽音樂。

這幾個受傷的民工一直守在項目部，連晚上都不例外。為了防止晚上被項目部的人「偷襲」將車弄走，胡克元甚至整晚就睡在那輛大卡車裡。第二天清早，我起床後來到門口，看見那輛車還是靜靜地停在那裡，胡克元正從車裡下來，他睡眼惺忪地撓了撓受傷的腦袋，不好意思地對我笑了笑，說：「一個晚上都沒睡好，好多蚊子啊。」

到了下午，傷者和那輛大卡車突然不見了蹤影。孟總告訴我，項目部的一把手毛總給胡克元打了電話，答應儘快地支付賠償，終於做通了他們的工作，將車開走了。

「具體什麼時候能支付呢？」我問。

「那就不知道了。」孟總笑了笑。

從此，我再也沒見過胡克元、王又發這幾個傷者，但腦袋被嚴重砍傷的張懷育除外。幾個月之後，他又現身在工地上，這次不是來抗議，而是來工作。他看起來已經從肉體之傷和喪侄之痛中擺脫出來，正站在

一道溝渠上指揮民工們填築土方。他戴著一頂黑色的鴨舌帽，遮擋住了傷痕累累的腦袋，行動和語速明顯變得比以前遲緩。

「你怎麼又來幹活了？」我驚訝地問他。對於他來說，工地實在是塊令人流血和喪命的危險之地，按理說應該退避三舍，怎麼這麼快又返回來了？

「沒辦法，」他笑了笑，很平靜地說，「因為『十月九日事件』，我承包的土方工程停工了很久，不做下去損失就會更大。」我沒想到他會使用「十月九日事件」這個官方色彩濃厚的詞彙，他的語氣和表情，讓人覺得他只是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並非倒楣的當事人。

「你現在的傷怎麼樣？」我又問他。

「基本上好了，就是經常頭暈，」他摸了摸腦袋，說，「以前坐車不暈車，現在一坐就暈車嘔吐，一碰到變天時腦袋還隱隱作痛。」

他的兒子小張好像就沒有父親這樣淡定。「這些領導真不是什麼東西，當初怎麼就不砍他們呢？」小張憤憤不平地說，「就是他們將我爸喊過去打架的，砍人時他們也在現場，卻都不制止，事發後連一點內疚都沒有。」

「反正，一條命對於他們也不值錢。我弟弟才十九歲，不就是被他們花三十多萬買了一條命嗎？」說起堂弟的意外離世，小張還是心痛不已。

時間一眨眼，又到了下半年的十一月份，此時距「十月九日事件」發生已經一年有餘，這筆久經波折的陳年老賬才終於有了了結。在項目部一份名為「十月九日事件支付明細表」的文件上，我看到了各位傷者得到的賠償金額，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數：

胡克元62488.63元；
吳磊明31219.46元；
王又發78428.24元；
禹西湖145161.29元；
曾江源56368.50元；
張懷育132191.33元；
張光求274680.85元

總 計780538.30元。

表格上，最顯眼的並不是這些名字和數字，而是一個個略顯凌亂的紅色指紋。在中國，自古以來「按手印」就是底層族群最通用的一種身份憑證方式。從這些靜靜地躺在白紙上的黑色數字和紅色指紋裡，已然看不到半點「十月九日事件」本身蘊含的驚險和弔詭，那些傷痛和殘廢也彷彿從來就未曾發生過。甚至，包括我作為旁觀者和記錄者面對這件事情時湧出的震驚和心悸，也彷彿了無痕跡。如同這個時代好多魔幻現實的曲折故事一樣，金錢最終為此劇畫上了句號。

我好奇地問孟總：「這筆巨額的賠償金究竟出自何處？」他笑了笑，回答我說：「那還不是國家買單！」

第五章

紅歌與娛樂

一場異彩紛呈的紅歌大賽

二○一一年六月中旬，項目部突然接到緊急通知，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建黨九十周年紀念日，溦懷公司要在月底舉辦主題為「頌歌獻給黨，和諧譜溦懷」的紅歌大賽，規定每一個標段都必須參加。在有關這次紅歌比賽的通知上，明確寫著：

参赛曲目应健康向上，歌唱祖国歌颂党，歌唱新中国成立以來的新变化、新气象，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歌唱人民和谐美好新生活。

今年是中共建黨九十周年。據中共黨史記載，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棟兩層私宅內，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祕密召開。後來走漏風聲，為了避免國民政府的打壓，會議的最後一天緊急轉移至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所以，上海的那棟老房子和南湖的紅色遊船被公認為是中共的誕生地。但在確定黨誕生的具體日期上，黨內卻一直犯糊塗，眾說不一，最後黨的新權威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決定，將黨的生日定在七月一日，而既不是「一大」的開幕日七月二十三日，也不是閉幕日七月三十一日。這樣的安排明顯有點背離真相和邏輯，但九十年後的今天，再沒有人去吹毛求疵地糾纏「黨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這個無關宏旨的問題。在中國民眾的眼裡，生日的象徵意義本來要大於實際意義，更何況，中國的「歷史」與其說是過往的真實，還不如說它是史官的編撰。

隨著七月一日——這個中共亦真亦幻的生日日益臨近，喜慶的氣氛越來越濃，各地都在舉辦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其中以「唱紅歌」最為普遍。黨的大壽年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紅歌年」。只要一打開電視機，各種紅歌表演的節目層出不窮，尤其以紅歌的主要陣地重慶為甚：在每

晚的黃金時段，重慶電視台都有一檔叫《天天紅歌會》的選秀節目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它的新聞裡也能處處見到各地群眾唱紅歌的激情場面。即便是深夜播出的電視連續劇，也幾乎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紅歌。講述黨的革命事蹟和卓越貢獻的長篇故事波瀾壯闊、曲折離奇，但和很多歷史典故一樣，仍然是編劇們絞盡腦汁編撰出來的。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重慶電視台甚至停播了所有的商業廣告，只剩下紅歌、紅電視劇和紅新聞—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唯一一家敢這麼做的電視台，透露出重慶當局「淨化精神環境」的巨大決心。

眾所周知，將革命歌曲最先稱為「紅歌」並在民眾中掀起大型的「唱紅歌」浪潮就是源起於重慶市。而這座最年輕的直轄市的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民眾的眼裡，是位兼具個人魅力和政治魄力的中共官員，也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甚至很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的接班人和主宰者。他在商務部部長任上被調任為重慶市委書記後，隨即在他的地盤上雷霆萬鈞地推行了「唱紅打黑」運動—「唱紅」就是唱紅歌，「打黑」就是打擊黑社會。從此，唱紅歌這種群眾文藝形式席捲中國。隨著薄熙來帶著他的氣勢恢宏的千人紅歌隊千里跋涉進京演出[1]，中國似乎也達到了紅色的高潮—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新聞時，馬上聯想到幾百年前徽派戲劇的進京演出—那直接導致了國粹京劇的誕生。紅歌隊從重慶進京演出，是不是也會誕生出新中國的一種新國粹—「唱紅歌」呢？我暗自充滿遐想。

雖然身處偏僻的湖南農村，項目部也沒能脫身於這場席捲全國的「唱紅」浪潮。不過，對於工作枯燥乏味的工人來說，這樣的活動與其說是一次政治任務，還不如說是一次難得的集體娛樂。接到通知起，項目部便興奮地開始了籌備工作，很快挑選出參加大賽的合唱隊成員，這些準備唱紅歌的年輕人，既有施工員、測量員，也有司機和會計。項目經理佘總和生產經理龍副總也親自參加，後者甚至擔當領唱。

組織這次活動的是部長楊保國。楊部長身材粗短，大腹便便，但他卻是文藝中年，且對公眾事務非常熱心。他很快從大賽指定的備選曲目裡選定了要演唱的歌曲—《歌唱祖國》，這是一首在中國極為著名的愛國歌曲，有著「第二國歌」的美譽。它創作於一九五○年九月，也是中共新政權即將成立一周年之際。據說這首歌的詞曲作者——一位身居天津

的共產黨音樂人一途經天安門，看見城樓前飄揚的「五星紅旗」後，愛國熱情高漲，在歸途火車上才思泉湧，一氣呵成。他也因此得到了毛澤東的當面稱讚。而後來，你也總是會在中國各種重大活動的禮儀上、開場或結束時，聽到這首歌曲，這也正是楊部長選定它的原因之一：它的主題與黨的生日慶祝相得益彰，另外一個原因，是這首歌節奏鮮明、朗朗上口、便於合唱。而且，大家耳熟能詳，幾乎每個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唱上幾句。

晚飯後，楊部長召集合唱團抓緊時間排練。排練的場地就在辦公室和餐廳之間的露天空地上。他將列印出來的歌詞分發給大家，而他則把自己的筆記型電腦放在桌上，接上小音箱，一遍一遍播放著《歌唱祖國》的MV。也許是因為這首MV是從網路上下載的低級版本，也許是因為廉價小音箱品質低劣，從音箱裡傳出的歌聲聽起來有點失真：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
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到了高音部分，因為不堪重負，劣質喇叭發出一陣吱吱啦啦的刺耳轟鳴：

我們領袖毛澤東，指引著前進的方向
我們的生活天天向上，我們的前途萬丈光芒

合唱隊成員隨意地散落在院子裡，幾個一身臭汗和灰塵的施工員，剛從工地上回來不久，還來不及洗澡。他們偶爾低聲地發出兩句牢騷，但牢騷話很快就被淹沒在歌唱祖國的歌聲裡。

經過幾天的跟唱訓練，大部分人都能「脫稿」唱出整首歌曲了。這個時候，楊部長給大家分配了隊形位置，而他自己自告奮勇地擔負起合唱隊的指揮。他面向歌手站立著，抬起肥大的手臂，打起了拍子。他的姿勢非常滑稽，他的兩腿鬆鬆垮垮，他的手臂與其說是在指揮，還不如說是在抽風，隨著手臂的揮動，他全身做波浪式的抖動，豐碩的屁股在肥大的西褲裡扭來扭去。無疑，這樣的形象離一個大家在電視上看見過的專業指揮還是有較大距離，合唱隊裡很快就爆發出笑聲。我在不遠處拍攝時，也差點忍俊不禁。但楊部長好像絲毫不計較大家的笑聲。

「別笑，我得慢慢找到感覺是吧？我又不是卡拉揚。」他說。他依然旁若無人地揮舞著他抽風似的手臂。

楊部長斯言誠然。當然不能拿這位前小學語文教師、現任的工地管理者和著名的指揮家卡拉揚相提並論。更何況，現場又有幾個人知道卡拉揚呢？這一點就讓人敬佩。他雖然只讀了高中，但多才多藝，能說會道，一度憑藉自己的聰明和努力儕身於民辦教師隊伍，後來因為耐不住做老師的清貧，半路轉行到了待遇相對優厚的工程行業。在這個陌生的行業裡，他從零開始，勤學苦讀，取得了工程專業的自考大專文憑，此外還考了好幾個行業內的資質證書。相比之下，指揮拍子打得業餘了些，完全是瑕不掩瑜。

而楊部長轉行到工程行業，主要是受了他堂哥的影響。「我哥是個活絡人，他原來是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幹部，專門負責招投標的，後來跳槽出來，自己組建了公司，利用以前在高管局掌握的豐厚人脈資源，專門給人家招投標。」有一次，他毫不忌諱地跟我坦言，「說白了，就是一個提籃子的呢。光婁底路橋一個公司我哥就給它中過四次標。」

「提籃子」是湖南俚語，意思是掮客，也就是工程行業的仲介，通過關係給其它公司中到標，從而根據標的的總價值賺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我高中時的師兄兼好朋友阿二，多年前就開始在長沙經營一家工程建設公司，主要從事路橋建設行業，據說業務做得風生水起，收益頗豐，因此在家鄉享有盛譽。一次我途徑長沙，去看望他，發現他的公司完全是一家空殼公司。公司裡除了幾個給他開車打雜的馬仔，幾乎沒有任何專業人士。而我的朋友本人從來沒有受過任何有關工程方面的專業教育，平時也不上班，買來的辦公室幾乎空著，他只是偶爾去公司喝茶會友。

他的公司有個響亮得讓人過目不忘的名字：「金土木」——無疑這是一個寓意美好的名字，同時準確地揭示了這個行業的特點。「金土木」公司位於黃金地段的高檔寫字樓內，在那裡，我喝著他泡好的上等好茶，彼此感慨地回憶了一番高中時的年少往事。再後來，我問及他公司的運作方式，這位老總朋友坦率地告訴我——他和某副廳長的關係不錯，從而經常能在某些工程中拿到標的，再轉手賣給一些有實力和資質、但缺乏關係和運氣的工程公司。

「我只要拿三個點的仲介費就夠了，這樣聊撇[2]得多。」他給我續了一杯茶，非常謙虛地說，「贊波，我其實是個沒多大抱負的人，只要

一年能賺個千把萬就夠了。」而要一年賺到一千多萬，送禮是必不可少的關鍵。他有一次在車輛的後車箱裡放了四百萬現金，去送禮，將車輛的重心都壓得變低了。我無比吃驚地聽著，感覺像是在聽一個遠古的神話故事。

大概因為那次去朋友公司參觀的大開眼界的經歷，楊部長的講述就顯得見怪不怪。在他看來，中標像唱歌一樣，是一門藝術，既要靠實力，更要靠關係，而現在，深諳關係之道的楊部長，也深諳紅歌比賽要獲勝，需要一定的訓練和實力。此時，他正帶著對祖國濃濃的愛意，揮舞著他肥胖而短小的手臂，試圖牢牢控制著這支業餘合唱隊的節奏和力度，但效果卻差強人意。他還不是卡拉揚，而他手下的散兵游勇，也不是維也納合唱團。

黨書記毛總過來觀摩了一下合唱隊的訓練，提出了不滿，他感覺這支散兵游勇，無異於烏合之眾。出於為自己聲譽著想，他建議去當地的學校請一名音樂老師來指導。毛總是出生在毛澤東時代的人物，他最崇拜的人物也是他的本家毛澤東。有一次，他面對我的鏡頭真誠地說：小張，還是專制好呢！中國搞民主不行的。他的民主意識雖然比較淡薄，但集體榮譽感卻很強，對關係到項目部集體聲譽的公共活動向來充滿了熱情。

有了毛總的旨意，楊部長很快就去附近的一所私立中學請來一位女音樂老師，為此項目部付給她四百塊的薪酬。這筆錢出得很值。合唱隊的水準有了較大的飛躍，一些明顯的毛病被剔除了，節奏也變得比較齊整，重要的是，楊部長的指揮拍子似乎也好看了不少。女教師唯一束手無策的是：每當他揮舞手臂，肥大的屁股還是抑制不住地扭來扭去。

正式比賽的前一天，負責採購的老李進了城，他買回了合唱隊的演出服——一件黃顏色的「特步牌」有領短袖運動T恤。展開T恤，胸口印有一個帶著英國米字旗標誌的徽標，還寫著幾個大大的英文字母「LOVE BFC」。我問老李這個英文是什麼意思，他漠然地搖了搖頭，說「管他什麼意思。」可我還是無法遏止住我的好奇心，就去網路上查證，發現「BFC」是英國的一支乙級足球俱樂部「摯友俱樂部」（Best Friend Club）的簡稱。很顯然這是一件紀念版的足球服。

在採購衣服上，老李這個人有著格外頑固而自信的美學。他似乎特

別偏愛黃色的運動衣。前一年溆懷公司舉辦了一次「精細化施工知識搶答賽」，他給項目部參賽選手買回來的隊服也是一件黃色的有領短袖運動T恤。無論從顏色到款式，都和這次的「LOVE BFC」幾乎如出一轍，唯一的差別是胸前寫著大大的義大利文「TORINO」，左手臂上則是「公牛形象」的徽標—那仍是一件義大利乙級足球俱樂部「都靈隊」的紀念隊服。我一度疑心老李是一個鐵桿足球迷，要不他怎麼會這麼癡迷這些五花八門的外國乙級足球隊？

「老李，你是足球迷嗎？」我忍不住問他。

他納悶地看了我一眼，不冷不熱地對我說，「不，我從不看足球比賽。」

當合唱隊員們在興奮地試穿隊服的時候，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

「怎麼沒有褲子？」我問。

「褲子誰還買？穿自己的。」老李說。

「演出時大家一定記得穿上深色的長褲！」楊保國順著我的話提醒大家，「而且要將衣服下擺扎在褲腰裡，如果這樣直接罩下來很不好看。」比賽的章程裡，「服裝統一整齊」會在評比中佔有一定的比分。這點和其它的中國式群體比賽活動別無二致。我敢打賭，朝鮮的團體操比賽中一定也有這麼一項要求。

我無法克制自己不這樣想：「特步」商家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它的黃色Best Friend紀念款T恤，竟然會被一支紅歌合唱隊當做演出服，即將帶著它耀眼的黃色光芒出現在黨的九十周年生日慶典上。那家叫做Best Friend 的英國乙級足球俱樂部，就更不會想到，在遙遠的中國湖南，有一群高速公路的建設者竟然一邊胸懷著對他們的「LOVE」，一邊在激情的舞台上唱響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LOVE」。

很快就到了比賽的時刻，六月二十四日，那一天並非「真正」的黨的生日—七月一日，距「真正」的生日還相差整整一個星期。但中國人對這樣的安排見怪不怪，真正的紀念日將留給更高級別、更為隆重的活動。像一條高速公路的施工方舉辦的紅歌賽，純當為一次正式的大活動暖場熱身。何況，在六月二十四日給黨過生日而不是在七月一日，這和在七月一日給黨過生日而不是在七月二十三日或三十一日一樣，並不會降低什麼。對黨來說，重要的是精神意義。比賽在懷化市委黨校的大禮

堂內舉行。這是一間毛時代遺留下來的老式大禮堂，有著偌大的穹頂，莊嚴的雕花圓柱，肅穆的舞台和老式的木座椅。大禮堂的正門上，寫著毛澤東手書的「實事求是」四個鍍金大字，而門廊牆壁上，則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五位偉人」的標準畫像。舞台兩邊的牆上用金光閃閃的字體寫著：

领导我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這間整個結構和裝飾都散發著鮮明的毛時代氣息的建築內，舉辦紅歌大賽是再合適不過了。

舞台上已經佈置一新，而這也是典型的黨的意志和色彩的表現。舞台前花團錦簇，舞台頂上懸掛著橫幅，寫有「湖南省溆懷高速公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紅歌大會」，紅色的幕牆上貼有巨大的標題——「頌歌獻給黨，和諧譜溆懷」—並配以醒目的鐮刀斧頭和「1911—2011」的字樣。此外，還飾以飛翔的白鴿和金燦燦的流蘇。合唱團們在舞台下面分區落座，因為服裝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方陣。有一個方陣的所有演出者都戴著一頂黃色安全帽，這讓他們看起來醒目突出，收穫了不少目光。會堂裡人聲鼎沸，人們像過節般的歡樂，等待著比賽的正式開始。很快會場裡就安靜下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身著盛裝，走上舞台，用激情澎湃的開篇詞拉開了比賽的序幕：

男：九十年前的七月，一個偉大的政黨莊嚴地宣告成立
女：九十年前的七月，一面火紅的旗幟迎風冉冉升起
男：從此，中華大地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女：從此，華夏兒女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奇跡
合：今天很榮幸在這裡和大家一起慶祝黨的生日……

然後，主持人一一介紹了今天出席紅歌會現場的各位領導。溆懷公司的黨委書記激情滿懷地上台發言：

這九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社會變革最為廣泛最為深刻的九十年；是中國共產黨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艱苦奮鬥前仆後繼的九十

年；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個接一個勝利的九十年。回顧黨發展的光輝歷程，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像今天一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不出所料，他還將黨的精神和高速公路修建工作聯繫起來：

當前，漵懷高速公路建設已經取得階段性勝利……各項工作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我們一定要按照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與漵懷公司「加快高速公路建設，確保品質、安全生產與進度」的科學精神，一心抓生產，全力促發展，同舟共濟大幹下半年，超額完成年度計畫，穩固推進漵懷高速公路建設，向黨，向湖南省委，向湖南省人民政府，向懷化人民交一份完美的答卷……

最後，他對這次紅歌大賽提出了要求和期待：

同志們，在建黨九十周年即將到來的莊嚴時刻，在漵懷高速公路建設如火如荼進行的關鍵時刻，我們大家在此歡聚一堂，高唱革命的紅歌，這是唱勝利之歌，唱成績之歌，唱振奮人心之歌，我們一定要唱出發自肺腑的喜悅和感激之情，唱出積蓄已久的自豪與激越之情，唱響漵懷高速公路建設者團結一致、攻堅克難、奮力拚搏、無往不勝的主旋律……

顯然，這不僅僅是紅歌大會，還是一次排比修辭的盛會。自從我脫離學校生活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遭遇到這麼多的氣勢恢宏的排比句。它們像新鮮出膛的子彈一樣，鏗鏘有力地從舞台上迸射出來，瘋狂掃射著我的耳膜和神經。這幾乎是一個規律，越是隆重盛大的節日，越是中國的領導們（秘書們）展示他們文采斐然和激情似火的時刻。而每支合唱隊演唱前，都有一篇由一男一女搭配朗誦的「開篇詞」，這是當天演出的最大亮點。朗誦的內容一律充斥著華麗而宏大的辭藻，融合了排比、反問、比喻、借代、甚至通感等各種修辭於一體，但情感空洞，甚至做作虛假，不知所云：

誰說人類是上帝的安排？誰說命運由神靈主宰？中國的事實就把這個謬論擊敗，我黨的偉大比神靈更值得信賴……

九十年前的南湖紅船，九十年後的世界舞台，中國的變化與發展誰不為之震撼喝彩，看！屹立天地人間的高樓大廈，貫穿東西南北的公路橋樑，哪點遜色於國外，哪點不受世人青睞？

嘹亮的歌聲喚起華夏兒女的自豪和嚮往，優美的音樂奏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樂章，讓我們一起回顧光輝的歷程，難忘的歲月，憶往昔，沒有前輩的雪山草地，哪有今日的繁榮昌盛；沒有前輩的堅持抗戰，哪有今日的社會和諧……

透過歷史的眼眸，我們站在歲月的肩膀上眺望，一九二一年七月，南湖蕩漾，一個巨人破天而出，從此鐮刀和斧頭組成圖案的旗幟迎風飄蕩，從此沉浸在黑暗中的靈魂有了太陽照射的光芒……

南湖船泛水波紋，盛世今朝頌黨恩，各族兒女興家國，攜手翻身做主人……

這樣的表述本質上和紅歌別無二致，它類型單一，意象固化，風格突出，既繼承了中共的締造者毛所開創的「革命浪漫主義」傳統，也融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中國的宮廷或官方文學似乎是從《詩經》的「頌」開始，到了漢代的「賦」，這一傳統成為典型，但在今日讀上去已經全然不知所云，只是詰屈聱牙的華麗辭藻和排比。我不知道過了幾百年後，人們會如何看待今天的黨化修辭，或許，它們創造了漢語表達的新境界。

我還注意到，黨誕生的那艘南湖遊船，和其它黨的聖地一樣，在朗誦中被一再「深情」地提到。其中一位女性朗誦者，因為緊張，一張口便將「南湖」誤讀成了「南海」：

是你開啟了南海的紅色航船，是你讓星星之火燎原中國大地，是你讓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聯想到此時緊張的中國南海局勢—因為領海爭議，中國和菲律賓、越南等鄰國正在那裡暗暗角力—這個一不留神的口誤，似乎散發出新的弦外之音，難免不讓人浮想聯翩。不僅僅是文辭，朗誦者的口音也是五花八門，風采各一，他們說著普通話，但夾雜著各種濃重的家鄉口音，

用從電視裡學來的腔調故作高亢地抒情──似乎是那些空洞而高亢的詞彙、腔調及肢體語言，倉促地嫁接到一個施工員或挖機司機身上。如果你不吝嗇自己的雞皮疙瘩的話，那麼你就可以來這所老禮堂體驗一下。

在正式演唱環節，也許因為準備不足，也許因為緊張所致，幾乎所有的表演隊伍都存在問題。他們明顯配合不當，歌聲和身姿都顯得非常僵硬，好像在夢遊一般。有些合唱隊有著明顯的跑調，甚至忘了詞。最糟糕的是大禮堂的音響設備，估計也是毛時代留下來的老古董，唱到最高音處，大禮堂裡迴蕩著幾乎要讓耳膜炸裂的巨大轟鳴，好似十架轟炸機正同時飛過頭頂，彷彿讓人回到了戰爭年代。

指揮也是當天演出的焦點，他們打拍子的姿態萬千，令人眼花繚亂。要不太過豪放，要不太過婉約，要不過於靈活，要不過於僵硬……。有一位看起來有幾分麥可．傑克森的神韻，他的指揮動作像太空漫步，又像觸了電。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阿姨，穿著一條和她的體型和氣質不甚匹配的黑色短裙，隨著她的手臂狂亂地揮舞，她傾斜的身子不斷地抖動，裙擺也隨著她的韻律一甩一甩，好像在經受著狂風大浪的沖刷，有好幾次幾乎都要露出裙底，讓觀眾為她懸著一顆心。看了他們的表演，才知道我們當初取笑楊部長的臀部，是多麼的狹隘。

除了台上的精彩紛呈，台下的觀眾也不容小窺。他們及時地根據場上的表演爆發出陣陣掌聲、笑聲或者喝彩聲──大部分時間這三種反應都只表達一種情緒：喝倒彩，尤其是指揮阿姨在甩動她的黑色短裙時。只有一支合唱隊上場時，全場爆發出難得的真正喝彩──那支隊伍裡的女演員，都穿著白色的性感低胸紗裙，像好多新娘子在參加集體婚禮。頃刻，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經久不息的喝彩，甚至夾雜著銳利的口哨和呼嘯──以至於我在台下拍攝時產生了一種錯覺，恍惚以為我置身在一群老光棍的相親會現場，而絕不是什麼慶祝黨的九十華誕的歌會上。領導發言時的「偉大、光明、正確和莊嚴」這時已經蕩然無存，整個氣氛變得非常諧趣，甚至粗鄙。

比賽上還出現了令人譁然的一幕。一個演唱隊在演唱《歌唱祖國》時，別出心裁地安排了四個隊員，每人分別高舉著一個大字牌，合起來是「祖國萬歲」。但是，高舉「國」字的隊員太緊張，他竟然將牌子舉倒了──「國」字成了腳朝上頭朝下。於是全場譁然，台下有人在大聲叫喊：國字拿倒啦，國字拿倒啦！但舉牌者太緊張，他似乎什麼都聽不到，全然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直到演出結束，合唱隊紛紛走下舞台，

還有人戲弄地對著粗心大意的他大聲喊叫：你這是顛覆國家罪！全場又爆出一陣笑聲。我拍攝下這一幕，額頭上冒出一陣冷汗。我想，幸好這只是在毛時代的禮堂裡演唱毛時代的歌曲，而並非身處真正的毛時代，要不然，這位粗心大意的演員命運擔憂。

在經歷了各種好戲後，總算輪到十四標項目部合唱隊出場了。他們抽的簽很不好，倒數第三位出場。這時，全場的高潮期已經平息，最悲劇的是，隊員們發現選定《歌唱祖國》參賽是最大的錯誤—儘管這首被毛親口稱讚的歌曲，很適合在這座懸掛毛的畫像且非常毛式風格的大禮堂內演唱，但之前至少有五支隊伍也同樣這樣看。這首歌已經被演唱了五次，觀眾和評委對它馬上被第六次演唱變得麻木，甚至厭煩。演唱頻率僅次於《歌唱祖國》的另一首歌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創作於一九四三年的革命歌曲，被反復演唱了四次。因為避重就輕的投機心理，現在，他們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當十四標合唱隊員穿著「LOVE BFC」的足球服紛紛上台時，他們臉上的沮喪神情難以掩飾，就像一隻喪失了鬥志的乙級隊，走上一場註定要被打敗的淘汰賽。

但楊部長是個例外。他依然保持著一以貫之的激情。他不但擔綱指揮，還和項目部的另一位女職工共同朗誦了「開篇詞」：

女：風風雨雨九十年，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它肩負著五湖四海中華兒女的的重托，引領著十三億國人奮發圖強。

楊：迎著朝陽乘風破浪，開創了一次又一次科學發展的歷史輝煌，九十續華章，路橋逢盛世，讓我們每一個路橋人高唱讚歌–

合：祝福我們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

隨後，莊嚴的大禮堂裡第六次響起了《歌唱祖國》的歌聲：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
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歌聲既不嘹亮，也不高亢，對祖國和黨的熱情在急遽下降。楊保國面向合唱隊成員而站，右手揮舞著一根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劣質指揮棒，像一個憤怒的老師正舉著教鞭訓斥一群恨鐵不成鋼的學生。他的屁股還

是在肥大的西褲裡扭來扭去，但此時已經鮮有人關心他了，甚至連一點喝倒彩的笑聲都沒有──台下非常安靜，大家都只盼著這場漫長而笑料百出的演出快快降下帷幕。

最後比賽結果揭曉，十四標什麼名次也沒拿到，除了一個無關痛癢的「優秀組織獎」──凡是參賽隊伍都無一例外地獲得了這個安慰獎。第一名由演唱《走進新時代》的十九標奪得，而演唱《歌唱祖國》的六支合唱隊全軍覆沒。

黨的九十華誕終於來了。項目部宿舍樓的客廳裡，電視依然播放著各種各樣的紅歌節目。聲音開得很大，我關起門坐在屋裡看書時，都會聽到穿牆而來的高亢的紅歌聲。重慶衛視的《天天紅歌會》這檔欄目，在項目部有三個鐵桿粉絲，一個是皮卡車司機，一個是測量員，還有一個是工程科的副科長兼施工員。司機最年輕，只有三十多歲，測量員四十來歲，施工員大概五十來歲。他們幾乎天天都準時地出現在電視機前，在觀看的全程中幾乎不聲不響，保持著一種儀式般的莊嚴和沉默。在黨的生日這天，我穿過客廳時又見到這不無詭異的一幕，三個人面帶虔誠的表情，不聲不響地並排坐在沙發上，眼睛緊緊盯著電視機。螢幕上正在直播《天天紅歌會》的特別節目──建黨九十周年晚會。來自重慶各地的合唱隊著裝整齊劃一地站在舞台上，激情澎湃的男男女女輪番朗誦著高亢的開篇詞，合唱著各種革命歌曲──雖然水準比起修路工人要高很多，但與我在大禮堂裡看到的別無二致。它們都脫胎自一個共同的母體。

「唱紅歌有這麼好看嗎？」我終於忍不住地問。

他們的眼睛一齊從螢幕上調轉過來，奇怪地盯著我。「好看啊。」年輕的司機回答。

「可是，天天看看不膩嗎？」

「這怎麼能看得膩？」這次，是年長的施工員接口說。

「可是紅歌都差不多一樣……」

「今天是黨的生日，看到唱紅歌，就可以瞭解到我們的過去。」年輕的司機回答。

「瞭解到祖國的歷史，就知道今天來之不易啊。」年長的施工員補充：「以前從來沒有在電視上見過這麼多紅歌，現在幾乎每個台都在

唱，這樣很好。」他似乎很滿意。但測量員轉變了話題：「今天是黨的九十歲生日，項目部竟然一點活動也不搞？」他轉過頭來，對著我的攝像機不滿地說：「我們這裡有十來個黨員，可連個黨支部都沒有，不知怎麼搞的。」

「你們是黨員嗎？」

「我是預備黨員。」司機靦腆地笑了。

「我是老黨員。」測量員說。

「我都有十多年的黨齡了。」施工員的言語中透著隱隱的自豪。

除了喜歡看紅歌外，這三個出生於不同年代的黨員也都很崇拜薄熙來。他們認為薄熙來在重慶開展「唱紅打黑」非常了不起。

「薄熙來很正直，黑社會分子就應該嚴厲打擊。」老一點的施工員說。

「我猜薄熙來應該在明年的十八大進常委，他完全有領袖的風範和魄力。」司機說，「要是我能投票，我就投他一票。」

「這個社會需要薄熙來這樣的人，要是所有的官員都像他一樣就好了。」測量員做出總結。然後反問我：「你覺得呢？」

我沉默了一下。「也許他確實有個人魅力，但是，那種運動式的『唱紅打黑』總是有問題的。」

「能有什麼問題呢？這個社會就是需要這樣的運動。」老施工員來不及聽我闡述理由，就打斷了我的話，「那些貪官污吏們才怕這樣的運動，我們這樣無權無勢的老百姓當然歡迎他的運動。現在的社會風氣太差了，大家都向錢看，我覺得還是毛澤東時代好。」

他們不是我在這裡第一次遇到的黨員。項目部還有其他黨員，比如說安保部部長兼合唱團指揮楊保國，他的黨齡是十六年。而在黨的生日那天，他的思考重點和客廳的三個紅色電視迷不一樣，不是唱紅，也不是打黑，而是和平日一樣務實。當天早晨，他剛刷完考勤儀，就向辦公室主任老李發出提議。

「老李，今天是我們共產黨的節日，」他說，「應該組織個黨會什麼的嘛，大家一起喝點革命小酒。黨的工作要做好，革命小酒一定不能少。要不給我們這些老黨員每人派發件衣服算了。」他露出了憧憬的神情。

「或者乾脆發點錢，一年黨齡發十塊錢……」他扳著手指頭算起來，「我是九幾年入的黨，一二三四五六……到今年十六年黨齡，一年

十塊，我也能得一百六十塊。」他開心地笑起來，彷彿剛才的願景瞬間變成了現實。

「最好每個黨員都發十萬塊。」爆破科袁科長半打趣半嘲諷地說，「如果我們婁底路橋的老總在黨的九十歲生日這天，敢給公司的每個黨員發十萬獎金，那他一定會在全國出名，並且保證能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袁科長不是黨員，他生性幽默，喜歡調侃人，他甚至直言不諱地稱項目部的黨員為「腐敗黨」，稱七月一日為「腐敗節」。

實驗室的老劉也持類似觀點。「我覺得，黨旗上的鐮刀斧頭應該換了，」他指著電視屏幕上正出現的一面鮮豔的黨旗──央視正在重播昨晚的慶祝晚會，說，「應該換成人民幣。」

「對，『為人民服務』也應該換成『為人民幣服務』。」另一個年輕的職工補充說。

「我們老家村裡的黨支部今天組織黨員去韶山旅遊去了，」楊部長絲毫沒有受到這些「反動分子」的冷嘲熱諷的影響，他依然沉浸在對黨的組織活動的嚮往中，用遺憾的口吻說，「可惜我不在家，沒有趕上。老李，我們怎麼也不搞點紅色旅遊項目啊？」

紅色旅遊最熱門的地方是韶山，毛的故鄉，一個位於湖南湘潭縣境內的偏僻山沖，距項目部所在地有五百餘公里。它是中國共產黨員的「朝覲聖地」，每到和黨有關的各種日子，都會有大量黨員從全國各地湧向那裡。甚至有黨員在那裡的巨大毛銅像前舉辦集體婚禮，只為了讓已「去見了馬克思」的毛成為他們的證婚人，而並不忌諱毛個人的婚姻之途其實坎坷不平，其婚姻伴侶也皆無善終。中國有八千多萬黨員，外加數目更多的崇拜毛的普通民眾，韶山的紅色旅遊因此變得格外興隆。中共的誕生地──那棟老房子和那條遊船也是紅色旅遊的熱門景觀。我曾經去過那座石庫門建築風格的兩層老房子，它們被中共彌足珍貴地保留和修繕，奇跡般地歷經各次破舊立新的時代浪潮，留存於繁華喧囂的上海「新天地」商圈。你可以看到中共一大召開時的復原場景，十五位當時參與會議的中共創始人的蠟像，圍桌而佈置。焦點人物是一尊穿著長衫的人，他是唯一正面面向參觀者，且保持直立和演講姿態的蠟像，他就是毛澤東。其他人或背面或側面而坐，保持著仰視和聆聽著毛的虔誠姿勢──儘管這樣的場景有違歷史事實，毛在當時還並不是黨的領袖，他之後要經歷各種黨內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後才取得黨的核心地位。而毛的主要黨內對手張國燾，則和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劉仁靜等其

他幾位被中共認為形象不光輝的創始人蠟像，卻乾脆完全背對著參觀者，沒有人能看清他們的面容。

歷史的書寫官不光創造出文字的歷史，還動輒演繹出視覺的歷史。與各種主旋律電影電視劇的編導一樣，他們生動地詮釋了黨的史觀，還形象地解釋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這兩個帶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彙。至於那艘紅色遊船，雖然在中共奪權後真跡已無處可覓，但這絲毫難不倒想象力和行動力都超強的黨，他們很快就複製出一艘，足以以假亂真，至今還擺在南湖上，供人瞻仰。黨宣稱至今有近三千萬人次瞻仰了它，說它是世界上最尊貴的一艘船。

楊部長不一定是想朝聖那艘船──他更喜歡旅遊，勝過紅色。關於他的熱情提議，老李冷漠地攤了攤手：「這個我做不了主，得聽毛總的。」

毛總不僅僅是老總，他還是項目部名義上設有的直屬婁底路橋公司所管的「黨小組」的「黨書記」。如同楊部長和那位黨員測量員所抱怨的，在黨的九十華誕當天，項目部沒有任何慶祝活動──前幾天的紅歌大會不算，那只是由上級部門組織安排的活動。黨書記毛總竟然在這意義重大的一天不見了蹤影，只留下這些被黨所遺忘和拋棄的黨員和民眾在自娛自樂：白天大家照常刷卡上班，晚上大部人一如既往地玩牌，上網，打電遊。但那三個喜歡看紅歌節目的黨員除外。他們既沒有自暴自棄，也不像他們的同志楊部長那麼物質主義，這種「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讓我佩服不已。

二○一二年四月份，我再次從北京回到湖南的工地上。項目部的人紛紛地找我這個京城來的人打聽關於王立軍和薄熙來的隱祕八卦──那時候，王立軍投奔美領館東窗事發，薄熙來和他的夫人薄谷開來受此牽連，已經正式被中央立案調查。昔日叱吒風雲的政壇明星，轉瞬變得前途未明、生死未卜。這起極富戲劇性的事件一時讓舉世譁然。

在消息嚴重不對稱的中國，各種坊間的小道消息漫天飛舞，哪怕在遙遠的湖南鄉下，也是大家茶餘飯後方興未艾的談資。我注意到，大家基本上持兩派意見，一派人認為薄熙來就是違法亂紀，中央懲治有理。另一派認為這是政治鬥爭，是某些人嫉妒薄的才華和威望故意陷害他。來自重慶巫山的民工老何，就堅定地持後一種態度。老何是薄書記治下

的一名農民，他是一位標準的「薄粉」。在薄熙來身陷囹圄之後，他難掩悲憤，要給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欄目寫信，給薄伸冤。

儘管在看待薄的落馬原因上兩派的分歧很大，但在預測薄的未來時卻殊途同歸，他們都認為薄的政治前途已經終結了──不光老何這麼想，項目部的黨書記毛總也這麼想。

「這肯定是一起政治鬥爭。」毛總遺憾地說，「薄熙來能力還是很強的，這麼倒了，確實比較遺憾。」顯然，這位覺得「專制比民主好」的黨員老總，並不太清楚薄在位時針對他轄區內的民營企業家做了些什麼。這位同樣是民營企業家的老總，更意識不到有時候專制對他的傷害可能比對普通民眾來得更甚。

那位年輕司機、預備黨員，曾猜測薄要進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現在對薄的前途也不再樂觀。然而他並不悲憤，如老何；也不感到遺憾，如毛總。他已經視薄熙來如路人甲。

「薄熙來出事了，你是不是覺得比較傷心？」我問他。

他笑了笑，有點不好意思的回答我：「才不呢，我現在不喜歡他了。」

這個回答委實讓我吃驚，距離去年他向我表達對薄的崇拜，還不到一年時間。

「那你還看紅歌嗎？」我接著問。

「早不看了。」他笑了笑，有點不太自在地走開了。

宿舍公共客廳裡的那台電視機，真的有好久沒有打開過了，上面還有一層厚厚的灰塵，灰塵上還有些凌亂的手印。那晚我睡得很沉，夜夜笙歌的紅歌聲從此再也沒有飄進我的屋子裡。

牌局與馬戲

在沒有紅歌比賽的日子裡，這些工地職工貧乏可憐的娛樂，除了看電視，就是打牌。晚飯後，無論你到哪一層宿舍樓，通常都會看到一桌牌局已經開設起來，在二樓有一局玩「鬥牛」──一種猜大小的撲克牌賭博遊戲；三樓的客廳裡有桌在玩字牌──一種類似於麻將的湖南紙牌。這兩桌牌的輸贏金額都不算太大，通常一個晚上幾百上千元。與其說他們在

玩牌，還不如說他們在打發無聊的時光。

最高規格的牌局就設在我隔壁──和我的宿舍一牆之隔，裡面住著兩位老總。孟副總，主管協調；龍副總，主管生產。這裡是整個項目部的主戰場，擺放著一張不用人工洗牌的電動麻將桌。孟總和龍總通常有三個常客，其中一個是黨書記毛總，另外兩個，一個是包工頭龍贏鋒，一個是監理處的黃監理。他們都不住在這裡，每次晚上都特意驅車過來玩牌。

隔音效果很差，當我在宿舍回看白天拍攝的鏡頭時，就會聽到隔牆劈哩啪啦的電動洗牌聲、各種出牌聲、間或還有突如其來的嬉笑或爭論聲，這些聲音每每要持續到凌晨。有一天，我被隔壁的麻將聲給吵醒了，看了下手錶，已經是凌晨五點多，窗外已經露出朦朦曙光。被麻將聲吵著的可憐蟲還不止我一個，辦公室主任老李也是受害者，他的宿舍正好位於孟總的房間正樓下。有一天晚上我走進他的房間，聽到樓上傳來熟悉的劈哩啪啦聲。老李斜躺在床上，眼睛仰視著天花板，表情複雜地啜了啜嘴說，「聽，又開始了！」老總們玩得最大，一般一個晚上有幾千上萬的輸贏。這個數字很容易推算：我每次走進他們的屋子，發現裡面總是煙霧繚繞，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抽菸，而每個人面前的桌子上都堆著一疊粉紅色的百元鈔票。因為鈔票上印著毛的頭像，他們管它叫「毛爹爹」。

項目部玩牌的風聲經由某個特殊的管道傳到了上級機構。婁底路橋總公司顯然意識到：對於幾乎每天都要出工的項目部來說，徹夜賭博之風肯定有損工作效率。因此提出禁賭令。總公司的一個副老總，親自來項目部頒發此令，違者罰款。而毛總和佘總也斬釘截鐵地表明，項目部一定會嚴格執行總公司的禁令，毫不手軟地向違紀者開刀。看到這一幕，我欣喜地心想，從今晚開始應該就再也聽不到麻將聲了。當天晚上，宿舍裡突然安靜下來，安靜得有些令人不適。

然而，第二天晚上，它又照常響起了！我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寧可認為是電動麻將桌出現了故障，正處於失控狀態，也不相信是有人在「頂風作案」。我好奇地推開隔壁房間的門，發現裡面像往常一樣煙霧繚繞，孟總、龍贏鋒、黃監理和毛總，圍著電動麻將桌團團而坐，洗好的牌一摞摞壘在各自面前。看見我進來，他們抬了一下眼睛，又旁若無人地沉浸在遊戲中。

我忍不住問他們，「不是說要禁牌了麼？」

「沒事，視察的領導已經回去了。」毛總笑了笑，打出一張牌，「三筒。」真讓人不敢相信，一天前措辭嚴厲地指出賭博的危害的那個人，就是此刻打出三筒的這一個。

「禁牌還不是假的？兩萬！」孟總打出一張麻將，豪爽地對著我說，「不打牌怎麼過啊，那大家不要在工地上搞了。」

「我們爭取少打點，不影響工作就可以了。」黃監理說，「小賭怡情嘛。我碰了。」

只有龍贏鋒一直思考著他的牌，沒回答我的問題。

我走出房間，發現外面客廳裡的那一桌牌局也已經開始了，圍觀的人還興高采烈地開著玩笑：「罰款罰款，我要去總公司舉報你們！」

有一個打牌的人接腔說：「你快去舉報吧，先罰了裡頭那一桌再說，」他指著孟總房間說，「我們罰一百的話，他們至少要罰一千，因為他們的賭注至少是我們的十倍。」

「就是就是。」其他人紛紛附和。整個場面看起來熱烈而和諧。

在中夥鋪的日子確實是乏味而單調。尤其到了夜晚，這座小小的村鎮就變得更加平淡無奇。和許多鄉村一樣，這裡既沒有電影院，也沒有舞廳，除了簡陋的網吧裡，偶爾有稀稀落落的幾個學生熬夜打遊戲外，大多數家庭一吃完晚飯便熄燈睡覺，村子裡便到處一片死寂。因此，偶爾出現的「盛會」便會吸引所有村民的注意。唐老師曾經「製造」過一次，那就是新留雲寺的落成典禮，他把它變成了一個雜糅各種文化展演的大派對，既上演地方戲曲、滑稽戲表演，也有流行歌曲的演唱。這是傳統的龍燈巡遊和儺戲儀式在當地逐漸消亡後，中夥鋪村迎來的一次非常罕見的大眾文化活動。無數村民們冒著大雨來到了留雲寺，還吸引來了不少高速公路工地上的修路工人和管理人員。兩個不同群體的人們，其樂融融，並肩站在寺廟屋簷下，共同觀看了這一場難得的鄉村盛會。

另一次熱鬧非凡的「盛會」是一個馬戲團的意外到來。二○一二年春天的某個中午，樓下馬路上反復傳來一陣喇叭聲，一個口音很重的男聲用生硬的普通話喊著：

雄獅馬戲團今晚精彩演出，不要錯過。票價八元，物有所值……

我往窗外一看，一輛大棚卡車在馬路上緩慢地開著，車身上畫著老虎、獅子、猴子等動物，還有一個美女，而「雄獅馬戲團」五個字醒目地寫在動物和美女旁。不少中夥鋪的村民站在路邊，興高采烈地看著這輛車開過，項目部的人也站在門口議論紛紛。

下午，從工地上回來的人帶來更準確的資訊：馬戲團是浙江那邊過來的，今晚八點演出，地點就在十三標段項目部旁邊的空地上，現在帳篷已經快搭好了。

「就是馬戲嗎？有沒有豔舞啊？脫衣舞、鋼管舞什麼的？」一個年輕人問。

「應該有吧，這種大篷演出一般都會搞點特殊表演的。」另一個回答。

他們倆的一問一答立刻激起了大家的興趣。吃完晚飯，項目部的年輕人分乘兩輛皮卡車—連後面的貨廂裡也站滿了人—趕到了馬戲團的大帳篷邊。帳篷是在一塊坑坑窪窪的泥地上搭起來的，像一個超大而簡陋的蒙古包。裡面早已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高音喇叭在放著歡快的流行歌曲。

成群結隊的當地村民從四面八方趕過來，好多還拖兒帶女，他們興高采烈地圍在門口，買票入場，孩子們在一旁打打鬧鬧，氣氛熱烈得好像過節一般。門口的售票窗口上寫著「票價：成人八元，兒童五元」。場內，地面上已經圍起了一圈高高的鐵柵欄。裡面樹立一根更高的杆子，上面掛著一盞雪亮的燈泡，許多蚊蛾密密麻麻地圍繞著燈泡飛舞，將它們碩大而怪異的影子投射在四周的觀眾身上。鐵柵欄外是幾圈髒兮兮的塑膠椅子，因為地面不平，人一坐上去就不斷地搖晃。在表演之前，好幾位商販兜著圈不斷遊走，賣爆米花、火腿腸、茶葉蛋，還有專門針對兒童的螢光棒和彩色氣球。他們是馬戲團的工作人員。

一個穿著土氣的中年男子出來報幕，他面無表情，用無精打采的蹩腳普通話開始了他的開場白：

馬戲傳四海，雜技揚五洲。雄獅馬戲團對各位觀眾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真誠的感謝，願我團的表演陪您度過美好的夜晚和歡樂的時光……

他的講話有著明顯的江浙口音，聽起來很熟悉，應該就是大篷車上

那個聒噪的喇叭聲。

表演開始了。一個穿著緊身表演服的青年男子手持鞭子，將一隻大獅子從鐵籠子裡趕出來，全場一陣驚呼。孩子們瞪圓了眼睛，露出一片驚愕的神色。在馴獸師的不斷鞭打下，大獅子極其不情願地表演了鑽火圈。這隻可憐的獅子毛髮稀疏，顯得營養不良，也可能是老了，牠懶洋洋的，極不耐煩、漫不經心地完成著任務。在鑽火圈時，牠的跳躍顯得鬆弛而乏力，剛夠勉勉強強鑽過火圈，甚至有幾次將火圈碰倒了好幾個。牠還不時地扭頭朝馴獸師咆哮幾聲，露出鬆鬆垮垮的牙齒，但很快就會遭到一陣鞭打。當牠朝主人露齒咆哮的時候，觀眾席上就會響起一陣興奮的歡呼聲，還有年輕人吹響了尖銳的口哨。

繼獅子之後，一隻動作笨拙的大黑熊出場了，牠在髒兮兮的地上翻著筋斗，在一片梅花樁木上表演行走和跳躍。再後來，一隻猴子和一隻山羊表演了走鋼絲。除了孩子，成人觀眾剛入場時高漲的熱情和新鮮感，很快就被這些了無新意的程序表演弄得乏味了，有人打起了呵欠，有人掏出菸來，噴雲吐霧。

「什麼時候表演帶勁的節目啊？」終於有人問到。

「就是，老耍猴子把戲沒意思。」有人附和。

但很快就中場休息了，這時高音喇叭響起來，適時地推銷一種「祖傳的」膏藥：

專治腰肌勞損，頸椎酸痛，跌打損傷，風濕關節炎，由祖傳祕方精製而成，原價三十八元，現在特大優惠價五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配合著高音喇叭，一個商販面無表情地，手持裝著膏藥的托盤，穿梭在觀眾席裡。但大家只是看看，購買者寥寥。

好不容易等到下半場開始了。結果還是那位穿緊身服的男子出場，他相繼表演了騎獨輪車和小魔術。再後來，一隻黑狗表演了算數。最後，那只年老的獅子再次出場，和一匹馬聯合表演了「獅子騎馬」的壓軸戲──整個表演就草草結束了。人們暗地裡期盼的「特殊節目」並沒有上演，項目部的人發出了失望的噓聲。但他們的壞情緒並沒有持續很久，很快，他們就有說有笑地去街道邊的夜宵攤喝起了啤酒──這個八塊錢的馬戲之夜，儘管不盡如人意，但對於當地人或修路者來說，還是物

有所值，難得的帶來一陣歡樂。

人人都愛「橋頭堡」

好在沒過多久，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地修路民工來到中夥鋪村，這裡單調的娛樂生態很快就出現了顯著的改變——「橋頭堡」橫空出世。

「橋頭堡」這三個字，是我來到中夥鋪後最頻繁聽到的一個詞彙。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它時，正拎著攝像機在工地上溜達，一群民工正在埋頭搬運著石塊。當我走過去，他們都好奇地停下來，抬起頭來怔怔地看著我——這是工地上經常上演的一幕，一個拎著攝像機的外來者永遠讓民工們充滿了好奇心——就像我永遠對一群正在埋頭勞作的民工充滿好奇心一樣。我朝他們微笑地點了點頭，拿著攝像機，拍攝著他們。

一個民工突然指了指我的攝像機，笑著說，「你應該拿這個東西去橋頭堡拍拍。」他穿著一件髒兮兮的迷彩服，衣服的暗色花紋幾乎被泥巴和塵土遮蓋不見了。但他說話的時候，臉上的笑容非常燦爛。

「什麼？」我沒聽明白。

「你應該去橋頭堡拍攝一下，那樣才精彩。」他重複了他的話，臉上的笑容更增添了一層神祕，「我們沒有什麼好拍的，我們都是土包子。」其他民工一陣哄堂大笑。他們幾乎笑得前仰後翻，站在泥地裡直不起腰來。

「橋頭堡是哪裡？」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這個「橋頭堡」一定不是個平凡的地方。

「橋頭堡你都不知道啊，你還當記者？」那個穿迷彩服的民工笑得更加燦爛，顯然，他將我當做記者了。「就在那座橋旁邊啊，你應該去採訪採訪。」他指了指龍門溪的方向。

「就你這個鬼不正經，莫嬲別個囉，人家還是個毛頭小伙子呢。」一個年紀大的人出來打圓場，他呵斥著大家，「快幹活快幹活，要不又要下雨了！」民工們又是一陣大笑，停止了對我的圍觀和調侃，重新開始手中的工作，不再搭理我。

我回到項目部，當我問一個施工員橋頭堡是個什麼地方時，也引起他一陣大笑。「橋頭堡啊，就是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地方。」他雙手圍攏，比劃了一個燈籠的姿勢，「怎麼了，你也想去體驗一下生活嗎？」

我馬上證實了自己的猜測。我在工地上被那個穿迷彩服的民工調侃時，就大致猜到了橋頭堡是何方神聖。因為在底層民間，能突然引起大家那麼濃厚的興趣和歡樂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和「那話兒」有關。

「一般來說，只要我們去哪裡修路，哪裡馬上就會開這種店。」施工員繼續笑著說，「這也沒什麼，畢竟這麼多民工常年在外，離家分居，有這個需求嘛。哪裡有需求就哪裡有市場囉。」

我找到了橋頭堡，就在省道跨過龍門溪的大橋之南側橋頭。它並非像「堡壘」一樣封閉，而是一棟普通的兩層民居，緊挨著旁邊一棟修路民工租住的宿舍樓。它的外牆髒兮兮的，沒有掛任何的招牌，但長廊裡並排掛起了四盞嶄新的紅色大燈籠，即便是在白天，都亮著燈光，顯得鮮紅璀璨，瞬間就賦予了這棟房子與眾不同的氣質。最打眼的，是它大門敞開，而堂屋裡，一把有著俗氣花紋的長沙發上，橫七豎八地躺靠著好幾個女子，穿著暴露、身材健碩，年紀似乎都不算太輕，看起來都有三十多歲。除了臉上的妝化得稍微濃豔點外，看起來和別的農家女人沒有什麼不同。

我剛在大門口停留一會，門內就有人注意到了我，起先是一位白衣女子，她慌慌張張地從斜躺著的沙發上坐直起來，瞪著怔怔的大眼睛看著我，臉上露出緊張而訝異的神情。旁邊的其他幾位女子也一陣騷動，紛紛從沙發上爬起來，齊刷刷地看著我。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尷尬和內疚。我知道問題一定出在我手上拎著的那台攝像機上──我有一個去哪裡都帶著它的習慣，她們一定將它看成是具有曝光威力的權力工具，而將我當成了一個突然而至的電視台新聞記者──就像我碰到過的535醫院的病人親屬所想的那樣。為了避免打擾她們的悠閒生活，我趕緊拐進了橋頭堡旁邊的民居裡。

這裡租住著新龍門溪大橋的挖樁隊民工，和老何的民工隊一樣，他們也是我的主要拍攝目標。直到我和熟悉的民工們隨意地聊著天，或拍攝著他們的日常生活時，我才逐漸擺脫窘迫。但我仍能感受到來自橋頭堡裡的關注目光，虛驚一場的她們站在大門口，對著我指指點點，彼此還竊竊私語，臉上的緊張逐漸被好奇和興奮所替代。隨著後來我多次經過她們門前，她們徹底地解除了對我的警惕，開始對我露出友好而嫵媚

的微笑，甚至還有人在沙發上對著我熱情地招手，好像將我當成了她們的老鄰居或老相好。此時，在她們的眼裡，我手裡的攝像機已經沒有了任何威脅力，也許，它就跟一個農夫手裡拿著的鋤頭或鐮刀差不多。

挖樁隊的領班老何，在很多省份的建築工地待過，算是見多識廣。他對橋頭堡司空見慣，「這種現象全國各地都有，不足為奇，現在的社會風氣比較開放了嘛。」但說起裡面那些女人時，他卻隱隱流露出略帶遺憾和不屑的口氣：「那些女的年紀太大了，不像我們重慶，十五六歲、十七八歲的乖妹兒多得是。」

「你要是下次去我們重慶，我可以帶你去找幾個乖妹兒耍耍，那可不是你們湖南這種水平。」在他的口裡，叫「乖妹兒」的這種東西聽起來像某種土特產，和他之前一再提及的「小三峽」和「大昌古鎮」彷彿是同一類充滿誘惑的東西。

「橋頭堡」這個名字的來源已經無從考證。總之，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叫它「橋頭堡」，這個應運而生的場所很快成了修路民工們新的娛樂點，它似乎使平凡乏味的生活瞬間有了起色。它一度成為了單身壯年民工的最愛。他們幾乎常年在外打工，一般老婆都不在身邊，性的需求只能靠自己想方設法去解決。

在橋頭沒有出現這座「堡壘」之前，民工們通常聚集在宿舍裡一起看A片。有一次，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推門而入，黑漆漆的工棚裡，一台二十一英寸的電視機發著黯淡的螢光。一個日本女優正在激情中，呻吟聲回蕩在小小的空間裡──這樣的光碟在鎮上的音像店裡花上十塊錢就能買到一張──五六個光著膀子的民工正屏息凝神，一齊盯著電視螢幕。看見我，他們嚇了一跳，接著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沒事，你們慢慢看。」為了不打擾他們，我禮貌地退出了工棚。我知道在看這玩意兒的時候，如果有個外人突然現身其中，那絕對會掃了他們的興致，會讓他們覺得很不自在。

而手機的普及，也使得色情無遠弗屆。有一次，我和一個陝西民工互留電話號碼，無意中發現他手機桌面竟然是一個裸體美女。

「啊，你的屏幕很火爆！」我說。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趕緊將手機收了回去。他四十多歲，看起來很憨厚。這款手機是國產的「山寨機」，笨重，金光閃閃，乍一看

像塊金磚──在工地上，民工們用的幾乎都是山寨機，但有些外形和LOGO卻足以亂真。一款叫做NCKIA的山寨機，它的C接口得很緊，乍一看和NOKIA一模一樣；而一款叫做CPPO的手機，看起來和OPPO沒什麼不同。即便是iPhone蘋果手機，也有高仿真的山寨款，對，它正是項目部孟總手裡的那部。它從外形到系統都和真正的蘋果機一模一樣，但價格只到蘋果機的四五分之一。而更低級一點的山寨蘋果機，它的字母標識是iPnone4，雖然比iPhone4少了一筆，但它卻給了你一隻完整的蘋果──沒有被咬過的那個小缺口，這讓人看了啞然一笑。

當我和陝西民工說話的時候，旁邊一個年輕的民工爽朗地說，「這張不算什麼，他的手機裡還多著呢。」

「是嗎？」我說。

「是的，我給你看看，有圖片也有視頻。」年輕民工搶過來手機，快速地按著鍵，打開了一個文檔。很快，一個裸體的大波妹出現在屏幕上，她挑逗地伸出舌頭，用火辣的眼神看著我們說：雅蠛蝶！

「啊，我喜歡，我拍一下！」我端起攝像機，裝作要拍攝的樣子。兩個民工看著我的反應哈哈大笑。

「這個你不要拍，拍了你的片子就是限制級的了！以後就不能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年輕的民工打趣地提醒我。看來他對電影審查和CCTV的瞭解程度還不錯。

中年民工露出了他憨厚的笑，撓了撓腦袋說，「沒辦法，我們老婆不在身邊，就只好過過乾癮囉。」

他的說法不無粗鄙，卻多少道出了修路者們的性生活狀況。因為勞動強度大，女性並不適合做工程行業，而男人們背井離鄉，老婆能陪同出來的是極少數。大部分夫妻倆只得兩地相隔，一年也見不了幾次。有一次，我和項目經理佘總聊到這個話題，他說，久而久之，我們這裡的人，一般要回家了，就會給老婆打個電話說，「我要回來了，洗好澡，等著。」就這麼簡單、直接。和大多數民工一樣，佘總的老婆也不在身邊，前幾年他和老婆的感情出現了問題，離婚了，但後來又復了婚。項目部的總工程師譚總也是先離婚，又復婚。而我也時常聽聞，更有民工的老婆因為常年獨自在家，出了軌，夫妻間正鬧得不可開交。

然而，工地上還是有少見的夫妻檔。在挖樁隊做苦力的幾對夫妻，一起幹活掙錢，女人其實是當做男人在使。我所見到的唯一例外是小何──重慶民工老何的兒子──他的老婆純粹出來為老公做飯洗衣。這些民工

隊的夫妻檔都住在條件簡陋的工棚裡，其中來自龍山縣和桑植縣的老張夫婦、老劉夫婦和老周夫婦，所住之地，完全像我在電視上看過的日本的膠囊公寓，三家人擠在一個所謂的房間裡，分割為各自逼仄的「家」，沒有床，直接在地板上打地鋪，而「家」與「家」之間，僅是薄薄的膠合板甚至彩條布。如何在這種地方做到不擾鄰地進行私人生活，看起來比「打樁」有難度多了──挖樁隊的民工在講葷段子時，恰恰喜歡用「打樁」來形容床笫之事，不知他們能否將這兩個領域的經驗融匯貫通，克服難關。

偷窺同事夫妻同房的荒誕經歷，也是茶餘飯後交流的話題。有一個施工員曾跟我繪聲繪色地講述他的經歷：

「有一次，我同事的老婆來了，領導就特別照顧他們，將他們晚上安排在一間本來堆放雜物的工棚裡，你知道工棚的那種門是關不太嚴實的，有一條門縫。到了晚上，我和另一個同事就輕手輕腳地走過去，趴在門縫上偷看，他們兩個在床上的動靜幾乎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們又興奮又緊張，大氣都不敢出。最搞笑的是，那個門縫只能同時容一個人看，所以我們兩個是輪流來看，每人看大概一分鐘。我剛看久了一會，同事就在後面著急地用手指捅我的腰，提醒我要換班啦……哎呦，你說我們有多麼缺德啦，又缺德又可憐！那會我們才二十出頭嘛，又沒女朋友，平時在工地上都很難見到一個女的，真是饑渴得很……」

二○一○年秋天的時候，龍老闆的大橋挖樁隊裡還傳出一起強姦醜聞。一個未婚的年輕民工在窩棚裡強姦了另一位民工的老婆，受害人去報案，警察過來將嫌犯帶走了。在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龍老闆感慨萬千：「我猜想他至少要判五、六年吧。警察來調查時，我本來是可以給他說說情的，但我不願意。那個人一看就有點傻氣，你說這時代還有強姦犯，是不是腦袋有毛病？就算再饑渴也可以用別的方式解決啊。」

不會感到飢渴的或許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楊保國。他雖然在很多年前就離了婚，還獨自撫養一個十六歲的兒子，但據說他天生命帶桃花，每去一個工地，都會招來一段姻緣。這應該是真的，來到中夥鋪後沒多久，四十歲的他很快就和當地一個黃花妹子談起了戀愛，女孩才二十一歲，是中夥鋪村衛生所的一名護士。這段情事讓同事們羨慕不已，而楊部長顯然也並不想隱瞞，他反而經常向同事們講敘他的戀愛故事，還慷

慨地輔佐以令人遐想的細節，極大地滿足了大家的八卦之心。

他也不忌諱我的攝像機，甚至有一次還特意衝著我的攝像機「秀恩愛」。他拿出一幅十字繡，上面繡著兩朵大紅玫瑰，在我的攝像機前展開。「這幅十字繡叫真愛永恆，我繡了有好幾個月，特意準備獻給我的戀人。」他模仿著電視主持人的腔調，面對鏡頭甜美而感概地說：「說真的，我來這個工地後最大的收穫，就是收穫了一份感情！」

楊部長是我見過的唯一會繡十字繡的男子，他不打牌，不抽菸，卻像女人一樣喜歡繡花。當別人聚眾打牌的時候，他會安靜地躲在宿舍裡繡十字繡。他不但繡出「真愛永恆」討取女友的歡心，而且繡了一個大大的「福」字，在毛總生日那天贈之以生日禮。他身上時不時流露出與眾不同的特殊氣質，和他的佛教徒及共產黨員的身份混搭一樣，一度讓我迷惑。而與其說他命帶桃花，還不如說他這種性格和氣質幾乎讓所有的人都很難不喜歡他。他開朗樂觀、積極向上、談吐幽默、表現慾強，似乎永遠對周遭世界充滿激情和新鮮的興趣。他也精力旺盛，遇到挫折百折不撓，能屈能伸。這是他很討女孩子和領導喜歡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楊部長的戀愛經歷很難複製。雖然一直有人也打周邊村姑村妹的主意，比如說項目部的劉司機，但他一直失敗而挫折。他離異已久，每次開車經過村莊，只要看到前方一個從背影看還不算太老的女人，就會異常興奮，口中一邊喊著「啊美女」，一邊加大油門，靠近目標後再減速，眼睛直勾勾瞟著側窗外──渾然不顧前方來車，每次都將坐在車上的我嚇出一身冷汗。然而在現今農村，要像楊部長這樣找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朋友，不會比修一條高速公路更為容易。大部分年輕女子都「孔雀東南飛」，去了南部的廣東和東部的上海打工，少數留在鄉間的，也早早嫁人生子，很快就被家務拖累得蒼老了容顏。劉司機「求女若渴」，但他更多的時候是失望。「看背影我還以為是個美女呢，沒想到遠看像朵花，近看牛屎粑。」他減速片刻，隨即搖搖頭，很不屑地說了一句湖南俚語。

有一定技術和學歷的青年人，在尋偶的機率上也遠遠大於工地上民工。項目部有個資料室，以前有人專司其職，就是負責將各種上傳下達的文檔整理歸檔，兼帶開會時給大夥倒倒茶。工作輕鬆自在。這應該是項目部最清閒的工作了，最難得的，還可以獨享一間資料室，不像其他人都是合在一間大屋子裡辦公。能享受獨立辦公室待遇的，只有項目經理佘總和書記毛總。資料室是一間大概六、七個平方米的小房子，裡面

擺放著幾個文檔櫃，還有一張電腦桌和一把椅子。除此之外，一無所有。雖然空間逼仄，但很清靜—因為旁邊是會議室，而大部分時間裡，既沒人開會，也沒人查資料。

最早的資料員是小唐，一個剛滿十八歲的女孩，人長得小巧秀氣，做事很麻利，對人很有禮貌。但一年左右，就再也見不到人影。我一問，眾說肚子大了回去生孩子了。「把肚子搞大」的是隔壁實驗室的小伙子小朱。小朱剛好二十歲，兩人都還沒到結婚的法定年齡。我問過小朱要做爸爸了但還沒結婚怎麼辦，他笑了笑說：「先生下來再說唄，要不還能怎麼辦。」小唐走後，又來了一位資料員，也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女孩。沒做多久後又走了，據說也是肚子大了，這次是測量科的小伙子阿迪惹的禍。領導一氣之下取消了資料員的職位，資料室裡從此就空著，有人要查資料，就找綜合辦公室老李要鑰匙。

這兩起「甜蜜的意外事故」發生後，有著大把無聊時光的老少光棍們經常會八卦起這些逸聞野史，有說資料室應該改名叫「生產車間」，有說不對，還沒生產呢，應該是「製造車間」。有更厲害的人說，應該叫「攪拌場」，他的話一出大家就心領神會地哈哈大笑起來。我很敬佩他們這種非凡的語言能力，總能隨口而出一些符合他們職業特點的精闢比喻，這個「攪拌場」的說法和「打樁」 及「開挖機」的引申用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笑過之後，有人又說，看來那把椅子的品質不錯啊，能承受這麼高強度的連續攪拌磨損。馬上又有人反駁他，你怎麼知道是椅子呢，難道桌子不行麼？說到這裡大家又開心地哈哈大笑起來，白天的勞累一掃而光。自從聽了他們的話，以後我再去資料室查資料，坐在那把椅子上，就感覺到面紅心跳的，渾身不自在。

現在，橋頭堡總算可以名正言順地解決一部分人的「饑渴」了，對他們來說，那實在是一次既物美價廉又不用承擔風險的選擇。王司機告訴我，去橋頭堡消費一次五十元，老顧客還可以打個九折，只收四十五塊。

「少收五塊錢說可以讓你省包菸抽。你說這服務人不人性化？」王司機哈哈大笑。

當他告訴我，早些年在湘西那邊修路時價格只有十塊錢時，我驚訝得掉了下巴。「一般都是在寨子裡的竹樓上，由當地的婦女迎客，民工

們經常相約著去消費，在門口排隊，有時候大夥在行事之前，還劃拳決定先後次序。」

我再次露出了訝異的神情。他說：「沒辦法，有需求就有市場，有句話是這麼說的，『不賭不嫖，不搞路橋』。不過我們項目部的人去橋頭堡的還是很少，那裡一般是民工去的，檔次比較低。」

「可不是嘛，還有句話這麼說的，『民工們去橋頭堡，項目部往市裡跑，領導們把二奶包』。」一位施工員幽默地說。

「那是，像我們，只要一個月去一次熱帶雨林就滿足了。」另一位施工員說。

「熱帶雨林」是懷化市的一家大型洗浴中心，提供洗浴、桑拿、按摩、餐飲、及特殊服務等一條龍服務。普通的洗浴費用是七十八元，特殊服務最低三百元起，最高五、六百、上千元都有。通常，施工方為了和有關方面搞好關係時，就會到「熱帶雨林」請客消費。而項目部的領導要公關更上一級的領導時，他們會去華天大酒店──懷化市最好的賓館，一個更高檔的娛樂場，裡面的「國際娛樂會所」也不缺特殊服務。

「懷化的服務實在是太差了，那些女的不但長得不好看，包夜時如果你超過兩次，竟然還要加錢。」爆炸科的袁科長說，「人家長沙如果你包了夜，只要你有能力，你一個晚上弄多少次都可以。」

「只有東莞的服務最好，人家那據說是達到了ISO9000標準，有一整套標準服務，每個步驟都進行了量化和細化，真正做到顧客至上，絕對弄到你滿意為止。」另一個在攪拌場工作的年輕職工無限神往地說。東莞被稱為中國的「性都」，因為蓬勃發展的半公開半地下的性交易市場及優良的性服務水平而聞名。

遠水解不了近渴，橋頭堡還是大家的最愛。然而不久之後，它的競爭對手來了。有人租了橋頭堡馬路對面的一棟房子，辦起一家新的「紅燈區」。據說老闆是附近的麻陽人，從麻陽帶來了一批年紀不大的小姑娘。很快，項目部的人就獲得這重要的商訊，有些敢為人先者還利索地去嚐了鮮，回來之後津津有味地向人講起這段難忘的體驗。

「哎喲，都是十七八歲、二十來歲的小姑娘，嫩得很。那跟橋頭堡不是一個檔次的。」體驗者吞了一口口水，意猶未盡地說，「我敢打賭，以後老的橋頭堡就沒什麼生意了！」

他的廣告節制而留白，勾起了大家濃厚的興趣，很快就有人問起實質性的問題來。

「多少錢一次？」

「一百塊。」

「要一百塊啊，橋頭堡只要五十！」

「那你要知道，一分錢一分貨嘛。我不騙你，絕對物有所值。」

體驗者繼續他繪聲繪色的講述，「再說，現在物價都漲這麼高了，豬肉都要二十多塊錢一斤了，人家跟你女兒年紀一樣的人，卻像你老婆一樣陪你睡陪你玩──並且絕對比你老婆玩得專業玩得爽多了，你說你五十塊錢能拿得出手嘛？！」

他幽默的反問引起了一陣笑聲。這條口碑廣告很快就不脛而走，傳遍了整個工地。而老橋頭堡很快就變得門庭冷落。

我去看過新橋頭堡。它和老橋頭堡並沒什麼不同，至少表面上看起來一模一樣。也是一棟貼著白瓷磚的兩層民居，門廊裡也懸掛著幾盞大紅燈籠，但顏色更為鮮艷，每一盞上還寫著一個大大的燙金「福」字──不知它和楊部長繡給毛總作生日禮物的那個「福」字形式上有何不同，但至少意義有別：前者指艷福，後者指財福。但也很有可能，楊部長對毛總的生日祝福集兩者於一身：財富加艷福，這是「福」的最高境界，恰好是很多「路橋人」乃至中國人所孜孜追求的。和老橋頭堡唯一的不同是，裡面的女孩年輕，臉上的脂粉沒有塗得那麼俗艷，身材也要好一些，這使她們躺在堂屋沙發上的姿態看起來也優雅不少，但初次面對我的攝像機時所爆發出的慌亂和緊張，仍然沒什麼不同──看來肉體的區別並沒有帶來觀念的更新。

「你說有十七、八歲的妹子玩，誰還去玩那些三十多歲的老堂客們！」在湖南話裡，老堂客是對老年女人的輕蔑稱呼。吳老闆──他是項目部的房東──親口向我證實這一點。而他之前的工作，居然是男老鴇。

「我們這邊都興這個，湘西一帶歷來風氣就比較開放。」

吳老闆和妻子是本地人，他們擁有這棟中夥鋪的三層樓房，還帶院子。自從項目部入駐以來，他將三層樓房和幾間廂房都租給了項目部，而夫妻兩人住在院子門口的三間平房，低矮而狹小──他的兒子去年剛上了長沙的一所大學，寒暑假才回家。他聰明靈活，善於精打細算，因

此，這三間平房也變成了項目部的傳達室和小賣部，他是傳達員兼保安，而他的老婆賣飲料、檳榔和香菸兼打掃衛生，每月夫妻倆都各自有一千多塊錢的工資。

「你知道嗎，我原來也做過花酒生意。」被橋頭堡的話題刺激，吳老闆突然告訴我。

「花酒」本來是中國古代對在妓院中狎妓飲宴的稱呼。湘西一帶現在還保留這個說法，稱呼去色情酒店消費為「喝花酒」。

「就在我這棟房子裡，我做了好幾年，從一九九七年到二○○四年。」吳老闆坐在傳達室的門口，指著面前的三層小洋樓說。「我給它取名叫『南天酒店』，南方的南，天空的天，因為我的房子在中夥鋪村的最南端嘛。」

「我開的南天酒店當年在這一帶很有名氣，沒有人不知道它。」吳老闆沉浸在想當年的輝煌裡。他驕傲地說，「連懷化市的局長們都到我這裡消費，我店裡那些妹子長得相當標緻，十多歲二十來歲，高的有一米六幾，好多當官的一過來，看著她們就流口水。」

我萬萬想不到，項目部下駐的這棟樓房，原來曾是風月場所。而那些深夜大啖A片、沉浸著色情氛圍的民工宿舍，和曾經春光旖旎的資料室，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聽著吳老闆的敘述，我不可遏制地在腦海裡將項目部和橋頭堡的場景交叉並置起來，最終呈現出電影中的「疊化」效果：隨著大門口項目部的黃銅招牌被置換為「南天酒店」的金字招牌，門廊裡的飄飄彩旗瞬間變成了寫有燙金福字的大紅燈籠，大辦公室裡的辦公桌全變成了沙發和床榻，辦公人員也在一眨眼間變成了性感女郎，而列印機和計算機發出的機械噪音，全變成了響徹「南天」的雲雨之音。

「最多的時候我這裡有二十多個妹子，消費一次最低一百塊，高的有一百五十到兩百元。」吳老闆說。

「那價錢也滿高了，尤其還是好多年前的價錢，現在的橋頭堡都只要五十塊呢。」我接話說。

「橋頭堡那算什麼東西，完全跟我的店不是一個檔次。」吳老闆毫不掩飾自己對橋頭堡的不屑，「我店裡的妹子大部分是從吉首和桃源過來的，水靈靈的。湖南境內的小姐，以這兩個地方最有名，尤其吉首，是最早集中規模做這個產業的。他們那裡的人，丈夫送妻子去做，一點都不計較，丈夫不會因為妻子做這個而離婚。」

吳老闆還告訴我，一九九九年全國掃黃大整頓的時候，辰溪縣的大部分「花酒店」都關門大吉，但他的店裡還留有七個妹子在營業，已經辭退了十多個。為了掩人耳目，上邊來檢查的時候，他給妹子們每人發一副套袖戴著，偽裝成飯店裡的端盤子的女服務員。

「但其實一看就不像做事的嘛，個個都水靈靈的，氣質也不像。小姐跟服務員還是有滿大區別的嘛。」吳老闆笑了笑說。

「那你這麼膽大，是跟當地公安局的關係不錯嗎？」我問。

吳老闆點了點頭。他和當地政府的關係一直處得不錯，所以公安局對他的「花酒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他不出事就行。而為了開這家「花酒店」，他之前還特意去當地的火馬沖派出所當了一年司機。

「我的目的不在當司機，我就是為了和他們搞好關係，為我開店做準備。」

吳老闆在開「花酒店」之前，也曾經和人合夥開過小煤窯，他的小煤礦就開在小龍門鄉，這裡有大小煤窯上百家，從上世紀八○年代末到二千年初，辰溪靠煤礦業賺了大錢，也因此帶動了當地的消費，尤其是色情業。然而吳老闆並沒有在煤礦上賺到錢，因此他決定開「花酒店」。

「整個辰溪縣的小姐，最多的時候有一千多人。有人曾經算過一筆賬，算出我們辰溪在色情業上花掉的錢，可以建兩座桃源縣城。」吳老闆說。

聽到我們在談論「花酒業」，司機小杜也饒有興致地插話進來，「我也做過這個行業啦。」我一聽有點暗暗吃驚。小杜二十出頭，是去年項目部新來的司機，他開一輛長城牌皮卡車，每天要出出進進工地好多次。他的手上和肩上都刺有紋青，打扮也比較潮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部正宗的iPhone 4S手機，他經常拿出來玩切西瓜的小遊戲——這似乎是讓他最有面子的事，因為項目部其他人的蘋果手機都是山寨版。二○○九年，小杜以談女朋友為名，騙過一個婁底的女孩去上海郊區做「這種事情」。他先將女孩帶到上海去玩，等錢玩光之後，就逼她去找工作。

「在上海工作肯定不好找啦，那個女的又沒讀過什麼書，於是我們就給她洗腦，後來她答應去一些酒店和歌廳做小姐。當時消費一次二百元，包含跳脫衣舞在內三百元。」小杜說，「我們住在租來的平房裡，房租每個月五百元。」

「那裡有一條街，全是做這個行業的，老闆和馬仔全是我們婁底和漣源的人，小姐也基本上都是從湖南帶過去的。大家都很抱團，有什麼事情就互相照顧。」小杜說。

「我還打過她，有一次，我打了她二十多個耳光，因此她私自賺了錢不交給我，後來發現她將錢藏在靴子裡。」小杜若無其事地笑了笑，好像在說著一個和自己無關的故事。

「那你這個人心太狠了。」吳老闆說，「人家給你賺錢你還打她。你看我，那些妹子到我店裡來，我全是包吃包住，對她們也很好。」

「哎呀，那不一樣啦。那個女的……」小杜一時無語。他挽起他的衣袖，露出了左手臂上的紋身，看起來是一朵花朵的變形圖案。那是他在珠海時紋上的，在來項目部前，他在珠海混過一段時間。我盯著他的花朵紋身和面前吳老闆的三層樓發了一會呆，腦海裡又不可遏制地「疊化」著珠海、上海和中夥鋪的場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三個地方其實並沒有什麼區別。發展的浪潮通通沖刷著它們，發出振聾發聵的時代之聲──那也是這個國家從權貴到平民都共同期盼的「福」聲：財富加豔福。

好景不長，新橋頭堡沒開多久就被查封了。一天，突然開來幾輛警車──據說從辰溪縣來的──幾個警察跳下車，連老闆帶小妹都帶上車，抓走了。據說是有人舉報，於是警察們出來掃黃。得知這一變故，民工們感到憤憤不平。

「絕對是老橋頭堡告的密，因為搶了他們的生意嘛。」

「你說掃黃，怎麼不掃原來那一家呢，還不是因為新來的是外地人，本地人他們就不管。」

「本地人不是不管，他們在公安局裡有關係的，要不怎麼敢開這種店，而且掃黃都不掃它。想都不用想，一定是交了米米的。」湖南話裡，米米的意思就是錢。「操他媽的，老子正想等到這個週末發工資了再去一次，結果一眨眼就沒了。簡直是存心給老子省錢啊，乾脆週末我休假回家去算了，家裡的老婆一分錢都不用花。」

「那是。隨你怎麼用都可以，不限量，不限時。」

大家又歡欣地開起玩笑來。很快，那個麻陽人開的店，像個短暫而美好的春夢一般在他們心中消逝無痕了。

1. 2011年6月11日，重慶千人紅歌團進京演出，以慶祝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
2. 長沙方言，意指輕鬆、省事。

第六章

老曾與老朱

被遺忘的老兵

認識老曾是從認識他的弟弟開始的，那是二○一○年春天的某個黃昏，我剛吃完晚飯，趁著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就拎著攝像機去這片工地溜達。當我經過一個覆蓋著塑膠布的小窩棚時，突然從裡面竄出一個穿工裝、但戴著眼鏡的老人，警惕地看著我。他就是老曾的弟弟，負責看管這片工地。因為之前當過小學老師，所以人稱曾老師。

我很快就和他熟悉了，也偶爾會把從城裡買回的報紙和雜誌整理了一下，給曾老師送過去。因為他晚上守夜有點無聊，而在鄉村裡想買到報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他很高興，說這樣晚上就不會那麼難熬了。我聽了也很欣慰，衷心希望他能藉此打發掉工地上無聊的漫漫長夜。從此，只要一有空閒，我就會去曾老師的窩棚裡串門聊天，他成了我難得的好鄰居。

然而四個月後的某一天，我再去曾老師的窩棚時，窩棚裡出來的卻是一位陌生的瘦高老人，對著我爽朗地笑。「我是曾老師的哥哥，我聽我弟弟說起過你。」他普通話說得不錯，「你是在這裡拍攝紀錄片的小張。」

要不是他自我介紹，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位老人是曾老師的親哥哥。他和曾老師長得一點都不像。除了外形不同，性格看起來也有相當差距：相比於曾老師的內向寡言，他顯得開朗而健談。語速也很快，說話像打機關槍一樣。原來曾老師去了上海。一位在上海建工集團工作的親戚，介紹他在上海的地鐵工地負責給工人考勤，工作較為清閒，工資也比較豐厚。曾老師離開時將哥哥叫來頂替自己的崗位。

「你就叫我老曾吧。」「兄承弟業」的老曾爽朗地說，「這裡的人都是這麼叫我的。」

確實，我很快就發現，儘管他剛剛來到工地，但看起來已經和民工

們相處得非常不錯，在我們聊天的間隙裡，就不斷有從旁邊經過的民工跟他打招呼，親切地叫他「老曾」，看起來彼此間像是認識多年的老友。也許因為他看起來比他弟弟要能幹得多，得到了包工頭侄子的信任。所以老曾的工作範疇不斷擴大，他除了看護管理材料，還同時擔負起民工隊的財務、材料採購及伙食等後勤工作。

「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在一次聊天中，老曾告訴我他的年齡，「四九年生的，我比我弟弟大了八歲，我的經歷可比我弟弟豐富多了。」他的表述體現了他善用政治術語的能力。「共和國的同齡人」是深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表述，用來比喻那些出生於中共建政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人。在黨機器的宣傳下，人們似乎覺得出生在那一年是種極大的榮耀。在中國，還有不少叫「國慶」、「黨生」和「建軍」的人，他們一定分別出生於十月一日國慶節、七月一日「黨的生日」及八月一日建軍節。叫「文革」和「躍進」的人也不少，同理，他們出生於「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年代。黨的強大由此可見一斑，國家主義的宏大敘事總是這麼輕而易舉地在普通個體身上留下烙印。

「我還參加過援越抗美。」他突然蹦出一句。

「援越抗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

「對的，不是『抗美援朝』，也不是『對越自衛反擊戰』，而是『援越抗美』。」他察覺了我的反應，「你們年輕人可能不太知道這段歷史了吧，也怪不得你們，現在的歷史教科書裡不講這一段。但是你一定看過美國的越戰片。」

大部分普通中國人都對「抗美援朝」耳熟能詳，相比之下也略微知道些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發動的中越戰爭──中國官方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然而他們大部分都不知道「援越抗美」。它實際上就是喜歡看美國主流戰爭電影的中國年輕人大部分都知道的「越戰」，「援越抗美」就是中國對「越戰」的官方表述。因此，當我聽了老曾的講述，備感驚訝。就繼續聽他娓娓而談那段幾乎被淹沒的經歷。

「我是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到的越南，」老曾清了清嗓子說，「當時還只有十六歲，我們生產隊給我虛報了兩歲，假裝上了十八歲才參上軍。去之前僅僅軍訓了三十多天，就坐上了兩天兩夜的火車被送往越南戰場。從友誼關入關的時候，我還想著，戰爭應該很快就會結束吧，我

應該能很快回來，沒想到我在越南一待就待了將近五年，一九七○年回來的時候我已經二十一歲了。」

老曾當時是鐵道兵。一九六五年初，越戰升級，美軍出動大批飛機轟炸鐵路橋樑，北越僅有的幾條鐵路基本上已經癱瘓。這時，胡志明祕密來到北京與毛澤東會面，請求中國支援。毛澤東也欣然應允了這位中共的「親密戰友」的請求。中國政府決定，幫助北越在河內以北地區修建一百多個鐵路工程。但當時中國沒有正式對美宣戰，為了避免不好的國際影響，所以部隊取消了番號和軍銜，改頭換面為中國人民志願工程隊。這支軍隊從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從友誼關與河口赴越，至一九七三年八月撤出越南，前後共派出了三十二萬餘名官兵。而老曾就是這三十二萬分之一。

我後來在資料中看到，這支偽裝成「工程隊」的中國部隊，在北越的五年裡，新建鐵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鐵路三百六十二公里，新建鐵路橋樑三十座、隧道十四條，似乎並沒有辜負黨和「親密戰友」的期望。老曾的工作主要是維護通訊暢通，此外還要架設通信線路。「剛去越南時我在施工連隊，幹了幾個月後，因為我的工作做得不錯，就被領導調到了團部當通訊班班長。」

「那你們這支部隊是只管修鐵路不打仗的吧？」我提出的這個無知問題似乎冒犯了老曾。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聲音：「當然打！我們團一共有二十五個連隊，其中二十個連隊主要是修鐵路，但其中五個連隊是高射機槍連，就負責打仗，那可是驚天動地地打！傷亡很大。」

老曾似乎把我回到了戰爭現場，透過他的描述，我似乎看到了一架美國戰機在天空上飛過，丟下一排炸彈，將老曾剛修過的大橋炸得稀巴爛。「飛機一來，施工部隊就全部撤出施工現場，只留下作戰部隊拚命地打。當時我們團還打下了美國在整個東南亞戰場上最先進的一架偵察機，還得到了當時中央軍委的通報表揚。」

「我記得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我正在團部吃餃子，飛機就從我們的頭上經過，我將手中的碗一掀，趕緊就往防空洞裡鑽。高射連馬上進入臨戰狀態，瞄準它要經過的方向迎頭就打，只用了六百多發子彈，就將這架飛機打下來了。五分鐘後，我們通訊兵就得到通知，趕緊開著摩托車去往墜機現場，飛機已經墜毀了，飛行員也被抓到了……」

老曾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當然這是打了勝仗，也有很多吃了虧

的。有一次美國飛機往下面丟炸彈，就炸中我認識的一個戰士，湖北人，當時肚皮被炸開了，腸子流了一地，他咬著牙將腸子撿起來，還帶著地上的草屑泥土一把塞進肚子裡，撿了一條命。我還有一個衡陽的戰友，叫向成湘，為了排除美國飛機丟在鐵路道岔裡的定時炸彈，他和另外兩個戰友當場就被炸飛了天，連屍體都找不全，後來只是象徵性地撿了些遺骸碎片分成三堆……」

在那個看起來無比尋常的夏日下午，老曾就這樣向我講述著他在十六歲到二十一歲時親歷的殘酷青春。他的記憶力和敘述力都很強大，不但有宏觀的背景描述，更有微觀細緻的感受和視角，很快將我帶入近五十年前的硝煙四起的北越。我彷彿有一種時光穿越般的奇異感覺，這種感覺和以往看越戰片的體驗不盡相同。因為講述者就在我面前觸手可及，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皺紋和白髮。更重要的，是老曾呈現了被遮蔽的獨特視角，隨著他的講述，在以往的教科書和主流媒體裡均見不到的場景和真相，有如塵埃落定的工地，正在慢慢地顯露出它的原形。

然而，「因為中國是祕密參戰的，再加上五、六年後，就發生了鄧小平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兩段歷史的立場是有衝突的，所以援越抗美這段歷史國家一直不讓宣傳，導致我們這批人慢慢地被淡忘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老曾懷揣著一張由當時越南總理范文同親筆簽名的紀念證書回到中國，而他們抗美援越的故事隨之進入暗黑的官方歷史，只潛藏在他自己的記憶深處。「無論在名譽上，還是享受的待遇上，我們都遠遠比不上抗美援朝的那批人。誰都知道他們是英雄，但我們寂寂無聞。好像歷史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回國後，他依舊修鐵路──湖北襄樊至重慶的襄渝鐵路。他在那待了半年多，才回到湖南華容老家。之後他招工進入當地的供銷社，一直做到二〇〇七年退休。他退休後的生活又再一次和道路結緣。拜他的包工頭侄子之賜，他沿著高速公路輾轉千里，從陝西白河到山西靈川，如今來到了湖南懷化。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前幾年，在好多老兵一起呼籲爭取、甚至上訪的情況下，國家開始落實「援越抗美」老兵的政策，給還健在的老兵每月發補助二百三十元。但老曾只拿到一年，這筆補貼因為他在二〇〇七年退休後而被取消。最後在華容縣老年協會的幫助下，他們終於改變了政策。「我從二〇一一年元月份，又重新領取這筆二百三十元每月的補助了。這筆錢一點都不多，我們當年可是在為國家流血賣命啊。」

在工地上，我還遇到另外一個「為國家流血賣命」的人老謝。他是湖南邵陽人，比老曾小將近十歲。當他前赴越南時，已經不是「援越抗美」，而是「對越自衛反擊戰」，那是一九七九年，當時他二十一歲。歷史就是如此弔詭。中國軍隊這兩次入越，僅僅相隔十多年，但性質完全變了，老曾去越南時，中國人和越南人是生死與共的盟友，美國人被視為敵人；老謝去越南時，中國人和越南人成為你死我活的敵人，而這次美國人變成結盟者。

老謝也爭取到了補助──雖然他的敵人正是老曾的盟友。他的補助是傷殘軍人補助。他的腦袋裡還有一塊彈片，他用食指指節比劃著彈片的長度，「大概一毫米寬，靠近血管和神經，不能做手術取出來，但CT能照到。每到變天的時候，這裡面就會隱隱作痛，頭就會暈。」

他所在的四一軍，傷亡人數高達三分之二。而和他在一起作戰的十四個戰友，最後回來的只有兩個，他是其中一個。當越南的砲彈炸來時，他躲在公路下面的下水道裡，才撿回一條命。「操他媽的，死了不少好人啊，都是一些年輕的好小伙子，才十多歲、二十來歲。結果都通通去送死了。」

現在國家發給老謝的傷殘軍人補助費，一年大概有一萬塊錢，最近又增加了一次，每月多了兩百四十塊。這筆錢，也是這些退伍老兵協力爭取而來的。「現在我們縣一百多位軍人組織起來了，成立了一個協會。」組織的力量雖然大於孤獨的老兵個體，但也並非每個人都從中受益。老謝一直覺得不平的一件事情，是他們縣的一個解放戰爭老兵，臉部被子彈打掉一塊骨頭，整張臉都是塌的，當時被評為二級傷殘軍人。但不幸的是，他的人事和傷殘檔案在該縣的一次水患中損壞了。某種程度上，這個國家的行政體系依靠所謂的「檔案」而運轉，一個沒有「檔案」的人就沒有了身份，更別說附加在其上的功勳與榮譽。這部國家機器控制了「檔案」，就控制了「人民」；而政府遺失了「人民」的檔案，他只能變成寸步難行的「隱形人」。他不斷去市裡省裡上訪，但都沒有結果，反而一度被公安局抓了起來。

「哎，像他這樣的人就太不值得了。」老謝搖了搖頭，無限惋惜地說，

和老謝一樣，「越戰」老兵老曾心裡也有著小小的惋惜，他對自己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雖然已經很滿足了，但還有一些戰友，因為當年屬祕密參戰，個人檔案裡沒有記載這一經歷，時隔多年後

部隊番號解散，無法落實優待政策，因此生活得比較淒慘，有不少抱恨離世。

「我們這批人還只有六、七十多歲，要是現在你拿攝像機去拍他們，還不算晚，要是太晚了就來不及了，這段歷史就會真正煙消雲散了。」

老曾最大的願望是能在有生之年再回越南去看一看。那裡長眠了他許多戰友。中國政府至今沒有公佈「援越抗美」時期中國士兵的具體死亡人數，但老曾知道那一定不是一個小數目。在越南的某些地方，至今還有中國士兵的紀念陵園。老曾最想去那裡祭奠一下客死他鄉的年輕魂靈。但這樣的機會似乎越來越渺茫。

「我主要沒有錢，我要是自己有筆錢，我就不來這裡做事了，我就約上我的戰友一塊去越南了。」說到這裡，老曾的臉上滿是沮喪。

二○一一年八月，老曾請假離開工地，回了趟華容縣老家，參加戰友們在八月一日──中共的建軍節──自發舉辦的大規模聚會。『援越抗美』的華容籍官兵有五百零一人，但一些已經離世，這次有三百多人參加聚會。

這次活動由老兵們自發組織，活動資金也由老兵們自己籌集，他們還出版了一本紀念集，叫《鐵道兵援越抗美紀事》，裡面收錄了一些文獻資料和戰友的回憶文章。因為那個敏感的政治原因，這本書沒法在中國公開出版發行。等老曾返回工地後，我看到了這本書。書中有不少老兵們繳獲的戰利品圖片：有美軍手槍，軍刀，軍服，美元……最令我好奇的是被俘虜的美軍飛行員隨身攜帶的求生布條，上面印著美國的星條旗，密密麻麻地用十三種文字寫著一段求救信，中文還分為繁體和簡體。

我是美國公民，我不會說中國話，我不幸要求你幫我獲得食物、住所和保護，請你領我到能給我安全和設法送我回美國的人那裡，美國政府必大大酬謝你們。

簡體的表述略有不同：

我是美国人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领我到能够给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去美国的人那里，美国的政府一定多多给钱谢谢你们。

我注意到，在繁體字中的「大大酬謝」在簡體字部分變成了「多多给钱谢谢」，「公民」也變成了「人民」，這樣的表述很耐人尋味。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是簡體字部分還逐字配上了拼音字母，估計是為了方便不會中文的美國飛行員在被俘虜後，對照注音向中國士兵朗讀。

「小張，這是送給你的禮物。」當我正在好奇地翻閱這本別緻的書時，老曾突然從包裡掏出一樣東西。

這是一塊很普通的電路板，上面有著電容器、電阻絲等電子元件。巴掌大小，有著不規則的形狀，好像是從一塊大的電路板上拆下來的。看起來跟電視機裡的電路板沒有什麼區別。

「這什麼東西？」我很納悶。

「不知道吧。」老曾哈哈大笑，說，「這可不是一般的東西，這是我從越南帶回來的珍貴戰利品，可能還是獨一無二的。」老曾賣著關子，故意停頓了一下，「這就是我跟你上次講過的那架被打下來的美國偵察機的殘骸！」

我大吃一驚。儘管當初老曾只有十六七歲，但親眼目睹那架被打下來的飛機和被俘虜的美國飛行員後，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件事非常有意義，為此從飛機殘骸中找了一塊電路板留作紀念。這次送給我的這塊就是從電路板上剪下來的一角。

「後來，我們還將那位俘虜偷偷送回了國內。」老曾接著說，「那時候，我們一旦抓到俘虜，就會給他們套上頭套，偷偷從友誼關送回國內。」

「為什麼是偷偷？」我問。

「因為出兵前中國就跟北越簽訂了協定，說我們抓到了俘虜只能交給越方，但中國想要弄出情報來嘛，就會用這種手段將俘虜偷偷押送回國，祕密審問。」老曾說，「審問後，據說好多俘虜就給祕密地處決了。」

一九四○年代，離中夥鋪不遠的懷化芷江縣，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在此修建了空軍基地和航空學校，協助中國人抵抗外敵；二十多年後，被稱為「中國人民志願工程隊」的中國部隊，則把美國飛行員俘

虜隨便處決。兩支在異國作戰的志願軍，美國飛行員的兩種命運……我突然意識到歷史的詭異。

我也曾經看過美軍在越南尋找士兵遺骸的報導，幾十年過去，有不少遺骸被找到，隆重地從越南運送回美國，但至今仍有不少美軍官兵遺骸尋而未得，下落不明。有數據顯示，在越戰中失蹤的美軍軍人有一千六百四十五人。我想，那架被擊落的美軍飛機的主人，是否也是屬於這一千六百四十五分之一，他究竟後來遭遇了什麼樣的生死經歷？在這一千六百四十五名失蹤士兵名錄中，又有多少人是以老曾所敘述的這種方式人間蒸發，魂歸他鄉？

我倒吸了一口寒氣。想起那個十三種文字印刷的求救布條以及很有可能被祕密處決了的美國飛行員。手中的這塊看似平常的電路板，瞬間有了沉甸甸的份量。我低頭仔細端詳著它，硝煙已從它身上散去，但每一個細小的電容器和電路線裡，都好像暗暗藏著歷史的密碼，彷彿只要一通上電，它就會告訴你答案。

美國 越南 南越 北越 越南勞動黨 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 胡志明 范文同 中國鐵道兵 中國人民志願工程隊 抗美援越

yi（一） ding（定） duo（多） duo（多） gei（给） qian（钱） xie（谢） xie（谢） ni（你） men（们）

沒有硝煙的戰場

只要有空，老曾就會去「巡視」他管轄範圍內的幾個工作區，它們分佈於兩座橋的兩端。其中一座是龍門溪大橋，這座橋全長約二百七十五米，將橫跨一條U型溝谷，山谷裡流淌著龍門溪。

龍門溪大橋北側的樁基工地，位於一片陡峭的山崖之上，與靈龜峰隔河相望。我和老曾曾經多次爬上這座山崖，「巡視」這塊工地。站在山崖上，你能俯瞰到中夥鋪村及山腳下蜿蜒而過的龍門溪，對面的靈龜峰和正在修建中的新留雲寺也赫然入目。如果眼力好，還能看到靜坐在簡陋棚屋裡的釋迦摩尼佛祖，他一臉淡定，似乎在遙望著什麼。用不了多久，一座氣勢如虹的大橋就會橫跨這裡，穿越靈龜峰，再拐個小彎，

繞開新留雲寺，從北向南逶迤而去。

這片有著釋迦牟尼佛祖相伴的工地，平時看起來風平浪靜，其實也是不見硝煙的戰場。而見多識廣、從援越戰場退伍的老曾，在這塊戰場上表現出處理棘手問題的超強能力。這個戰場，就是討薪的戰場。

有一次，一支民工隊完成了一個階段的挖樁任務，準備拿錢回家。但項目部遲遲沒有支付計量工資。民工們等不及了，天天找老曾要錢。老曾就帶著農民工去了項目部。大家圍在走廊裡，老曾一個人進去和領導談判，儘管他有理有據，但那位領導就是說沒錢。事情眼看就要陷入僵局，聰明的老曾眼珠一轉，找到了一個方法，很快就解決了這個僵局。

「我的辦法其實很簡單。」當他向我追述此事時，依舊很得意。他當著這位領導的面拿出手機，給上面的漵懷公司領導打了一個電話，向他反映這起欠薪事件。「哈哈，你知道嗎？項目部一聽到上級電話，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一天之內就發了工資，並且發的都是現金。說什麼上面沒有發工程款是假的，實際上是他們自己拿去做別的用了。」

「現在這個社會，就是官大一級壓死人，對上面畢恭畢敬，對下面刁難蠻橫。」老曾繼續評點此事，「所以我就利用了他們的弱點。他們還納悶我怎麼有他們領導的電話。」說到這裡，他得意地笑了笑，「這幫沒腦子的。我其實就是從他們的櫥窗裡看到領導的電話的。」就這樣，項目部拖欠工資事件就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解決了。在工地上，農民工討薪是一齣經常上演且永遠不會落幕的現實主義戲劇，它甚至經常呈現出黑色喜劇的色彩。因為欠薪已經成為常態，以至於中國政府「維護穩定」的工作也將「按時發放農民工薪水」也納入其中。我在項目部的辦公室裡曾看到一份文件，名為《關於加強我省第十次黨代會期間維穩工作的緊急通知》，裡面明確地寫到：

三：確保工程款、農民工工資及時支付

我細細地閱讀了這份文件裡的邏輯。你不能不說，政府想盡各種辦法，保護農民工的利益。然而這些措施更多是紙面上的流轉。因為各種原因，工地上拖欠農民工工資還是比較普遍。隔三差五，討薪這齣戲就會上演一下，似乎是某種惡性循環。而我在工地上的三年多，至少見識

過七、八起比較嚴重的討薪大戲。劇情幾乎一致，只是換了新的素人演員。

有的民工切斷了攪拌場的水源；有的民工在攪拌場門口打地鋪睡下，任你拖拉，就是不肯起身，聲稱不拿到錢不會離開；有的民工用摩托車車鎖鎖住項目部大門，逼迫孟總出來談判；還有的民工隊開著大卡車堵住項目部的進出口，三、四十號人突然「佔領」了項目部—有人戲稱這是「佔領華爾街」行動的中夥鋪版：民工們在上班時間突然湧進辦公室，擠滿所有的空沙發和椅子，將電視機打開，旁若無人地看著；他們還湧入檯球室和籃球場，自顧自地玩起檯球和籃球；最有趣的，一到開飯時間，他們就衝入食堂端碗吃飯，很快就將所有飯菜一掃而光，弄得項目部的職工無飯可吃，只能去外面的飯店解決。

除此之外，民工隊的反制手段還有集體罷工，甚至到勞動部門和高速公路主管部門集體上訪。在「維穩」的政治主題下，罷工並集體上訪是個好辦法。然而就我觀察而言，這並非農民工的逆向操作，而是無奈之中揭竿而起。二○一二年元月份，第五標項目部的部分農民工到溆懷公司駐地上訪，他們堵住了公司大門，並造成短暫的交通堵塞。這起事件讓業主極為惱火，星星之火，燎原起來，在維穩當頭，怎可出現此類上訪？為了殺雞儆猴，溆懷公司最後祭出罰款，第五標項目部被罰十萬元，這是我所見的因為拖欠農民工工資而遭受到的一起最嚴重的處罰。

這是農民工勝利的例子，然而也有失敗的悲劇令人唏噓不已。我聽好友斌和跟我講述他曾親歷的一起討薪實例。二○○一年，他在湖南祁東縣修建衡棗高速公路時親眼目睹到，一位當地農民工討要欠他的八百元薪資，被項目經理冷落後當場服下老鼠藥，命喪黃泉。「僅僅為了八百元就去了一條命。」只要一想起這個匪夷所思的悲劇，斌和就唏噓不已。更讓斌和感慨的，是項目部「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賠償了死者家屬三萬元，然而卻從保險公司索賠了五萬元，「竟然還賺了兩萬元。」

從二○一一年下半年開始，溆懷高速公路建設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愈演愈烈，這裡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背景。因為交通行業出現了太多起腐敗和安全事故，所以，中央政府對高速公路的建設規劃進行了重新審計和調控。審計之下，弊案爆發。在二○一一年八月和二○一二年三月，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和前交通廳副廳長相繼因腐敗而落馬。這兩

起「核爆」讓溆懷高速的資金變得吃緊。項目部工作人員的工資也連續六個月未發，就更別說農民工的工資了。在二○一二年六月份，終於爆發了一場大罷工。楊柳灣大橋橋樑預製場的民工最終挺不下去了，包工頭趙老闆先是和項目部大吵一架，然後宣佈罷工。罷工風潮快速傳播，其他幾個民工隊也開始集體「放假」，大部分人紛紛回了老家。

昔日一片繁忙喧囂的工地，安靜地近乎失真。地面上胡亂堆放著剩餘的材料，模板和鋼筋一片鏽跡斑斑。窩棚裡大多空空如也，但還有幾個民工在繼續等待，他們搓麻將，打發著無聊的日子。在空空的工地上，我碰見了無所事事的李師傅，他六十歲左右，來自湖南永州。他來這裡打工已半年，本應該支付一萬多的工資，但到目前只給他六百塊錢。

「連生活費都不夠。在這裡一天要十五塊錢的伙食費，還要抽菸，買點其它的東西。」

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回去。「我連回去都不敢。現在兜裡空空，給孫子買點糖果的錢都沒有，我怎麼能有臉回去啊。」他愁眉苦臉地說，「只好再等等看吧，但願他們能早點將錢發下來。現在去別的地方也沒事做。」李師傅顯然不知道這次欠薪的大背景。

「嗨，你知道上面能什麼時候發錢嗎？」他盯著我的攝像機，眼睛裡流露出期待的目光，「你們搞這一行的應該消息靈通些。」我心存內疚地搖了搖頭。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連續停發半年工資之後，即便是項目部的人也都怨聲載道。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湊到一起，抱怨一下這種無奈的局面。

「這麼久沒發工資，我還是第一次碰到，以前頂多就是一、兩個月停發嘛。」一位施工員掏出一張五元紙幣，吐了吐舌頭，「你看我兜裡就這五塊錢了，真是窮死了。」

「媽的，沒錢就不要修路，又要我們在這賣力，又不給發錢，這是什麼道理？」另一位施工員言語激烈。

「國家的政策真的就是一陣風，前一天還說要大力發展，後一天就說要調控了。害得我們底下做事的像無頭蒼蠅。」項目部的譚總工認為，這種局面和國家政策有關。

「我過幾天要回家，都買不起火車票了。我打算逃票，萬一抓到了我就說我是修高速公路的，現在國家不給我們發工資，我們沒錢買票了。」劉司機自嘲地說。

因為工資的停發，大家手頭都很窘迫。這場日漸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直接影響到了大家的娛樂活動。除了我隔壁房間那桌領導級別的麻將還時不時響起之外，其它的牌局都停了下來──這是禁賭令頒發以來最見效果的時段。這場經濟危機還無意中承載了「掃黃」的功效。現在，橋頭堡的生意差了不少，我有好幾次路過那，都發現門可羅雀，幾個女人無精打采地躺在堂屋裡的沙發上，見了我，也不再微笑和招手。去懷化「熱帶雨林」的人幾乎已經絕跡。

如果說「經濟危機」引起的內部抱怨還不算什麼，那麼最惱火的當屬來自外部的壓力。材料供應商的討債也讓人不勝其煩。王科長主管十四標的材料採購，目前已經欠了供應商一屁股的債。在項目部裡，經常看到有人找他，大聲嚷嚷，情緒激動，追要貨款，而他只能很抱歉地攤開雙手：

「對不起，你現在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錢。國家不給我們發錢，我自己的工資都半年沒發了。」

這次調控導致的欠薪不僅僅侷限在溆懷公路。二○一一年年底，我突然接到了民工老張打來的電話。他人在湖北恩施一條高速公路上挖樁，時值年底，樁已經挖完，他們要回家過年了，但卻遲遲領不到工資。老張是湖南吉首人，曾經在老曾手下幹活。之後，他又和妻子、同伴輾轉到了廣西，後來又來到湖北恩施。這次欠薪，他們和當地的包工頭也發生了糾紛，包工頭是本地人，態度蠻橫，威脅著要打他們這幾個外地佬。他們到項目部投訴，但也無濟於事。束手無策之際，突然想到了求助於我。在他們眼裡，成天挎著一台攝像機的人應該具有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

我再一次感到了羞愧，我沒什麼辦法，那台攝像機也只是假象。我只能在電話裡建議他們儘快去當地的勞動局申訴，一定不要和包工頭發生正面衝突，保護自己的安全。我還提醒他們，切記保全糾紛的證據，關鍵時刻可以用手機錄音錄影。第二天，我又接到了老張的電話。「我們人在勞動局。」他說，勞動局已經受理了他們的申訴。他希望我跟勞動局的工作人員說上幾句。

我知道老張的用意。他們覺得，像我這樣北京來的人如果說幾句話，就能給對方一點壓力，讓事情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這可能也是當初

他索要我電話的原因。然而工作人員拒絕了老張的請求。電話裡，我聽得出老張有點失落，我安慰他不要太著急，只要懂得利用法律和政策，結果應該不會太差。如果沒有解決，你們就繼續去更上一級的勞動局申訴。

沒過幾天，我接到了老張的短信：

小張你好，我們的工資已經拿到了，謝謝你幫助我們。

我鬆了一口氣，叮囑他們儘快買票回家，路上要結伴而行，注意安全。因為我擔心包工頭的報復──這種事情並不是沒有先例。在中國，哪怕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向上級部門申訴，另一方都會因被「告狀」而激怒。

好在並沒有出現我所擔心的糟糕事情。又隔了一天後，我再次收到老張的短信：

小張，我們到家了，謝謝你關心我們的安全，你是個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我徹底地放心了。我虛頭巴腦的舉手之勞──不，連舉手都沒有，只是動了動嘴皮子──就能幫助他們平安回家，我感到非常欣慰。儘管，於他們贈送的「好人」稱號，我實在是覺得有愧。

「彎道超車」新時代

不忙的時候，老曾還經常喊我一塊去中夥鋪街邊的「神愛世人」飯店喝酒。店主人阿姨跟老曾也很熟悉，每次看見他去，都很熱情地跟他打招呼。

在喝酒的時候，老曾除了聊他的越戰史外，還經常會談起時政話題。他喜歡讀報，喜歡看電視新聞，尤其是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因此他對時政很敏感。從埃及局勢到國家領導人出訪，他總是會跟上時政議題，跟我聊上一兩句。一般來說，都是他說得多，我說得少。我就是作為他的聽眾。按照我的習慣，在拍攝紀

錄片期間，我通常不會跟拍攝對象過多地交流自己的想法和觀念，尤其是是對方有可能會和自己存在觀念「鴻溝」的時候，我儘量讓自己閉嘴。

一次，在「神愛世人」飯店，我們談到了一位曾經主宰中國多年的「神」。「我覺得還是回到毛主席那個時代好。」他喝了一口酒，「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就是腐敗太厲害了，導致兩極分化很嚴重。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腐敗，人與人之間很平等，社會風氣好多了。」

對於一個曾經在毛時代參加過戰爭的「忠誠戰士」來說，老曾這樣的看法我一點都不吃驚。中國民間大部分人對毛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神化，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他更是個容不得半點質疑的舉世無雙的大英雄。你別想試圖去改變他們的觀念。別說老曾、老何這樣的毛時代「過來人」，就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你可能也很難和他在對毛的評價上達成共識。所以，當這個出現時，我就只好裝聾作啞。

「要是毛主席還在，我敢肯定現在那些貪官會被全部殺掉，社會治安啊風氣啊，老百姓的素質啊，都會比現在強很多。」老曾看我沒有做聲，就問我，「你說是不是？小張。」

我本來不想參與這個話題，但為了避免不禮貌，我只好回答他一句。「嗯，社會治安可能會好一點，但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是那麼好比較的。」我不想違心附和他的觀點，但又不想觸痛他，故意說得模棱兩可。

「有什麼複雜的，就是這麼簡單，毛主席時代要清廉多了。」老曾不容辯駁地說。

「但是，那個時代也有它的弊端。」我忍不住地說，「老百姓飯都吃不飽，還要搞政治運動。」為了避免刺激老曾，我還是說得小心翼翼。

「就應該搞搞政治運動，現在思想教育抓得比較鬆了，人們太自由了，就會亂。」

「不是因為自由了就亂了，而是因為沒有徹底實現法治。」我終於有點憋不住氣了，「我不覺得以前就比現在好，那個時代的所謂清廉是高壓狀況下的假像。搞那麼多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經濟落後，死了那麼多無辜者，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

老曾臉色沉了下來。他顯然不贊同我的看法，他接著為毛的政治鬥

爭辯解，「我覺得凡事要從辯證唯物的角度來看，那時候剛從舊社會過來，有很多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他必須通過階級鬥爭來鞏固統治，這也沒什麼錯。」

「再鞏固統治也不能隨意踐踏國民的權益和生命。」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

這是我和老曾唯一一次因為觀念而起的小小爭執。就像我所預料到的一樣，我們誰也不能說服誰。好在接下來我們倆都沒有再繼續這場爭執的意思，很快我們就轉移了話題，繼續喝酒，碰杯，吃菜，似乎剛才突然爆發的那場觀點交鋒並沒有真正發生過。

二○一○年十月份，我跟著老曾去懷化市內修理空壓機。老曾租了一台貨車，沿著省道朝懷化市飛奔而去。懷化市的路旁，停泊著大量的挖土機和壓路機，烏壓壓的一大片，多的有幾十上百台，場面頗為驚人。大型看板矗立在路旁，醒目地寫著「挖機出售」、「挖機出租」。讓人疑心這個城市一夜之間就被這些長手長腳的鋼鐵怪物所佔領。到處都在施工，到處都是穿腸破肚的道路和地面，無論站在哪裡，抬頭就能看見天空中林立的塔吊—這無處不在的玩意兒似乎成了當今中國城市的一個LOGO。整個城市看起來像一個亂糟糟的大工地，散發出工業時代的野蠻氣息。中國正處於從農業時代轉型為工業時代的某個階段，粗糙、龐大、野蠻，這個時代的標籤是鋼筋和水泥。

我們的目的地是懷化市的「西南機電大市場」。這裡號稱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機電市場，市場內密密麻麻分佈著好多家銷售或維修機電的店舖。在彭老闆的店舖裡，老曾看起來和他猶如多年老友。當伙計們去修理空壓機時，他們聊起這個高速發展的時代，聊得熱火朝天。

「溆懷高速、新溆高速、吉懷高速、懷通高速、鳳大高速湘黔段、懷化繞城高速、再加上滬昆高鐵，光這條高鐵在懷化境內就有二百多公里。」彭老闆掰著指頭，一條一條說出那些正在修建中的道路的名字。「同時這麼多工程在做，你可以想想這塊蛋糕有多大。」我腦海中再次浮現出那些密密麻麻停在城市路邊的挖機和壓路機，心中的迷惑這才有了答案。

據官方資料，在二○○五到二○一○年期間，湖南高速公路新開工的項目有五十多個，四千多公里，而這個數字超過二○○五年以前所修建公路

里程的總和。《湖南日報》上說，到二○一五年底，湖南將建成高速公路七千多公里，形成「七縱九橫」的高速公路網，保證省內的任何一個駕駛人都可以在三十分鐘內驅馳在高速公路上。這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挖機和壓路機泊在路邊待租或待售的原因。

而湖南的高速公路之所以如此快的建設，老曾認為，這和湖南省新任的省委書記有關。「張春賢來湖南任職前，是交通部部長嘛，這是很關鍵的因素。他有關係和資源嘛，所以一來湖南，就大力發展交通建設，各種項目一報上去國家就給批准了，現在湖南有二十三條高速公路同時開工，居全國第一。」

擁有這些如此豐富的資訊知識，是老曾平時喜歡看報和看電視的結果。「張書記還提出了一個獨特的理念，是什麼呢？是『彎道超車』。一般交通規矩，彎道是不准超車的嘛，但他說，要想領先對手，必須在大家都拐彎減速之際，加踩油門搶道勝出。越有危機，越是機遇。湖南確實就是這麼做的，這幾年發展相當快，不斷搶得先機。」我突然想起，在溆懷高速公路的開工儀式上，主席台上那塊巨大的宣傳背板上，確實寫著「加快富民強省，實現彎道超車」幾個字。此時，湖南省高速公路的高層腐敗案還沒有爆發，高速公路建設正處在「大躍進」的黃金時期。

「加之國家投入四萬個億來促發展，以後上馬的基礎建設肯定還會越來越多，有修不完的路，就有賺不完的錢。」老曾笑著對彭老闆說。

「不過，像我們這些做小生意的，只是賺點小錢養家糊口。發大財的人是你們這些搞工程的人，你們吃肉，我跟著喝湯唄。」彭老闆笑著說。

修不完的路？我想起項目部實驗室主任周凱的觀點。在一次聊天中，他說再過幾年，湖南乃至整個中國就會迎來高速公路的「大修年」，到時，這些路橋企業又將迎來事業上的另一個春天。周主任解釋給我說，一種叫做「鹼ー骨料反應」的化學現象會導致混凝土開裂和強度下降，嚴重時會使工程崩潰，這是縮短高速公路壽命的元兇。因此，發達國家一般會嚴格控制混凝土中的含鹼量，高速公路的設計壽命一般是一百年。但中國目前並沒有嚴格的檢測標準，材質的使用比較隨意。所以一般二十年就得大修一次。

湖南的第一條高速公路—長潭高速是一九九六年完工通車的，這意味著它很快就到了大修之年。「你知道嗎？翻修比新建一條公路更賺

錢。」聽他講述，讓我想起自己在行走中經常碰到的修路情景。想像著隨著「大修年」的到來，整個中國的交通大動脈集體封閉、接受手術的「勝景」，不禁不寒而慄。

空壓機修好後，我和老曾返回工地，又一路經過那些鋼鐵怪物，在省道上，我們的貨車不斷地駛過彎道，不斷地有重型工程車冷不丁地從對面呼嘯著竄出，我想起了「彎道超車」的理念，以及領導者的「速度之戀」，心中暗暗地冒出一把冷汗。

領道人的「速度之戀」會隨著他的升遷，移植到另外的地方，即便那裡是廣袤的沙漠和高原。自二○○五至二○一○年，張春賢在湖南當了五年的省委書記，這位交通部部長在湖南這個並不太發達的中國中部省份留下了影響深遠的「彎道超車」理念及遍地開花的道路。二○一○年四月，他再次被中央委以重任，調至西北邊陲新疆任黨委書記。一年後，喀伊高速公路（喀什到伊爾克什坦口岸）正式動工，這條道路全長二百一十四公里，總投資四十一點六八億元，是從南疆喀什到中亞的重要通路。

隨著張春賢赴任新疆，這個占中國國土總面積六分之一的行政區，馬上就編織出一張全新的高速公路網，名為「三橫兩縱兩環八通道」，它將翻越高原、沙漠、戈壁和峻嶺，延伸到中亞、西亞和北亞。到二○一五年，新疆的高速公路里程預計將達到五千公里。我在小小的中夥鋪，依舊可聽聞到他在新疆的聲音。二○一一年年底，給孟總開車的劉司機走了，項目部又新招來一位譚司機。譚司機是湖南本地人，之前在新疆修建的正是那條從喀什到伊爾克什坦口岸的高速公路。

「其實在新疆修路還是蠻賺錢的，但氣候太冷了，離家又太遠。就只好跑了回來。」譚司機有點遺憾地說。

「湖南的公司還能在新疆中到標？」

「這個沒什麼難的，現在新疆的黨委書記張春賢之前是我們湖南的省委書記，你知道，湖南的高速公路發展得這麼快就因為他，所以他去新疆後又開始發展新疆的高速公路，帶去了很大一撥跟著他的湖南人。我們那個工地上全是湖南人。」

公安老朱和母狗小白

二○一一年三月，預製場開始澆築楊柳灣大橋的第一片T樑。T樑是大橋橋面的主體結構，一座楊柳灣大橋，要用上三百多片。對於一座大橋來說，澆築T樑意義重大，它標誌著這座橋的建設進入了最關鍵的時刻。

按照工程業的規矩，澆築前要舉行帶有民間宗教色彩的開工儀式。這一天，項目部的領導紛紛前來，一位當地的法師當場宰殺了一隻公雞，一邊唸唸有詞，一邊繞著預製場走了一圈，將雞血灑了一地。這樣的儀式有驅魔辟邪、祈禱平安之意。儘管看起來和高速公路所代表的現代化建設充滿了違和感，但對希望平安的人們來說，舉行這一儀式，有一種精神上的慰藉作用。

「快放鞭炮！嗚炮嘛嗚炮！」我正在饒有興致地拍攝著這個奇特的場面時，突然傳來濃重方言口音的吆喝聲。我回頭一看，吆喝聲來自一位陌生老者，我立刻就被他獨特的形象所吸引：他身材乾癟，個子矮小，皮膚黝黑，佝僂著背，戴著一頂人造革製的老式黑色有簷帽子。最與眾不同的，他竟然穿著件軍綠色的公安制服，綴著金光閃閃的黃銅鈕扣，手臂上還戴有醒目的徽章，寫著大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字樣，這是種早已淘汰的舊公安制服。從做工看來，應該屬於廉價的山寨品。

等儀式結束，我走過去跟這位「公安」老者搭訕。原來他也是生於一九四九年的「共和國同齡人」，叫老朱，是楊柳灣大橋預製場新來的的材料看管員。老朱來自湖南雙峰，之前是打鐵匠。他身高大約一百五十公分，當你知道他的大名叫朱太高時，難免會莞爾一笑，覺得反差實在較大。

「我在羅老闆手下做事，看管材料。預製場不是開工了嗎？這些露天的材料就要看著，防止被偷走。」羅老闆是預製場一位年輕的包工頭，三十出頭，平時脖子上套著一根大拇指粗的金項鍊，指頭上還戴著一枚碩大的金戒指，當他遠遠地走過來時，你就會感受到一片金光閃閃。

守夜人老朱和守夜人老曾關於毛澤東的看法，英雄所見略同。老曾認為，毛澤東如果不死，中國就不會出現貧富差距和腐敗。而老朱的看法則沒那麼「大乘」，他曾期待毛澤東晚死幾年，那樣他就可以成為一名正式的國家工人。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他曾在邵陽礦山機械廠做

過兩年臨時鍛工，本來有望在一九七六年轉為正式國家工人──在當時，那意味著房子、退休金、穩定和體面。當時，行政批文已經下達，只要他的檔案調到機械廠，他就端上鐵飯碗了。但沒想到毛澤東突然去世了，而不知為什麼，湖南的行政區域也隨之做了調整，他的老家雙峰縣從邵陽地區劃分給新成立的婁底地區，他變成了婁底人，而邵陽的工廠不會聘用外地工人。就這樣，他的工人夢就此破碎。

「要是毛主席晚死一年就好了，那樣我就轉正了，就成了正式的工人了。要是那樣的話，這個時候我早就退休享福了。可是沒有那個福氣啊，他娘的。」老朱遺憾地說。

「那時候我們廠說是叫礦山機械廠，實際上是軍工廠，專給大砲、坦克做零件，用四十五號鋼鍛煉……」老朱回憶起在工廠的短暫時光，「七六年冬季，我在機械廠時，有一天半夜突然廣播叫了，高喊『打到王張江姚四人幫』，說他們篡黨奪權什麼的，我們都被嚇得要死，不知道怎麼突然就打到四人幫了，原來是從中央搞起來的，邵陽也搞得很凶，到處都喊口號。那個時候真是翻天覆地啊……」

我幾乎每次見他，他都穿著那件老式公安制服，似乎從來沒有換洗過。這件衣服顯然成了他獨一無二的標誌，他的第二皮膚。在工地上，穿迷彩服和軍服幹活的民工很常見，但穿公安制服的民工只有老朱一個，尤其還是這種帶肩章的制服。或許，這套公安制服符合他的職業，對一般民眾多多少少還是會產生威懾，即便是過時的款式。但是，這套公安制服顯然對小偷並沒有威懾力。

「夥計，我倒楣了！昨天這裡進了小偷了！」一天，我在預製場又碰到了老朱，他站在屋簷下，臉色鐵青，兩眼通紅，一副很疲倦的樣子。他看見我，神祕地朝我招了招手，等待我走近，他才壓低聲音跟我說，「偷了一台電機和電焊機，兩捆電纜，還有一堆鋼筋，損失一萬來塊啦。」

「啊，你晚上值班沒有看見嗎？」我感到很驚奇。

「哎，別說了。大概凌晨三點的時候，我那時候困得很了，又冷，天下著雨。我有點熬不住了，就去房間睡了一會，我剛睡了一會，就聽到外面似乎有聲音，我趕緊走到外面用手電筒一照，一輛車從那裡一溜煙就開走了。」老朱恨恨地說，「娘賣比的，賊骨頭膽子大得很啊，一

定就是這附近的村民。」

「要是要我賠就慘了，我這一年就會給他白乾了。我一年的工資拋掉生活開支加起也就一萬來塊啊。」老朱憂慮地說。他已經報了案，但我知道這樣的報案多半沒用。項目經理佘總的房間也曾進過小偷，他的錢包、單反相機和筆記型電腦全都被盜。楊部長報案後，反而被派出所警察訓斥一頓，「誰叫你們自己不防範點，被偷了活該。」搞得楊部長一陣感慨。亡羊補牢，老朱的防範之道是想養條狗。

「夥計，能麻煩你個事情麼？」老朱的眼裡露出熱切的目光，「你們項目部有小狗麼？能不能送個小狗給我？」

老朱帶著濃濃的鄉音，將小狗說成了小ge。我一下子沒明白老朱的意思，納悶地說，「什麼？小ge？」

「我一個人，要是有隻狗幫著我看看這裡就好了，夜裡來了生人，牠就會叫啊。這樣東西就不會輕易被偷了。」老朱說。

項目部裡，剛好黑皮生了一窩小狗，為了節省糧食，辦公室的老李正想送出幾隻。我去詢問的時候，只剩下一隻小白狗沒人領養，但是隻母狗。牠一身白色皮毛，長得結實又機靈。就這樣，小白成為老朱的「守夜警衛」。

「小白，小白，你這個狗東西，要乖一點。你從此就和老漢我一起過了。」羅總並沒要老朱賠錢，只是叮囑了他以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能再發生偷盜現象。「我們羅總人還不錯。」老朱感激地說，「以後啊，我一定給他好好看著材料，有了小白了，就不怕小偷了。」

很快夏天就到了，工地上一派熱火朝天，預製場澆築好的T樑已堆滿了工地。用不了多久，楊柳灣大橋就會進行第一根T樑的吊裝施工，按照工地上的風俗，到時會舉行更加盛大的「上樑」儀式。辦公室老李已經四下打聽哪裡有合適的公牛出售。

我也很久沒見到老朱了，他的宿舍空空蕩蕩，隔壁宿舍的人說，老朱幾天前就去辰溪縣城住院了。我以為他生病了，但電話打過去才知道，他被人打斷了兩根肋骨，已經在辰溪醫院住了快一個星期。

「夥計，我求你幫個忙好麼？你能來辰溪一趟嗎，來了我再跟你當面細說。」他說得可憐巴巴，似乎有難言的苦衷。

第二天一大早，我乘坐了一個小時的巴士趕到辰溪縣人民醫院。老

朱正坐在病床上打著點滴，這個時候的老朱，總算脫下了他那件標誌性的公安制服，穿上了醫院的病號服。他拉我坐在床頭，充滿感激地連聲對我說：「好朋友，你真是個好朋友，太感謝你了，你還真來看我了。」

老朱的傷是同宿舍的兩兄弟打的，而矛盾的引爆點則是他白天回宿舍睡覺時，這幾個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了，他們將電視機打開，吵醒了他。雙方因此發生口角，到最後變成一頓拳打腳踢。老朱掀開他的衣服，只見腰上纏著厚厚的繃帶，還套上了一個醫用的矯正腰帶。「照了片子，斷了兩根肋骨。剛來的時候動都不能動，現在好一些了。」

「都看我一個老頭子好欺負，他們有一幫人，都是一個地方來的，人多勢眾，我就一個人，我的家人不在身邊，他們就很囂張。連道個歉都沒有。」老朱可憐巴巴地對著我說，「老朋友，你說我應該怎麼辦，給我出點主意吧，我在這裡只有你一個朋友啦。」我注意到，老朱將我的稱呼從「好朋友」改成「老朋友」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你告訴了你的家裡人嗎？」

「告訴了。」老朱說。

「這時候你家裡最好來個人，一方面是照顧你，另一方面是協助你處理賠償的事情。」我提出建議。

「哎。兒子在浙江打工，離家裡遠，不方便。」老朱歎了口氣。

無奈之中，我只能叫他先將所有的診斷單、治療單據和CT照片保全作為證據，並讓他催羅老闆前來處理。「羅是你的老闆，他有義務保障你的權益。反正這事對方肯定要賠償，也應該賠禮道歉。如果私了你能滿意就私了，如果沒達成一致，你就帶著這些診斷單做傷殘鑒定，然後再去項目部找孟總申訴。如果再解決不好，就起訴對方。反正對方還在工地上幹活，跑不了。」我只能給老朱這些基本的概念，然而我並不知道是否有效。但老朱聽我這麼一說，惶恐的心稍微安穩了一些。

兩天後，我接到了老朱的電話。他已經和羅老闆談好了，羅老闆答應將原來沒有結清的工資發給他，再給他補助三個月工資，讓他回家。聽起來，他好像比較滿意這樣的處理結果。我趕緊提醒他，這只是用工方對你的補償，和打斷你肋骨的賠償是兩碼事，不可混在一起處理。而且一旦和工地解除勞務關係，再來處理糾紛就沒有法律依據了。

但不知怎的，老朱好像已經拿定主意，他決定先回家，半個月後再

來告兩兄弟。他的火車票都已經買好，第二天辦完出院手續就走。但他委託我照看一下小白，「那些壞傢伙，我在的時候他們都對小白不好，我走了後他們肯定不會餵食給牠吃的，到時小白就會餓死了。這樣吧，老朋友，要是沒人喂牠飯，不如你再將牠帶回項目部吧。」

老朱的宿舍裡，他的鋪位上已經空空如也。幾個年輕的民工在若無其事地看電視—我猜打人的兄弟或許也在其中。我試著和他們聊老朱被打的事情，他們卻說沒有誰打老朱，他的傷是自己喝醉了酒摔的。還有人說他的腦子有問題，是個酒鬼、神經病。我沒想到他們竟然這麼說老朱，聽了有點氣憤，但我儘量忍著氣告訴他們，憑我的判斷，老朱雖然沒啥文化，可能有時還有點囉嗦，但腦子絕對正常。另外，他不可能無中生有向我瞎編一個被打的故事。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和他們交流，就離開了預製場。

再過了些天，我想起問一下老朱在家裡的情況，我覺得如果可以，最好直接跟他的家人說一下老朱在這裡遭遇到的麻煩，還有後續可能的處理方式。但我撥打電話時，發現他的手機已經欠費停機了。

楊柳灣大橋預製場終於迎來了它盛大的上樑儀式。項目部和監理處的領導都紛紛來到工地，架橋機上掛起了楊部長製作的嶄新大紅橫幅。此刻他正站在人群中，仰頭看著自己的作品，臉上露出滿意的微笑。他還拿著一台卡片式照相機，忙不迭地變換著角度，給自己的新作品拍照—這些照片將會被精心保存在一本厚厚的工地安全檔案中，供上級領導檢查時翻閱。

為了這座大橋順利進行，他最近還去了一趟懷化市「辦理」架橋工程隊的許可證。項目部聘請的工程隊，沒有當地「質量技術監督局」經過考試審核後才頒發的證件。不過，這絲毫難不倒靈活的楊部長，當他從懷化市回來時，施工人員的許可證已經在握。

只是，這是些足以以假亂真的資格證。在中國，幾乎各個城市都有一條「假證街」，懷化市也不例外。你只需花很少的錢，就可獲得各種假證件：身份證、文憑證、結婚證、離婚證……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甚至還有「聯合國維和部隊司令部軍官證」和「中南海通行證」—在一起詐騙新聞中，我曾目睹了這兩個證件的「真容」。有了這個買來的特許作業資格證，至關重要的架橋工作才順利進行。因此，今日的上樑儀

式，自然少不了楊部長的功勞。但今天他並非主角。在儀式的前半段，一頭戴著大紅花的壯實公牛成了大夥的焦點。牠被牽到了楊柳灣大橋工地，幾個女職工還來不及和牠合影，牠就被推到了一塊空地上，僱來的「庖丁」很快地「解牛」宰殺，鮮血接滿了一鐵桶。場面血腥而野蠻，但大家紛紛興奮地圍觀著。

很快，一隻牛頭就仰面擺在橋頭的祭台上。禮炮齊鳴聲中，一位年老的黑衣巫師帶著他的徒弟煞有介事地做起法事，燒紙，打掛，宰殺公雞，將一小包灑了雞血的米埋在橋墩下，並將雞血抹在架橋機上。然後，再將那桶牛血，一路灑在整座大橋的橋墩下。比起澆築第一片T樑時的祭拜，今天的儀式更為繁瑣而隆重。一條標誌著現代化程度的高速公路，在建設過程中，竟然不斷上演著原始的祭祀儀式，這沒法不讓我目瞪口呆。

「我今天打出了一個陰卦和一個陽卦，這意味著你們工地今後的施工會平平安安。」做完法事，巫師向他的僱主—項目經理佘總匯報說。

「謝謝你。」佘總客氣地說，「但願天上地下的神靈都保佑我們。」公室主任老李馬上向巫師們奉上準備好的薪酬——一個鼓鼓囊囊的大紅包。

今天，老李的挎包裡裝了不少紅包。巫師走後，他還向前來參加儀式的幾個監理員一一送了紅包，紅包的厚薄取決於對方職位的高低。和看不見的神靈一樣，他們也是庇佑這座大橋平安順利建成的「守護神」，絕對不容怠慢。今天的儀式讓我大開眼界，它不僅僅向我提供了民俗奇觀，而且讓我一度陷入困惑：工程的品質和安全，究竟是由現代化的工藝和管理決定，還是由標語、巫師和人情管控？我不得而知。

在拍攝這場盛大的慶典時，我不時遇見小白的身影，牠在人群中竄來竄去，顯得異常興奮。但突然燃放的禮炮聲把牠嚇到了，牠夾著尾巴倉皇逃竄，遠遠地躲在工棚旁的一個角落裡，困惑地打量著熱鬧非凡的人群。不知道此刻，牠有沒有想起牠的主人—那個穿公安制服的朱老頭？

說曹操，曹操到。等到儀式結束後，我回到宿舍，意外地接到了老朱的電話。他已經回到中夥鋪，而且馬上就要去找打傷他的兄弟索賠。我問他家人來了沒有，他說沒有，仍然只有他一個人。我一聽心裡咯噔了

一下。

說實話，我突然有點惱火老朱了：為什麼關鍵時刻他擅作主張回家，而既然回家了為什麼他的家人不能陪著他過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在外面被人打斷兩根肋骨，晚輩就沒有反應嗎？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隱隱地感覺到我和他的交流出現了困難。他這樣直接去找打他的人，除了得到侮辱外，又能獲得什麼呢？

我趕緊叮囑他別魯莽，一定先給羅老闆打電話，最好要通過第三方給他協調。如果不行，就趕緊來項目部找孟總申訴。我還告訴老朱，明天上午我還在項目部，可以幫著他解釋情況。但下午我就要回北京了，我已經預定好了車票。

第二天上午，老朱來到了項目部。這是他第二次來到這裡，幾個月前他第一次來帶走小白的時候，他還精神飽滿，但這次，老朱憔悴和蒼老了不少，他沒有再穿著那件公安制服——似乎那件標誌性的衣服隨著他的下崗而下崗了。他的腰傷明顯還沒好，綁著醫用腰帶，使他走路和說話都變得很遲緩。

正如我的預料，他昨天去預製場沒有找到羅總，那些打的人沒誰理他。我帶他找孟總，他喘著氣向孟總講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但夾纏不清，講了好一陣，孟總還不太明白事情的經過。我在一旁拍攝這一幕，見此情景，實在憋不住了，我停下了拍攝，替他說了一遍他的遭遇。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出來打工不容易，被人家打了，還是要給個公道。」我跟孟總說。

「就是，再怎麼也不應該向老人動手，不管他有什麼錯誤，你頂多說人家幾句，不能打人。」孟總很快就給羅老闆打了電話。然後他掛了電話，要老朱先回去，等羅老闆過來時再處理。

因為趕火車的緣故，我沒法留下來跟蹤這個事件的結果。我只得叮囑老朱注意身體，有什麼事可以隨時給我打電話。我匆匆地告別了他。他坐在項目部辦公室的沙發上，佝僂著乾巴的身子，面帶愁雲，一動不動，像一尊憂傷的雕塑。

回到北京後，我很快就陷入私人瑣事中。因為離京太久，好多事情需要處理，加之因為放映和創作新片的緣故，接下來我又輾轉去了上海、寧波、深圳和台北。在城市的生活節奏裡，我很少想起老朱——這位身穿

山寨公安制服的「共和國同齡人」，他也一直沒有再給我電話。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又想起他，趕緊掏出手機來，發現電話裡再次傳來：「您撥的電話因欠費已停機。」

幾個月後，我重新回到中夥鋪工地。當我碰到孟總，我發現他幾乎將此事全然忘記了。我向他描述了一遍經過，他似乎才猛然想起來。我也見到了羅老闆，我追問他關於老朱的處理結果。他像孟總一樣，一頭霧水，完全想不起老朱是誰。我詳細地描述老朱的樣子──那個矮個子的老頭，六十來歲，看材料，喜歡穿一件公安制服，他才恍然大悟地說，「哦，他呀，他不是我隊伍裡的，他是架橋班的。」說完後，就轉身走開了，只聽見他脖子上的大金鏈子在簌簌地響動。

我忍不住再次撥打老朱的手機，電話竟然通了，裡面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她說，「你打錯了。」隨即掛掉了我的電話。嘟嘟……我聽著電話裡的忙音，好一陣發呆。

在那一瞬間，我嚴重懷疑是我自己的記憶出現了偏差。事已至今，關於老朱的一切顯得如此的不真實，彷彿這個矮個子的老鐵匠、預製場的巡夜人、「共和國的同齡人」壓根兒不曾來過這個喧囂的工地。他跟我的相識、交流、他的被打和黯然神傷地離開……都像一個不真實的夢。只有那件標誌性的舊公安制服，依然頑固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包括它做工粗糙的「公安」徽標及劣質的銅釦子都毫髮畢現，歷歷在目。

我想可能還有一個「人」會和我一樣記得老朱，牠就是「小白」。我在工地上再次見到了牠，牠依然躺在老朱為牠搭的狗窩上，幾隻老鼠般大小的小狗，正閉著眼睛趴在牠的肚皮上愜意地吃奶──就在前幾天，牠剛成了四個孩子的母親。看見我走過去，牠有點疲憊地抬眼看著我，表情漠然，既不興奮，也不緊張。我心情激動，趕緊拿出攝像機來拍下了小白和牠的孩子們。我想，要是老朱還在這裡，看到了這一幕，不知道有多高興。

第七章

中國式關係

袁科長的一天

中國古代一則寓言裡說，一群意志堅定的人鋤挖肩挑，要移走一座大山。最後，他們的意志感動了天帝，天帝用神力將山移走了。在今天，在中國的高速公路即將突破十萬公里的時代，削平山嶺、移山開路則必須借助炸藥的力量。而項目部裡負責炸藥的人，是爆破科的袁科長。他將近五十歲，性格幽默開朗，平常頭髮梳得油光發亮。爆破科，顧名思義，負責高速公路施工中的爆破事宜。這個科只有他一個光桿司令。

因「維穩」之名，中國對炸藥等危險爆破品的管理，實行許可證制度，由國家壟斷。未經許可，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均不得從事它的生產、銷售、購買、運輸、爆破作業等環節，否則違法。而擁有許可權力的國家機構是公安部門。最近，中國的公共安全頻頻告急──強勢的維穩並沒有帶來真正的穩定，由絕望的底層民眾發動的自殺式公車爆炸案層出不窮，公安部門對此已經草木皆兵，他們收繳民眾家裡的火柴，要求購買散裝汽油的人留下實名──當然，比火柴和汽油更「危險」的炸藥更要嚴密掌控。

二○一○年秋天的某一天，是袁科長工作中最典型的一天，這一天，他要去申請購買炸藥。在中國，和各種官僚機構打交道，往往充滿著繁文縟節，手續繁瑣，過程冗長。申請購買炸藥更是如此，需要逐級審批，缺一不可。而我尾隨著他，也見證了這個繁瑣的申購流程，以及該行業隱祕的運作之道。

我們的第一站是當地的火馬沖派出所。它坐落在偏僻的鄉野，幾棟兩層小樓組成了一個幽靜的院落，看起來像一座樸實的鄉間小學，但院子裡停著的一排警車和來來往往的警察能讓你的錯覺瞬間消失。我們到了所長辦公室的門外，袁科長先是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門，然後推門走了進去。一位身穿警服的中年男子坐在一張辦公桌前，袁科長趕緊走上

去，畢恭畢敬地遞給他一支菸，是剛從辦公室主任老李那領來的藍芙蓉王，然後再將一份「民爆物品購買審批表」遞到桌上，等他簽字。

「炸藥又這麼快用完啦？」中年男子抬眼看了下表格。他就是火馬沖派出所的楊所長。我曾在項目部牆上看到過他的照片。那是一張「警民聯繫牌」，他和屬下艾警官的照片並排在一起。

「對的，秋季是我們的施工旺季，現在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土石方施工。」袁科長陪著笑臉解釋，「所以炸藥用得特別快，就只好再來麻煩你們。」

「不麻煩，不麻煩。」楊所長很客氣地說，他開始在表格上簽字。突然，他好像想起什麼似的抬起頭來，隨意地說，「上次跟你說過的那件事情怎麼樣了？」

「你親戚出售河沙的事情嗎？」袁科長說，「沒問題，只要品質沒問題，我們一定會優先照顧。」

「品質肯定沒問題，但是你們給的收購價太低了，現在出廠價都要四十五塊。」

「具體價格我也搞不清楚，但只要你需要，隨時給我打電話就行。」袁科長說，「我已經跟項目部打好招呼，說這種關係必須要照顧，不照顧今後我們就不好辦的。」

「那倒不要那麼說呢。」楊所長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是故意跟他們說得嚴重點。」袁科長坦誠地說。

拿到楊所長的簽字和蓋章後，袁科長離開了火馬沖，我們的下一站是幾十公里之外的辰溪縣公安局。袁科長需在那裡獲得級別更高的簽字和蓋章。縣公安局位於縣城中心區，在一個環境優雅的大院裡，它的辦公樓比派出所要高大氣派很多，上面掛著一幅醒目的橫幅：

听民声，访民意，排民忧，解民难，护民权

共產黨的宣傳術語，往往充滿了簡短的箴言性質，在文體上遵循著《詩經》或古文的格式。但顯然這些術語通常都只是掛在牆上。袁科長輕車熟路地來到負責民爆品管理的治安大隊。辦公室裡，一位年輕的女警員正低頭坐在電腦前，她眉清目秀的臉上掛著悠閒安逸的神色，要不是她穿著警服，還以為她是一位在網吧裡上網的女青年。

「小張，羅教導員呢？」袁科長跟這裡的警察都很熟悉。

「上廁所去了。」女警員抬起頭，她突然看見拎著攝像機的我，悠閒的神色立刻成了一陣慌張，「這是幹什麼？」

「沒事，這是我們單位的。」袁科長說，「他來拍我的工作流程。」

「我還以為是紀委的，嚇死我了。」她拍了拍胸脯，鬆了口氣，露出有點自嘲的笑容，「我正在玩遊戲，不要拍我。」說完她又低下頭，電腦裡傳出響亮的電動聲。

不一會，羅教導員回來了，袁科長馬上給他遞上一支藍色芙蓉王，請他簽字。羅教導員簽完字後，袁科長又上樓找到公安局的熊副局長，他是主管領導，也要簽字。拿到縣公安局的簽字蓋章之後，袁科長算完成了第二道程序。第三站比較近，就在公安局的隔壁，那是一家負責運送炸藥的保安公司，在這裡，我們需要預付一筆押運費，保安公司才會在表格上蓋章，之後才能購買炸藥。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邏輯──也就是說，你要買東西，則要先付運費，而且必須付給某家公安局指定的保安公司。

「這家保安公司跟公安局是什麼關係？」我納悶地問。

「哈哈，那你就不懂了。按理說，保安公司是民營的，和公安局沒什麼關係，而且任何一家保安公司都可以押運對不對？但──這家公司和公安局關係很好，要不怎麼會指定它來賺這個錢呢？」袁科長解釋道。它們的關係確實很好，這從表面都看得出：這家保安公司的裝飾風格看起來就像派出所的翻版，招牌和牆體上都用了很耀眼的「警用藍」。門前還停著一輛警車。

交完費用之後，袁科長手中的審批表上已經佈滿了各種大紅印章和簽字，有了這些「審批」，他終於可以購買炸藥了。接下來，我們來到第四站，也是最後一站：一家叫「吉安」的民爆公司。它也在附近，掩藏在一棟毫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樓裡，辦公室由民居套間改裝而成，裝飾和擺設都非常簡樸和低調。

「民爆公司和公安局的關係更鐵。公安局的家屬都在民爆公司上班！」這一次，袁科長主動先給我解釋，「等一下你會看到，那些收費的，開票的，都是公安局的家屬。」

辦公室裡，工作人員均是清一色的女性，她們一邊嘰嘰喳喳地聊天，一邊忙著什麼。偶爾，幾位穿警服的警察進進出出，看見袁科長，熱情地打著招呼。「就是她們，都是公安局的親屬。」袁科長轉過頭，

小聲對我說道，並朝櫃台後的女人們呶了呶嘴。

袁科長共預訂了一百箱炸藥，此外還有兩千發雷管和若干導火索。在使用炸藥的高峰期，一個土方隊一天就可以用上十箱炸藥，也就是二百四十公斤。一個月下來，就要耗費七、八噸。然而公安局政策規定，炸藥庫的庫存不能超過三噸，所以不到十天，袁科長就要重新申請審批購買一次。自從他來到爆破科工作，這已經是他第十二次前來審批購買了。

交完錢，吉安公司承諾將在三天內，派出專車將炸藥送到，袁科長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當我們走出民爆公司大門時，已經是下午時分。經過大半天的折騰，袁科長典型的一天才告結束。

而我也真正開了眼界。這不僅僅是因為申請購買流程的繁瑣和無聊，更是其中隱祕複雜的利益關係。「你想想看，這相當於行業壟斷，裡面有多大的利潤？」多大的利潤？可以算一筆賬。袁科長從吉安公司購買的炸藥每噸是一萬二千元，但他要繳納每噸三百二十元的配送費和每噸二十元的裝車費—炸藥的配送和裝車必須由吉安公司承擔，這是公安局的強制性規定。袁科長沒有權力選擇其它民爆公司或者運送公司，更不能自己把這些炸藥載回項目部。

還沒完—除了運送費，袁科長還要支付保安公司押送費和管理費。此外，當項目部辦理爆破作業人員的許可證和技能培訓時，也得向公安部門支付一筆錢。

維穩的初衷演變成了一條隱祕的利益鏈。對此我已經不覺得奇怪，在中國，類似的權力尋租看來是遍地開花，尋常得很。當袁科長再次神祕爆出一則內幕關係時，我已經無動於衷。

「這家民爆公司的老總是公安局的一個女副政委的老公，要不怎麼就它能拿到這塊肥肉？」

炸藥庫位於工地後一座荒無人煙的山腰上，臨時征用小龍門村的山地而建成。它是包括庫房、值班室、看管員宿舍在內的四、五間平房，簡陋而粗糙，但卻戒備森嚴。四周是一圈高高的水泥圍牆，上面插滿了玻璃碎片，大門口立著醒目的紅色警示牌：紅色危險區域，非請勿進！而在門內，牆壁上還掛著「嚴禁煙火」以及「請消除靜電」的大幅圖文標誌。

倉庫看管員叫老龍，五十多歲，有著南方人少有的高大身材，他是項目部副經理龍總的哥哥，吃住都在裡面，每月工資三千元。陪他的是一隻黃毛土狗。袁科長幾乎每天都要來一次炸藥庫，審查炸藥的領取和使用情況。聽到聲音，這條狗總是熱情地出來迎接，朝著他搖頭擺尾。

在袁科長購買炸藥後的一天，我又跟著他來到炸藥庫。黃毛土狗看到陌生人，警惕地盯著我。而老龍馬上把狗趕到一邊，並向我們遞來一支香菸。站在「嚴禁煙火」的警示牌下，袁科長和老龍點燃了香菸，吞雲吐霧起來。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

「不是說禁止煙火嗎？不會引爆炸藥庫吧？」我膽戰心驚地問。

「炸藥不怕火，主要是雷管怕電，進去取貨的時候關掉手機就可以了。」老龍說。

我突然注意到，圍牆上還有一台攝像頭。「這是監控系統嗎？」我問。

「對的，」袁科長說，「這玩意兒就花了我們一萬八，由火馬沖派出所購置安裝的。」

原來，爆破科和公安局的「藕斷絲連」並沒有結束，它還延伸到這個炸藥庫的一個小小的監控系統。在老龍的值班室裡，我看到了這台由火馬沖派出所購買的監視器，小小的螢幕上分屏顯示出各個角度的即時畫面，但很不清楚，畫面上滿是電波干擾的噪點。

「這東西沒什麼用，看不太清楚。夜裡就更模糊了。買的時候說有夜視功能的，結果沒有。」

「他們弄的都不會是什麼好東西。」袁科長說，「還有那套避雷針系統，更貴，花了我們三萬多。」他指的是安裝在倉庫屋頂的避雷針。

「連這個炸藥庫都是由火馬沖派出所他們承包建的，」袁科長補充說，「一共花了十五萬八千元。」

「派出所建房子？」我納悶地問，「為什麼自己不能建？」

如果說，監控警報系統由派出所來安裝，這還比較好理解，但炸藥庫的建設竟然也要承包給派出所，這個邏輯我一時沒明白。派出所只是一個執法部門，和土木建設八竿子打不著邊。如此越俎代庖，就好比一個裁縫將自己的衣服交給一個廚子去縫製，或者，一個廚子僱請一個裁縫來給自己做飯吃一樣。

「自己建怎麼行？我們必須要靠他們才能申請下所有的特許證件，還要通過『安全評估』，以後還要找他們審批炸藥，不能得罪他們。」

「承包給他們，無非就是讓他們賺點錢唄。」袁科長笑了笑，吐出一口煙。

我頓時茅塞頓開，為自己剛才幼稚的邏輯力感到臉紅。我想起一句話：邏輯分為兩種，一種叫邏輯，另一種叫中國邏輯。

歐婆婆家的飛來「橫」石

運炸藥的「吉安公司」車輛很快就來到了工地上。車廂門打開，一個個寫著「乳化炸藥，淨重二十四公斤」的牛皮紙箱，在袁科長的指揮下，被民工們一一搬下車，準備運到對面的一座石山上。

這座石山位於楊柳灣大橋工地，正對著幾百米外的火車道。山並不太高，長著鬱鬱蔥蔥的灌木叢。我剛來工地時，為了拍攝火車過境的全景鏡頭，曾經爬上去過。站在山上，剛好能俯瞰南來北往的火車—它從不遠處山谷中的隧道裡鑽出來，隨著一聲呼嘯的長鳴，很快就拐了個彎，「鏗鏘鏗鏘」地朝前駛去，消失在崇山峻嶺和零落的村落之間。這條鐵路就是著名的湘黔線，修建於上個世紀七○年代，是從北方去往貴州雲南的必經之路。如果在火車上往窗外留意看，還能驚鴻一瞥地看到我腳下的這座石頭山，及山下一座孤零零的老房子。

那座老房子就是歐婆婆的家。歐婆婆今年七十七歲，身體很不好，骨瘦如柴，走路顫顫巍巍，彷彿一陣風就能將她吹倒。她丈夫年輕時候便已早逝，她和小兒子一家住在石山下的老房子裡。小兒子出生於湘黔鐵路修建之時，所以名字叫「安鐵」。早幾年，小兒子一家去了杭州打工，連孫子和孫女也跟著過去了，只剩下歐婆婆獨居在家。歐家幾乎一貧如洗，門口的火車便是歐婆婆的計時工具。每到下午，她只要看見接連幾輛紅白相間的「和諧號」火車交錯經過，她就知道是下午兩點左右了。於是，她就會起身進廚房弄中飯吃。屋前屋後的菜地裡，種著新鮮的蔬菜：白菜、菠菜、芥菜和香菜……還有蘿蔔、辣椒和茄子。屋腳下便是一條流水潺潺的水渠，很方便歐婆婆澆灌菜地，因此各種蔬菜長勢喜人。

歐婆婆對突然湧來的修路工人並不陌生，她年輕時曾經歷過這條鐵路的修建。「那時候，有好多人來我們這裡修這條鐵路，最多的時候有

六百人駐紮在我們村裡。修了好多年才修好。」她坐在門前走廊裡，看著對面一輛正駛過的紅白車身的「和諧號」火車。轟隆轟隆的軌道震盪聲，幾乎將她微弱的講話聲淹沒。

儘管每天看著火車從家門前經過，但她這輩子卻從來沒有坐過火車—她甚至連汽車都沒坐過。她的一生，似乎已經無法脫離這條鐵路了，然而現在，新的高速公路即將要修到她家的門前。

當這條高速公路來的時候，那座石頭山要「奉獻」出它的一半，被袁科長的炸藥炸掉。然而歐婆婆的老房子卻不在高速公路的拆遷範圍，儘管相距只有十米。這個尷尬的位置給歐婆婆帶來了麻煩和危險，但此時她還渾然不知。

石頭山就要被炸了，民工們搬著炸藥來到石山上。他們已經在石頭裡打出鑽孔，接下來，在專業爆破員的指導下，他們將一截截炸藥填進鑽孔。在等待爆破的間隙，袁科長和幾個施工員來到歐婆婆家歇息。他們戴著紅色的安全帽，坐在走廊裡的長凳上，東一句西一句地閒扯。偶爾還旁若無人開著黃色玩笑。完全置屋子裡的主人和我的攝像機於不顧。

「去問問她家有臘肉賣沒有？」袁科長好像突然想起屋裡還有人存在。湘西的農家臘肉很有名，他想買點回去打打牙祭。工程科的小毛馬上起身，進到屋裡。歐婆婆正蹲在火塘前燒火。

「你家裡有臘肉賣嗎？」小毛彎下身問。

「什麼？」她說的是地道的方言。

「臘肉。」小毛重複了一遍。

「我懂不到。」歐婆婆說，她完全聽不懂這些外來的「紅帽子」說的普通話。

「臘肉，就是熏乾的豬肉。」小毛耐心地解釋。

「我聽不懂。」歐婆婆又說。

「哦。你聽不懂啊。」小毛掏出手機，在上面打出兩個字—「臘肉」。然後將手機伸到歐婆婆的眼底。

「什麼？我看不到。」歐婆婆瞇著眼睛，擺了擺手說。她的眼睛不太好。

小毛還是沒有放棄。他想了想，掏出隨身帶著的工作本，寫出大大

的「臘肉」二個字，然後將本子湊到歐婆婆眼底。

「我懂不到，」歐婆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沒有進過學堂的門，不識字。」

「哦。你不識字啊。」小毛恍然大悟，「那就沒辦法了。」

他悻悻地走出屋子，向袁科長匯報這起失敗的臘肉收購，大家聽了全哈哈大笑起來。好像剛才聽黃色笑話一樣開心。賓主之間雖然無法在語言和文字上溝通，但彼此相安無事，其樂融融。不過，這只是短暫的幻象。因為爆破開始了。石山上傳來轟隆聲，雖然還只是一次試爆，但也讓歐婆婆嚇了一跳。

「你們不能放砲啊。」這時，她才意識到這些「紅帽子」並不只是來歇息或者收購臘肉的，「我人還在屋裡，不能放砲。」

但沒誰搭理她，彷彿剛才那次不成功的溝通逆轉過來了──現在輪到這些突然闖入的「紅帽子」們聽不懂她的方言，他們全離開了她的小屋，再次來到石山上，為正式爆破做著準備。

我在石山對面的馬路上架好攝像機。沒多久，歐婆婆也被爆破安全員「請」了出來，她顫顫巍巍地走過家門前的狹窄田埂，來到馬路上，就在攝像機旁，遠遠地看著自家的房子。

「放砲啦，放砲啦。」對面山頭傳來爆破員聲嘶力竭的呼喊，還有尖銳的哨子聲。這是爆破前最後的警示。很快，石山上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響聲，地動山搖中，塵土和石塊伴隨著濃煙騰空而起，四下飛濺，砸在田野裡，及近在咫尺的歐婆婆的老房子上，發出砰砰的聲音。從鏡頭裡看到這樣的場面，我覺得驚心動魄，感覺自己並不是在拍攝一部獨立紀錄片，而更像是在拍攝一部大型戰爭片。

與一般的戰爭片不同，這場「戰爭戲」裡並沒有敵人，既沒有中國官方抗日電影裡的「龜田少佐」等面貌可憎的「鬼子」角色，也沒有描寫國民黨敵人如「胡漢三」、「湯司令」那樣的惡霸漢奸，只有一群在為國家的現代化而工作的自己人。但根據後面的情節發展，如果硬要為這齣戲找出一個敵人的話，很不幸，那就是歐婆婆。風燭殘年的她，身不由己地站在了這場聲勢浩大的現代化工程的反面。

歐婆婆回到家裡，屋頂已經被「飛來橫石」砸了好幾個窟窿。一塊破屋而入的石頭正掉落在堂屋裡的神龕下，驚擾了保佑家族平安昌盛的祖

先和神靈。菜地裡也落滿了大小不一的碎石，辣椒和茄子被打得東倒西歪，有的攔腰斷了莖稈，凌亂地伏倒在地裡。

一看到這樣的場景，歐婆婆傷心地掉下淚來。「房子炸壞了，你們要賠我！」她帶著哭腔朝屋後施工的民工們喊。「沒事的，會有人來給你賠償處理的。」一位民工朝歐婆婆回喊。他來自福建，有著濃重的福建口音，歐婆婆聽不懂他的話。她顯得非常悲傷和無助，坐在屋簷下的矮凳上一個勁地抹著眼淚。

並沒有誰來給歐婆婆賠償。偶爾有好心的民工將她屋子裡和菜地裡的大石頭撿了出去。但這無異於薛西弗斯推石。舊石頭撿走之後，新石頭又砸了下來，歐婆婆的屋頂更加千瘡百孔。歐婆婆不幹了。當爆破隊搬著炸藥再次經過她家門前時，她顫顫巍巍地攔住了其中一個「紅帽子」。「你們不能再放砲了，將我房子都砸壞了！」她伸出瘦小的手臂，試圖拽住他。

「你幹什麼啊，砸壞了有錢賠給你的，你怕什麼！」年輕的「紅帽子」對著她一陣怒斥，他就是剛才在歐婆婆家門口講黃段子的施工員之一──至此，賓主之間的和睦假象蕩然無存。他輕易地甩開了她的手，頭也不回地扛著炸藥箱上了山。

當老弱的歐婆婆伸出手臂去攔住壯實的「紅帽子」時，這一頗具象徵意味的場景，讓我悲哀地想到了「螳臂擋車」這個詞──在中共的話語系統裡，它往往被用來形容自不量力的階級敵人。誠然，別說歐婆婆瘦小的手臂，誰也不能阻擋這個執意加速向前的時代，它只顧著匆匆趕路，並不在乎要撞到路上的其它個體。而所有站在它對立面的人，都會成為它的敵人。

又一輪爆破馬上開始，歐婆婆死活不願再走出屋子，她坐在神龕下的凳子上，對著前來清場的施工員喃喃地說：「我不走了，你們將我炸死算了！」而施工者一邊一個，連哄帶拽地扶住歐婆婆的雙臂，將骨瘦如柴的她輕而易舉地「攙扶」出了房子，架到了對面的馬路上。

爆炸聲再次響起，將歐婆婆微弱不清的哭泣聲徹底地淹沒。

幾天後，歐婆婆的小兒子從杭州緊急趕了回來，他剛放下行囊，便去項目部討要說法。他就是歐安鐵，生於湘黔鐵路修建的年代，「安鐵」這個樸素的名字既體現了中夥鋪村民對新生事物──及由此帶來的新時代

一的歡迎，也寄予了他們美好的祝願，但不幸的是，這個祝願正在遭遇挑戰—因為另外一條新生的道路，他位於鐵路旁的家變得不再安寧。

「你們放砲—炸壞了我家的房子，你們—怎麼辦？」歐安鐵跟孟總結結巴巴地說。他看起來老實巴交，表達能力很差，見到孟總後，甚至都不太敢直視他，眼神軟弱而遊離。

「你放心，砸壞了房子我們肯定會負責的，不會讓你吃虧。」孟總拍了拍歐安鐵的肩膀，豪爽地說，「你自己先弄點瓦片，將砸壞了的地方蓋上，我給你算點材料錢和工錢。」

「一個工我搞不了，房樑都要檢修，很麻煩。」歐安鐵面露難色，「要不你們派個人過來給我修吧。」

「哎喲，你自己怎麼就不能修了？你在外面給人打工都要打，自己的事情怎麼就不能做了。」孟總開始教導他。好像是歐安鐵而不是項目部砸壞了他的房子。

「並且，你不需要大修，只要保證下雨時不漏雨就行了。」孟總說，「我費了好大的勁，正在幫你家打報告上去，爭取列入補充徵收範圍。這樣你就可以拆遷了，我們也避免了麻煩。」

歐安鐵不吭聲了。房屋被徵收也是他的心願，那樣就能拿到一筆賠償款，異地再建新房。這總比既受到爆破的影響又拿不到賠償要強很多。

「難道你有新房子住還不好嗎？」孟總說，他的語氣讓人產生錯覺，似乎並不是高速公路給歐安鐵一家帶來了損害，反而帶來了很大的恩惠。

「你回去耐心等待，有了結果我們再給你答覆。」孟總再次拍了拍歐安鐵的肩膀，送走了他。

從施工至今，儘管爆破所帶來的麻煩不斷，但也不過如此。這是最讓袁科長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壓力面前，他照樣過得悠閒自在。「你知道養花最好的肥料是什麼嗎？」有一天袁科長突然問我。

「什麼？」我搖了搖頭。

「炸藥！」看見我露出驚訝的神情，他興奮地補充說：「將一筒炸藥的硝料倒在花泥中，花草就會長得很好。」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以前有個爆破隊的民工偷了一箱炸藥，埋在工棚前的地下，後來，一棵枝

葉稀疏的葡萄樹突然長勢喜人，一陣瘋長後，結出了滿樹顆粒飽滿的葡萄。

「後來他才發現，是葡萄樹的根系吸收了埋在地底的炸藥硝料。」袁科長光滑的臉上煥發出掩飾不住的神采，「你信不信？這個東西就這麼神奇！」

他指著院子裡一株枯萎的盆栽鐵樹說，「要是以前的話，我就會弄些炸藥來當肥料，保證能讓這棵鐵樹起死回生！」

「只是現在管得很嚴，沒法弄了。」袁科長的語氣透露出些許遺憾。

時時間已經進入到二○一二年的五月份。因為各種原因，施工進度一再被延遲，這條原本預計在二○一一年年底完工通車的道路，現在看起來距建成通車遙遙無期。經過兩年多來的施工，經袁科長之手購置並用掉的炸藥達到近兩百噸，雷管也已用掉五、六萬枚──要是他將這些「神奇」的炸藥用去養花的話，估計大半個中國都早已繁花似錦了。

一天晚飯過後，袁科長坐在宿舍客廳裡，打開電視機。最近手氣不好，他和同事們打牌輸多贏少，他打算停一停，等臭手氣過去後從頭再來。

「糟了！糟了！」他突然一拍大腿，發出一聲驚呼，眼睛死死地盯住電視屏幕。電視上出現了非常熟悉的工地場景，一群身穿橘紅色消防服的消防隊員正在幾輛毀損嚴重的工程車前經過。原來，五月十九日上午八點半，湖南境內另外一條正在修建的炎汝高速公路某隧道內，發生了爆炸，造成二十人死亡。事故起因則是，一輛載有十二箱炸藥的車輛在隧道內爆炸。炎汝高速是炎陵到汝城的高速，跟溆懷高速一樣，都是湖南省「五縱七橫」高速公路網中的在建線路。

「這下糟了，接下來我有事做了！上頭一定會來檢查。」他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

和他反應相似的是楊保國。憑藉多年經驗，他也預感到一場安全檢查風暴即將來臨。「中國就是這樣的，不出事就沒事，出了事就要大搞運動！」果然，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天，項目部就收到了一份緊急通知。全名叫《關於開展專項整治嚴防安全生產事故發生的緊急通知》。發文的是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楊部長的預估沒錯，一場「運動」降臨

了。

袁科長滿面愁容，他用炸藥養花的閒情逸致突然消失了，現階段他有一樁心病：「我最擔心的是，炸藥庫的『安評』有效期剛剛過期了。」當初派出所承建時，炸藥庫接受過一次「安全評估」，但有效期只有兩年。

「那還不簡單，就再去評估一次唄。」我說。

「簡單？可沒那麼簡單！」袁科長回答我，「這是要出米米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做了一個數錢的動作。他算過這筆帳，做一次安全評估，要交給公安局認可的評估機構兩萬八千元，還要交給辰溪縣公安局八千元。此外，公安局一直要求他在炸藥庫房和雷管庫房間修一堵防止靜電牆，這要花一萬二千元。「再加上安評時，我們還要接待這些大爺，這樣加起來就是五萬塊了！」而項目部在今年年底就要可以結束爆破工程，還有半年時間。「半年再花五萬塊，實在太冤了。」

除了「安評」的問題，他還有一個心結，公司的爆破作業許可證也剛好過期了，雖然他已經向公安局遞交了延期到年底的報告，但對方遲遲未批。袁科長擔心此事還會有波折。因為他不久前和公安局治安大隊一位熊姓隊長結下了不大不小的樑子。那次，他突然接到這位熊姓隊長的電話，說治安大隊正在改組，需要一點「工作經費」，問能不能資助他們一萬塊錢。「出錢是自願的，沒出錢，我們也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們的工作。」—袁科長模仿著熊隊長說話的口氣。但公司最終沒出這筆資助費，此後，袁科長明顯感覺到了治安大隊態度的轉變。其中一個姓魏的教導員最為明顯。

「我去審批炸藥時，他找各種理由不給我簽字，百般刁難我。」袁科長說，「這倒罷了，有一次，我的車停在公安局大院裡，他看見了，訓斥我說，『誰叫你停進來的，趕緊開走！』」

「只不過我現在還有求於他們，沒辦法，等我這個工地結束了，你信不信我一定要去舉報投訴他！」袁科長越講越激動，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幾天後，溆懷公司召集各標段和各監理處參加有關「五一九事故」和安全生產的緊急會議。我跟著楊保國部長參加了會議，還有佘總和譚總工程師—顯然，這是一次規格較高的重要會議。

「『五一九事故』是犯了低級得不能再低級的錯誤。」主席台上，會議主持人——淑懷公司總監辦的盧姓領導說。「在座的大家都知道，炸藥和雷管是不能一起運輸的，他們不但一起運輸，而且還人貨混裝。二十個人死了後，起碼是牽連到幾十個家庭吧。中國有句古話，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但現在到哪去找屍體？最完整的遺骸是一段這麼長的手臂。」盧領導停頓了一下，用手比劃著那截看不見的手臂，「其它的都不知道炸飛到哪裡去了。」

台下發出了一陣笑聲。我很奇怪死亡竟然成了他們的笑點，聽起來好像他們在開一場表彰會，而不是一次事故會。會場上一片吞雲吐霧，交頭接耳。

「你們還好意思笑？要是『五一九事故』發生在你們身上，你們怎麼辦？」坐在主席台的總監辦主任郭總發話了，他嚴厲地掃視著會場，場上立刻安靜下來。

在領導們召開會議的時候，袁科長未雨綢繆，已經開始著手解決炸藥庫的問題。總公司最後決定，儘快申請爆破許可證延期，至於炸藥庫，不再花錢去「安評」，立即停止使用，剩下的炸藥寄存在附近煤礦裡。趕在檢查組到來之前，搬遷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我跟著袁科長冒雨來到山腰上的炸藥庫，他和老龍對庫存爆破品進行了仔細的清點。

「還剩下一千八百多公斤炸藥及一千一百多發雷管。」袁科長說，「這可比炎汝高速爆炸的二百八十八斤多得多。」他生性幽默，喜歡開玩笑。但此時他的玩笑只讓我覺得膽戰心驚。我敢肯定，要是它們爆炸起來，一定能將這座山頭轟上天。運載炸藥的彭司機看起來也很害怕，他一再提醒在場的大家關掉手機。「自從看了新聞後，我真是有點害怕。可不是鬧著玩的。」

「彭師傅你別害怕，」袁科長過來安慰他，「只要將雷管和炸藥分離就不會有事，炎汝高速之所以爆炸，是因為將炸藥和雷管混裝，那些人真是蠢得要死。」

「哦，錯了，不是蠢得要死，是蠢得死，蠢死了。」袁科長又開始展示他的幽默，笑嘻嘻地說，「所以，不就被炸死了嘛。」

炸藥裝滿了整整三車，將被運到附近一座當地煤礦。一路上，彭司機開得小心翼翼，以從未有過的平穩和慢速。他感覺自己在搬運一座隨

時可能爆發的軍火庫。好在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軍火庫」平安地抵達了目的地。在接下來的大半年裡，項目部將租用這座煤礦的炸藥庫存放炸藥。

「每月只要三千元，這可比將去『安評』划算多了！」袁科長說。

「那騰空了的炸藥庫以後用來幹什麼呢？」我問。

「不幹什麼，等老龍走後就廢棄了。」也許是因為解決了這個棘手的問題，袁科長的心情非常不錯，他又開起了玩笑，「你要是願意，我們倆可以搬到這來住，想想多舒服，像住別墅一般。」

袁科長還慷慨地送給我一件禮物——一個裝雷管的空箱子，原木做的，結實而質樸，帶著兩個金屬鎖扣，非常復古風。箱子上還貼著「工業電雷管—通過IS09001-2000品質管制體系認證」的標籤。我看了一眼就很喜歡。「你可以拿回去裝點什麼。」袁科長說，「你如果還要，儘管拿，反正多的是。」

我尋思著可以用它來裝磁帶—將我這幾年在工地拍攝的素材帶整整齊齊碼在裡面，然後拎著造型酷酷的它坐火車回北京—聽起來有點像電影中尋寶歸來的西部牛仔。只是，我擔心在進火車站的時候，很有可能被警察們當場擒下，即使裡面裝的只是磁帶，可是，誰會相信一個拎著雷管箱上北京的獨立導演呢？

老龍的心情有點黯然，兩天後，他即將離開這裡返回老家。當五百公里外炎汝高速公路隧道內的爆炸聲響起的時候，他完全想不到，這竟然會導致自己的失業。

「我來看管炸藥庫已經兩年零一個月了。」老龍屈指算了一下，說：「本來以為能幹到這條路修完的，沒想到突然就要回去了。」

「回去做什麼呢？」我問他。

「再看吧，可能去長沙打工。但工資太低了。」老龍的表情變得茫然。「只是不知道拿這隻狗怎麼辦？又不能帶上火車。」小黃狗親熱地蹭過來，老龍輕輕地摸著牠。炸藥庫的「編外成員」也隨著主人下崗了。但此刻，牠只知道快活地搖著尾巴，完全不體會主人的苦衷，也全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風雲變幻。

速度之戀

就在「五一九事故」發生兩個月前，高速公路上傳來一個驚天大新聞：原湖南省交通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明憲，因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投標等環節涉嫌嚴重違紀，被省紀委正式立案調查。

這不是湖南交通系統第一起高層腐敗案。在去年八月份，陳書記的部下、湖南省交通廳黨組成員、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馮偉林，也涉嫌嚴重違紀被立案調查。據媒體報導，馮在土地轉讓、工程招投標、炒股三個方面，存在上億元的巨額受賄等重大違紀行為。而在更早之前，馮的前任、原湖南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楊志達和原湖南交通廳副廳長馬其偉也因腐敗落馬。這些連續爆發的高層弊案無異於湖南省交通系統內的「核爆」─它的威力遠勝炎汝高速隧道裡的爆炸事件，受到爆炸衝擊的也遠不止二十多個人。

這起高層弊案爆發前，湖南的高速公路建設一直領先於全國，據截至二○一一年八月份的一份資料，湖南在建公路里程為四千零六十四公里，居全國第一位；在建和通車高速公路總里程達到六千四百五十公里，歷史性地跨入全國第三位。而在四年前，湖南在全國排行榜的名次是第十七位。對於一個經濟並不發達的中國中部省份來說，這樣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規模無疑顯得驚人。而馮偉林和陳明憲，正是推動湖南高速公路「大發展」的兩個關鍵的「功勳人物」。

我剛到工地上不久，就曾在一份省高管局頒發的文件中領略過這二位的風采。當時是二○一○年十一月，他們尚未東窗事發，正權勢顯赫，雙雙出席了一個名字有點奇怪的會議─「全省高速公路建設項目督戰會」。果然名不虛傳，光從他倆的講話文件中，就可以感受到湖南高速公路建設的「大發展」氣勢─講話裡充斥著「加大」、「搶抓」、「推進」、「確保」、「力爭」、「衝刺」等剛性詞彙，它們都被用來修飾一個輝煌的既定目標─完成六百八十億元以上的年度投資任務、開工十條高速公路項目。在這份文件裡，關於安全和品質，則是草草地略過。這一講話背景，正是中央政府為刺激經濟而推出的「四萬億計劃」，中國繼續進行大建設、大發展，展開了史上「第二次大躍進」。

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大躍進」發生在毛時代，毛提出了「超英趕美」的口號，上演了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等一系列荒唐鬧劇，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我一度以為這樣的荒唐事已經徹底成為歷史，但在如今，我覺得自己的結論也許為時過早。在二位領導參加的這次督戰會裡，從名字到議題，都透露出「大躍

進」般的雷霆萬鈞之勢。

「督戰」這個詞是戰爭詞彙—每一場戰爭中，都有「督戰隊」，他們有權就地處決戰場上臨陣脫逃的士兵。然而，中國的行政體系和現代化之運作，本來就沿襲了共產革命時期的軍事、搞運動的思維，「戰爭」一直積澱在官方和民間的思維及話語系統裡。

不過在高速公路的歷史上，它和戰爭之間倒真的存在某種相通之處。高速公路的血管裡真的流淌著戰爭的基因。較為普遍的一種說法，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誕生在一九三七年的德國，而始作俑者是希特勒。希特勒是個狂熱的高速公路計劃的推廣者，自從他出任德國總理後，不顧當時很多人反對修建這種「奢侈的道路」，大肆宣傳推廣高速公路。他巧立名目，成功鼓動十多萬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進行六個月的所謂國家社會教育，不計報酬地投身於高速公路建設。希特勒還親自制定了高速路的工程標準：包括車道數量、路基寬度、隔離帶的寬度，以及路面坡度和拐彎的半徑，還有反光板、緊急停車帶、高架橋、立交橋的設立，都一一有著具體而詳盡的規劃。甚至連每隔一定距離設置加油站、連鎖餐廳等設施，希特勒都想到了。這些標準幾乎成了後世高速公路建設沿用至今的藍本。

嚴格的標準是為了提升「速度」。希特勒要求，建成後的高速公路能夠讓軍車在一天內橫貫德國的東西南北，一些路段還要能起降飛機。希特勒甚至還制訂了「從柏林到莫斯科」的高速公路計劃，不過這個宏偉而瘋狂的藍圖隨著他的垮台而破滅。

根據資料記載，至希特勒倒台時，納粹德國已修建高速公路達到了四千公里，佔當今德國高速公路總里程數的四分之一。這些高速公路技術精湛，沿途風光明媚，正好讓當時的納粹拿來宣傳德國的工程科技水準，高速公路的建設，還幫助希特勒在短期內扭轉瀕於崩潰的經濟，進而贏得選民信任，為其獨裁鋪平了道路。

然而也有很多中國人認為，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的「秦直道」才能配得上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的桂冠。這條道路全長七百多公里，南起今日陝西淳化，北至今日內蒙古的包頭，縱貫黃土高原和鄂爾多斯高原。這也是一條為戰爭服務的軍事要道，與長城構成了「丁」字形戰略防禦體系。據說是秦始皇命公子扶蘇負責、大將蒙恬監修、徵用了全國七十

萬勞役修建而成。建成後，秦騎兵從咸陽出發，三晝夜即可抵達陰山北伐匈奴。這條古老的道路，最寬處達六十米，可併排行駛十二輛大卡車，最直而寬的路段甚至可起降現代中型飛機。不管怎樣，分隔東西方、橫跨兩千多年的兩位歷史上著名的獨裁者—秦始皇和希特勒竟然不約而同地和一條號稱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發生了關聯。在這裡，「高速公路」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獨裁者和他們的時代共同的面貌：野心勃勃的鐵腕領袖、強大的中央集權、大一統的集體主義、勞民傷財的大興土木、嚴酷的思想控制、受到煽動的愛國主義、目空一切的窮兵黷武……當然，他們最終都逃不脫帝國的坍塌。

「媽的，我做的工程進度牌上還寫著『預計二○一一年年底通車』呢，現在都是二○一二年五月份了，這不是笑話嗎？」楊部長自嘲地笑了笑，「還不知道這條路猴年馬月能建好？」

雖然高速公路建設裡充滿了不可想像的巨大腐敗，高速公路方面臨的社會壓力也非常巨大，然而湖南省高層還是沒有捨棄對「速度」的追求。一位領導在會議講話中說，「儘管目前形勢非常複雜，但是我們湖南高速公路建設今年仍然要完成五百七十億的投資，一千公里的通車目標。大家還是不能鬆懈。」他再次提到了由顯赫的數字組成的年度目標，講話語氣和這些落馬者不謀而合。

畢竟，在這個發展是第一要義的時代，「速度」所帶來的快感和誘惑鮮有人能抵擋。

馮偉林出事之後不久，項目部的王司機興奮地給我打來電話。他無意中看到一檔國產電視劇叫《審計報告》，內容講的是，國家審計署派出「欽差大臣」—特派員到某地方，和當地高速公路集團的腐敗勢力展開較量。

「你一定要看！我懷疑它是根據馮偉林貪腐事件改編的，主要的反面角色也是省高速公路集團的總經理，而且一連樣子都跟他長得有點像，同樣也是文質彬彬。」他興奮地講起他的驚人發現。

我頗感吃驚，趕緊上網搜索了這部電視劇。它真的幾乎就是現實的

翻版：案情不但涉及到了省高速集團的總經理，還牽涉到了省交通廳等更高層領導。劇中對行業潛規則的描繪更是繪聲繪色。電視劇中的總經理，透過他的情婦，暗中控制了二十六家遍布全國各地的工程公司，每次招標，這二十六家企業都會前來競標，從而達成「圍標」。這正是鮮活的現實，據媒體報道，馮偉林僅透過「圍標」就非法獲利三千五百萬元。

但很快，我就發現王司機的結論站不住腳。因為這部電視劇早在二○○五年就製作完成，且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映了。而馮偉林案發已經是二○一一年八月份。所以說，這只是一種「巧合」。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這種「巧合」豈非恰好說明了腐敗的嚴重和普遍？編劇全然不必虛構，就能在現實中輕易找到原型，甚至形成預言。不知馮偉林出事之前看過這部電視劇麼？看過的話，他又會作何感想呢？

這位前局長不但是湖南政界的明星官員，還是湖南文壇的「閃亮」作家，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成員，曾先後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等報刊上發表系列散文，還出版過《誰與歷史同行》、《借問英雄何處》、《書生報國》等十多本書—從書名上看，他無疑是個文藝中年。他曾獲「冰心散文獎」等多項文學殊榮，甚至還入圍中國官方的最高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提名。一群我推測是「市場化」的御用評論，還在北京和長沙為他舉辦了高規格的作品研討會，他被這些評論家譽為「新儒生散文」的代表。

當然，對他的詬病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湖南文壇早就流傳他的作品都是捉刀之作。在案發近一年後，我去網路上搜索他的作品，發現還有他的十部大作出售。其中有兩本頗能勾起我濃厚的興趣。一本是《速度之戀—高速公路文化家園》，一本是《日月馳騁—高速公路文化鏡像》，無論從書名還是封面裝幀來看，這兩本書都是寫高速公路的「姊妹書」。《速度之戀》一書厚達五百一十七頁，腰封上還赫然印著一段文字：

诗人的激情，学者的智慧，英雄的胆略，书生的谦卑。这是国际罕见的从精神的高度描绘高速公路的灿烂画卷，这是国内第一次从文化的视角书写高速公路的煌煌巨著。

我敢說，即便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辭，也遠不及這段「文案」如

此震聾發聵。這位馳騁政壇與文壇的「兩棲官員」真是才華橫溢，他對高速公路的文化剖析與哲學思辨無人能出其右。相比之下，我感到非常羞愧，因為我的紀錄片雖然也是高速公路，但我的思考和見識要膚淺太多，我僅僅紀錄下一條高速公路如何建成、並如何影響到一些人物的命運，從不敢奢望達到馮局長這樣的「精神高度」。我的片子裡的人物也低得像塵埃，進不了局長大人精心編織的「文化家園」。

然而，我卻對他創造出「速度之戀」這個詞彙深感佩服，它精闢地描繪了高速公路的特點，更無心插柳地呈現了當代中國人的某種特質：迷戀速度，速度至上。這不正是從毛時代到當下中國的主政者們一貫的心理徵候嗎？無論是「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還是「向國慶或州慶獻禮」的「趕進度施工」，或者「全力衝刺年度目標」的「督戰會」，不都是不折不扣的「速度之戀」嗎？我想起我在貴陽市的建築工地上看到的一句標語：

我们只畅享最疯狂的速度！

它將暢享和瘋狂（前面還有一個「最」！）並置在一起，毫不掩飾自己病態的「速度之戀」，讓人看了瞠目結舌。在馮局長的巨著裡，他將這種心理稱作「速度徵候群」：

速度徵候群，就是……只要誰超他的車，他就會立即反超。在別的時候，他總是落在別人後面。現在是在高速公路上，他再也不願落在人後。

這似乎是不斷鼓勵你超速的國家發展之路的隱喻。隨著馮局長的「翻車」，這些精闢之言，聽起來就像他獻給自己和這個時代的讖語。我直後悔當初沒有找馮局長給我的紀錄片《大路朝天》做「藝術指導」。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誰比他更適合了，他既懂高速公路，又深具創作熱情。但遺憾的是，此時的馮局長已經深陷囹圄。

「工程關係學」

在我的眼中，高速公路建設是一項技術含量相對比較高的專業工作，涉及到工程學、結構力學、材料學、管理學等各學科，在具體操作中，國家也制定了嚴格的考核、資格認證、監督管理等制度。然而，王司機卻不這麼看。在他看來，高速公路建設除了需要專業知識之外，還有一門非常關鍵的「學科」必須精通─那就是「關係學」，業內人士戲之為「工程關係學」，否則必然失敗。因此，袁科長對治安大隊的「報復和刁難」耿耿於懷，在王司機的眼裡，他的反應實在是有點大驚小怪。

「這種『伸手要錢』的事情，發生在一條高速公路的修建過程中，一點都不奇怪！」王司機說，「只要你搞工程，就一定需要搞好各種關係，要不，你不可能修成一條路！」

「你知道項目經理最重要的能力是什麼嗎？」王司機突然問我。我搖了搖頭。

「就是維護關係，一個不會搞關係的項目經理，哪怕他專業能力、管理能力再強，也是不合格的。」王司機總結說，「一個合格的項目經理應該經常去上面跑動，而不應該老待在工地上。」

作為項目經理的專任司機，我豈能不相信他的看法？在中國官場乃至各個行業，領導的司機是一個特別而重要的角色。與其說是司機，還不如說是生活秘書或助理。這也是我經常能從王司機那得到一些不為人知的資訊的緣故。在中國特色的現實裡，「關係」這兩字是決定一條高速公路成功修建與否的核心指標，從項目的招投標到正式的修建，再到考核和結算，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它。

因此，十四標項目部實際上有兩位「公關先生」，一個就是項目經理佘總，他負責對上級：業主、監理、工作站、高速公路管理局以及交通廳─這些部門握有關係施工方利潤的「生殺大權」。另一個是協調經理孟總，他主要針對當地政府：縣指揮部、鄉村兩級政府、以及地方各相關部門─路政、運管、稅務、交警、國土，當然還有公安局和派出所。這些人雖然不能直接給工程創造利潤，但絕對能保證你的工作是否順利開展─這也是一種利潤。相比於經常出現在我鏡頭裡的孟總，佘總的公關工作更為隱形而神祕。我平時幾乎見不到他的蹤影，只要到了臨到檢查、開會或者其他重要活動的時候，他才出現。

佘總平時會待在懷化市內一家不錯的賓館裡辦公，可以先消費後結帳。賓館處在交通便捷、商業繁華之地，距離業主溆懷公司的辦公室不

遠。而他的主要公關工作，就是和領導們唱歌喝酒，有時候還要打「業務麻將」──這是句湖南俗語，指陪領導搓麻將，它必須遵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換句話說，你最後只能輸給領導。「要維護這些關係，自然離不開『米米』」。

我的鏡頭裡都無法呈現這些場景，而我之所以了解，要多虧他的司機偶爾透露。這位文藝中年一直喜歡看我拍攝紀錄片，相熟之後，即便嘴巴嚴密，還是會流露出蛛絲馬跡。

「昨天晚上，我們請業主唱歌，花了六千元。叫了好幾個小姐。業主方還自己從懷化學院裡找了幾個學生妹子陪同。」

「學生妹子？」我好奇地問。

「對的，你想玩嗎？一米七幾的個頭，身材超好，極品型的，每夜三千元。」王司機大笑起來，並朝我擠眉弄眼。

除了請領導參加自己安排的酒席，一名合格的項目經理還要時不時參加領導或某些特殊關係人舉辦的酒席。不管是生日宴、結婚宴、嫁女宴、招媳宴、兒女升學宴、喬遷新居宴，名目繁多，數不勝數。但同樣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前不久，溆懷公司的一位副老總五十大壽，佘總去喝了酒，其他各個標段都去了。」王司機說，「不送個幾千塊錢的紅包，根本就拿不出手。」

「所以說稍微有點權力的領導，都喜歡趁著任內舉辦酒席。這叫有權就用，過期作廢。」

我想起前幾天在孟總的辦公桌上看到的一張紅色請柬：

为女儿升学设宴 恭请溆怀高速十四标项目部协调部光临
时间：公历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农历二○一○年七月二十一）
上午10：18入席，席设大丰和饭店（小龙门）

發出請柬的人是火馬沖派出所的艾警官，此刻，「警民聯繫」的紐帶是一張喜慶的紅色請柬。派出所管轄範圍內的幾個標段都收到了它，大家不敢不去參加，自然也少不了贈送紅包。用孟總的話說，「這些地頭蛇可不能得罪。」

二○一二年十一月份，佘總在懷化市的「煌族大酒店」訂了一桌酒席，宴請業主方的總監辦領導。一位老總和副老總參加，還有其他領導作陪，總共七個人。因為是佘總宴請，王司機今天的角色不完全是開車，還要負責訂製酒席、點菜和結賬，以及擔負其它的隱祕職能。

「這頓飯吃得一點都不貴，只花了三千多一點。」但王司機馬上補充說，「但這沒算酒水費。」宴請的酒是「內參酒鬼酒」，一千多塊一瓶，王司機先從菸酒專賣店買了六瓶。席間喝掉了四瓶。「內參」是獨特的中國新聞詞彙，因為資訊不公開，所以一般民眾在報紙上看到的新聞是「狗咬人」，但市一級領導們則透過記者們用「內部參考」的方式看到「人咬狗」；級別越高的知道的越多：省級領導可以看到「人為何咬狗」，中央層次的則會知道誰在咬狗，以及咬法和處理的結果。如今，「參考」變成了一種象徵更高地位、獨家壟斷的酒。

「剩下兩瓶，被那位副老總順手牽羊了。」王司機悻悻地說，「他每次都這樣，看起來好像喝醉了，關鍵時刻可不糊塗。」

然而這還不是一次宴會的全部花費。在宴會開始前，還有一個小小的「熱身」環節。王司機在酒店點完菜後，將車開到所宴請客人的辦公大樓下。辦公樓前停著一排小車，王司機一眼就認出了其中一輛。這正是今日主角──某總監的座駕。他走過去敲了敲車窗。

「來，你下來。」駕駛室裡坐著一位年輕人。他是總監的司機、秘書兼生活助理。王司機領著同行走到自己的車旁，打開後車廂，拎出一個鼓鼓囊囊的大手提袋交給他。

「你交給總監吧。」王司機說。

總監司機接過手提袋，掃了一眼，「裡面沒放別的東西吧。」

「沒有，就是酒和菸。」

「好的。」總監司機迅速地離去，麻利地將它放進了自己的後備箱。無論整個過程，還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對白，都簡短得超乎想像。真讓我有點失望。

「他剛才問我有沒有別的東西，就是指有沒有錢的意思。」等總監司機走遠，王司機解釋說，「如果禮品裡塞了錢，他就要趕緊拿出來處理好。」總監司機提走的兩瓶酒，叫「洞藏酒鬼酒」，比「內參酒鬼酒」貴很多，王司機告訴我，一瓶近四千元。還有兩條「和天下」牌香菸，一條一千一百元，也就是說，這個簡短的「熱身」價值一萬多。作為一名合格的領導司機兼助理，王司機熟稔各種菸酒的市場行情。「我

們拿的還是大客戶才能拿到的批發價，市場價就更高了。修這條路到現在，光我們買酒的錢，就花去了二十來萬。」

除了一般宴請送禮，每年的端午、中秋、春節三個傳統節日，也是王司機最忙的送禮日期。此時，他通常要給業主方的主要領導送五千元紅包，外加兩條「和天下」牌香菸。換言之，僅僅一個節日，業主方的一個領導就會收到十萬多元現金和二十條「和天下」。

「他們收到的菸堆積如山，根本就抽不完，只好賣掉。」王司機越說越興奮，「給你講個有趣的事，有一位副老總還專門委託他的司機，用批發價處理掉這些抽不完的菸。有一次，我還從他手裡重新買回好幾條『和天下』，我們送給他，又從他手裡買回來，你說搞不搞笑？」他忍不住自己就笑了起來。

坐在王司機旁邊的副駕駛位置上，我卻一點也笑不出來。王司機顯然不知道我內心的變化，他繼續「指導」我這個關係學的小學生。「這種菸還不是湖南最好的，最好的是白板的『和天下』，兩千七百多一條。」他從座位旁的儲物箱裡拿出一包菸，「就是這種，抽起來很香，你要不要來一根？」

我有點受寵若驚，趕緊謝絕了他的慷慨。我這個不會抽菸的人，不想糟蹋了它的尊貴—我暗暗算了一下，這樣一根菸就值將近十五塊錢，差不多夠在中夥鋪買四十斤桔子了。在那裡，村民們自家種植的桔子只賣四毛錢一斤。我好奇地看著這包菸，簡單的白色包裝，沒有任何圖案，沒有廠標，沒有「吸菸有害健康」的警語。在我這個外行人的眼裡，它怎麼也不值將近三百塊。我覺得和民工們抽的五塊錢一包的差不多。沒想到在中國鼎鼎大名的、為特權階層獨享的「特供品」，竟然長得如此平民，就好像微服私訪的王爺一樣。上面只寫著兩個詞：

和天下　特供

「越貴的菸越是這樣，簡單，低調，可別看它這樣，你想買市場上都買不到，必須有關係走特殊管道才能買到。」王司機看出了我的迷惑，「兄弟，見識了吧。這還只算湖南最好的菸，據說全國最好的菸一條要一萬四，專供接待上級高官的，一包就是一千四，一根就是七十塊，你說嚇不嚇人！」

「沒辦法，中國就是這種風氣，所謂菸酒菸酒，就是研究研究，誰

叫他們手中掌握了研究你的事情的權力呢。」

相比於菸酒、土特產，還有一些別緻的「特供品」聽起來更具誘惑力和想像力。當我們談及此話題時，除了王司機外，黃監理和楊部長都加入話題，各自分享自己的經驗。

黃監理三十出頭，濃眉大眼，精明幹練，來自監理處，負責監理十四標。他講了一段自己監理正道公司某一標段時的經歷。「我親眼見過他們搞這一套的厲害。有一次，業主總監帶隊來工地視察，他們安排了十多個小姑娘，一人手上拿頂草帽，還有一把紙扇子，一對一地陪著領導們走。走到有太陽的地方，就趕緊給領導戴上草帽，用扇子搧風。」黃監理模擬戴草帽和搧扇子的動作，繪聲繪色地說，「更有意思的，小姑娘手上不知什麼時候就多了一個冰淇淋，遞給領導，說，領導，請吃冰淇淋。」

旁邊的楊部長對此也很有感受，插話說，「我在廣西搞工程的時候，省高管局領導下來做交工驗收，項目部也是派出小姑娘陪同，手上拿著遮陽傘、防曬油、濕巾紙。一邊走一邊給領導打傘，一看到領導出汗了，馬上就遞上濕巾紙，給他擦汗，然後再用防曬油給他擦臉，那可真是皇帝的架勢！」

我聽著楊部長的講述，腦海裡馬上浮現出陪同人員畢恭畢敬給領導打傘的場面—這一幕經常出現在中國有關領導視察的新聞裡，但我沒想到，在打傘的背後，還有這麼多更人性化的豐富細節。

「那真叫一個細心體貼。那次，領導們是來定投資比的，他們自然不敢怠慢。」黃監理嘖嘖讚歎，「正道搞這套很厲害，我真是很佩服他們。」

黃監理口中的「正道公司」，就是譚司機去新疆修公路時服務的那家民營公司，在業內名氣不小，中標率很高，承包的工程遍佈全省甚至外省。「正道」這個名字取自毛澤東的一句詩詞：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不過，它的制勝法寶似乎並不那麼「正道」。

「你還別說領導，就像我這樣的普通監理，他們也不會疏忽。」黃監理接著說，「我一上工地，他們就派一個年輕的妹子緊緊跟著我，給我遞菸、點火，熱的時候，也給我搧扇子。」黃監理又用手做出遞菸、點火和搧扇子的系列動作，好像在表演獨角戲。

「只不過我不吃他們那一套，要是換成你龍總，我敢保證，你隨隨便便就可以搞到她！」黃監理興致很高，指著旁邊正聽得入神的龍副總開著玩笑。大家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冤家亦朋友

在來工地之前，我以為，因為不同角色使然，施工方和監理方應該是一對天生針鋒相對的「冤家」：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施工方總會想方設法降低成本，甚至降低工程標準，忽視施工安全。而監理方要做的，就是嚴格糾正他們的錯誤行為，讓他們從「歪門邪道」回歸「正道」，從而保證工程的品質和安全。但在現實中，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據我在三年多時間裡的觀察，監理和施工方的關係通常其樂融融，一片和諧。甚至說彼此是好朋友也毫不為過，他們經常在一塊喝酒打牌，唱K娛樂。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就像一位好脾氣的和事佬，帶著甜美的笑容出現在工地上。

溆懷高速全路段的土建工程總共有四個監理方。十四標段的監理方是一家來自浙江的監理公司，監理處處長六十來歲，人很和氣，平時大部分時間都笑瞇瞇的，經常來項目部喝酒，人們背後都親切地稱他為「宋老爹」。宋老爹的小舅子也在十四標項目部工作，在實驗室任職。他剛從家鄉縣城的某企業「退休」，雖然沒有在實驗室工作的專業技能，但礙於宋老爹的面子，項目部不得不聘用他。

「他什麼也不懂，其實就是給他一個拿工資的機會。」實驗室的一位職工說。

年輕的黃監理就是該公司的職員。儘管他謙虛地稱自己為「普通監理」，但其實，監理方並不那麼「普通」，它是項目部不敢怠慢的對象。因為監理所擁有的職責權力，同樣能影響到工程項目的驗收、評比、變更和款額支付。有時候，只要監理大筆一揮，就能為施工方帶來數以萬計的豐厚利益。

「你知道嗎？監理們每月都從我們這裡領工資。」有一天，綜合辦公室的辦事員小羅突然忍不住跟我說，「不同級別領取的數額也不一樣，像黃監理，他是監理組長，大概每月能領到四千塊的工資。我們每

個月還要給他好幾條菸。他回家休假探親，我們也要給他買好車票，準備好禮物，他在工地上開車的油錢，都是我們給他報銷呢。當然，宋老爹拿到的就更多了。」

看到我露出了驚訝的表情，小羅笑了笑說，「要不你以為平時關係不錯是那麼容易得來的？」

我心生一陣羞愧。坦誠說，我沒法做到對施工方和監理方的這種特殊關係安然若素。

當然也有例外。有一次，黃監理突然在工地上變臉了，他大發雷霆，突然之間，讓我覺得之前的和睦都是假象。起因是楊柳灣大橋的立柱和蓋樑施工不達標，違反了程序，黃監理威脅，要對項目部施以「罰款」、「停工」和「返工」的處罰──這是監理具備的權力。

「黃總，下次我們改正吧。」譚總工程師陪著笑說：「這次就算了。」他和工程師老毛一路陪著黃監理。龍老闆聞訊趕來，這個有問題的工程就是他的施工隊承接的。

「還有下次？三番五次地跟你說，省交通廳發的一八二號文你們看過沒有？」黃監理依然面孔嚴肅。「你以為我是吃素的？你別看我以前不發脾氣，那我這次發次脾氣給你們看看。我不在你這裡工作沒關係的，我去哪都一樣有飯吃。我告訴你！」他怒氣衝衝，幾乎暴跳如雷，完全變了個人。

「都是熟人，都是老朋友啦。別因為這個傷了感情……」譚總工繼續磨著嘴皮子。

「還好意思說老朋友？不是我傷感情，是你們逼著我這麼辦的，現在是我給你們面子，你們不給我面子了。」黃監理指了一下施工中的橋樑立柱，「我已經跟你們說了多次了，這個東西不能這麼搞。你們根本就不將我當回事，那我有什麼辦法呢？」

「不就是個支架問題嘛，其實在你的領導下，我們的蓋樑做得還馬馬虎虎的嘛。」龍老闆接過話說，他好像並不怎麼懼怕黃監理的停工威脅。「說實話，有些標段連支架都沒做呢。」

「你別給我戴高帽。」黃監理轉過頭，對著龍老闆嚴肅地說，「我跟你說，你那根立柱絕對別想計量了。」所謂計量，就是計算工程量，必須經監理簽字，否則，施工方就拿不到施工款。

「哎呀，這個只要保證安全就可以了，該照顧就照顧一下吧，你說是吧。」龍老闆仍然笑嘻嘻地說。

「真是給你們臉不要臉。」似乎被龍老闆的無所謂刺激了，黃監理變得火上加油，「讓你們一尺，你們就進一丈。有你這麼搞的嗎？你別逼我。都是幹工程的，有些東西不要太過分了！」

「不會的，我們有底的，你就放心吧，我們會做好的。」龍老闆滿臉堆笑，遞過去一根藍芙蓉王，「黃總，別發脾氣了，抽根菸消消氣。」

「不抽！」黃監理沒接龍的菸。

譚總工又出來打圓場：「黃總，你別太激動了，太激動了你自己也傷身體。一會我們去找毛總，一起談一下，將這個事情商量好。」

「你看，像這麼吊鋼筋也是不允許的，」黃監理又指著橋墩下正在起吊鋼筋的吊車說：「必須裝一個籃子，鋼筋這樣吊上去不變形嗎？」

「主要是要趕進度嘛，再不打混凝土鋼筋籠就生銹了，所以龍老闆就有點著急。」譚總工又出來打圓場，他好像不是最高技術長官，而是一個公關先生。「這麼弄也沒多大的問題，你不原諒一下就算了？」

「要是上面來檢查，我們肯定就會停工的。」龍老闆說，「我就是看你平時好說話，別再為難我了，兄弟，沒必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嘛。」龍老闆叫起了「兄弟」，這個詞好像才是施工方和監理的本質關係。確實，大部分時間，他們就像榮辱與共、互幫互助的兄弟一樣。

橋樑工程師老毛也出來打圓場：「黃總，特殊情況還是特殊解決吧。」

「你跟我說沒用，我只是在執行上面的命令。」黃監理還是氣鼓鼓的。

「你是我們的父母官啊。」老毛說。他用的這個詞──「父母官」又道出了監理和施工方的另一層本質關係：監理就是施工方的衣食父母。

「走吧，我們去項目部說。」龍老闆走過來，將手搭在黃監理的肩上，笑嘻嘻地說。從我的鏡頭裡看起來，這時候的他們更像兄弟。

在項目部，一把手毛總早在等著他。毛總將黃監理迎進了他的辦公室，卻將譚總工、龍老闆、老毛以及我禮貌地請了出來。不知道他們在房間裡講些什麼。

瞧這架勢，我想今天晚上項目部一定會召開「整風會議」，從而掀起一陣「問責風暴」。為了不錯過這個重要環節的拍攝，我趕緊去給攝

像機充足電。然而我的預測落空了。沒一會，黃監理從毛總的辦公室出來，他臉上的怒容早已消失不見，又代之以平和而友善的笑容。毛總跟在他身後，也是一副樂呵呵的樣子。

「走吧，我們去放鬆一下。」毛總親暱地拍打著黃監理的肩膀，有說有笑地走到了大門口。

龍老闆看到他們走來，麻利地發動了自己的吉普車。黃監理一閃身，坐上了毛總的小車。吉普車在前面開路，兩輛車一前一後地朝懷化市方向疾駛而去。

「他們去幹嘛了？」我看著兩輛車漸行漸遠，納悶地問。

「還能幹嘛？嗨皮唄。」譚總工朝我眨了眨眼睛。

「那明天還停工嗎？」我繼續問。

「當然不停工啦，不都公關了嘛。」老毛搶著回答我。

第二天，我在工地上碰到龍老闆。他的施工隊仍然在熱火朝天地施工，並沒有任何停工或者返工的跡象。「沒罰款了吧？」我關心地問。

「不可能罰款，誰的面子不賣，毛總的面子他還是要賣的。」龍老闆說，「監理都是吃項目部的，用項目部的。他還來找麻煩的話，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昨晚去哪裡玩了？」我問。

「請他喝點酒，打下牌，送點錢給他。不就完事了麼？」

「既然毛總的面子要給，那他昨天也不要發那麼大的脾氣呀。」我還是不解。

「不發脾氣怎麼能拿到錢？他這是能屈能伸，是一種策略。」龍老闆說，「不過站在他的立場上考慮，我們也理解他。大家太熟了，像親戚一樣，他不這樣有時候不好控制局面。」

當我聽到龍老闆說出「親戚」一詞時，越發對工程關係學裡的複雜性感到迷惑，不知道他們究竟算上下級、兄弟、朋友，親戚，還是別的什麼？或者兼而有之？「不管發生什麼，到最後大家只要坐到一塊喝杯酒就OK了。」每一次嚴峻的品質問題，總會演變為一次荒誕的公關行動。這就是中國式的監理。

二○○九年，上海發生一起著名的建築事故：一棟在建的十三層住宅樓突然全部倒塌，造成一名施工員死亡。當時在網上引發了公眾對當今

建築品質的強力質疑。網民們將中國各地發生的垮樓事件戲稱為「樓脆脆」──就是「樓很脆弱」的意思。繼上海「樓脆脆」後，又出現了鄭州「樓脆脆」，武漢「樓脆脆」，青海「樓脆脆」等等。在中國，不光只有「樓脆脆」，還有「橋脆脆」和「路脆脆」。最近幾年，垮橋事故頻發，道路塌陷嚴重，各種「豆腐渣工程」一直層出不窮。有媒體報導，截至二○一二年的最近五年，整個中國垮橋三十七座。有專家警告：中國將進入垮樓垮橋的高發期。而湖南就是垮橋的重災區，二○○七年，沈從文的故鄉──湖南省鳳凰縣正在建設的鳳大高速公路堤溪沱江大橋發生坍塌，造成六十四人死亡，二十二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近四千萬元。大橋坍塌的主要原因是「趕進度」，為了給一個月後的湘西自治州「五十年州慶」獻禮，因此降低了施工品質。此外，好幾起發生在外省的垮橋事故，都跟湖南的施工企業有關。我在工地上，經常會聽到民工調侃此事。

「你們湖南人修的橋不行，老是垮。」在楊柳灣大橋上施工的小馬來自廣東湛江，他用濃重的湛江口音很不屑地說，「什麼九江大橋，錢塘江三橋，都是你們湖南人修的，結果都垮了。」

「你們請我們來是對的，我們修的橋絕不會垮。」不過，他也坦誠說出自己的擔憂，「每次通車後，我走在自己修的橋上時，心還是嘭嘭嘭跳。」

「為什麼？你不是覺得自己修的橋很好嗎？」我問他。

「因為修橋的還有你們湖南的、四川的，各個地方的都有，我只負責其中一道工序，鋼筋啊、水泥啊、樁基啊、立柱啊，都不是我們做的，我不能保證它們有沒有問題。」小馬說，「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橋就有可能垮掉。」

二○一二年六月，項目部接到通知，幾天後上級將來檢查工作。對於楊部長來說，如何應付這種檢查，早已不是個問題。每當檢查來臨，他們就會全力以赴做好「面子工程」：在領導們要經過的地方清掃場地、平整道路、插上彩旗、豎好標語牌等等；當然，也會遮住一些不想讓領導看到的東西──平時堆在工地上、經過日曬雨淋而變得鏽跡斑斑的鋼筋，此時，就會有一塊油布及時地蓋住它，或者一輛吊車將之暫時吊走。我跟著楊部長去工地插彩旗，掛橫幅。他特意做了一條紅色橫幅，

上面寫著「熱烈歡迎上級領導蒞臨我標視察指導工作」，他將它掛在醒目的交通要道上，「這就是給領導們看的，如果他們有興致，還可以站在前面拍拍照。」一領導檢查完後，他就會趕緊將它撤下，以留待下次使用。從業主到省交通廳，從當地縣政府到市政府，檢查的名目雖然繁多，但過程通常大同小異：多半是走走過場，說點一團和氣的空話和套話。往往聲勢浩大而來，一溜煙而去，甚至有前來檢查的領導在工地上待不足五分鐘。

「我覺得這樣的工作沒有一點意義，老是在做面子工程，很無聊。」他將一面寫著「婁底路橋」的旗子綁在橋欄上，一邊自嘲地說。他的腳下還有一堆炫目的旗幟。他今天的任務就是將七彩旗插滿工地。

無疑，如同他把共產主義和佛教平衡得很好一樣，楊部長很快就把剛才的反應拋到腦後。他馬上又說，「不過面子工程也是必須的，旗子是一個標誌，是意志和精神的象徵，不能缺少。」於是，楊部長又精神抖擻地扛起一面旗子，大步流星地朝下一個目的地走去。

這次，楊部長的預估錯了。他佈置的面子工程非但沒有轉移檢查者的視線，反而成為欲蓋彌彰的象徵。蒞臨檢查的是位長沙官員，來自湖南省交通建設質量安全監督局。這位官員很年輕，大概四十出頭，是個工程博士。和之前我見過的領導完全不同，他隨手帶把卷尺和卡片式照相機，一邊走一邊測量鋼筋、T樑等施工物的規格，且親手拍照備案。這種典型的學者型官員氣質，以及他表現出的專業素養和細緻認真的態度，讓攝像機後的我備感吃驚和欽佩。出人意料的，這位官員給我留下了非常不錯的印象。

他很快在預製場發現了問題：T樑鋼筋構架焊接不合格，還採用一種被交通廳明令禁止的老式焊接法。

「你們怎麼搞的？我將文件和圖紙下發給你們很久了，你們怎麼就沒改？」博士官員第一次發了飆，他鐵青著臉，對著佘總說，「你們的質檢員和施工員怎麼搞的？難道不會看圖紙嗎？」

他又朝著宋老爹，「誰是這裡的現場監理？」

宋老爹趕緊將黃監理推了過去，「是他。」

黃監理嚇得有點不敢說話了，紅著臉，低著頭站著。

「要你們監理幹什麼的？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沒有看出來，真是瞎胡

鬧！」

宋老爹的臉此刻陰雲密布，他指著黃監理：「你真是個傻逼，我說過很多次了，你怎麼就沒聽？」

「將這片鋼筋全部給我拆掉，重新返工，並且將圖片拍好發給我。」博士官員嚴厲地說。宋老爹、佘總和譚總工等人連連點頭，唯唯諾諾。此時，他們失去了當初和黃監理討價還價時的那種氣勢。

博士官員又來到楊柳灣大橋上，他的目光沒有在楊部長的橫幅上做任何停留，只低著頭細緻地檢查著橋樑上的施工規範。此時正值中午，夏日烈陽曬得他渾身冒汗，額頭上汗水涔涔，白色的襯衫後背也已經濕掉了一大塊。但奇怪的是，此時沒有人給他打傘，更別說遞濕巾紙和防曬霜。

宋老爹和佘總示意他不必走完全程，他卻堅持一直走到橋的另一端。很快他又在橋上發現混凝土澆築和鋼筋焊接都有問題，此外，施工安全也有違規。他第二次發了飆。這還不是最後一次。他回到項目部，查閱施工文件，又發現了新的問題，他第三次發了飆。

「他媽的要你們監理幹什麼的？太不像話了，現場監理工作完全不到位！」他開始朝宋老爹和黃監理罵起了粗話。「必須以你們監理處或者業主的名義，對監理工程師進行處罰！還有，你們施工單位這麼搞也太馬虎了，亂彈琴！」我在攝像機後大吃一驚。像他如此不留情面、當面痛斥的官員，真的是非常罕見。我暗暗為他喝彩。只有這樣的精神多一點，才能讓中國的「橋脆脆」少一些。

最後，博士官員責令項目部，對所有問題工程進行返工：包括填充好的路基，也要挖開後重新填築。此外，要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罰。問題如此棘手，這可是項目部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結果，看起來，他們之前所有的經驗在這位認真的博士官員身上失效了。博士官員一走，項目部的領導們便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馬上召開會議探討應對措施：一方面按規定進行整改，另一方面，他們決定由佘總緊急公關。忐忑不安的佘總放下了手邊的其它事情，驅車前往四百多公里外的長沙。

幾天後，王司機面帶倦容地回來了。顯然，這次不像一般的赴宴送禮輕鬆，他似乎也沒有休息好。

「佘總將那位官員單獨約了出來，送給了他幾條菸和一個紅包。」

「這次你們碰了釘子吧。」

「廢話，當然收了，他就是存心來找茬的。」王司機如釋重負地說，「這事應該沒什麼事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即使我相信其他所有的檢查最後都轉換成了公關行動，但我也不相信它會發生在這位博士官員身上。我實在無法將鏡頭後那位認真、負責、秉公辦事的好官員和王司機描繪的聯繫在一起。我承受不了如此程度的分裂。

但項目部裡只有我一個人少見多怪。「他們總是習慣用人民幣去擦屁股。」辦公室主任老李平靜地說。「有什麼好稀奇的呢？還有一次規格更高的檢查，是國家交通部的領導前來，為應付這次檢查，項目部就花了四、五十萬元，請了一百五十位民工，連續工作一星期。這樣才得以通過。」

「十九標差點沒通過，」王司機補充說，「交通部領導對他們大發雷霆，突然，一個神祕電話打來，他畢恭畢敬地聽了一會，臉色很快就多雲轉晴。」

「據說那個電話是從北京打來的，他媽的真沒想到小小的十九標，竟然有這麼牛的關係！」

第八章

被改變的村莊

「和諧拆遷」

二○一○年秋天的某個清晨，我又爬上了歐婆婆屋後的那座無名石山。往北望去，正可看見這條成長中的道路，頂著曙光，一路從北至南穿山越嶺而來──像一張正在被時光顯影的底片，面目一天比一天清晰起來，漸露出龐大而綿長的雛形。相比於春天時的情景，腳下的這座石山已經面目全非。原先茂盛的灌木叢日漸凋零，枯萎的葉片上佈滿塵土。碎石遍佈。石山一側，被炸掉了一半，露出了灰白色的陡峭崖壁，而崖壁下的山地已被夷平，變為高速公路的路基。

從去年冬天開始，修建敘懷高速公路而引起的徵地和拆遷就已經如火如荼，全線需徵用土地多達八千三百七十一畝，需拆遷房屋八百二十八戶；僅辰溪縣境內，需徵用土地二千一百多畝，需拆遷房屋二百四十多戶，歐婆婆家正是其中之一。對於當地政府來說，協助高速公路進行拆遷，無異於一次堪比戰爭的「大會戰」。中國官方語言裡，一直用戰爭術語表達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動員。就在不久前，我看到道路旁邊一幅讓人記憶深刻的標語：

是英雄，是好汉，三年会展比比看

辰溪縣政府的門戶網站「辰溪網」上，也有一篇名為《辰溪縣打響溆懷高速公路徵地拆遷大會戰》新聞，標題就用了「打響」和「大會戰」兩個軍事詞彙。而二○一○年三月九日的《湖南日報》，更是刊發了整版的長篇通訊《懷化市在建高速公路徵地拆遷紀實》，以「革命浪漫主義」的文風，激情地描繪著這片土地上的巨變：

延伸，延伸，不斷地向前延伸！

初春的五溪大地，到處都是一片熱氣騰騰的景象。從雪峰山下，到

沅水河畔，從麻陽苗寨，到通道侗鄉，彩旗獵獵，機械轟鳴，群山沸騰。懷通、吉懷、新溆、溆懷四條高速公路建設大軍在數百里沿線擺開戰場，揮汗如雨，晝夜不停，破土前行。

文章用「大軍」表示修路工人，工地則被形容為「戰場」。文章後面關於拆遷的描述，則被形容為一場「攻堅戰」。即便是夜晚，依舊在開戰，所以「營火點點」。類似軍方的「指揮部」，是這場拆遷戰爭的總統帥，此外，還有「助戰」的方方面面，如國土、交通、林業等部門。

旌旗展，千軍萬馬上高速，雪峰山下的懷化展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征地拆遷攻堅戰，只見戰疆長臥，營火點點。

《湖南日報》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宣傳國家意識形態的「黨的喉舌」。它的報頭題詞出自毛澤東一九六四年的手筆。這個最著名的湖南人不光是政治家，也是深具「革命浪漫主義」氣質的詩人，更是中國共產黨裡最能鼓蕩風雲的一條「喉舌」。他親筆寫下了很多篇戰鬥檄文，並直接以社論形式發表在各類黨媒體上，不斷鼓蕩起一個民族的瘋狂和荒誕。很顯然，這篇通訊的文風儼然有幾分毛的氣質。文風還是次要的，關鍵是真相再一次被篡改。對於讓當事者棘手和頭疼的拆遷，這篇通訊從頭至尾都是空泛的謳歌，尖銳的社會矛盾和複雜的人性糾葛卻蕩然無存，只剩下被過於美化的現實，以及被過於粉飾的太平：

他們深知，幹部付出的是心血，百姓讓出的是土地，而他們留下的則是希望。面對簡陋的村寨、淳樸的鄉民，施工方常常義然而動。

懷化人如同當年三線建設修鐵路一樣，以高昂的熱情投入建設中，默默地承受著一切犧牲。桃李快熟了，楊梅快紅了，辛勤耕耘的橘園盛產了，安居樂業的房屋修好了。但是高速公路快要開工了，怎麼辦？農民磨利斧子一砍！強忍心痛一拆！

路地攜手，和諧拆遷，換來的是濃濃的「魚水情」。麻陽苗族自治縣蘭村鄉泥溪村的村民，就像當年支援解放軍一樣，主動為駐紮在深山老林的十四標段送米送菜，每逢傳統節日，還殺豬宰羊，自編自演節目慰問施工人員……

看了這樣的文字，我的心中升起一股無法遏止的虛無感，恍惚中，我以為自己穿越去了一個異度空間。因為在拆遷中，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那些尖銳糾紛，在官方的媒體裡幾乎不見蹤影。我的攝像機拍下並見證的那些世事，絕非文中描述的「和諧盛景」。如果這篇報導也算「紀實」的話，那我的紀錄片絕對就是百分百的科幻片。

隨著施工旺季的到來，現在是孟總最忙碌的時候。在整個秋季，我的「科幻片」裡的主要角色孟總，幾乎每天都奔波於外，處理拆遷中不斷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糾紛。而陪伴他的，還有縣高速公路指揮部的官員、國土資源所的公務人員，以及鄉、村兩級幹部們。無論對於孟總，還是對於政府來說，徵地拆遷絕非《湖南日報》上描繪出來的「和諧拆遷」，而件件都是棘手之事，稍有怠慢就可能惹出大麻煩。

「來，你過來在這裡簽個字。」在一塊稻田旁，國土所的公務人員指著一份徵地統計表，對著一個老實巴交的男人說。他就是稻田的主人歐安鐵。他憨厚樸實，應聲過來，拙笨地握住遞過來的圓珠筆，歪歪扭扭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房子被徵收拆遷之事還沒妥善，歐婆婆家又有一塊田地被徵收。

「好了，補償款會統一發放的，到時村裡會通知你。」公務人員迅速收回了筆和表格，和孟總往另一塊稻田走去。歐安鐵什麼話也沒說，他呆呆地盯著田埂下的一塊稻田。稻子已經熟了，逼仄的山谷間金燦燦一片。

另一條田埂上，站著一位中年農婦，她一邊簽字，一邊絮絮叨叨地抱怨說：「賠這點錢太少了……就這麼一點田地，昨天他鐵路上來徵收，今天你高速公路來徵收，明天他什麼廠礦又來徵收，以後我們就沒有田種了……沒田種要農民怎麼活啊……」

「我們已經按比較高的標準賠付給她了，她還想怎樣？」孟總看了一眼農婦，皺了皺眉頭，轉過身來，不屑地說。

那是一小塊不規則的稻田，後方是高速公路的路基，前邊是蜿蜒而來的湘黔鐵路，右邊是車流如織的省道。金燦燦的稻禾點綴在這三條道路的夾縫之中，從鏡頭裡看起來，有著讓人觸目驚心的美和憂傷。農婦就站在那裡叨叨絮語。突然，一列紅白相間的「和諧號」火車從東邊飛馳而來，轟隆隆的轟鳴聲淹沒了她的抱怨。歐安鐵憂心忡忡。他家的水

田，每畝將會補償三萬元。房子是磚木結構，按標準能拿到的總補償款只有八萬元。按現在的物價、工價水準，要重新建起一棟磚瓦新房需要大概二十萬元。

這十二萬的價格差正是他憂心忡忡的原因。「我們兩口子打工的積蓄都墊在裡面，都還不夠。還得找親戚借錢。」此外，「加上為了拆遷，我這一年不能出去打工，又損失了不少。」在回家之前，歐安鐵夫婦在杭州打工已經有四、五年。他在一家電線廠，一個月工資一千八百元；他老婆在一家毛巾廠，工資一千五百元。扣除吃飯住宿等開銷，一個月的工資所剩不多。

但除了偶爾向我抱怨幾句外，歐安鐵並沒有向高速公路方提出任何額外的要求。他是那種老實本分的農民，只知道默默勞作，在我拍攝他的大部分時間裡幾乎一聲不吭。在獲知老屋被徵收後，他也沒有抗議，而是很快就在對面鐵路邊的山坳上，找到一塊荒廢的空地，他獨自一人，花了三天時間，用木頭、竹篾和防雨布搭起一個簡易窩棚。第四天，他弄來一輛破板車，將老屋裡的各種家什，一車一車地拉到「新家」去。歐婆婆則背著一個裝滿了壇壇罐罐的竹製背簍，顫顫悠悠地走到一公里外的「新家」。

「既然他們要徵收我的房子了，我們就沒必要再住在這裡。」歐安鐵將一隻大陶罐和一台舊電視機放進板車，說，「屋後天天放砲，我媽媽年紀大了，不方便躲避。再住下來太危險。」他永遠也想不到，這種危險也正是談判賠償的資本。

天黑時分，大部分家當都已經搬進了臨時棚子裡。歐婆婆開始在新家裡做飯，炊煙飄蕩，山坳幽靜。窩棚裡，電燈昏暗，十四英吋的老式黑白電視機被重新擺在了桌子上，正播放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夜幕中響起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聲音，那音色的本質是低沉暗淡的，但久之，他的位置似乎賦予了這一聲音某種奇怪的權威：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雄辯地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是完全正確的，中央作出興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這一天，是二○一○年九月六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地──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的紀念日，當胡錦濤主席說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由之路」、「成功之路」的時候，一條在建的現代化高速公路正穿過這村莊、緊挨著歐婆婆老家縱橫而去。

然而，不是每位村民都像歐安鐵這樣，中夥鋪村村民老肖，在孟總看來，則是一位「刁民」。他是位五十多歲的農民，也是當地小學的「民辦教師」──這是中國特有的概念，即指可以上課教學，但不是國家編制的老師，但在鄉村，擁有這種「身份」及其附帶的好處，已經為當地農民所羨慕。他因為不滿意政府所核定的拆遷面積，便用一堆廢棄的磚頭堵在自家宅地上，導致施工被延誤了很久。這一天，孟總帶著推土機過去強拆。像往常一樣，我跟著孟總過去拍攝。

「推吧，就推這裡，不管了！」孟總大手一揮，朝推土機司機說。推土機開動，將老肖家宅前的磚塊一股腦兒推倒。突然一個人影從身後竄出來：老肖現身了。

「你們這是幹什麼？」他對著孟總氣憤地喊，臉脹得通紅。

「鄉政府命令我來拆的，你堵了我們這麼久，我們不能再等了！」孟總毫不示弱地說。我習慣性地調轉鏡頭，拍攝他和孟總的對話。他一扭頭，看見我在拍攝，眼睛裡立即冒出火焰。

「你拍我幹什麼？」他飛快地衝來，一拳打向攝像機。事發突然，我來不及躲避，那一拳正打在攝像機的話筒上。

「好了，我不拍了，你別打我攝像機。」看見話筒被打歪，話筒底座搖搖欲墜，我頓時心痛不已──我寧可那一拳打在我身上。我趕緊雙臂抱緊攝像機，向後退去。

「就要打你！」老肖不依不饒，他又打來一拳。無疑，他將我當成了高速公路方的人。

「我沒拍了，你別這樣，老鄉。」我對他露出「以德報怨」的微笑，邊說邊躲閃，趕緊往田埂上退去。實話說，我可不想跟這裡的村民發生一絲一毫的衝突。我還要在這裡拍攝好幾年，可不想給自己找麻煩。此外，我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突然，一位五十多歲的農婦不知道什麼時候冒出來，在前面截住了我，她發出誇張的哭聲，撿起一塊石頭丟向我和孟總。她是老肖的妻子。石頭從耳邊呼呼經過，剎那

間，我感覺到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很不真實。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拎著攝像機拔腿就跑，在長滿野草的田埂上一路飛奔，好像奔跑在一個沒頭沒尾的夢中一樣。來不及關掉的機器將這個「夢」記錄了下來：凌亂的鏡頭裡，晃動的野草劃過身前，狼奔豕突的腳步聲，激烈的喘息聲，還有背後傳來的哭喊聲……

老肖緊追不捨，他堅強的意志讓我歎服。他妻子的聰慧也讓我刮目相看，她正從田埂的另一邊向我包抄。我走投無路，扭身躲進旁邊的一棟民工宿舍裡。關鍵時刻，一個駕駛挖機的年輕小伙子，將我塞進床上，並緊鎖房門。我憋住喘息，狼狽地蜷縮在床上，很快聽到房間門被人狠狠地踢了幾腳，老肖妻子的哭罵聲隨之響起，她趴在玻璃上朝房間裡面打望──毛玻璃上透出了她模糊而憤怒的臉。這似乎像是電影中的某個鏡頭，但我實在想不起來它出自哪一部電影。緊張的奔跑讓我的腦袋有點缺氧。

「他不在這裡，從那邊那扇門跑了……真的，就是那邊……你快去……」門外，幾個民工聲東擊西，轉移了老肖夫婦的關注。我和我的攝像機得救了。

當我回到項目部後，才得知老肖夫婦轉而回去，又圍困住孟總，破口大罵，老肖的妻子再次拿起一塊大石頭，向孟總腳上砸去，幸虧他躲得快，沒有砸到。最後，鄉村幹部聞訊及時趕來，幹部們威脅老肖，如果他膽敢再對抗施工、糾纏孟總的話，就解除他的教職。老肖聽到這個，立刻軟了下來。

「你以前見識過這樣的場面嗎？」孟總朝著我說。

「沒有，今天總算見識過了。」我想起話筒，一陣心疼。

「這樣的場面，我可見得多啦。」孟總哈哈大笑起來，彷彿這種經歷如此值得驕傲。但他說的大抵沒錯，他確實見慣了這種場面，他也很快就遇到了另一個「刁民」。

「刁民」歐家發是中夥鋪村的村民，他承租的一口魚塘正好位於高速公路的邊坡範圍之內，因此，這口魚塘有一半將要被填充掉。魚塘的產權方──中夥鋪村委會已經和高速公路方達成了徵收協定，然而，作為承租人，他死活也不肯配合拆遷。他承租這口水塘多年，此時被徵收，不但意味著他今年的損失，而且也影響到他今後的打算。更棘手的是，這

口魚塘的所有權雖然是整個中夥鋪村擁有，但它卻位於第五小組轄地之內。因此，當村委會提出，賠償款額將由七個小組平分時，第五小組的村民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歐家發不僅是魚塘的承租人，也是第五小組的組長。既然魚塘是在自己的地盤上，為什麼不可以獨享賠償金呢？退一步，他們至少也要占大頭。然而怎樣的比例才算合理，村民們眾說紛紜，法律也沒有定論，村委會舉棋不定，所以，這口魚塘成了施工方一塊難啃的骨頭。

挖土機已經開到並停在魚塘旁。歐家發則天天守在塘邊，揚言「誰要動他的魚塘，他就找誰的麻煩」。孟總和當地的村鄉幹部好說歹說，他就是不肯做出任何讓步，堅稱「如果政府欺人太甚，他就去上訪」。

孟總知道自己這次碰到了真正的「釘子戶」──相比之下，老肖的一時衝動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媽的，這個歐疤子真是討厭。」歐家發臉上有一道明顯的疤痕，孟總和鄉幹部都叫他「歐疤子」。被迫停工長達幾個月後，孟總的耐心幾乎要被消耗殆盡。

「他再敢阻工，我們就抓了他，他以為他是誰啊。我們已經跟派出所說好了，只要他再阻工，就一定抓了他。」在鄉政府的辦公室裡，孟總對幾位鄉幹部說。

鄉人民代表大會王主席、李副鄉長和鄉指揮部的老陳，都表示支持孟總。在徵地和拆遷中，他們是孟總的「親密戰友」，並肩戰鬥，合力面對防不勝防的「刁民」。面對我的鏡頭，王主席說：「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支持高速公路建設，高速公路建設無小事，這是我們工作的指導思想。」王主席戴著眼鏡，文質彬彬，像個知識分子，說話輕聲細語，卻充斥著中國的政治語言，他的這番話明顯是在「表態」──表明一個地方官員對發展的迫切支持。而孟總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他也扭過身來，對準攝像機說：「有了王主席的大力支持，我們十四標是施工環境最好，施工最為順利的。」雙方一唱一和，有如琴瑟和鳴，海枯石爛。

「還有啊，上次縣指揮部孫指揮長說了，如果有刁民要告你們高速公路方，縣裡已經跟法院打了招呼，一律不受理。」王主席說。

「那當然，修高速公路又不是個人的事情，是黨和政府做出的決策，這怎麼能告狀呢？」孟總說。

歐家發依然不依不饒地守在魚塘邊，不准挖土機施工。一天，他甚至威脅著要打一位挖機司機，因為後者在施工中不小心將石頭落在水塘裡。接到民工隊的「報警」，在鄉幹部的陪同下，孟總火速趕過去「滅火」。

「這該死的傢伙，就是想著敲詐勒索，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在路上，孟總罵了出來。

「你一會將他阻工的樣子拍下來，到時派出所要拘留他，就可以拿來作為證據。」鄉指揮部幹部老陳對我說。他也將我當成了項目部的人。自從來到工地，我的攝像機就經常被人們當做取證的工具。官方的人動不動就指揮我拍攝這個、拍攝那個。而普通民眾，也往往把攝像機當做公權力的象徵，從而對我發起攻擊。

「你不要拍我，否則你的攝像機被摔了不要怪我。」魚塘邊，當我跟著孟總走近歐家發時，他指著我的攝像機，嚴厲地說。

我馬上將攝像機放下來。經過和老肖的那次衝突，我更加小心翼翼，絕不會去激怒一個正處於情緒中的人。歐家發四十多歲，身材健壯。在和孟總們爭論的時候，他眼神尖銳，用詞激烈，左臉上的疤痕脹得通紅，顯得更加兇悍。「這口魚塘是我承包的，我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我認為你們的賠償方案不妥當，不能接受。但你們動不動就採取強制的辦法，強制我放乾塘水、搬遷魚塘，這怎麼可能？」他義憤填膺地說，「你們口口聲聲說這是國家的建設，我們必須要支持，可是我們老百姓的權益誰來保護？」他條理清楚，邏輯力很強。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孟總說他「是一盞不省油的燈」。

談判再次不歡而散。等孟總們走後，我留了下來，想和他聊聊。我拿出一根菸給他。可能是因為我放下了攝像機，也可能是那根表達尊重的菸，他的態度逐漸有了改變。

「這口魚塘本來是屬於我們第五組的，但現任的村支書不顧事實，強行要瓜分賠償款，這是不公平的。我不怕跟他們打官司。」他站在魚塘上，向我傾訴了他的苦衷。

「上次鄉裡來調解我們這起糾紛，竟然要從賠償款中提取四千五百塊錢的差旅生活費！我完全想不通，他們有什麼理由這麼做？這本來是他們分內的事情。我正想著寫個報告，去縣裡上訪，再不行就將事情發佈在網路上，引起上級部門的重視。」

他對村委會也感到不滿，「農民應該有權利瞭解整個村莊的徵地賠

償情況，但具體賠償費是多少？這些錢究竟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老百姓要求公開，公正，但現實中連公開都做不到，更不存在公正。」

我發現一個規律，大凡官方眼裡的「刁民」，儘管有時候可能很偏執，也難免有點私心，但一般來說，都比較有見識，懂法律，維護自己權益的意識強，也懂得利用輿論和官方博弈。這種人一旦較真起來，可不是那麼容易對付。

「現在就是官官相護，只知道壓迫老百姓。」歐家發說。

沒過幾天，孟總通知我再去魚塘。當地政府已經給「歐疤子」下了最後通牒，今天，縣鄉兩級的領導幹部會到現場「聯合執法」，同時派出所會派出警力保護幹部們「執法」。

「如果歐疤子要製造什麼衝突，你就用攝像機將它拍下來，作為證據。」孟總吩咐我。

一台挖機停在魚塘邊，附近已經烏壓壓地站滿了人，有民工，也有村民。幾輛車停在路邊，包括一台警車。幾個身穿制服的警察站在人群裡。除了王主席、李副鄉長和老陳之外，鄉黨委書記、鄉長和縣指揮部的唐副指揮長也來了現場……看來今天這場「聯合執法」行動的規格不低。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見到魚塘承租人歐家發的身影。

孟總熱情地和幹部們打著招呼，一一發給他們菸。唐副指揮長接過菸，對孟總說：「有政府支持，就沒問題，你不要怕。」

「怕我倒不怕，就是工作不好開展。」孟總尷尬地笑了笑，說，「其實我們下面的民工隊早就想著跟他打一架了，都被阻工快半年了。」

「怕他什麼呢？你說，畢竟是共產黨執政。」一位穿著白色POLO衫的年輕幹部笑著說，「你就趕緊開工吧。」

挖土機的鐵爪子一下就將魚塘的田埂挖倒一塊，水直往低處的水渠裡湧去，引起水中的魚一陣騷動，泛起了雪白的鱗片。岸上的人們發出陣陣驚呼。曾經追打過我的老肖也在其中——今天，他只是一個圍觀者，看起來心情不錯，臉上帶著優雅的微笑。警察蹲在他的旁邊專心地拍照。

不知什麼時候，歐家發出現在了人群中，正和兩個警察說著什麼。我一直沒看到他的身影，還以為他已經被強制限定自由了——在各地發生

的強拆事件中，政府經常這麼做，以便為強拆減少阻力。我趕緊朝歐家發走過去，我不想漏掉一個「釘子戶」和警察在強拆現場的對話。

「這裡頭的魚大吧？」一個警察說。

「有幾條草魚大一點。」歐家發回答。

「草魚？最大的有好大？」

「最大的有四、五斤吧。」

「四、五斤，那也不錯了。」 另一個警察接口。

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們的對話充滿了日常性，聽起來就像鄰里間拉家常。歐家發的心情看起來很平靜，還時不時對著我的攝像機笑笑。好像之前他的強硬態度並不存在似的。沒過一會，他麻利地脫了鞋，挽著褲腳，走進剛被挖機挖出來的出水豁口裡。

「你們注意點，別碰倒了我的簍子，將我的魚弄跑了。」歐家發說。

他在出水處放了一個大竹簍子，裡邊攔住了幾條一尺來長的草魚和鯉魚。警察和幹部們站在高處，低頭圍觀著他。他站在齊膝深的水流裡，褲子濕了一大截，臉上也濺了不少泥漿，就像一個在野外演習、故意用油彩塗滿臉部的特種兵。但顯然，今天的他失去了戰鬥力，向那股他曾稱之為「官官相護」的勢力投了降。我實在想像不出，從對抗到妥協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今天總算識時務了。」孟總對我眨了下眼睛，得意地說。當這個難纏的釘子戶被攻克後，他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今天的「兵不血刃」來得有點意外，警察和幹部們徹底地放鬆了，他們興致很高，站在田埂上圍觀起捕魚來。

「這裡有一條大的！」一個警察指著一條在泥漿中翻滾的魚。歐家發踩著泥濘走過去，抓到了這條有四、五斤重的大草魚。

「丟上來，丟上來！」警察興奮地喊。這位熱衷於捕魚的警察，就是項目部牆上「警民聯繫牌」裡的艾警官。此刻，警民聯繫的紐帶是這條活蹦亂跳的大魚。我突然想起《湖南日報》上描述「和諧拆遷」的句子：

> 路地攜手，和諧拆遷，換來的是濃濃的「魚水情」。

果真，此時此刻，再沒有比「魚水情」這個詞更合適「紀實」了。

歐家發將魚朝岸上拋去。魚躍入艾警官腳下的一片草叢，不斷地翻滾著。艾警官一把按住，麻利地掐住魚鰓，拎起來快步朝警車走去，將魚丟進了警車尾箱裡。在走向警車的途中，那尾可憐的魚不斷地掙扎著，魚尾左右擺動，好像壓根兒不是一尾魚，而是一個抗拒被帶上警車的罪犯。這個小插曲散發出荒誕的氣息，但誰又能說它不是最完美的結尾呢：一尾魚代替了「刁民」主人坐上警車。在一頓鮮美的魚湯之後，這次兵不血刃的行動將成為茶餘飯後的美好談資。

「我本來希望歐疤子今天鬧一下，這樣就可以將他抓走。別看他平時牛逼哄哄，一旦來真格的，他就怕了。對付這些刁民，就應該用警力，好說歹說當不得一棒子。」孟總感慨地說，「有時候，你對他太人性化了，他就對你不人性化。」

水源保衛戰

二○一○年八月，我跟著喇坪村的「村支書」朱支書穿過村子中央，走上狹窄彎曲的田埂，穿過一片片稻田，一路向後山走去。「稻子都黃了，很快就要收割了。可是澆灌的水源卻快沒了。」朱支書一邊用手劃過田埂上的稻穗，一邊說。

和中夥鋪村的交通便捷、喧囂熱鬧迥然有別，喇坪村遠離交通要道，坐落在群山懷抱之間，位於一大片稻田中央，整個村落格外寧靜而雅致，頗有幾分雞犬相聞的古風。然而，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正從後山橫跨而來，從村頭逶迤而去。我走在田埂上，能隱隱地聽到工地上傳來嘈雜的機械作業聲。一路上，茂密的稻葉和沉甸甸的稻穗不斷地傾斜下來，劃過我的腳踝，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

很快我們就來到一口山洞裡。岩石之間有一潭狹窄的水面，渾濁而死寂，像一口即將乾涸的死水塘。「看，就是那裡，水都快沒有了。原來水面很寬，一直都到那邊那塊岩石去了。」朱支書指著一塊岩石，上面有著清晰可見的水位線。自古以來，這裡就是喇坪村的水源，水非常清澈，流水潺潺，一年四季都不會乾掉。水裡還有鰱子魚。一九九八年，喇坪村每戶出資七百元，共花了約四萬元建了自來水管道，將這潭泉水引到家裡，直接打開水龍頭就能喝。「泉水很甜，比你們城裡人喝

的礦泉水好喝多了。」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水喝了，還有幾十畝稻田，都是靠著它灌溉的。這可真讓人惱火。」

這件惱火的事情發生在幾天前。那天，村民們擰開自來水管，發現流水突然變得渾濁不堪。跑到山洞裡一看，發現井裡冒出了渾濁的泥漿。開始大家以為是天氣原因引起的自然現象，但糟糕的是，幾天後，水非但沒有變清澈，而且水量越來越少。納悶的村民們很快就想到了高速公路施工。問題確實出現在高速公路的施工。前幾天，楊柳灣大橋的挖樁隊在挖掘一口三十七米的樁井時，突然樁底湧出來大量的水，他們連續用抽水機抽了幾天才抽乾。勘測發現，正是挖樁破壞了喇坪村的水系。

「孟總也到這個山洞裡看過，他還跟我開玩笑，說這個山洞可以做旅遊開發。」朱支書說，「可是我現在沒有心情和他開玩笑，村民們意見很大，前兩天就說要去阻工，但被我勸阻了，但如果項目部不解決，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不可控制的事情來。」

不可控制的事情陸續發生了。作為城裡人，孟總顯然還沒有意識到水源對於村落的重要性。不說飲用水，光是斷了灌溉的水源，在稻作區域的農村，就事關村落的生死存亡。孟總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將情況向上匯報。經過反復研究，上級部門決定，由項目部重新給喇坪村找到一處同等規模的替代水源。技術人員進行一番探測後發現，最近的水源通到喇坪村尚有一段不近的距離，且地質結構比較複雜，估計造價不菲。

這邊還在緩慢地研究決策，那邊沒水喝的村民已經等不及了。一天，楊柳灣大橋的施工現場迅速圍來二十多個村民，他們大多年紀較大，滿面怒色，不斷地用方言抱怨著。村民們強行拉下工地上的電閘，民工隊被迫停工，無奈地退回到樁井後的窩棚裡。正是這支來自陝西的民工隊無意中破壞了喇坪村的水系。孟總趕緊過去處理，並給朱支書打電話求援，朱支書聞訊趕來，勸退了他的村民。然而，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後面的幾個月內，項目部只能用抽水機給村民們抽去臨時生活用水，官僚系統一貫低效而傲慢，引水渠的修建，卡在技術、資金及審批等問題上，一直沒有進展。這時，喇坪村又發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去後山尋找新水源的過程中，一位村民不幸墜入山洞，摔斷了左腿，住進了醫院。

這件事情變成了導火線。二○一一年四月份的一天，村民們再次動

怒了！他們又聚集到大橋工地，將正在澆築混凝土的罐車團團圍住。孟總緊急趕過去調解，結果被憤怒的村民們圍而攻之。一片混亂之中，在村民們的拳腳相加下，他身體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這真是不可忍受！吃了虧的孟總一邊報警，一邊通知了鄉政府和項目部。很快，項目部的全體職工趕到現場，雙方劍拔弩張，大規模的衝突一觸即發。

就在衝突的臨界點上，鄉政府領導和派出所警察及時趕到了！經過一番艱難的調停和談判，村民們終於從工地上退去。

毫無疑問，這是孟總來項目部之後最黑暗的一天。一個「堂堂的項目部副總經理」，竟然被「灰頭土臉的村民」打倒在地，他的情緒低落到了極點。回到項目部後，他一直臉色鐵青，甚至向佘總經理提出辭職。當然，他的辭呈被拒絕了。他思來想去，還是咽不下被打的這口氣，於是向當地派出所打電話，態度堅決，要求處理打人的村民。「你們不處理的話，我以後沒法再開展工作了。今天他們可以打我，明天別人也可以打我。那這條路不要再修了！」

過幾天後，當派出所去喇坪村抓打人的肇事者時，發現他們已經得知風聲，隱匿起來。「媽的，這些刁民。」孟總聞之，很不甘心地說，「有本事就逃出去別回來了。假若我不是為了修路，他們怎麼敢動我一根毫毛？我非搞死他們不可。」孟總的眼神裡流露出兇狠。

「我真不想再幹了，我只是一個打工的，沒必要為了公司自己吃這麼大的虧，費力不討好。」孟總耷拉著腦袋，「其實我當初就不太想來這個工地，我女兒也一直反對我出來打工。現在發生這個事情，我還不敢跟我女兒說。」

只有在說到他的寶貝女兒，或和他的寶貝女兒網路聊天時，孟總臉上的焦慮和沮喪好像才減輕不少。在圍攻被打事件幾天後，孟總又和女兒進行了一次網路連線。他隱瞞了剛剛發生的這起極其不愉快的事件，不想要女兒為此擔心。

女兒是孟總最大的驕傲，這是整個項目部人盡皆知的事情。但初來乍到的我除外。剛到項目部時，我就發現孟總的娛樂品味與眾不同。辦公室的數台電腦，不是被用來玩遊戲就是被用來看電視劇。年輕人玩《傳奇》、《醉西遊》等網路遊戲，年紀大一點的玩「撲克牌」，女職工玩「開心農場」。最受歡迎的電視劇是《滇西1944》、《遍地狼烟》

等抗日劇。這是年輕的男性施工員們的最愛，他們經常好幾個人圍著一台電腦看，每當看到日本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就爆發出陣陣歡呼。

而孟總是個例外。他經常在電腦上觀看一個韓國女子組合的演出視頻：四個造型新潮的年輕女孩子邊唱邊跳，唱著聽不懂的韓語。孟總趴在電腦前看得津津有味，眼睛裡散發出少有的柔情──這幾乎和「搓麻」一樣成了孟總每天的「必修課」，哪怕是馬上出門處理棘手的糾紛，他也會見縫插針地看上一段。

「哈韓風」竟然吹拂到這個平時工作和生活都有點乏味的中年人身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他又趴在電腦前觀看韓國女子組合的演出視頻，我終於忍不住了：「孟總，你聽得懂韓語嗎？」

「聽不懂。」他回頭朝我笑了笑，「要是能聽懂就好了。」

「那聽不懂你怎麼還經常看？」我問。

「這個──」孟總指著螢幕上一個正在蹦蹦跳跳的女孩，她染著別緻的粉紅色長髮，「是我女兒。」

「這你都不知道啊，孟總有個明星女兒呢。」辦公室的小周有點不屑我的孤陋寡聞。

「要是真是明星就好了，我就是星爸了，就不用來這裡上班了。」孟總開心地笑著說。

我大吃一驚。原來孟總的女兒是韓國著名人氣組合MISS A的四成員之一，這個組合由韓國著名娛樂公司JYP精心打造，如今在整個東南亞包括中國擁有大量粉絲。原來孟總的女兒高中畢業後就去了北京研修音樂，二○○七年被韓國星探選中，經過培訓和包裝，成為MISS A的成員。

「當初要簽合同的時候，我和我老婆還擔心是騙子，心裡沒底。」孟總說，「你電影學院畢業的，應該很清楚，娛樂界的騙子太多了。」

「後來我瞭解了一下，那是韓國一家比較有名的正規公司。據說是韓國人氣天王瑞恩的公司。」孟總說，「我也不知道瑞恩是誰，但有人說他在韓國很有名。」我愣住了一下，但很快就意識到孟總口中的瑞恩就是韓國娛樂明星Rain。「後來我女兒就從北京去了韓國，算起來，她已經有快三年沒有回家了。」

「那你能放心她嗎？一個人在韓國，人還這麼小。」小周搭話。

「那沒辦法，她自己喜歡。」孟總說，「我們做家長的也不能保護她一世，就尊重她的選擇囉。」孟總說完，又扭過頭去，靜靜地看著視頻上又唱又跳的女兒。

此刻，孟總正和女兒在網路上聊天。因為女兒的演出和訓練都很繁忙，他只有見縫插針才能聊上幾句。他似乎忘記了這幾天的不快，也全然不見打電話給派出所時的凶煞模樣，現在，他是一名慈愛而充滿柔情的父親了。

孟總：最近演出多嗎？

女兒：多，最近要去台灣。

孟總：什麼時候能來中國演出？

女兒：還不知道。

孟總：要是來北京、上海演出的話就提早告訴我，到時我就可以和你媽媽去看妳，都這麼久沒看到妳了。還有妳爺爺奶奶，他們也很想妳了。

女兒在網路那頭一陣沉默。

孟總：在外面一切都要多注意，既要好好學習韓語和歌舞，也要注意身體。

女兒：知道了，爸爸你和媽媽也要多注意身體，工作不要太勞累了。

女兒：我在這裡一切都很好，不要擔心我。

女兒：我要去訓練了，爸爸我先下線了，改天有時間再跟你聊。

孟總：好的，你去吧。

一次寶貴而短暫的跨國語音聊天就這樣結束了。跟其他父女之間的聊天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目睹了全過程的我卻有些感慨。「我女兒反對我再上工地打工。我答應她做完這條路就真的退休養老了。」孟總說，「如果她知道我被人打了，還不知道會有多難過。」

孟總還要在複雜的環境中艱難地熬到這條道路修成。改水方案一直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阻工時不時爆發一次。二○一一年六月的一天，我再次和孟總緊急趕赴楊柳灣大橋工地。

幾十位村民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只要有工地的車輛經過，他們就會

攔截下來—既不讓車通過，也不讓車撤離。司機只得關緊了車窗躲在車內。施工完全處於癱瘓狀態。村民們仍然年齡偏大，其中還有一些白髮老人，他們衣著樸素，大多頭上戴著頂竹編斗笠，腰上挎著把柴刀，遠遠地看去，像一群正在劫富濟貧的俠客。這樣的場面，沒法不讓我聯想起歷史上中夥鋪境內曾發生過的一起「農民起義」。

清咸豐年間，一個人稱「雷水牯」的貧窮鐵匠—他就住在中伙鋪的古驛道橋下，和唐老師老家相隔極近—因為不滿山塘驛站一驛卒至中伙鋪勒索財物，憤而打死驛卒，率眾舉旗起事。後自稱「義王」，提出「打富濟貧」的口號，周邊貧苦民眾響應者多達數千人，勢力波及大半個縣域。一度牽引湖廣兩省兵力圍剿，持續一年有餘才被鎮壓。這是辰溪縣史上有記載以來最大的一起「農民起義」。

如今，我們所在的時代，是一個官方在歷史觀上美化讚許農民起義，但卻不希望歷史重演的「維穩時代」。縣指揮部和鄉政府的領導們心中清楚，不敢疏忽，已經在第一時間內趕到現場，向這些「聚眾起事」的「俠客」們耐心調解。

我拿出DV，準備拍下這有可能在將來成為「歷史事件」的一幕，一個中年村民馬上注意到了我，他徑直朝我走來，指著我的DV說，「信不信，你再拍我就摔了它？」我信。他的語氣和535醫院的那位軍人醫生差不多。我趕緊將DV裝進包裡，對這位「俠客」笑了笑。在這種場合，我一般不會激怒他們。

但我不甘放棄。我迅速地觀察了一下地形，發現不遠處有一個彩條布搭起的工棚，那正是老何和他的工友們的宿舍，會是個隱蔽的拍攝地。我假裝離開現場，慢慢地繞了一個大彎，確定沒有村民在注意我後，閃身進了一間工棚。工棚裡空無一人，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外，幾乎一貧如洗，這正是民工們即便外出也不關門的原因。我找到一道不小的縫隙，將頭湊到縫隙上一看，阻工的現場正好一覽無餘—李副鄉長和縣指揮部的領導正在和「俠客」們談著什麼。孟總則和村民們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兀自一個人抽著菸。他對這些情緒激動的「刁民」心有餘悸。

我趕緊拿出DV拍攝。根本沒人能注意到我，唯一的遺憾是距離現場稍遠，我沒法將他們的對話清楚地錄製下來。但我已經心滿意足，我知道在這種複雜的拍攝局面下不能太貪心。我畢竟是在拍一部記錄真相的紀錄片，而不是一部精雕細琢的故事片。哪怕你記錄得再粗糙，也好過

什麼也不拍。這也是我敬佩那位拿出手機拍攝「十月九日事件」現場的民工的原因—儘管他用的是效果很差的山寨手機，儘管他只錄下了一分二十多秒。

三個月後，又發生了更大規模的阻工。九月時，喇坪村出動了人數更多的村民，圍堵了村莊附近所有的施工場所。為了捍衛飲水權利，他們明顯要戰鬥到底，村民們分批輪流值班，白天黑夜都有人把守。在喇坪村轄地內的所有施工全面癱瘓。此外，已經有一百多位村民在聯名上書，他們還打算去市裡集體上訪。在這個「維穩時代」，上頭三令五申地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沒有誰敢掉以輕心。除了「協調副老總」的身份之外，孟總在項目部的另一個職務是「信訪維穩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對維穩工作的要求和意義心知肚明。束手無策的孟總只得再次給上級緊急彙報，並對上面遲緩的效率也頗有微詞。

「這件事情實在拖得太久了，都一年多了，再不解決的話，還指不定後面有什麼更大的麻煩發生。」孟總在匯報中說到，「改水事件」就像一個炸藥桶壓在頭上，隨時有爆炸的可能。經過這幾次嚴重的阻工事件之後，市、縣兩級的高速公路指揮部終於制定出改水方案並立即實施，據說投入的資金高達近二百萬元。「水源保衛戰」終於落幕。

「小張，你知道嗎？這些阻工事件，其實都是那個姓朱的在背後煽風點火，發動群眾。」孟總說，「他媽的，他其實不是什麼好東西，一直無非是想多弄點錢，就藉著這個事情來敲竹槓。」

孟總所說的「姓朱的」指的就是喇坪村的朱支書。在斷水事件發生之前，孟總和朱支書的關係很不錯。在早期徵地時期，我經常看見他們倆稱兄道弟，互相開著玩笑。還經常一起喝酒吃飯—當然是孟總買單。然而，孟總也逐漸意識到朱書記喜歡貪小便宜的性格和他背後的算盤。

有一次，朱支書陪著孟總去村裡徵地，他突然搭著孟總的肩膀說，「將你們的泥漿池修建工程交給我做吧，我村裡正好有不少石頭。」

「包工程的事情我可做不了主，你知道的，我也只是一個打工的。」孟總擺了擺手，自嘲地笑了笑。

「他媽的，我真是沒有從你們十四標得到一點好處，相反，全是給我找麻煩！」朱支書放下了搭著孟總肩膀上的手。他的話聽起來似乎不悅，但臉上還是笑呵呵的。

「你這個共產黨幹部，這麼想就不對啦。」孟總繼續開著玩笑，「一看你上次去縣裡開會就沒有認真聽，縣領導不是說，要各級幹部在配合高速路修建中『將自己位置擺正』嘛。」

朱支書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他什麼也沒有再說，氣氛似乎有點尷尬。

在高速公路建設中，幾乎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會從中漁利，既然派出所的所長、治安大隊的隊長都會這樣做，所以像村支書、村長這些村幹部也想插一竿子承攬工程，其實一點都不稀奇。龍老闆也曾和我聊過朱支書喜歡貪小便宜的個性，有次朱支書找他要一噸水泥和河沙，因為材料是項目部的，龍老闆不能做主，朱支書因此變了臉。後來，龍老闆只好自己給了他四百塊錢，讓他自己去買，「沒辦法，他是地頭蛇，我可不能得罪他。」龍老闆無奈地說。

從斷水事件開始，孟總和朱支書的關係迅速破裂。他懷疑就是因為自己拒絕了朱支書的要求所致。「現在我打他電話，他經常不接，沒有一點好處給他，他就不過來。」

朱支書的口碑在喇坪村裡也很糟糕。有一次，一位農民老朱因為不滿意徵地補償結果，孟總前去協調，我聽到了他向孟總數落朱支書──也是他的同族侄子的「斑斑劣跡」。

「你應該回去跟朱支書好好談談。」孟總對老朱說。老朱的土地徵收賠償方案，是經過朱支書決定的，高速公路方的賠償款也已經撥付給了村裡。

「我跟他談個卵，他一天到晚說瞎話、說屁話。我二十三個平方的油菜地、四十四棵樹，都是他代我簽的字。我本來不同意的，他就替我做主了。現在快一個月了，樹木賠償和青苗補助費影子都沒見一個。」老朱光著膀子，露出曬得漆黑的上身，手上拿著一把柴刀，坐在楊柳灣大橋下的土坡上。

「你放心，他會給你的。他不是你的侄子嗎？你應該多支持他的工作啊。他現在剛當上村支部書記，就趕上修高速公路，一天到晚好多事

情，可能耽誤了。」孟總笑著勸說老朱。

「當初選舉的時候，他見我就一臉笑容，嘴上喊著『老叔，給我拉幾票啊』，沒想到選上來後，一搞起事來就翻臉不認人了。」

「沒有吧，我跟你講，你們書記為了你們村裡人的利益，還是出了不少力的，尤其在徵收的事情上。這個事我清楚。」這個時候，孟總和朱支書的關係還處在「蜜月期」，尚未破裂。

「你清楚，還是我清楚？他是我的侄子我還不清楚他？」老朱將手上的柴刀在地上頓了一下，氣憤地說：「光林地那一塊，他就吃了我三畝地，一年少給我六百多塊錢。我跟你說實話，孟總，我現在兩個小孩要讀書，我自己前一年住了三次院，花了幾萬塊錢，現在身體都還沒恢復。可以這麼說，我現在是村裡最窮的，但他都還要踩你，往死裡踩你。」

「是嗎？他是這樣的人嗎？」孟總有點吃驚，但還是半信半疑，他拍了拍老朱的肩膀，依然給朱支書打著圓場，「哎喲，你也別將別人想得太壞啦。」

「不是我將他想得太壞，是有事實擺在那裡，都清清楚楚的。如果將好多事情擺出來，他就麻煩了，現在群眾對他的意見很大，他已經在我們喇坪村失去人心了。」老朱憤憤不平地說。

「比如說這一塊地和那一塊地，總共有一千三百多畝，」老朱指著身後的山地說，「他卻說只有兩百多畝，一共賠償一百一十萬，他一個人拿了六十萬，整個村民只得了五十萬，這一塊群眾意見最大。」

「那不可能吧，我不相信你說的，不是他的他敢拿到自己袋子裡，不怕你們告他？」孟總依然堅持自己對朱支書的信賴，「老朱，有些東西沒有證據不能亂說的啊，這些違法亂紀的事情，我相信他不敢做。」

「他不違法亂紀才怪呢，我們當然有證據。」老朱說，「我們肯定要告他。」

當孟總和朱支書的蜜月期結束後，他對朱的看法全然改觀。現在，他完全相信老朱的話了，朱支書既然連項目部的竹槓都敢敲，對村里的弱勢村民，自然就更不客氣！

朱支書不是我在鄉下碰見的第一個黨支部書記，在最近幾年的鄉間拍攝中，我經常和村支書打交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群體。在中國，設在村裡的黨支部是中共最基層的黨組織，它的黨支部書記，即民眾俗稱的「村支書」，就位於中國政治權力等級結構中的最底層。但千萬別

小看了這個連「九品」都算不上的小小芝麻村官。它是行政村內的「一把手」，直接負責村級公共事務的管理，是國家公共資源在農村分配的最基礎的決策者、參與者和組織者，可以直接支配國家公共服務、公共資源在農村的分配。隨著城鎮化在農村的迅猛蔓延，還有包括高速公路在內的基礎設施的修建，村支書手中可供支配的資源越來越多，這小小「螺螄殼」裡自然也有不少「道場」可做。近年來，很多地方在「競選」村幹部時競爭激烈，也許和此不無關係。

產生村支書的程序往往有兩種，一種是由村裡的黨員選舉產生，另一種由上級黨組織委任。但不管哪種方式，村支書都必須是本村土生土長的村民，這個職務不可能「空降」，只有「在地」而生。在中國，村一級別的黨和政府的幹部不被納入「公務員」體系，他們看起來只是黨和政府的「臨時工」，其身份卻還是繼承著祖輩的衣缽—「農民」，他們並沒完全放棄自己的田地和農業。

因此，村支書往往既具有官僚特點，又具有鄉黨氣質。他們既是黨的旨意在農村的執行者，又要受到民間傳統的倫理綱常以及人際關係的制約，必須在黨和鄉村的熟人社會（宗法關係）中都尋求到適度的認可。因為兩者之間有時候存在天生的抵牾，這樣的工作無異於走鋼絲，平衡起來並不容易。如果再加上他們一不小心就會膨脹起來的私慾，情況就會變得很複雜。

我接觸過中夥鋪周邊幾個村的村支書，他們看起來都是一副敦厚老實的樣子，無論容貌、衣著還是氣質，均與樸實本分的農民無異。但一旦處理具體的事情來，就會立刻露出精明老練、八面玲瓏的另一面。但很不幸地是，他們在村民中的口碑似乎都不太好。

「唯利是圖，不是個什麼好東西。」魚塘承租人歐家發，曾經對著我的攝像機，直截了當地指責村裡的鄭姓支書。鄭支書年近六十，是中夥鋪村所有二十五位中共黨員的黨魁，人長得較瘦，顯得幹練精明，之前我在各種場合見過他。中夥鋪村發生的每一起村民阻工糾紛，他總會及時地出現在事件現場「滅火」。而在縣領導親自主持的全縣拆遷動員大會上，鄭支書曾作為村級代表登台發言，就如何「服務工程建設」表了態。然而就是在徵地和拆遷問題上，歐家發質疑他，認為他在公共土地的徵收上「不透明，不公正，一定有貓膩」。唐老師也認同歐家發的看法。他主持留雲寺的拆遷和修建，經常和鄭支書打交道，但並不愉快。「他不想真正地幫助我們修新寺，」唐老師說，「他人很狡猾。」

要搬遷的不只是活人，還有地底下的亡靈們。溆懷高速全線要搬遷墳墓七千六百一十三座，僅辰溪縣境內需搬遷近千座。但相比之下，亡靈比活人要好處理得多。每遷走一座墳墓，項目部只需支付給村民一千兩百塊錢的遷墳費就可。但這筆錢只能在遷完墳後才能簽字領取，而遷墳事宜，也由施工方出人出力完成。

二○一○年夏天，我跟著孟總來到一片田野旁的墳地──很快這裡就要變成楊柳灣大橋的施工現場。幾個很不起眼的墳包，坐落在一片小松樹林裡，面前是田野和村莊，背後是連綿肅穆的青山。如果不是高速公路要經過這裡，這裡倒不失為一處較好的長眠之地，環境幽雅，風水較佳。

施工員和一輛大型的挖土機早已等在那裡。孟總今天的工作就是要遷走一座祖墳。一位四十出頭的農民等在墳包邊，裡面埋葬的是他的奶奶，過世已有二、三十年。我敢打賭，他平時並沒有盡到晚輩的義務，墳上雜草叢生，早已分不出墳頭和墳尾，也看不出在別的墳墓上的白色墳飄，顯然沒有人來此掃過墓。

在遷墳開始之前，我以為應該會有一個短短的儀式：燒紙，點香和燃一掛鞭炮──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最基本的禮數。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位後人並沒有做儀式的任何準備，他兩手空空而來，連裝遺骨的容器都沒有準備。

「你沒有準備一個罎子什麼的嗎，將骨頭放在裡面？」孟總問。

「還有骨頭嗎？都這麼久了。」他漫不經心。

「骨頭應該還是會有的吧，這東西一般幾百年都化不了。」孟總說。

「有的話你就先放在草堆裡吧，我到時來處理。」他說。

「那好吧，我們就開始了啊，你確定不放掛鞭炮嗎？」孟總再次問。

「不放了，沒買鞭炮。你們弄吧，弄好了再喊我一聲，我先去那邊看看水田。」他說完扭頭走了，很快就消失在禾苗青青的田野中。

「好了，你開始吧，挖出來的東西先堆在這一邊。」孟總衝著挖土機裡的司機做著手勢。

司機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留著時尚的髮型。他手腳麻利地發動了機器，長長的鋼鐵手臂伸起來，像一個威猛的變形金剛，對著這個小小的墳堆鏟了下去。墳堆連土帶草被撕裂開來，露出了褐色的黃土、黑色的棺木，還有白色的骨殖。

這只是一座普通的墳。但有時候，墳墓裡會意外地挖出文物，一不留神就豐富甚至改寫了中國歷史。但有時候，這些發現進入不了歷史，它倒是有可能進入施工者的腰包。我曾經聽我做工程的師兄、金土木公司的老總阿二說起過，他以前承包的一段高速公路工程，在施工中挖出了一座不明年代的古墓，裡面的女屍保存完好，像馬王堆漢墓裡的女屍一樣，神態安詳，彷彿只是睡著了。但她身上的首飾和陪葬品很快被施工隊哄搶一空，有人拿走了一個手鐲，有人拿走了一枚戒指，有人拿走了一條項鏈，還有人搶走了一顆寶石……這筆意外之財讓民工們高興了一個下午。而墓主人的屍體被拋在一邊，很快就腐爛風化，最後被草草地就地掩埋，成為那條嶄新的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路基。

我看著鏡頭，繼續拍攝，腦子裡突然湧出幾組彼此對立又互相關聯的詞彙：現代和傳統、逝者和後裔、當代和歷史、古老與簇新、喧嘩與寧靜……突然，鏡頭上出現了幾滴水珠。我仰頭一看，原來是下雨了。

陰沉的天空上淅淅瀝瀝地掉著雨滴，打在墳堆邊的小松樹上簌簌作響。我突然心裡冒出一股寒意，眼裡似乎也有點潮濕。那位長眠於此的先人，怎麼也想不到，短短的幾十年後，世界就已經翻天覆地，她從未見過的鋼鐵怪物兵臨寧靜的家園，三下五除二就將她已經入土為安的骨殖和魂靈粗暴地挖掘開了。

被粗暴對待的魂靈遠遠不止這一個。修建溆懷高速公路要遷移七千六百一十三座墳墓，這就是七千六百一十三個魂靈。我想像他們如果同時現形飛在空中，一定是遮天蔽日的一大片，像遷徙的候鳥群一般。然而，在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裡，候鳥們尚能找到一塊過冬之所，亡靈們要再找到一處永久安息之地似乎不太可能了。

唐代詩人杜牧在《春日古道傍作》裡寫下：

萬古榮華旦暮齊，樓台春盡草萋萋。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紅塵送馬蹄。

這首一千多年前的古詩所描繪的場景，如今在我的鏡頭下再現了：

一座不知埋葬何人的無名墓，再次為馬蹄經過的阡陌讓路——雖然時代更迭，現在的「阡陌」已更新換代為一條古人聞所未聞的高速公路，「馬蹄」之「馬」也已是時速一百多公里的「賓士」、「寶馬」，但舊事物永遠為新事物讓路的本質未變。時光如一匹過隙白駒，馬蹄聲聲，永不停息，重重地踩踏在包括杜牧在內的每一位懷舊者的心上。

我又想起元代詩人王冕寫過的《懷鄉》詩：

關西吾故里，八代不能歸。墳墓今何在？門閭故已非。清秋愁燕去，殘日望雲飛。豈是桃源客？虛無與世違。

現在，根本就用不著「八代」那麼久遠的時光，只需短短的幾十年，故鄉就面目全非，祖先的亡靈也魂飛魄散。縱使道路縱橫，高速馳騁，可你再也找不到通往它們的那一條舊時道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一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你註定要和幾百上千年前的詩人一樣，患上「懷鄉」這種無可救藥的病。

對不起，我也許不該如此傷感。我只是一個記錄者，我來了，我看見，我記錄，完了，我應該再扭頭走開——就跟那位若無其事的農人一樣，一聲不吭地消失在現實的阡陌縱橫之中。

要給高速公路讓路的，除了田野與果園、魚塘與水井、房舍與墳墓之外，還有一種不得不說的東西——古樹。在村民歐家發承租的那口魚塘之上，栽有一棵古樟樹，原來樹下有一戶人家，因為被徵收，房屋早已拆遷，只留下這棵樟樹依然屹立。樹幹高大，一個人都抱不過來，樹冠寬廣而茂密。最難得的，它還是一棵珍稀的連理樹——一個樹兜上並肩長著兩個樹幹，像一對忠貞不渝的情侶相依相伴。我在這一帶拍攝時，曾於樹下躲過烈日，也躲過突如其來的陣雨。它寬厚的樹冠像一把遮天蔽日的大傘，躲在下面，樹蔭完全將烈日阻擋在外，哪怕暑氣逼人，樹下也涼爽幽靜；即使下雨，一躲進樹下，雨滴也彷彿被過濾般，只稀稀落落地從枝葉間落下幾點，完全不礙事。

這是一棵被當地人視為「神樹」的「土地樹」。樹齡推算下來，至少有一百多年。如今，這棵土地樹守護的土地廟連同廟後的房舍都被拆了，房主人——也是樹主人暫時借住在廢棄的礦工宿舍裡。神樹正長在高

速公路的正中央，不，準確地表述，應該是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正要穿過這棵神樹而去。紅線範圍內的東西基本都被清場，只留下它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黃土中。不遠處，挖土機、壓路機在轟隆隆地作業，幾台橘色的重型卡車來來回回穿梭，歐家發的魚塘已經被填平了一多半，昔日波光粼粼的水面蕩然無存，只剩下半截塘底露出龜裂的地面。幾隻鵝在裡面四處尋食，呱呱亂叫。

幾天後，我終於等到了來「處理」這棵古樹的人。他們開來了兩輛車，一輛是黑色的大眾牌汽車，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大概五十歲，穿著黑色T恤和白色西褲，留著大背頭，有明顯的禿頂，一看就有地方常見的大老闆派頭。一輛是深綠色的皮卡車。下來六、七個民工，搬運著鐵鍬、鍘刀、電鋸等工具。有人圍著大樟樹往地面上灑下一圈白石灰。一台挖土機按照石灰白圈往地下挖掘，沒過多久，一個環形的大坑出現了。民工們跳進去，用鐵鍬繼續擴挖。

「小心點，別挖到根！」大背頭男子叮囑著大家。他突然發現我在一旁拍攝，警惕地詢問我是幹什麼的。確定我不是電視台的人之後，他鬆了一口氣。

「你別拍我，你拍他們。」他指了指在樹下幹活的民工們，在確定自己已站在我的拍攝範圍之外後，他站定，並遞給我一根菸。「抽根菸吧。」這是根本地的「和天下」牌香煙，一百五十塊錢一盒。

「謝了，我不抽菸。」我朝他笑了一下，「你們這棵樹要弄到哪去啊？」

「先弄到臨時苗圃裡去，以後還是栽在高速公路旁邊。」

「你是業主方的嗎？」我問。

「我們是給業主幹活的。」他很快就不再跟我說話。過了一會，他和一位矮個子的民工頭交頭接耳一番，然後上了那輛黑色大眾車，開走了。

經過大半天的勞作，老樟樹粗壯而豐富的根系慢慢地從泥土裡露出來。民工們已經累得滿頭大汗。他們簡短地休息了一會，又開始了第二道工序，給老樟樹做截肢手術。有人拿出了一把電鋸，爬進挖土機裡，挖土機將他托舉起來，慢慢地送到樹枝上。他麻利地發動了電鋸，一陣轟鳴中，幾隻鳥從濃密的樹葉間慌亂地飛走了。咔嚓咔嚓地，一根根碩大的樹枝折斷了，砰然跌落在地面上。空氣中彌漫著樟木的清香，和灰塵的氣息混雜在一起，讓人聞了產生無限的感傷。

歐家發出現在視線裡。他從乾涸的魚塘邊走過來，「你最好站遠一點。因為這是土地公公的樹，挖走它的人是要倒楣的。」他好心地提醒我。

沒過多久，一位四十多歲的農民急匆匆地走過來，當他看到已經面目全非的古樟樹時，臉上立刻佈滿了焦急的神情。「哎，誰要你們來挖樹的？」他的聲音有點小，那夥正在熱火朝天幹活的傢伙根本沒聽到。

「哎，問你們呢，誰叫你們來挖我家這棵樹的？怎麼沒人跟我說一聲？」他加大音量，大家這才注意到他，扭過頭來看著這個「不速之客」。

「你這棵樹是被高速公路徵收了吧？」矮個子民工頭說。

「哪有啊？當時只徵收了我家的房子。說這棵樹先不要動，到時再來跟我談價錢。可是你們來挖了快一天了都不告訴我。」中年農民說。「這是一棵神樹，土地樹，按我們這的風俗，你們動工前應該做個法事，之前我就跟你們公司講過，你們也不聽。」

「哎喲，不可能的嘛，共產黨還會給你一棵樹做法事？你真會開玩笑。」民工頭說。「我們只是底下做事的，也搞不清具體情況。這樣吧，我下午幫你向領導反應吧。」

第二天早上，樹主人又來了，但民工頭所說的「領導」連個影子也沒看到。樹主人有點惱了，民工頭只得掏出手機來打了一通電話。過了一會，那輛黑色大眾車又出現在工地上。大背頭男子走下車，若無其事地走到樹主人面前。

「誰是這棵樹的主人？是你嗎？」

樹主人點了點頭。他在長久的等待中已經積蓄了不少的情緒，他面對大背頭男子傲慢的詢問，甚至都不想開口。

「你這棵樹不是被徵收了嗎？還要怎樣？」大背頭男子的語氣裡充滿著挑釁。

「哪裡徵收了？你說誰徵收了？」樹主人反問，他在儘量控制自己的情緒。

「誰徵收了？高速公路徵收啊，你房子都拆了，那當然已經徵收你這一塊地盤了！」

「徵收了房子也沒徵收我的樹啊。」樹主人的火氣很快就被點燃

了。

「那你去找政府啊，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只是給共產黨做事。」大背頭男子不再搭理樹主人，繼續指揮民工們給樟樹做「截肢手術」。

「怎麼不關你們的事？誰在這裡挖我就找誰！」樹主人走向民工說，「不要挖了，給我停下來……」

「開玩笑，給我挖！」大背頭男子不等樹主人將話說完，惡狠狠地朝著民工們說。

「誰說挖我就找誰的麻煩！」樹主人徹底被激怒了。

「我就說挖！」大背頭男子朝著樹主人走了兩步，指著自己的胸膛，盛氣淩人地說，「你有本事將我扣起來吧。」他看起來像一位從主旋律戰爭片中走出來的戰士，隨時準備為了黨的事業英勇獻身。

「我扣你幹什麼？」樹主人一時有點懵了。

「你今天不是要阻工麼？」大背頭男子掏出手機，「他媽的你哪來這麼大膽子啊。」他走到一邊去打電話，隱隱能聽到他說，「你快來現場吧，他媽的都阻工了……」

「反正不跟我談好之前，誰動我的樹我就打誰！」樹主人氣鼓鼓地說。

「你想打人不是？我今天讓你打一下看看！」大背頭男子掛完電話，再次「英勇無畏」地朝樹主人走去：「你來打我看看！」大背頭男子比樹主人要高一大截，身體也要壯實不少。兩人開始推推搡搡，大背頭男子開始罵起了髒話：「你媽逼的，你敢打我，你試試看！」

大背頭手下的幾個民工趕緊圍了過去。「你再推我一下，我喊他們打死你！」大背頭男子指著旁邊的民工說。

「你來打啊。」樹主人並不懼怕他的威脅。

「我今天要是將你打死在這，我賠你幾十萬就是了。」大背頭男子丟出了狠話。

「賠我？你有錢啊？」

「我就有錢！」大背頭男子昂著頭回答，「你的樹是在紅線範圍內的，我們就要動！」

「是在紅線內沒錯，但我們又不是不讓你們砍樹。」一位女子突然插話。我的注意力一直在爭吵雙方身上，不知道她何時出現，又是從哪裡出現。她長得小巧文弱，穿著一件綠衣裳，手上拿著一頂大斗笠。

「只是必須要和我們主人談好啊。最起碼的道理，你動工前應該通

知我們一聲。你們不打招呼就移我們的樹，哪有這樣的道理？」聽口氣，她應該是樹主人的家人，也許是妻子。

「我為什麼要通知你？你算老幾？我只通知政府就可以了，我們只是給共產黨修路。」大背頭男子說不過綠衣女子，又開始蠻橫無理地狡辯。

「這樹是政府的嗎？這是我家的樹，是我家的私有財產，政府能隨便侵佔老百姓的私有財產嗎？政府有這樣的政策嗎？」綠衣女子反問。

「連你人都是屬於政府的，一棵樹還不是政府的！」大背頭男子越來越像個流氓了。

綠衣女子明顯被他的這句混帳話侮辱到了，她的情緒瞬間變得很高亢：「你放屁！你竟然講出這樣的話，真不是人話，真是氣人，那你老婆是屬於公家的，大家就可以隨便去睡你老婆嗎？」

綠衣女子說話的聲音不大，但口齒清楚，邏輯清晰，反問非常有力，令我暗暗稱奇。此時的她戴上了寬邊斗笠，站在土堆上，在鏡頭裡看起來像一位橫空出世的俠女。

大背頭男子詞窮理盡，就不再接她的腔，轉過頭又朝著樹主人耍起狠來：「你算老幾？今天還說要動我，要是真動了我，我立馬叫上幾車人來，將你全家都抄掉，你能奈何我？」一轉身，大背頭男子看見我在拍攝，就指著我的攝像機說，「你看著，你剛才要打我他都拍下來了，我們是有影像記錄的！」

「拍下來又怎麼了？還口口聲聲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你這樣做事的嗎？」綠衣女子對著大背頭男子和我氣憤地說。也許因為憤怒，她的臉脹得通紅。

我心裡暗呼糟糕。大背頭男子剛才的一席話「出賣」了我，我肯定被她視為大背頭的同黨了。作為一名客觀的記錄者，我最怕被人誤解立場，但在此情境下，我有口難辯。於是我趕緊閃身，走到一邊，去靜靜地看著這一切，但攝像機仍然沒有停止工作。

過了一會，中夥鋪村的鄭支書聞訊匆匆趕來。「你們不要再吵了，不就是要賠償嗎？你就開個價吧。」他開門見山地說。他剛接到了指揮部的電話，委派他來處理這起糾紛。

樹主人想了一會，「至少五千。」

「你別說這麼高，這個要符合事實。」鄭支書說。

「怎麼就不符合事實啦？這棵樹這麼大，光賣木材都能賣一千多塊

錢呢。剛才他不是說有錢嗎？這點錢對他算什麼。他們出不了這個價就別買，樹我可以自己移，賣給別的人。」

「你自己移那是不可能的，能讓你移嗎？根據有關部門的規定，這棵樹不由得你自己處理。」鄭支書撇了撇嘴，不屑地說。

「我自己的樹為什麼不能移？他們可以來挖我就不能移？」

「你等會，我先將你這個意見往上匯報一下。」鄭支書走到一邊，打起了電話，不知道電話那頭是個什麼「神祕人」。沒一會，他走過來，跟樹主人說：「他們說不可能五千塊，一千塊錢差不多，如果你硬要堅持，那他們就不要樹了。」

「一千塊不可能的，我這麼大一棵樹，直徑都快六尺了。不要就不要，我自己移走！」樹主人說。

「自己移走可以，但他們說，限你兩個小時之內移走，要不耽誤了高速公路的施工，你要負責任。」鄭支書說。

「不可能嘛，這麼大一棵樹，兩個小時內我怎麼能移走？」樹主人指著大背頭男子和民工說，「他們專業隊伍兩個小時也移不走啊，我至少得兩天的時間才能移走。」

大背頭男子站在一邊，幸災樂禍地聽著樹主人和村支書的爭辯。自從村支書這位真正的「共產黨」和「政府人」來了後，他就不發一言，變成個局外人，站在樹下看熱鬧。

「這不明明是壓迫我們老百姓嘛！」綠衣女子又變得激動起來：「還說我們耽誤高速公路施工，這條路能在兩個小時內修起來嗎？他們要是能在兩個小時內修好這條路，我就在兩個小時內移走這棵樹。」

「這是國家建設。沒有國家的建設，你們這裡將來能發展嗎？看起來這條路好像跟老百姓沒有什麼切身聯繫，但實際上小家和大家之間不可分割。」鄭支書端出了他的政治高度，高屋建瓴地說，「一般我還不跟老百姓講這個大道理呢……」

「我的意思啊，你們還是得到那筆錢算了，要是樹被推倒了，就一分錢也沒有了，你們要識時務。」他現在轉而語重心長地勸導。

「不是錢不錢的問題，是沒有這個道理。你是村裡的書記，你說話要站中間，要講到道理上，別動不動用共產黨來欺壓我們。」綠衣女子並不賣村支書的賬。

這位老共產黨員似乎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不再高屋建瓴，也不再語重心長，突然失去了耐心，站在土堆上，他提高了音調，朝著樹主

人吼著：「你別那麼固執，只按著你的性子辦事，這樣能行嗎？有些事情不是以你的意志為轉移的，如果都依著老百姓的意志，那政府還要著幹什麼呢？反正是這樣的，今天這事情必須處理，如果你們再不聽我的意見，我就不管了！你們一分錢也得不到！」

樹主人可能被村支書的氣勢所壓倒了，他口裡雖然還在嘟囔著什麼，但明顯聲音低了很多。

鄭支書不再理他，突然走到我的面前，壓低聲音跟我說：「剛才縣指揮部的劉書記跟我講，意思是適當給他們一點補償，具體情況全權委託我來處理。我覺得就是給一千多塊錢，充其量兩千塊錢。他們要五千，這個口子不能開，開大了不行。」他繼續說，「所以我們就故意說要兩個小時內移開，就是逼著他們馬上解決這個問題。」他得意地笑了笑。當然，他沒意識到攝像機錄下了這段精彩告白。

支書的策略果然見了效，電話那頭的神祕人──現在我知道他是「劉書記」，就是那位在留雲寺落成慶典上叩拜菩薩的指揮部官員──帶來的壓力，讓樹主人不得不妥協，他們最後接受了兩千元的賠償條件。而我，也再次領略到了「村支書」這個群體所具有的智慧和風度。處理完後，鄭支書和大背頭男子得意得離開了。

綠衣女子無聲地站在古樟樹下，我忍不住走過去，說：「兩千塊真是不高。」我真心覺得，這個價錢大大地低於我的估算，我甚至有多出點錢將這棵樹買下來的衝動。唐老師跟我說過，新留雲寺缺一棵古樹，要是能將這棵古樟樹移植在新廟宇旁邊，那真是再般配再美妙不過了。

她似乎恍過神來。「就是啊，這麼大一棵樹，一、兩百年的光景才長成，如果不是要修高速公路，這棵樹也不會被砍掉，我們的房子也不會被拆掉。」綠衣女子跟我說，「我們心理上對政府是很不滿的。他們稍微補償了一點錢給我們，就讓我們搬走，新的地基都是我們自己花錢買的，現在建一棟房子要虧空十多萬，還要去銀行貸款。」

「現在我們想去貸款，可能還貸不下來……貸下來利息也很高……本來住在這好好的，如果不是國家修路，誰願意去重新建房子……」綠衣女子聲音哽咽，眼圈一下就紅了，淚光閃爍在她的雙眼裡。她趕緊扭過頭去，用手指抹了抹眼淚。

這樣的場景直讓我一陣心酸。從剛才的大義凜然到現在的無聲哭

泣，這位尋常的鄉村女子，身上散發出剛柔相濟的母性之美，深深地打動了我。可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安慰或幫助她，就像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阻止那棵百年古樹的傾倒一般。在這個堅硬的世界面前，我除了打開攝像機，別的都無能為力。

轉瞬間，巨大的傘狀樹冠已經被鋸掉了一半，此刻的古樟樹，有點像被狂風暴雨吹壞的雨傘。我兀自看著這顆大樹，回想當初在樹蔭下避雨蔽日的時光，一時間陷入沉思。短暫的休息時間，一位挖樹的老年民工偷偷地湊過來。

「他說他有錢，這一點都沒錯，他搞工程發了大財，現在起碼有幾千萬的家產，家裡有好多輛車，他平時開一輛嶄新的奧迪車，上工地才開舊車。」老年民工壓低聲音跟我說。他穿著一件髒兮兮的工裝，皮膚黝黑，大概有六十多歲。突然聽到他跟我說起這些，我有些吃驚，也許是他老闆的囂張跋扈讓這位底層勞動者感到了不平？透過他的口，我才知道那個大背頭中年男子姓簡，以前是湖南省林業廳的官員，後來辭職開公司，專門從事高速公路的綠化。因為省裡的關係，他總能承包到高速公路的綠化工程，打著業主的幌子低價拿到徵收範圍內的古樹，再轉手高價賣出。

老年民工指了指身前的古樹說，「像這棵這麼老的樹，至少能賣好幾萬塊錢，大城市十幾萬、二十萬都有可能。」我暗暗吃驚，沒想到這棵偏居一隅的土地樹，一經和高速公路的發展浪潮發生關係，轉眼就成了某些人的搖錢樹。大背頭男子之所以一直避開鏡頭，可能是這位省林業廳的前官員擔心其中的貓膩被曝光。我也總算明白了，為什麼他那麼霸氣十足和官話連篇。相較於年平均收入只有約三千元的中夥鋪村村民，他確實是個當之無愧的「大富豪」—富得可以拿錢買命。

「可我們給他幹活，才六十塊錢一天。別看就是移一棵樹，這麼幹一天很累的。但沒辦法，不幹更加沒錢。」說完，他很快起身離去—還有很多繁重的活計在等著他。

這棵古樟樹實在是大，這支專業隊伍整整工作了四天，並動用了各種大小工具和設備：刀、鋸、鎬、錘子、剪子、斧頭、繩索、鐵鍬、鋤頭、電焊、挖機……一直到第四天下午，這棵樹才變成了他們期望中的樣子—樹枝和樹根都被截斷了，片葉不留，只剩下兩個連理樹幹和樹

兜，看起來像一具「Y型」的塑膠模型，光禿禿了無生氣。在挖土機的協力下，民工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大樹拉到。在倒下時，它發出沉悶的聲音，像一位不肯屈服於暴力的義士所發出的低沉怒吼，讓人聽了驚心動魄。

現在，這棵面目全非的古樟樹，身上捆滿了草墊和繩索，像打著繃帶的截肢傷員，被一輛承重五十五噸的大吊車吊到了一輛長長的掛車上。掛車載著它慢慢地駛向數公里外的小龍門中學。那是小龍門鄉唯一的一所中學，唐老師曾經在那工作過九年，因為王家坡高速公路大橋要橫跨門口，學校也被迫搬遷，很快就人去樓空—我曾拍攝到，挖機將寫有「辰溪縣小龍門中學」的校門轟然推倒；師生們搬著課桌和棉被去幾公里外的另一所小學借讀；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在我的鏡頭前悵然若失，扼腕長歎。我也曾拍攝到，在附近施工的大批民工很快就佔領了這裡，昔日書聲琅琅的教室裡，突然堆滿了鍋碗瓢盆和各種施工工具。黑板上寫著「沉著冷靜，細心守紀」的考試要求，還來不及抹掉。

大背頭男子的綠化公司，也在這所小學裡佔據了一間教室，操場一角已經被改建成一個臨時苗圃。從附近移栽過來的大樹、古樹，紛紛匯集到這裡，與操場另一角的鋼筋班為鄰。它們如能大難不死，等高速公路修好之後，又會身價倍增，成為那條同樣價格不菲的道路的裝飾品。

在項目部，我看到了一份《漵懷公司古樹大樹統計表》，一共列舉了紅線範圍內徵收的古樹大樹四十棵。年紀最大的是棵「估測樹齡」為三百年的白櫟樹，來自漵浦縣洑水灣鄉沅水村。此外還有四棵樹齡均為二百年以上的柞樹、黃檁、和朴樹也來自沅水村。我在腦海裡一遍一遍地想像著這個叫做「沅水村」的村莊的前世今生：它一定是個隱藏在漵浦沅水邊上的古村落吧？當年「入漵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屈原曾涉水經過它嗎？它有著怎樣的歷史、生態和風土人情？它究竟是怎樣躲過如此多的歷史浩劫和時代變更，保存下來這麼多滄桑的古樹的？是因為它的與世隔絕，還是因為它對自然的敬仰？……我均不得而知。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一條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正穿越它，並且，將脫胎換骨地改變它。

在表格中，我也找到了那棵連理古樟的記錄，如同別的古樹一樣，它變成了一行簡短無情的表格。

名稱：樟樹。所在地點：辰溪縣中夥鋪村；所在標段：第十四標；

胸徑（cm）：80；樹齡（年）：105

第九章

我的角色

「你是站在什麼立場的？」

好多個清晨，當我被項目部院內的起床鈴聲驚醒，繼而在宿舍裡的單人木床上睜開迷濛的雙眼時，我就會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一種自我懷疑之中：我怎麼跑到這裡來了？我究竟在幹什麼呢？他們修建的這條高速公路跟我有關係嗎？

在十四標項目部，大家都叫我「張贊」。我剛去的時候向大家自我介紹，就有意省略了名字中的「波」字。因為我想在隨後幾年的拍攝間，和過去的那個「我」做一個切割。關於過去的那個「我」，那個拍過《天降》、《戀曲》和《有一種靜叫莊嚴》的「我」，網路上有一些消息和痕跡存在，我不想讓我的新拍攝對象看到這些，也可以防止別人對我有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當然，我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接受別人叫我「張贊」，還因為「張贊」這個名字不是我憑空捏造的。小時候，老家就有長輩這麼叫我，它聽起來比「張贊波」更親切更簡潔，是我真心喜歡的名字。現在，我只是再一次從時光的倉庫中搬出它、借用它而已。我聽到人們又重新叫我「張贊」時，感到既陌生又親切，內心充滿了複雜的情緒，彷彿一種嶄新的人生隨著這個舊日的名字重新開始了。但名字的改變真能帶來角色的變換嗎？我並無把握。名字只是人的一個標籤，一個假面，而問題的實質應該在於這個標籤和假面下的人。儘管在喧囂的人際交往中，我竭力隱藏自己的過去和內心，但一到了打開的攝像機後，我的本我又會自動浮現，他堅持用自己內心的眼睛看世界，並做好了準備，要大聲說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就這樣，我在項目部的三年多，無疑是分裂和糾結的三年多時光。「張贊」這個傢伙和他人過著集體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除了不打卡，不領工資，和別的職工看起來沒什麼不同。但在項目部職

工和民工的眼裡，這個人是特意來「體驗生活」的城裡人和知識分子，性格隨和，低眉順眼。但時不時露出少見多怪的毛病，似乎對什麼事情都感到新鮮好奇，喜歡看熱鬧，喜歡探根就底，喜歡追問和傾聽。但身體裡的另一個人，那個叫「張贊波」的傢伙，又幾乎在所有的時刻都頑固地存在著。他刻意和「張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張贊」積極生活的時候，他卻堅持遠遠地退卻幾步，用自己的眼光冷靜地打量著這個世界，且關鍵時刻並不吝嗇自己一貫的感懷、嘲諷和批判。這個叫「張贊波」的傢伙無疑是有點固執的，他暗暗地堅持著自己的方向和節奏。當然還有一點不可避免的孤獨。在項目部和工地上，張贊有不少熟人和朋友──比如說王司機，還有被「追殺」時解救自己的民工兄弟，但張贊波卻一個朋友都沒有。

不過，有些時候，我的兩個自我並沒有分得那麼清楚，它們緊緊地糾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說，我被老肖夫婦追趕得在田埂上一路飛奔的時候，我就神情恍惚，分不清此刻被「追殺」的究竟是張贊，還是張贊波。在回看被攝像機記錄下來的這段影像裡，我也分不清，究竟是張贊的肉體在奔跑，還是張贊波的靈魂在喘息？

只有到了晚上，回到他獨處的房子裡後，張贊波才占了上風。他肆無忌憚地從張贊的軀殼裡跳出來，認真地檢索白天的拍攝成果，並在一本牛皮紙的筆記本（這是張贊波的女友送給他的）上條分縷析地記錄下這一切，並及時地思考拍攝得失，制定新的拍攝思路。在二○一二年上半年的時候，這個叫張贊波的人，還開始進行另一項計畫，他開始悄悄寫作一本書。拍攝已經不能完全滿足他，他嘗試著用另外一種方式說話，試圖製造出一個多聲部的聲音。從此，新的局面又出現了：白天，張贊出去四處溜達，用影像記錄著生活；夜裡，張贊波坐在桌前，埋頭寫作，用文字描繪著對這個世界的體驗和看法。

在這個小空間裡現形後，張贊波沒忘緊鎖房門，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避免外人看到裡面的「變形記」──他畢竟還擁有一些永遠充滿好奇心的鄰居，比如爆破科的袁科長。他和我住在同一層樓，似乎很早就觀察到了我喜歡躲在房間裡，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舉動。有一次，我聽到敲門聲，趕緊合上電腦跑去開門。滿臉狐疑的袁科長站在門外。

「你每次一進房間就將門咔嚓鎖上，你關門閉戶的究竟在裡面搞什麼名堂？」他透過門縫對我（張贊）說。

「看A片呢。」一個我（張贊）笑了笑說，極力掩飾另一個我（張

贊波）的小小尷尬。有時候，兩個「我」就會像現在這樣互相配合，互濟互助。這樣做的好處是，張贊的玩笑很快就沖散了張贊波的尷尬，也消除了袁科長的疑慮。

「看A片不要緊嘛，沒必要躲躲藏藏的。」他轉身離去。這件事情於是就此了結。

當我還是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學生時，我胸懷藝術夢想，成天沉浸在藝術電影的海洋中，奉塔柯夫斯基、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等大師為圭臬，高談闊論，滿口「場面調度」、「長鏡頭」、「跳切」等專業術語，滿書櫃都是印著金棕櫚、金獅獎、金熊獎等炫目標籤的DVD。那時候，我壓根兒沒有想到，有一天竟然會獨自晃蕩到這窮鄉僻壤來完成一部有關道路的紀錄片。我的專業是劇情片導演，我在電影學院的三年裡從沒有上過紀錄片的課，在理論素養上更是一片空白。在那三年裡，我和紀錄片的相遇似乎只有兩次。有一次我在學校後邊的黃亭子音像店裡，碰到一位鬚髮斑白的老頭在專心地挑選DVD，他衣著樸素、身材瘦小，看起來像一位農夫。同學悄悄告訴我，這是司徒兆敦導演，導演是著名的紀錄片老師。當我從架上拿起一張碟，還沒看清楚片名時，司徒老師突然在旁邊說，「這個片子很棒！」我不好意思將這張碟放下，只好一併放在我要買的一摞大師片裡。但這部叫做《耶穌你知道》（*Jesus, You Know*）的奧地利紀錄片，卻一直冷落在我的碟櫃上。它算是我和司徒老師及他所代表的「紀錄片創作」方向的一段最大淵源。

我跟紀錄片的另外一層淵源，是我宿舍隔壁的一個姓梁的同學，他是司徒老師的學生，年紀比我要大點，已婚，經常來我們宿舍一起看片子聊天。印象中我們很少談及紀錄片，多是圍繞著電影史上的劇情片大導演而展開─在電影學院，相比於劇情片導演專業，紀錄片導演專業的地位並不太高，很多人內心裡有點不屑於它，認為紀錄片在照搬現實，並不算真正的藝術。我當時多少也抱有這種偏見。

在畢業創作階段，梁同學來到我宿舍，跟我說起他在選題上的困惑，問我有什麼建議。這是我們有關紀錄片的第一次真正交流。

「要不你去我們湖南拍小煤窯吧。」我隨口而出。我的故鄉有一座很大的煤城，境內遍佈小煤礦，礦難事故頻頻發生，即使我遠在北京，也時不時從新聞上看到來自故鄉的血色訊息。

「這確實是個不錯的題材。」梁同學有點興奮，但很快就表達了自己的顧慮，「不過拍攝起來難度太大了。」他低著頭沉默了一會，突然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感慨地說：「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

他突然冒頭冒腦地說出這句話，既像說給我聽，又像在自言自語。我沒太明白他的意思，以為他擔心拍攝時可能遭遇到的礦難，內心裡對他的膽小感到不屑。不會有任何一座小煤窯願意向一位帶著攝像機的外鄉人敞開大門。那黑暗的深井之下，絕對見不得陽光。最後，梁同學在陝西潼關找到一座願意接受他拍攝的礦山，那是一座金礦，而他的畢業作品就叫《掘金》。畢業前，他特意送了一張DVD給我，在上面鄭重地寫著「贊波惠存」。此時我正在忙自己的畢業創作，這片《掘金》就被我隨手放在碟櫃裡，緊挨著那張《耶穌你知道》。

後來，我整理碟櫃時，才特意拿出來看了全片。它比較樸實地展現了礦工們的勞動與生活處境，但也僅限於此，並沒有特別打動我的地方。當然這可能跟我當時的心境以及對紀錄片的認知水準有關。看完片子後，我很想給梁同學打個電話，跟他敘敘舊，順便說說我對他這部作品的觀後感。但發現此時已經沒有他的新電話了。畢業後，他去了中國軍方的電影製片廠工作，有人說他在拍攝一些和軍方有關的主旋律紀錄片，也有人說他專門拍攝戰爭片的製作花絮。他穿著一身筆挺的軍裝，很是神氣。

後來，我捨棄了拍攝劇情片，不務正業地走上紀錄片拍攝之路，對獨立紀錄片在中國的處境有了切身體會後，我終於理解了梁同學拍大腿發出的那句感慨。但時至今日，他很有可能經忘記了曾經說過的那句話吧，更不可能知道，那句無意中說出的話，給他的隔壁同學帶來了怎樣的迴響和變化？

有一天，當我拎著攝像機在村莊裡四處拍攝的時候，又在路上碰到了農民兼小學老師老肖。他曾經一拳打歪我的攝像機話筒，並將我「追殺」到民工宿舍，但不打不相識，那件突如其來的衝突發生後大概一個小時，我又主動返回事發地找到他，和他化解了恩怨。

「嗨，你在拍什麼呢？」老肖主動湊過來和我打招呼。

「哦，老肖啊，我在拍那片田野。」我說。

「田野有什麼好拍的？你不去拍高速公路來拍田野幹什麼？」

「我覺得那片田野很好看。」我笑著說，「油菜剛從地裡長出來，綠油油的。」

「你到底是搞什麼的？我覺得你很奇怪，你跟那些高速公路的人好像不太一樣。」老肖發給我一支菸。

「是嗎，有什麼不一樣呢？」我笑著接過他的菸。

「我也說不好，就是有這種感覺。」老肖給我用火機點菸，「我一直沒想明白，你到底是什麼立場的？到底代表誰？」

「我注意到你不但拍高速公路，還經常在我們村子裡拍攝，人家種田你也拍，放牛你也拍，聊天你也拍，蓋房子建寺廟你也拍。連油菜田你都拍。」他皺起了眉頭，露出迷惑的神情，「我就是搞不清你是什麼立場的？你到底是站在農民這邊，還是站在政府那邊的？」

這番話頓時將我逗笑了。此時的老肖好可愛，和那位「追殺」我的暴躁老肖判若兩人。我一邊笑一邊說，「我也搞不懂我站在哪邊，也許我只站在自己這邊。」因為處境使然，我沒法向他和盤托出我的真實身份和拍攝意圖。

我並不是第一次被人問到有關「身份」和「立場」的問題。在一次無意中拍攝的一起拆遷題材中，被「強拆」的村民們一直都不信任我，這些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已經被冷酷的現實磨滅了他們對陌生人的最後一點信任。

「你是幹什麼的？」在我走入村莊拍攝時，他們警惕地問我，將我團團圍住，要求查看我的身份證和工作證。當得知我沒有工作證的時候，他們用非常懷疑的眼神打量我；在我將身份證交給他們檢閱後，他們迅速地給我和我的身份證拍照，好像警官對犯罪嫌疑人那樣；還有人上網搜尋我的資料，懷疑我是政府派來的「間諜」。

「我真的不是政府的間諜，我只是個拍紀錄片的。」

「我還是不相信你，實話說現在我誰也不相信了，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一位老人冷漠地對我說。村民們告訴我，老人已經八十歲，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他口中的「他們」在前不久拘留了他的兒子，還多次把他以「阻礙公務」的名義帶進派出所。看著老人飽經風霜的臉，我放棄了辯解，心中充滿酸楚。

老肖的疑問，以及老人的疑慮，無意中觸及了紀錄片創作的深刻靈魂：記錄者究竟應該站在什麼立場？影像的真實度如何來保證？紀錄片

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如何平衡？對此，我也說不太清楚。我只會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一切，記錄下那些能真實觸動我的情感和現實。從這個角度上說，我並沒有欺騙老肖，我確實只站在「自己的立場」。某種意義上，我最終呈現的這條寬廣的道路，也是我自己的一條道路。

除了討厭的「立場」問題，其它問題也讓我難以招架。就在我跟著「援越抗美」老兵老曾去十五標項目部討薪的那次，為了不引起對方驚慌，我並沒有跟著老曾走進項目部，而是特意站在對面的一棟民居走廊上，遠遠地拍攝著老曾。儘管我儘量隱祕而低調，但還是被裡面的人發現了。不一會，一位表情嚴肅的中年女人朝我走來──後來才知道她是行政處的工作人員，她身後跟著一名身穿制服的保全。

「你是哪個電視台的？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證件？」她徑直問我。

「我不是電視台的。」

「你不是電視台的在這裡拍什麼？」她的語氣更加不屑。

「我在拍他，他是一位參加過援越抗美的老兵，我覺得他的生活很有意思。」我指了一下不遠處的老曾，對中年女人笑了笑，「因為並不想給你們添麻煩，所以就站在外邊遠遠地拍一下。」

「在外邊拍也不行，無論你站在外面還是裡面，你拍了我們就不行，就是侵犯了我們的肖像權和隱私權。」她板著臉孔，用命令式的口吻跟我說，「你必須跟我們走一趟，我們必須檢查你拍的是什麼。」被我拒絕後，她叫保全來搶我的攝像機。危急時刻，十五標項目部負責協調的周總聞訊趕來，他經常來十四標項目部辦事，所以認識我。他打起了圓場，支走了女人和保全後，將我帶到他的辦公室，並問了我一個在拍攝中最不願聽到、卻經常會遭遇到的問題。

「你拍這個紀錄片是什麼主題呢？」周總很客氣地給我倒了一杯茶。這個問題第一次被問及，是在我獲許進駐項目部拍攝之前，去見婁底路橋公司的毛董事長時。

「你拍這個紀錄片是什麼主題呢？」毛董和我握過手後，坐在寬大的老闆桌後，客氣卻不無疑慮地問我。

「我想通過紀錄一條道路的修建過程，來表現公路建設者這個群體的精神面貌和勞動風範。」我胸有成竹地回答。

「國家在高速公路建設上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成就，現在每個人出

行都離不開高速公路，但普通人不一定知道一條高速公路是怎麼修成的，修一條高速公路背後有些什麼故事。我想拍下這個過程，記錄下修路者的故事，讓大家知道修一條高速公路是多麼的不容易。」我從容地補充著。毛董在辦公桌後臉帶微笑，滿意地點了點頭。我鬆了一口氣。

現在，我幾乎原封不動地將這個回答向周總複述了一遍。他聽後深有感觸的說，「那是，修一條路太不容易了，一修就是三、五年，我們常年四季在外面待著，家裡都回去得很少。」

周總停頓了一下，突然說：「等於說你拍這個片子──拍一條路是怎麼修成的，就相當於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嘛。」他好像找到一個非常恰當的比喻，呵呵笑了起來。

我卻頗感意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的知識系統裡，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本史達林時代應運而生的蘇聯長篇小說，被視為社會主義文學的典範，中文譯本多達二十多個，發行量高達近三百萬冊。這本書至今被中國教育部定為「中小學必讀書目」，在中共建政五十周年的一九九九年，中國某出版機構舉辦了「感動共和國的五十本書」的群眾票選活動，結果該書打敗了備選書目中的《毛澤東選集》和《鄧小平文選》，名列榜首──中國人在政治上沒有投票權，因此常常熱衷於另闢蹊徑地評選出某個「感動中國」的「道德模範」，或者晉級成功的「超級女聲」。

總之，如果你出生在中國，你在小學時代就要讀這本書。但你完全無須擔心小孩子如何啃完這部四十多萬字的大塊頭著作，考慮周到的教育部門和出版機構特意編撰出版了專供小學生的彩圖注音版，還改編部分文字，列入中學語文課本。好友斌和在給我的來信中提到的初二課文《築路》，就是摘錄於該小說。

然而至今，我除了應付考試而被動讀過《築路》之外，從來沒有看過這本書。更加可笑的是，在初二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雖然不斷地聽到這本書的大名，但一直誤以為它是一本介紹煉鋼技術的科普書，以為它和《怎樣科學養豬》差不多。顯然，它的書名誤導了我這個愚頑粗陋的鄉村小兒。我也不能確定我的紀錄片能否再塑造出一個「保爾．柯察金」的角色。他是這本書的主人翁。「身殘志堅」的保爾．柯察金，在經過革命的千錘百煉後，擁有了鋼鐵般的革命意志以及強大的共產主義思想──為了黨的事業，他甚至毅然拋棄了具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初戀女友冬妮婭：

「如果你認為，我首先應該屬於你，其次才屬於黨，那麼，我絕不會成為你的好丈夫。因為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能屬於你和其他親人。」

在我的片子裡，誰能代替「保爾．柯察金」呢？老何？老姜？老曾？孟總？楊保國？龍老闆？唐老師？粟師傅？……好像都不太合適。好在周總的類比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個設問句一樣，並不需要我回答。

「下次你要拍什麼，就提前跟我說一聲，我給你安排一下，免得再引起誤解。」周總豪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親自開車，將我送回了十四標項目部。

「小機機」拍客的底層生活

立場、主題、身份這些宏大的東西，雖然是「張贊波」要盡力掩藏的東西，然而在工地和鄉村底層，某種層面上，「張贊」這個身份也被「張贊波」扮演得非常成功。隨著「張贊」跟大家相處得越來越熟絡，大家對他的好奇，慢慢地從拍攝方面，轉移到了行業「潛規則」等八卦問題上。

「嗨，張贊，你潛規則過女演員沒有？」有一天，王司機意味深長地問我。

「哪有？我是拍紀錄片的，沒有女演員。」

「那以後你拍劇情片了你就可以潛規則了吧。」王司機很開心地說，「這在你們圈子裡應該很普遍吧。」

「不知道，我不混圈子。」

「別不好意思嘛，哪個圈子都有潛規則的。」王司機表現出了他非同凡響的見識，「你們電影圈有電影圈的潛規則，我們工程圈也有我們工程圈的潛規則。這其實很正常。」我只好默認。他總有一些讓你無法辯駁的觀點，如果繼續爭論下去，會讓你很難脫身。相比之下，其他職工的問題就比較好對付。

「你覺得范冰冰這個人到底怎麼樣？」一位職工突然問我。

「不知道，不熟。」我回答他。

「我看網路上說她跟很多人有一腿，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不清楚。」我力求簡潔地回答，希望儘快結束這個無聊的八卦問題。

「你不是拍電影的嗎，怎麼會不知道這些呢？」他很失望地走開了。

有時候，他們也會問起我拍完紀錄片後的播出問題。

「你這個片子以後在哪個台播出呢？」合約科的一位女職工問我。

「現在還不知道，要做好後再說。」我只能搪塞著她。

「能不能上中央台啊，要是能上中央一套就好了！」她臉上煥發出難以掩飾的期待。

「我也希望上中央台呢。」我感到暗暗好笑。「那你拍了我的鏡頭沒有？你可要給我拍幾個鏡頭啊，到時在中央台播出了要通知我們看！」女職工興奮地說。

我只好在心裡暗暗地說了聲抱歉。我知道，我的片子不可能上央視，就像爛白菜湯不可能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國宴中一樣。

不光是項目部的職工，民工們也總會有意無意地拿電視台的標準衡量我。有一次，我去山坳上一個土方隊拍攝，有位五十歲左右的民工看見我走來，指著我的攝像機一臉壞笑地說，「你這個小機機好小哦。」

「什麼？」我沒太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你這個小機機，這麼小。」他有點不屑地地用手比劃了一下我的佳能小高清攝像機的長度，「人家電視台的機機比你的大多了！」他展開手臂，誇張地比劃了一個「大機機」的尺寸。「我看中央電視台採訪的時候，他們的攝像機都好大，湖南衛視的也很大。你的怎麼這麼小？」

「哦，這玩意兒不在乎大小的，要看它的功能。」我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乾脆順著他的意思開著玩笑，「那些看起來很大的，關鍵時刻往往不行。」民工們聽了我的話後，全都哈哈大笑起來。

然而讓人笑不起來的是，「張贊」的「小機機」偶爾被誤認為「功能強大」。貧窮而老實巴交的貴爹，七十多歲，很多年前喪偶，因為地陷災害，他的老房子塌了，只能獨自住在廢棄的小學教室裡。牆壁上的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八個字已經被煙熏得黑黑的。

「我的腰一直很疼，我懷疑自己有腎結石。」有一天，他摸著自己的腰跟我說。

「那你應該去醫院看看，最好照個片。」我建議他。

「你這個東西能照嗎？」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攝像機，期待地說。

「什麼？」我沒聽懂。

他又重複了一遍，「你能用你手裡的這個東西給我照個片嗎？」

這時，我才明白，他將我的攝像機當做是X光照片機了。我搖了搖頭，心酸地關了機。那一刻，我真希望手中的攝像機可以識別病痛，甚至治病療人，而強過用它拍攝這些沒用的紀錄片──它們不能給鏡頭後的人們帶去半點幫助，更別說去改變我們均置身其中的那個結石般堅硬的世界。

「你怎麼又來了？你真是吃飽了飯沒事幹！我這裡有什麼好照的？」每次看見「張贊」拎著攝像機走進她的房子，歐婆婆就忍不住笑，笑得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像其他當地的老人一樣，她也將我手中的攝像機叫成「照相機」，將我的拍攝當成「照相」。

「嗯，我就是沒事幹。」我跟她開著玩笑。隨著我在中夥鋪村的時間越來越久，我跟村民們的交流也越來越輕鬆。甚至，我也基本上聽懂了他們的方言。

「在你們那裡，你的工作最輕鬆吧。」歐婆婆笑過之後，問我。很顯然，她也將我當做了高速公路施工方的人。

「也不輕鬆。」

「還不輕鬆？汗都不要出。」歐婆婆指著屋後正在抬石頭的民工說，「你看他們，天晴下雨都要賣苦力。」

「你的工資多少錢一個月？」歐婆婆突然話題一轉。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她才好。我總不能如實回答，說我其實是名失業者，沒有人發給我一毛錢的工資。那只會帶來更加沒完沒了的詢問。於是我假裝沒聽到她的話，裝著很專心地拍攝她腳旁的一隻正在覓食的公雞。

「問你呢，你的工資多少錢一月？」歐婆婆窮追不捨，湊到我的攝像機前再問。

我逃無可逃，只好迅速地在心裡斟酌了一下，說出了一個數字，「三千。」我判斷，對她而言，這個數字應該比較合適。太高和太低都會增添對方的好奇心，這個討厭的話題必然還會繼續。

「三千啊，那麼多。」歐婆婆吃驚地說，「那你真划得來，工作那麼輕鬆。我的細伢子在杭州打工，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很辛苦，工資還只有一千多。」我暗暗後悔說高了這個子虛烏有的數字。

但高和低並沒有清晰的標準。我去村莊的桔林裡拍攝時，一位正在摘桔子的中年農婦也曾經冷不丁地問我這個問題，「你多少錢一個月？」有了歐婆婆的那次經歷在先，這次我學乖了，我當即果斷而慷慨地將自己的「工資」減去一千元。「兩千。」這次，我以為對方一定不會再有什麼疑意。

「才兩千啊？」農婦同情地掃視了我一眼，「看你的樣子應該也是大學畢業生吧，如果真拿這麼一點，確實有點低。我女兒是長沙財經學院的大學生，畢業後留在審計局了，每個月能拿到四千多呢。」很快，她將對我的同情轉變為了對女兒的自豪。

除了尷尬地將鏡頭對準她手裡的一枚豐滿的桔子，我不知道怎麼接她的話好。

不僅有人關心「張贊」的「工資」和「小機機」，也有人偶爾關心「張贊」的婚事。有一天，協調副老總孟至強突然神祕兮兮地將我召進他的房間，「小張，你覺得小玲怎麼樣？」他充滿期望地對我說。

「小玲？很好啊。」我一時沒明白孟總的意思。

小玲是財務室的會計，大概二十來歲，個頭不高，性格外向爽朗，衣著較為時髦。平常經常會見面，但彼此間只是點點頭，並沒有更多的往來。我依稀記得王司機說過，在項目部和漵懷公司裡有好多人都喜歡她，想追她，但她都瞧不上，至今單身。我對她的全部印象，還包括一次KTV見聞。那次是龍副總喜得龍子，請全體項目部職工去懷化市喝酒唱歌。我們來到一間我平生見過的最大的KTV豪華包間，足足有項目部的兩個會議室那麼大，裡面霓虹閃爍，樂聲震天。小玲也唱了一首歌，她一邊唱一邊劇烈地扭著腰臀，抖動著身子，好像在跳種她藉著酒精的靈感剛剛獨創出來的奇特醉舞，讓攝像機後的我驚愕不已。

「很好？那你願意跟她在一起吧。」孟總的神情有點興奮。

「在一起？」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是這樣的，小玲是毛總的親戚，毛總早就託付我為她介紹男朋友，她不一直沒有男朋友嘛，平時眼光也很挑，這工地上沒有她看得上的。」孟總察覺出了我的驚訝。「我們都覺得你人不錯，你要是喜歡她就可以考慮一下。我覺得你們倆很配。」

「啊，我們倆？」我這才意識到孟總來意，他今天竟然放下繁重的協調工作，不務正業地當起紅娘來。

「這好像不太合適吧，我拍完這裡的紀錄片就要走的，我在北京，她在湖南……」

「這個沒問題，你可以帶走她嘛，帶她回北京就是。」

「可是，我有女朋友的……」

我一邊說，一邊對孟總的草率感到不解。他竟然不先調查一下「張贊」的背景，即便他對「張贊」的「工資」和「機機」（主題和立場）不介意，但總不能對「張贊」的情感狀況也不聞不問吧。看來，他不是一個好的紅娘，抑或是「張贊」的扮演太成功了嗎？——一個每天拎著攝像機閒逛的人，至少應該沒女朋友吧。

「有女朋友了？那就算了，那就沒辦法了……」孟總有點失落，及時地打住了話題。

後來，我又在項目部的過道裡碰到了小玲。她迎面走來，高跟鞋篤篤地響，遠遠地看見我，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扭著頭從我身邊匆匆擦身而過。我也尷尬地回笑了一下，好像做了虧心事一般。我不知道這陣倏起的尷尬究竟是屬於「張贊」的，還是屬於「張贊波」的。

分裂和糾結的紀錄人生

有時候，我既不是張贊也不是張贊波，我還需要臨時扮演別的角色。一次，佘總的表弟、那位成功的陳姓商人又出現在項目部。他在中夥鋪境內投資的一所民辦寄宿中學，即將迎來一場全縣的教學改革研討會。屆時，市、縣教育局的領導以及全縣其它中小學的校長、骨幹教師都將前來參加。他需要將這個榮耀時刻記錄下來，以作為這所學校今後招生宣傳時的砝碼。於是他想到請項目部幫忙。這個光榮的任務自然落在了

「張贊」的身上。我不好拒絕，就打算帶著項目部的小「掌中寶」DV過去應付一下。

「這個不行，應該帶上你的那台大的去。」陳姓商人看了一眼我手中的小DV，不屑地搖了搖頭，「市縣領導都會來，帶台大的才顯得氣派。」這個時候，他不再懼怕和討厭我的攝像機了。這正是中國官方對待媒體和鏡頭的立場：在榮耀時需要你記錄，在見不得人的時候巴不得你離得越遠越好。

我帶著我的佳能高清機器趕到學校。正如我的猜想，那場所謂的教改研討會陳詞濫調，毫無新意。領導和校長們的發言囉唆而冗長，而且不乏官僚氣息，讓人聽得直乏困，但我只能強打精神將他們一一拍下來。我知道，今天的「張贊」本質上就是一台記錄「榮耀時刻」的機器，不需要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課堂上還播放了一段教學片：一名裝腔作勢的男播音員用高亢之音朗誦了一篇課文，然後，女老師再讓孩子們模仿著他的腔調朗誦。此時，我這台昏昏入睡的「記錄機器」頓時被喚醒了，身上起滿了雞皮疙瘩。這讓我想起在大禮堂裡看紅歌大會時的感受。佯裝高亢的朗誦詞、辭藻華麗但情感虛假做作的散文、陳腐老套的價值觀。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經典」外國文學一樣，構成了孩子們的語文世界，也塑造了這個國度裡的成人們的表述風格：「十月九日事件」中楊保國部長的檄文、李副總的寫作指導，顯然都來自於這樣的教育背景。在我拍攝完活動之後，陳姓校董派出一位女老師來到我宿舍拷貝拍攝素材。她是學校裡主管宣傳的職員，也給學生上思想政治課。在等待拷貝的間隙裡，她好奇地四處觀察著我的房間，然後看到了牆上張貼的一幅海報。

「第四屆……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她輕聲地念出聲，停頓了片刻，然後狐疑地問我，「什麼叫民間映畫？」

「映畫是日本的說法，就是電影的意思。」我後悔不該一時頭腦發熱，將這幅我在二○一○年參加獨立影展的海報貼在墻上。在「張贊」的空間裡，實在不宜這麼大張旗鼓地展示出只屬於「張贊波」的東西。

「那民間映畫呢？」

「就是民間拍的電影。」我倉促地應付她。我並沒有解釋「民間映畫」其實就是「獨立電影」的意思，影展創辦人之所以採用這個怪怪的名字來替代「獨立電影」，就是為了規避不必要的麻煩。

「民間拍的電影？就是網路上的微電影嗎？」女老師窮追不捨。

「差不多吧，但不止這些。」我含糊其辭。雖然我喜歡談論這個話題，但理智在提醒我，如果我不想惹麻煩的話，就繼續演好「張贊」的角色，而最好不要跟一位主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政」老師談什麼「獨立電影」。

在在中國，脫離了電影審查機制的獨立電影又叫「地下電影」，它沒有政府的拍攝許可，也不會獲得公映資格。它的情況有點類似於違背了計劃生育體制而出生的孩子，既不會獲得准生證，也不會載入戶籍，完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黑孩子」。

最近這幾年，獨立電影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在北京、上海和南京，好幾起獨立影展（或放映活動）被強制拉閘斷電，被勒令即時停辦甚至永久終止舉辦。如果你不知道「拉閘斷電」是怎麼回事的話，我（「張贊波」）願意再多跟你說兩句。中國民眾將人為的斷電行為稱之為「拉閘斷電」，一般是指用電高峰期間政府電力部門用以調控用電量的手段。但現在，它成了中國官方對付某些「刁民」的武器，如果你是一個膽敢違抗政府拆遷令的「釘子戶」，他們很快就會斷了你家的水電供應，讓你生活在一座黑暗的孤島上，最後不得不放棄抵抗。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比比皆是，毫不稀奇。但最近幾年，這個法寶被用來對付不服管束的獨立電影。如果你不聽從他們的警告堅持放映獨立電影，他們就會切斷電力，讓你的電影放映瞬間陷入黑暗。

黨的思想審查一旦和電力部門結合起來，立刻變得「戰無不勝」，許多獨立放映機構不得不關門大吉。「拉閘斷電」的創造性運用，絕對堪稱是黨的智慧和思想的完美結晶。它反應了黨的審查機構熟諳電影的真諦：電影，電影，確實是需要電的。除非我們改為退回古代去導演不需要電的皮影戲。但我敢說，他們照樣有辦法熄滅皮影戲演出中所需要的光源。

在任何時候，你都不能低估了他們的能力，即便你掩名埋姓。二○一一年六月，我在中夥鋪村再次碰到唐老師。「有人來找過我調查你的情況。」他突然神神祕祕地說。

「誰？調查我的情況？」我感到莫名其妙。

原來早些天，懷化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三位警察專程驅車前往辰溪縣，將唐老師請出去「喝茶」，目的就是打聽我的情況。「喝茶」是中

國新出現的網路詞彙，指某人因為有「危害社會和諧穩定」的言論或行為，被負責「維護穩定」機關—通常是公安局下設的「國保大隊」—帶去做調查、警告和規勸。這一過程被網友戲稱為「被請去喝茶」。

「他們問我你這個人怎麼樣？究竟在中夥鋪村拍些什麼？拍攝內容有沒有涉及到腐敗、環保、拆遷等負面的東西？」唐老師說。

「他們也非常清楚你的身份和背景，也掌握了你的電話，還知道你的真名叫張贊波而非張贊。」

我驚訝得張大了嘴。儘管我自認對國家的維穩機制之運轉方式和效力並不陌生，但還是沒想到它會和自己發生直接關聯。他們輕而易舉地識破了我用「張贊」這個名字進行的「精心偽裝」，就像一個正在台上表演的魔術師，突然被圍觀者拆穿了小把戲。

「那後來發生了什麼呢？」我故作鎮定地問。

「我對他們說，你們太敏感了吧，人家是給高速公路拍紀錄片的，斯斯文文的一個人，像個學生伢子。在我這裡也只是拍拍我的新寺廟的建設過程，我們碰巧都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感興趣。」

「他們請我喝的是鐵觀音，喝完茶後，還順帶請我吃了一頓飯，就在我們辰溪縣最好的酒店，海天大酒店的十二樓茶餐廳裡。」唐老師笑了笑說。

那一刻，我的心情有點低落。我暗自在心裡算了一筆賬，在那樣的場所消費一壺茶加一頓飯，好歹也得花去幾百大洋。我一想起因為我的原因，導致了我的尚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祖國亂花掉了幾百大洋，就感到心疼不已。這明顯屬於不會有任何回報的投資失誤。

像我這樣的人，壓根兒就不值得花費他們半毛錢的維穩經費。這幾年來，儘管我誤入歧途，拍攝了幾部獨立紀錄片，但它們一直毫無影響，在蒸蒸日上的中國電影的汪洋大海裡，一點浪花都沒折騰出。它除了讓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窘迫，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當然更不會給崛起的中國帶來什麼。除了那些蟄居在地下室的內心陰暗、品味怪異的文藝青年—也許主要是文藝女青年會抬眼看它兩眼，它再沒別的出路。

前不久我閒得發慌，去了文藝青年們常逛的「豆瓣網」。我查了下看過我的片子的人數，發現標註看過《戀曲》的人只有一百八十二個；標註看過《有一種靜叫莊嚴》的人更少，只有一百二十七人；另一個片子《天降》就更慘，它不幸成了龐大的敏感詞家族的新成員，網站將它的條目刪掉了，沒有留下任何一條信息，彷彿它從來就未曾來過這世

上。我暗暗算了算，哪怕將那些不上豆瓣網的觀眾算在內，估計至今中國看過《有一種靜叫莊嚴》的人不到五百個。當我統計出這個數字後，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你想想看，相比於中國十三、四億人口，這個數字是不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我敢保證，在中國，長著六根手指或三隻眼睛的人數都比它多，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流感或霧霾擊倒的人就更不止這個數。如果國保警察知道這一點，他們一定會為自己盲目的判斷和不必要的草木皆兵感到可笑。

告別唐老師後，我回到項目部，暗暗做好了隨時去赴「茶約」的準備。我甚至想好了我要點的茶品。但很奇怪，至今沒有任何人來找我，項目部裡也依然風平浪靜。唐老師所說的喝茶故事好像只是我做的一個荒誕的夢。

在工地上的每一天，我都拎著攝像機出去轉悠。我發現我的紀錄片製作方式越來越接近傳統手工藝人──從選題、拍攝、錄音、剪輯到上字幕，我幾乎從頭至尾都是自己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和節奏行事。儘管我不斷碰到不少外在的困難和限制，但主流工業電影體制所形成的那些商業壓力和政治忌諱，不再和我有什麼關係。這種內心充實而自由的感覺妙不可言。

當獨自拎著DV在南方的鄉村裡晃蕩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就是一位鐵匠鋪裡的小夥計，大部分時間都在笨手笨腳地敲打著一塊生鐵塊──它剛從生活的熔爐裡鍛煉出來，慢慢地經過淬火、成型，最終將變成一把笨拙的犁鏵，或者一隻蹩腳的挖耳勺。工地守夜人「公安老朱」在當鐵匠時肯定也是這麼幹的，從某個方面來說，我跟他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另外一方面，一個生活在現代的「手工藝人」也會被時代潮流賦予一些別的稱謂。「你是哪個電視台的？」有一次，我在工地上轉來轉去，旁邊一個挖樁隊的年輕民工連續幾天都看見我，就忍不住過來問我。

「我不是電視台的。」

「那你拍什麼？」

「拍著玩。」

「那你是拍客嗎？」他認真地問我。

「拍客？」我剛一聽這個詞彙覺得有點陌生，但馬上就領會了它的

意思。「對對對，我是拍客，拍客！」我高興地回答他。

這是我來工地之後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定義我。在工地上，和我熟悉的民工一般都叫我「小張」，還有人叫我「張師傅」。偶爾也有叫我「老張」，這是一種民間的尊稱方式。有一次我去工地，一個五十多歲的陝西民工放下手中的鐵鎬，用髒兮兮的手給我遞過來一根不知道牌子的香菸，「老張，抽一根！」還有人叫我「張老師」、「張記者」、「張攝像」，甚至「張總」。剛開始，我還多少會對這種五花八門的稱呼感到錯愕，但很快我就見怪不怪了，坦然接受他們的一一加冕。然而「拍客」這個充滿時代草根氣息的名號，最符合我現在的自由拍攝者身份。我樂呵呵地發了一根菸給年輕民工抽，對他不經意間賜予我一個好稱呼而表示感激。他一定是個平時喜歡上網、善於接受新潮事物的人。

在這裡，從來沒人叫過我「導演」。在大家的觀念裡，導演這種光鮮的職業和塵土飛揚的工地相距太遠，就像澳大利亞的無尾熊絕不可能出現在湖南的森林裡一樣。有一次，我去湖南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他客氣地將我迎進門。「快叫叔叔。」他對坐在客廳裡看電視的女兒說，「這是一位導演叔叔呢。」

朋友的女兒大概七、八歲，長得很可愛，她正在看湖南衛視的一檔娛樂秀。

「導演？」朋友家的女兒抬起頭來掃視了我一眼，很不屑地說，「導遊還差不多吧。」

朋友覺得很尷尬，趕緊訓斥她沒有禮貌。我卻聽了哈哈大笑。我覺得童言無忌，如果她眼前這位突然闖入家門的灰頭土臉、衣衫不整的「屌絲男」會是一個導演，那炫目的電視舞台上那些「高大帥」導演一定來自外星球。後來，我再去我朋友家，他女兒還是叫我「導遊叔叔」。我高興地回應了，我喜歡這個稱呼勝過有名無實的「導演」。

做導演的「成本」實在太大，我無力擔當。有一次我去長沙，一位同學見我開口就問，「你現在的年收入一百萬沒問題吧。」他是我大學同班同學，當初我們曾同時就職長沙電信局，後來我辭職去了北京學電影，他跳槽到「中國移動」，掌管湖南省分公司的宣傳廣告部門，經他手的資金一年就達上億元。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好，就笑著打了個哈哈。好像是他的一個因為打腫臉充胖子而變得很心虛的客戶。

我剛去項目部的時候，對我的拍攝工作最感興趣的人是王榮。他經常會邀請我去他的宿舍做客，而他問「張贊」的一些問題讓「張贊波」暗暗驚奇。

從電影劇本的寫作、電影的成本構成、電影的特技，到導演如何控制一個大場面的拍攝、場記或電影美術的職能、電影的後期調色，以及電影的發行分成，這些問題基本上涉及了電影行當裡的各個層面。從導演到製片，從前期到後期，無一疏漏。每次，我硬著頭皮一一回答他，感覺自己似乎又在參加電影學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試。好像他也是一個「潛伏者」—真實身份並不是一名司機，而是一名面試官。

隨著與我的交往漸漸加深，王司機不但體現出了好學好思的特性，還表現出了他好為人師的一面。

「我覺得你應該去拍拍我們吃飯的場景，吃飯是表現工地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你的片子裡不能沒有它。」

「工程部的劉師傅在施工方面經驗很豐富，我覺得你應該將他當做你的主要拍攝對象。」

「楊保國和衛生站的小護士談戀愛你拍了沒有？你一定要拍這個，愛情也是修路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說要你去拍一部愛情片，但你不應該只拍一條路。」

「我覺得這座橋你不應該這麼拍，你應該跑到對面山上去拍，這樣就可以俯拍到全景，那樣才有氣勢。」

每到這種時刻，我都會對不吝指教的王司機致以感謝。「你完全可以擔綱我這個片子的藝術指導。」我忍不住對他說。自從才華橫溢的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馮偉林「進去」之後，我覺得王司機成了這個職務的不二人選。

「是嗎？」王司機聽了我的讚揚，非常高興。

然而，當他發怒時對我說的話，也依舊傳達了他對獨立記錄電影本質的某種認識。有一次，大家紛紛抱怨公司裡某些規定不公正，並由此談及這個國家灰暗的一面。王司機見多識廣，認識深刻，他越說越氣，變得義憤填膺。如同以往，我拿著攝像機在一旁不露聲色地記錄。他一扭頭，發現我正在拍他，立刻將憤怒的矛頭轉向了我。

「你紀錄這些東西有什麼狗屁用？」他指著我的攝像機，嚴厲地說。我沒有反應。他停頓了一下，又反問我：「難道不是嗎，拍了之後

就剪一個片子，又沒有幾個人會看到，看到了可能也看不懂。浪費磁帶，浪費人力物力，是不是？你光紀錄一個工地有什麼用？你實質性的東西又紀錄不到，你拍這條路的建設無非就是歌頌祖國嘛，你說你還能拍到什麼東西？」旁邊的人一看他對我展開輕蔑的攻擊，全部開心地哈哈大笑起來。

也許是圍觀者的哄笑讓王司機變得越發激動。「我覺得你待到這裡是狗屁，不應該待在這個地方，真的，你說是不是？你覺得你在這裡待兩年、三年有什麼意義呢？」他的聲音不由地提高了八度：「我現在只覺得，理想什麼的，都是狗屁！你跑到這裡來是一個十足的錯誤的選擇！」

眼看著這位藝術指導突然搖身變為尖銳的批判者，我覺得很不適應，窘迫地低著頭，不敢接他的腔。

「我覺得你應該明天就回家去，將你所有的磁帶都砸了，拍這沒有用。什麼狗屁理想！」王司機再次用「狗屁」結束了批判，揚長而去。我愣在那裡，羞愧得滿臉通紅。

儘管我最終拍攝製作的片子並非王司機所想的「歌頌祖國」，但他的「狗屁」之說還是適時地擊中了我。好多個清晨，當我從那張重慶民間映畫展的海報下醒過來，坐在床沿上，懸著兩腿，用模糊的雙眼打量著這間逼仄的小屋，以及窗外陌生的山巒和工地時，就會不由自主地再次陷入到自我拷問之中：我是誰？我來這裡幹什麼？我這樣做有意義嗎？這樣的問題永遠找不到答案。從我不務正業走上獨立紀錄片這條道路起，看似一切安排，都有著不可預知的偶然性，卻在冥冥中透著天意。

二○一一年一月底，離兔年新春只有十多天的時間了，民工們都陸陸續續地返鄉過年。但老曾和他的挖樁隊工友們還沒有回家，項目部還沒有撥發民工隊的工錢，他們只好一直等待。

吃過晚飯後，我走進老曾的租住房。老曾正在二樓客廳裡和一幫民工看電視。「來，坐這裡看吧，烤烤火。」老曾看見我進來，挪了挪身子，讓出屁股下面床墊上的一小塊空間。眼睛很快又回到電視畫面上。電視上正在放著央視的「新聞聯播」。這位「援越抗美」的老戰士、鐵道兵通訊員、修路民工，位卑不敢忘憂國，長年以來堅持每天收看這檔

節目。

湖南剛下完一場號稱四十年來最大的雪，天很冷，房間裡沒有取暖設施。他們便充分發揮著「窮人的智慧」，將平時掛在牆上照明的大功率白熾燈取下來，用鐵絲焊了一個籠子套在燈泡上，把它放在一把凳子下，再在凳子上蓋張被子。一個簡易而神奇的取暖器誕生了，大家不懼觸電的危險，紛紛將手腳伸進被子，藉助燈泡的熱度「烤火」取暖。這一幕看得我膽戰心驚，可他們早已習以為常。

「我覺得你比他們都做得好，你才是真正的走基層，快過年了還在我們這裡。」老曾指著電視畫面說。

我定睛一看電視畫面，有記者正在採訪一些回家過年的人，畫面右下角寫著「新春走基層」的字樣。

「我們拿不到工錢，回不了家，你應該採訪一下這個情況。然後也發到中央電視台這個『新春走基層』欄目上去。」來自貴州的胖哥和我開著玩笑。

「就是，我們辛苦一年了，到頭來還拿不到工錢。怎麼就沒看到中央電視台到我們這裡來走基層。」來自湖南桑植縣的老周抱怨說。

「小張不正在給你們拍嗎？」老曾說，「小張這個走基層也不是鬧著玩的。到時他的紀錄片做好了，你們的形象全國人民就可以看到了。」老曾和民工們打著趣。我這才領悟他剛才的意思。老曾的嘴裡經常會蹦出一些比較時髦的政治詞彙，讓我摸不著頭腦。我猜這一定跟他喜歡收看「新聞聯播」有關。

後來，老曾離開了工地，但我們一直保持著電話聯繫。有一次，他在電話裡又再次提到「走基層」的話題。

「現在中央正大力提倡新聞戰線要『走轉改』，看來你比他們都走在前面。」電話裡傳來他爽朗的聲音。

「什麼『走轉改』？」我沒聽明白老曾的話。

「你不知道嗎？『走轉改』就是『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這是中宣部提出來的。現在電視上天天都在播，就是說搞新聞不能高高在上、脫離實際，要到基層去走，才能改變作風和文風。」老曾又表現出了他高超的政策水準，「小張，我看這點你做得很好啊，你一直在走基層，一直紮在基層。」

聽到老曾的誇獎，我差點在電話這頭笑出聲來。這可是我──一個更像導遊而非導演的卑微小拍客從未享受過的嘉獎！不過，我除了付之一

笑外，並沒有接老曾的腔。在我的心目中，這樣的誇讚只有廟堂之上的官員或CCTV那樣的中央級媒體記者才配擁有，我這樣的一介草民加遊民實在配不上它。我本地道草根階層，從小到大都生長在底層，我不紮在基層我紮在哪裡？難道小草可以不長在泥土裡而長在半空中？

獨立紀錄片人經常要面對某些人的質疑：你們的片子裡為什麼只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小人物？你們為什麼老要背離社會的主流視野，而熱衷於關注社會的底層和邊緣？你們的片子是刻意要展現社會的陰暗面嗎？對此我同樣只能回答：對不起，我自己就是底層、邊緣和小人物，你們認識的大人物、主流高層或者社會名流離我非常遙遠。我除了經常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他們光鮮的樣子，在現實的生活中很難見到他們。偶爾見到了，我也聞不到他們的味道、觸不到他們的形體、感受不到他們的溫度。

我所拍攝的對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難與共、悲喜相連的人：我的朋友、親人、同學或者父老鄉親，他們都是像我一樣卑微而無力的人群。他們就真實地生活在我面前，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溫度、質感和形狀—甚至，他們說話時迸發的唾沫星子。

所謂的陰暗面，也只是世間真相的一部分。而陽光和陰暗，本來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既然你們成天用「大機機」展現光明，那為什麼我就不可以用「小機機」勾勒出光明背面的影子呢？這些影子正是我的生活，我不斷親眼看見它壓在和我一樣的底層人們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重印記。

我怎可對它視而不見。

第十章

巫山與巫溪

迎來送往的道路

二○一一年一月下旬，離兔年春節只有十幾天時間了，湖南境內突然降下一場被媒體稱作是「四十年來最大」的雪。一連幾天，大雪紛飛，整個世界很快就銀裝素裹，冰天雪地。早在入冬時節，高速公路主管部門就下發了預防冰雪災害的通知，雖然大家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準備，但還是沒有想到今年的這場雪來得這麼大。

項目部緊急啟動防治冰雪災害的預案，派出由楊保國率隊的巡檢人員，檢查各處災情，組織清掃成災的積雪。最嚴重的災情發生在攪拌場，一個由石棉瓦和鐵架搭成的大棚被積雪壓垮了，但幸無人員傷亡，只留下一個巨大的殘骸覆蓋在攙和著白雪的沙石上。另外，民工們的簡陋工棚也被壓倒幾處。好在因為春節臨近，大部分民工都回老家過年去了，壓垮的棚子裡並沒有住人，所以沒有什麼嚴重的損失。

這是一年當中工地上最為安靜的時刻。昔日噪雜的機械設備全部銷聲匿跡，昔日人頭湧動的工地上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白雪覆蓋了一切，整個曠野變得荒涼而空曠，甚至能聽到雪落下來的沙沙聲。

因為冰雪路滑，省道上的車流比平時要稀少很多。好久才能看到一輛車經過，當它小心翼翼地駛過時，能聽到防滑鏈與地面刮擦發出的刺耳噪音。沒有裝防滑鏈的車輛就很不幸，一路上見到了好幾起車禍。一輛大卡車停在長長的坡道下，輪胎發出陣陣空捲的轟鳴，冒出一陣陣黑煙，卻還是原地不動，最後只得無望地熄了火停下來。去往楊柳灣大橋施工工地的路上，我還經過了歐婆婆的新家——一個臨時搭建的簡易窩棚，安靜而卑微地趴在鐵道邊上的一個山坳上，倏忽而來的白雪覆蓋，加重了它的低矮和孤獨。遠遠地看起來，它像是上帝遺棄在人間的一隻破靴子。

歐婆婆一家必須在這隻「破靴子」裡熬到明年開春，才能正式搬進

他們的新家——旁邊山坡上一棟初見雛形的兩層小樓。歐安鐵已經拿到了八萬元拆遷賠償款，這段時間裡，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被用來建設這個新家。然而因為地基是片山坡，所以平整不易，他本想讓項目部派輛閒置的挖土機幫忙，但被拒絕。他只好自己幹，已經花了兩萬多塊，因此他滿面愁容。

他的新家依舊緊挨著湘黔鐵路，但位置和之前的老房子正好顛倒過來：以前是面臨鐵路，現在是背靠鐵路，一打開門，就能看到兩、三百米外的田野裡橫穿而過的高速公路，也能看到那座本來鬱鬱蔥蔥的石山，現在有一大半已被夷為平地，變成了一個大型預製場，專為鄰近的楊柳灣大橋澆築預製樑。老房子也早已拆掉了，舊址上新建了一個簡易的民工食堂。在大雪覆蓋的路上，我陸續地碰到一些正準備回家過年的民工。他們背著行李，沿著村莊的田埂緩緩而來，在馬路兩旁的積雪裡等待著巴士。天氣寒冷，他們不斷地搓著手，哈著氣。還有人使勁地跺著腳，在雪地裡留下一圈凌亂的腳印。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交談，大家都默默無言，彷彿是這突來的山河肅穆感染了他們。

我突然注意到一個等待的民工，他身穿灰色棉衣，戴著一頂破舊的棉帽子，一手提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包袱，一手拿著一把風扇——普通的台式舊風扇，鐵質的，原有的彩漆幾乎掉落殆盡，露出了裡面的斑斑鏽跡。這樣的場景難掩魔幻色彩：一個帶著風扇的人，站在冰天雪地的曠野裡，夏天和冬天在這一刻神奇地交會了，時光在他的身上呈現了雙重景象。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從夏天到冬天都沒有回過家的民工，那把可能是他從家鄉帶來的風扇，曾在暑氣炙人的窩棚裡帶給他陣陣涼爽。經過一年的勞作，在春節來臨前，他終於結算到了薪水，馬上就要和這把捨不得丟棄的舊風扇一同返回久別的故鄉。在道路的另一頭，迎接他和舊風扇的，會是什麼樣的景致和人物呢？……我思緒飄蕩，展開了聯想，覺得這樣的場面耐人尋味，像某部還沒誕生的電影中精心安排的場景。

我默默地告別了這些正要返鄉的民工，翻過一座山，到達王家坡大橋施工工地。在一片寒冷的白色之中，我突然發現有一小塊溫暖的紅色在移動。仔細一看，是一位戴著紅頭巾的女人在樁井邊勞作，頭巾和肩背上滿是白色的積雪。她哈著白色的口氣，開動著悉悉索索的捲揚機，彎

腰從樁井裡提出一桶渣土，傾倒在雪地之中。樁井邊擺著一盆炭火，正竄起紅藍相間的火苗。在勞作的間隙裡，她時不時往火盆裡添幾塊木炭，伸出戴著的濕漉漉的手套烤著火，很快一陣騰騰的熱氣從手套上冒出來。

「下這麼大雪，你們還在開工啊？」我和她打著招呼。我認出了她，她是民工田師傅的老婆。她抬起頭來，有點詫異地看著我。之前因為專注於手頭的活計，她並沒有察覺到我的到來。

「沒辦法，要過年了，我們還沒拿到工資，項目部要我們再等些天，反正閒著也不好玩，不如再挖點樁。」她靦腆地笑了笑，又低下頭去看著井底。雪花正紛紛揚揚地飄下，在風的作用下，像陣陣小旋風一樣旋轉著墜入井口，讓人疑心井底有一張正在吸氣的血盆大口。

在井底挖樁的人，是她的丈夫田師傅和他的表弟。他們來自重慶開縣，下半年才來到工地，住在小龍門中學一間廢棄的教室裡。幾個月來，他們一直還沒領到工資。馬上就要過年了，他們正在發愁如果拿不到錢該如何回去面對家人。在整個被大雪封住的冰冷工地上，他們是我碰到的唯一還在勞動的人。他們在漫天大雪中連續工作了整整三天。

三天後，雪終於徹底停了，太陽升起來，照在工地上光芒萬丈。可陽光並沒有帶給他們好運氣，從項目部傳來了不好的消息：因為業主的結算問題，他們很有可能在過年前拿不到工資。無奈之中，他們只好放棄等待，決定先回去過年，等來年開春再說。在積雪初消的省道旁，一輛巴士終於來了，田師傅他們，背著裝滿雜物的包袱，上了車。到了城裡後，他們將再次轉上火車，踏上歸家的漫漫路途。

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我不可遏止地想起半年前的夏天，在暑氣逼人的田野裡，我偶遇另外一夥重慶人逶迤到來的場景。那是老何和他的工友及家人們，同樣被這條骯髒的道路運來，同樣帶著各種行李以及對新生活的希冀。僅僅半年時光裡，這條道路迎來一撥撥人，又送走了一撥撥。在這半年時光裡，每個人究竟歷經了怎樣的心境和故事，還有些什麼樣的情感和現實呢？一定有些不為我和我的攝像機所知。

老何的新人生

轉眼間冬去春來，很快春季又到了尾聲。二○一一年五月時，我終於忙完了手頭的一些事情，決意去趟重慶看看老何和老姜。老何離開工地返回故鄉後，偶爾會給我打來電話。他現在正幫著一個朋友「做點事情」，然而當我問起他具體做什麼時，他卻有點語焉不詳。而在巫溪的老姜，他只聽說在家裡種植菸草。

我很快就買好了去宜昌的火車票。因為我聽老何和老姜說過，去他們老家均要從宜昌坐船過去。我給老何打了電話，將要去看他們的消息告訴了他。

「太好啦，小張，大半年沒見你了我們都很想你。」老何高興地說，「你先從宜昌坐船到奉節，到我家玩幾天後，我再陪你去巫溪找老姜。」

「奉節？你的家怎麼在奉節？你不是巫山人嗎？」我感到奇怪，因為老何多次跟我說過他的家在有名的巫山「大昌古鎮」，我還想這次正好可以一睹真容。「我現在搬到奉節來住了。」老何說，「就在奉節城裡。」說起「奉節城」三個字的時候，他隱隱地透露著一種驕傲感，如同他當初說起「大昌古鎮」時一樣。

「怎麼回事？你怎麼不住在巫山了？」我更加納悶了，懷疑自己聽錯了老何的重慶方言。

「你來了我再跟你說嘛，」老何沒有正面回答我，「你趕緊來吧，到時你要去巫山大昌古鎮玩我可以帶你去。」我有種預感，這段時間以來，老何身上一定發生了些還不為我所知的故事。

在宜昌火車站外，客船公司的人在舉著牌子，召集要去宜昌港坐船的人，大家坐上了他們安排的一輛巴士，一路朝碼頭開去。

過了一會，巴士拐了個彎，坐在我前面的一位中年女人突然發出了驚呼。「三峽大壩！」她伸長脖子探著頭看著窗外，好像發現了世外桃源。人們紛紛朝著她所指的方向張望，坐在巴士另一側的人甚至站立起來，彎著身子加入到張望的行列。透過窗戶，能遠遠地看到一灘不清不濁的水面，波瀾不驚，沉寂而寬廣，一道長長的灰色混凝土大壩橫躺其上──這就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電工程三峽大壩。但我們還來不及看清楚什麼，它就一閃而過，消失在疾馳不停的視線裡。

在宜昌港，我坐上了前往奉節的客船。這是一艘快艇，條件簡樸，座位陳舊，玻璃窗上一片骯髒不堪。但這並沒有影響到我的激動心情。這是我第一次坐船經過三峽。透過骯髒的窗玻璃，我看著窗外的群山和水面，感覺到這將是一趟美妙的旅行。

但我的新鮮感很快就消失不見了。窗外的景致一直平平淡淡，「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意境蕩然無存。隨著三峽大壩的建成，整個長江水面變高，兩岸原本陡峭的山嶺變得不再那麼險峻。最糟糕的是長江不再流淌，變成了一條死去的河流──不，與其說它是一條河流，還不如說它是一個大水庫。這個水庫深不見底，非常寬廣，但既看不到魚蝦，也看不到水草，只能看到水面漂浮著各種骯髒的垃圾和令人噁心的泡沫。兩岸的村莊和城市也變得平淡無奇，幾乎都有著千篇一律的嶄新而俗氣的外表，散發出輕浮而囂張的氣息。那些古老而寧靜的城市和村落，紛紛沉入了江底被泥沙掩蓋。但不包括大昌古鎮。

我想起在工地的時候，老何跟我講起大昌古鎮如何搬遷到新城的情形。

「它是整體拆遷，每一根房樑、每一塊青石板都做上了記號，運到新城再組裝起來。」記得那天工地停電，老何正在享受他難得的歇息，他坐在離工棚不遠的鐵路涵洞裡一邊乘涼一邊和我閒扯。「老南城門牆上有一棵一百多年的黃桷樹，它的根是長在城牆裡的，也要搬遷。園林局就將它的樹枝都切斷，只剩下一個樹兜兜，後來用吊車吊走，運到了新城，又重新砌進城牆裡。」老何繪聲繪色地說。我想起了中夥鋪村那棵被移走的土地樹。

「怕它死了，還給它掛上鹽水袋子補充營養，就像給一個人打吊針一樣！」老何連連驚歎，「日你媽，光是移這棵樹，就花了六十萬！你說捨不捨得花本錢！」

船很快就到了巫山。山坡上參差散落著一座新城，還有一座橫跨江面的紅色「彩虹橋」，這是巫山新城的標誌性建築。它出現在不少三峽題材的電影中，無論是賈樟柯的《三峽好人》還是章明的《巫山之春》。我還記得巫山有另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物──一座位於長江對岸的航運信號塔。它曾出現在章明的電影《巫山雲雨》裡──這部電影展現了「巫山」這座長江邊上的老城，在被淹沒之前的暗流湧動、茫然惶恐。應該是最早涉及三峽搬遷的中國電影。二○○一年我在長沙工作時，無意中看了這部電影，心有戚戚。一年後我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成為導演

章明老師的首屆研究生。

此時此刻，我終於來到了巫山，但四顧左右，除了看到了新城和彩虹橋，老城和信號塔早已不見蹤影。時代的發展浪潮如大壩截留後的長江水面，迅速地淹沒了過往的一切。

在客船上，我還意外地遇見了一位家在奉節的「同行」，他就坐在我的後座，名叫張義，也來自北京。見我一路上都拿著小DV在拍攝，有著很強職業敏感的張義饒有興趣地觀察著我。

「你在拍攝什麼呢？」終於他湊過來跟我搭腔。

「就是拍拍風景，瞎拍。」

「但我看你拍攝的架勢和普通的遊客不一樣，」他好奇地說，「我猜你八成也是搞紀錄片的吧。」

得到了我的確認後，他有一種找到同行的驚喜：「我也是拍紀錄片的，我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

我有點吃驚。真沒想到在這艘普通的客船上還能碰到一位北京來的「同行」。不過，我知道，他可不像我這個打鐵匠似的「小拍客」，他來自大名鼎鼎的「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

這是中國唯一生產新聞紀錄影片的官方專業機構，其前身是成立一九三八年的「延安電影團」—這是中共成立的第一個電影機構，當時還得到了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贈送的攝像機，由此開始了黨的政治宣傳片（當然黨還是叫它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中央新影」成立以來，攝製了大量中共歷史上最重要、最具文獻價值的電影紀錄片，包括毛在內的許多黨的領導人的影像都是由它攝製。目前，它仍承擔著黨和國家重大時政活動資料的膠片拍攝及保存任務，是名符其實的中共歷史檔案庫。

張義正參與拍攝一部大型文獻紀錄電影《中國三峽》，他擔綱製片和攝像。《中國三峽》由中國國務院三峽辦公室、湖北省人民政府、重慶市人民政府、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國家電網公司、中央新影集團聯合投資攝製，是中共九十周年誕辰的「獻禮大片」。我後來在「中央新影」的官網上，看到了對這部影片的介紹：

《中國三峽》是全球首部全景式反映三峽工程的官方電影……該片

從人文高度、哲學深度、客觀角度、公正尺度、大國氣度，展示了共和國幾代領導人對三峽工程建設的親切關懷與英明決策，展示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和強大凝聚力，展示了三峽工程廣大建設者、移民工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奉獻精神，展示了三峽庫區經濟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和變化。

在聊天中，張義又問我：「你拍過什麼片子？」

「我就是瞎拍的，上不了檯面的小片子，都不好意思說出名字來。」我沒正面回答他，因為我知道，我這個「拍紀錄片的」和他這個「拍紀錄片的」完全不一樣，我們的「紀錄片」也有著天壤之別。

這時，遠遠地，我看見前方的峭壁上突然漫起一陣黃褐色的煙霧，籠罩在江面一側，還隱隱聽到沉悶的嗡嗡聲傳來。原來前面出現大規模的塌方！峭壁崩裂，大面積的土石沿著山壁迅疾墜落，砸在水面上，濺起一陣水霧。水霧和煙塵混合在一起，驚心動魄，讓人疑心整座山都會在瞬間脆弱地塌陷在長江裡。

乘客們紛紛興奮地湊到船的一側來張望，大聲驚呼。客船被迫減速，小心翼翼地繞過塌方的河岸。我本能得用小DV錄下了這個場景，回頭一看，張義正在看著窗外，神情漠然。我不知他在想些什麼，但我能肯定的是，這樣的場景永遠也不會出現在獻禮大片《中國三峽》裡。

張義是三峽人，在介紹《中國三峽》的網頁上，他親自撰文一篇，表達了自己參與拍攝而生出的自豪之情：

我生在三峽，長在三峽，並見證了三峽水利工程的建設。在三峽工程即將竣工之際，我擔任了大型文獻紀錄電影《中國三峽》劇組製片工作，因此我感到無比的榮幸和自豪。

他還就自己的拍攝見聞發出了感慨：

在歷時幾年的拍攝中，涉及三峽工程的建設、移民搬遷、航運和發電方面，我們都作了非常細緻的採訪，但最讓我感動的是百萬移民的搬遷。移民問題是世界性難題，這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實現不了的，但就是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夠實現百萬移民的搬遷和安置，這充分體現我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確實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實現百萬移民的搬遷，並為了宏大遠景犧牲微弱的個人。在三峽行船，你會不斷看到山崖上立著的巨大灰色水泥牌──足有一間屋子那麼大，像一堵牆壁。上面用紅色漆著大大的「175M」。那是大壩蓄水後庫區的最高水位──將淹沒掉陸地約六百三十二平方公里，耕地和園地三十六萬畝，房屋三千四百七十三多萬平方米。一百三十多萬世代生活於此的民眾必須背井離鄉，移民異地，這其中，一定掩藏著無數回腸蕩氣、具體而微的故事。然而在官方宣傳文字裡，完全聽不到另一種聲音：因為在環保、地質、氣候、航運、移民、國家安全等方面帶來的危害，以及工程本身的弊案叢生，這個水壩也備受爭議、飽受詬病。這一切全部被消音了，在高速而瘋狂的發展中，只剩下赤裸而無恥的讚美。以及，一部謳歌它的宏大的獻禮大片，在打著紀錄片的名號並配上四句響亮的宣傳詞：

一個寄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
一項凝聚幾代偉人心血汗水的世紀工程
一首謳歌百萬移民愛國奉獻的時代讚歌
一部詮釋中華民族治水興利的宏大史詩

船駛到白帝城時，奉節就快到了。「朝辭白帝彩雲間」的「白帝城」雖然有幸沒有拆遷，但也被升起的長江水淹得像一座孤島，僅露出小小的一角，早已失去了曾經的氣勢和意境。在下午，客船駛進奉節──一座異地重建的嶄新奉節城，有著兩千三百多年歷史的老城已沉在江底。

仰頭便看見老何遠遠地站在碼頭邊的階梯上，他背後的河岸上，矗立著一塊巨大的宣傳看板：

全民会战森林工程，建设高峡平湖中的园林城市

我停下腳步，舉起手中的DV拍攝著老何──和客船上遭遇到的那場塌方一樣，他同樣是不能出現在光鮮的國家鏡頭裡的「景致」，但對於我的小DV來說，他是一個倍感親切的老朋友。在我拍攝老何的時候，我的「記錄片同行」從身邊大步經過，他面帶優雅的笑容看著我，和我揮了揮手，就此別過──儘管我們「有緣修得同船渡」，但最終必然會是這

樣各奔東西，形同陌路。

「歡迎你來到我們奉節！」老何微笑著走到我的面前，禮貌地和我握手。他的歡迎詞有著標準的官方色彩，讓我一時產生了錯覺：彷彿他不是我的老友，而是代表這座「高峽平湖中的園林城市」的官員；抑或，我並不是一位帶著「小機機」的獨立拍客，而是一名中央派來奉節取景的《中國三峽》劇組成員。

我吃驚地發現，老何的外表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他穿著一件潔白的襯衫、筆挺的深色西褲，腳下是一雙錚亮的黑色皮鞋。他的皮膚也白皙了不少，頭髮卻烏黑發亮，梳得一絲不苟，看起來「洋氣」和年輕了不少。除了鼻樑上的金絲邊眼鏡，他身上的一切彷彿都是嶄新的，和他身後的這座新城一樣。

「哎喲，老何，你怎麼變得這麼帥了？」我一邊握手一邊驚歎。看慣了他在工地上沾泥帶土的勞動者形象，我對他現在這副「洗腳進城」的城市人形象頗感意外。

「帥嗎？」老何露出了他的銀色假牙。這倒是熟悉而久違的笑容。

「真的，你看起來年輕了很多，頭髮好像也比以前要黑了不少。」

「那是因為我染了頭髮。」老何毫不掩飾他年輕的祕密，坦誠地告訴我，「我的白頭髮越來越多了。」

我們翻過長長的階梯，朝著時而舒緩、時而陡峭的坡道走去。「我的家就在碼頭後面不遠，我們就走路過去算了。」他指著坡道後面的樓房說。如同長江兩岸邊的其他城市，奉節新城也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城市，彷彿有著永遠也爬不完的坡道，建築物鱗次櫛比卻大同小異。

「嗨，老何，你還沒告訴我，你怎麼將家搬到奉節來了？」我開宗明義地問。

「這邊是我的新家，巫山是我的老家，我有兩個家嘛。」 老何神祕地笑了笑，壓低了聲音說，「我剛在這裡找了一個新老婆，她就是奉節人。」

「哦，這樣啊。」我並沒有很吃驚。在工地上，他曾向我提起過他和老婆的關係一直不太好，很長時間兩人都沒有生活在一起。

「我現在的這個老婆比我要年輕十多歲，整整十四歲。」老何又笑了起來，「我好多年前就認識她，沒想到現在她跟著我了，想想真是緣分啊。」

他停下了腳步，掏出手機伸到我面前，他按了一下按鍵，螢幕頓時

亮了起來，手機桌面是個中年女人的照片。她人有點微胖，站在一株叫不出名的花樹下，憨厚地笑著。

「看！這就是我的新老婆！長得還不錯吧，尤其蠻有氣質的，你一會就會見到。」老何的語氣掩飾不住他的興奮和驕傲。我看著老何染黑的頭髮，馬上領會了他為何變得如此年輕。我意識到老何的愛情故事還有很多豐富情節有待展開。

老何不但有了新的愛情，也有了新的工作。他整個人幾乎都是全新的了。「老何，你說你現在在給一個朋友做事，具體是做什麼事？」

「我有個朋友，湖北十堰人，他投資幾百萬開了一家民俗博物館，需要收集各種民俗文物，我就給他幫忙到處去搜羅。」

「反正這比挖椿要好嘛，輕鬆，來錢快。」老何對著我笑。說起昔日的挖椿經歷，他馬上露出了心有餘悸的神情。「哎呀，在你們湖南挖椿真是將我搞怕囉，狗日的龍老闆！」他狠狠地罵了一聲，但馬上就打住了。我以為老何會問起我工地上的情況，但他似乎已經把工地遺忘了。

步行大概一刻鐘，老何帶我走進了一個住宅社區。這是一個廉價的移民社區，建築物身上帶著明顯的「加速重建」的印記，品質低劣而粗糙，周邊環境糟糕，樓與樓隔得太近，空地狹窄，林木稀疏，樓道裡到處貼著「裝修」、「搬家」、「開鎖」和「金屬護欄」的小廣告。在失去古老家園之後，從老城遷來的小市民被政府統一安排住進這裡。所謂的「園林城市」目前分明只是一句口號，抑或是人們心中的夢想。因為這座高峽平湖中的新城就是由無數個這樣的移民社區組成的，如同無數個這樣的新城組成了日新月異的中國。

老何的「新老婆」是奉節鄉下人，所以他們兩人只能租房而居，每月租金五百元。房間逼仄，臥室和客廳合二為一，屋內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家具，一切都很簡陋，甚至有點寒磣。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間屋裡有位讓老何恢復年輕的女主人。他向我隆重地介紹他的「新老婆」：照片中那位身材胖胖的中年女人，比老何要高出整整一個頭。

「我早就聽老何講起過你，他經常小張小張地說個不停。」她熱情地端上茶水，顯得爽朗而賢慧。

我「順從」了老何留我吃晚飯的盛情。他的「新老婆」麻利地圍上圍裙，閃身進了廚房，老何在一旁樂呵呵地打著幫手。儘管大環境難免滄桑巨變，個體的命運也動蕩不安，但總有一刻，人們會回到自己的蝸

居裡，放下滿身的疲倦和無助，和自己的家人相濡以沫，互相溫暖。天色暗下來，昏黃的燈光下，這個移民社區裡的簡陋之「家」散發出祥和安寧的氣息。

老姜的舊生活

第二天清早，我和老何在奉節碼頭後的汽車站碰面，一同坐上了去往巫溪縣的巴士。老何腋下夾著一個褐色的公文皮包，看起來像一個正要下鄉的鄉幹部，或者去收賬的小商人。

「我記得老姜家老漢有個老菸筒還不錯，我原來見過，不過那時候沒想到要收集。」老漢是重慶方言，就是父親。老何的兩眼放著光，這樣的光芒於我很陌生，是挖棒人老何的眼睛裡從來沒有的東西。

經過數小時翻山越嶺，巴士終於來到了巫溪縣城。與奉節不同，巫溪縣城完全深藏在大山裡，位於四面環山的一塊狹窄平地上。當我們翻過大巴山的一個豁口，在順著盤山公路一路迴旋而下時，就會時不時看到。在臨近縣城前，窗外出現一處風景秀麗的山谷，聳立著鷹嘴形狀的山崖，散落著三三兩兩的農舍，一律白牆青瓦，散發出難得一見的典雅氣息。

「這是新農村建設，薄熙來書記來重慶後搞的。」老何像個導遊。此時正是薄熙來主政重慶。「房子外面的裝修都是政府出錢搞的，老百姓不要花一分錢，但不能亂建房子，要符合政府規定的式樣。」

「是不是只有在旅遊景點和交通要道才這麼做？」我小心翼翼地問。我注意到之前在車上看到的道路兩側的農村不是這樣。

「是的，現在還只是試點嘛。」老何沒有察覺到我的質疑，繼續自豪地說，「我覺得這樣對於改善農村的髒亂差形象很有幫助，薄書記來我們重慶後做了不少有魄力的事情。」

我沒有接老何的腔。我知道他崇拜薄熙來，而他對新農村建設的評語，也全然是官方宣傳的翻版。他還不知道，這位魄力十足的重慶新「領袖」，已經因為其運動式的治理手段在法律界引起了不少爭議。但我沒打算跟老何說起這個。

在巫溪縣城，老姜的大兒子在等待我們。他有著魁梧的身材和寬厚的臉龐，和父親以及他弟弟小姜都長得不太一樣。他將在一個星期後結婚，正好和未婚妻來縣城購置婚禮用品。接到我們後，他開著摩托載著未婚妻在前面帶路，我和老何租了一輛出租车在後跟著他走。車輛開上了與來時方向相反的一條馬路，駛離縣城後，道路越來越狹窄和曲折，兩邊的山越來越高深，路上的車也越來越少，除了偶爾能看到一兩輛摩托車外，再看不到其它的汽車了。幸虧老姜派大兒子來接我們，要不我真不知道怎麼才能找到他的家。「那是真正的高山上，山窩窩裡。」老何說。

又是一陣翻山越嶺，不斷地上山，上山。下起了毛毛小雨，道路變得濕漉漉的。摩托車和出租車都開得小心翼翼。終於我們看到，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散落在高山上的一個山坳裡。幾乎都是破舊的土房子，外牆袒露著黃土的原貌。顯然「新農村建設」的春風並沒有吹拂到這塊偏僻之地。摩托車在其中一棟低矮的單層土房子前停了下來。老姜站在門口迎接我們。除了人稍微瘦了點，他還是一副工地上的樣子。頭髮好久沒剪了，顯得亂蓬蓬的，身上一件髒兮兮的舊夾克，就是工地上常穿的那件，腳上一雙橡膠套鞋沾滿了新鮮的泥土。看著我們下車，老姜迎過來，憨厚拘謹地笑著。

「老姜，你的傷沒事了吧？」我問他。

「沒事了。」

「可以幹活了？」

「一般的活沒關係，我剛從山後挖土回來，明天本來打算栽菸草，但現在下雨了。」

「你家還種植菸草嗎？你不是說要去菸草收購站工作的？」

「哦，那個事後來沒搞成。」

廳房裡一片昏暗，老姜給我們去倒茶。像大多數貧窮的鄉村家庭一樣，室內只亮著一盞度數很低的燈泡，發著昏黃的光。顯然，號稱「建成後能照亮大半個中國」的三峽工程，並沒有將光明惠及這個荒涼的小山村。三峽工程的電也並沒有照亮半個中國，有數據顯示，目前三峽工程的發電量只達到全國發電量的百分之三點多。它更沒有像政府當年所承諾的那樣，為民眾、特別是被涉及區域的居民提供「廉價」的電力。像中國許多領域的經濟改革一樣，民眾承擔改革的成本，改革所創造的

收入卻流入利益集團的口袋。

進去了好一會後，我才勉強看清室內的一切：坑坑窪窪的泥土地面，擺放著一張木頭桌子和幾條凳子，漆黑的牆壁上掛著鐮刀鋤頭等農具，房樑上掛著好多煙薰火燎的臘肉。門口釘著一塊門牌，寫著「通城鄉團包村」字樣。

「老姜，將你老漢的菸筒拿來看看。」我們剛一落座，敬業的老何就嚷嚷著開始了他的工作。

老姜從裡屋拿出一個菸筒，半米長，竹竿做的，烏黑發亮，鑲著黃銅嘴子，看起來有點年頭。

「哦，這樣的，這可值不了多少錢，這樣的東西市面上太多了。」老何儼然一副生意人的口氣，停頓了一下。「你看出多少錢賣給我算了？」

「這個賣不了，值不值錢都不賣。因為這是我爺爺留下來的，我家老漢還在用它。」老姜父親今年七十多歲，剛從外面幹活回來，一副沉默寡言的樣子，我跟他打招呼時，他只微笑地點了點頭。

老何覺得有點失望，又話題一轉：「你家好像還有幾個古銅錢吧，也拿來給我看看嘛。正好我帶來了一個好東西，可以給你測測。」

他從皮包裡拿出一個像手機一樣的儀器，「這是我那個湖北做館長的朋友送給我的，可別小看這東西，它可是個古幣的照妖鏡，真的假的它一測就知道。」老姜又進到裡屋，拿出幾枚古幣。老何先用手掂量了一下，將其中一枚古錢放在儀器上，顯示幕上立刻出現一串數字。

「二十五點三克。」老何讀出聲。原來這是一個電子計重器。他又從皮包裡翻出一張紙仔細地看著。我湊過去一看，原來是張「歷代錢幣重量與價格表」，表格內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數字。

「假的，」老何斬釘截鐵地說，「超重了！真的應該只有十五到二十克。」

老何的古玩鑒定告一段落後，我提出去山後看看菸草地。「不如明天再去看了，今天下雨路滑。」老姜說，「如果明天雨停了，我們一家人都會去種植菸草，還有好幾個親戚也要過來幫忙。」

暮色四合，天很快就黑了下來，雨越下越大，山谷裡一片淅淅瀝瀝，寒氣逼人。當初我以為能到最近的鎮上住宿，盡量不要麻煩老姜，但沒想到這裡如此偏僻，連開往山外的巴士都沒有，最後只好留宿在山上。晚飯後，老姜將我和老何帶到他的親戚家借宿。這是一棟條件較好

的磚房，主人是一對年輕夫妻，熱情而好客。將我和老何安排進一間有著兩張床的臥房。

「小張，明天我們下山去巫山吧，待在這裡真是無聊。」老何半躺在床上。

「明天恐怕不行，我想看看老姜他們種菸草。」

「種菸草有什麼看的？我帶你去看我們的大昌古鎮，那裡不像這個鬼地方，山窩窩，又偏僻又窮得出奇。」老何的話語間充滿了不屑，我不太懂他怎麼突然抱怨起來，或許和他收購古玩的計劃受挫有關。

「那你上午趕緊拍一下，我們下午就下山。」

「看明天拍攝情況吧。」我只能這麼說，「先睡覺，明天再見機行事。」正當我倒頭睡覺時，老何在被窩裡和他的「新老婆」煲起了電話粥。

「日你媽，這山窩窩裡太冷了，凍得老子要死。」我終於重新聽到老何說出了這句熟悉的口頭禪。自從我見他後，一直沒聽到他說過，還以為他早已經捨棄了這句「經典台詞」。他們倆拉拉扯扯地聊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鐘，一片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樣子，完全置我這個旁人於不顧。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一點都不相信打電話的人是一位快六十歲的老者。

看來「黃昏戀」委實有著神奇效果，這真讓我這個未老先衰的晚輩羨慕。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鳥鳴一片，山谷裡滿目青翠，空氣中充滿著泥土和草木的清新。遠處的山頭上雲霧繚繞，恍若仙境。

俗世的生活卻充滿艱辛。老姜一家開始了勞作，幾個遠房親戚也早早趕過來幫忙。他們從苗圃裡移出二十來公分高的菸苗，揹了滿滿的一背簍，去山後田地裡種栽。道路狹窄而崎嶇，我走在老姜身後，他揹著不少菸苗，小心翼翼地彎腰行走，不一會便聽到他氣喘噓噓。我不由地想起他在工地上受傷的肋骨。

菸田是一塊在舒緩的斜坡上開墾出來的空地。兩邊是起伏的叢林，下面則是一道石崖，而對面是重重疊疊連綿起伏的山巒，看不到盡頭。老姜指點著不遠處的山巒說，「這邊就是陝西，那邊就是湖北，我們這裡屬於重慶、陝西、湖北三省交界處。」大家心照不宣地開始了分工，

老姜用鋤頭分壟，挖坑，姜爸爸和幾個親戚將菸苗攙和著肥料栽到地裡，而大兒子背著噴霧器給菸苗灑水。在整個過程中，大家不斷地開著玩笑，一片歡聲笑語。好像艱辛並不存在。

這片菸田是他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這片崇山峻嶺空氣清新，氣候偏寒，非常適合種植菸草。當地百分之七十多的農戶也都以種植菸草維生。每到春天，當地的菸草站就會給他們發下菸種，大家開始培植菸苗，等到夏天，大家將成熟的菸葉收割回家，再放進烤菸房烘乾。這個時候菸草站再派人來檢驗、收購菸葉，隨同而來的大卡車挨家挨戶地收走煙農們種植的菸葉。經過菸草工廠的加工包裝，這些出自老姜和鄉親們之手的菸葉，可能就會搖身一變為身價倍增的高價煙和「特供品」。

「我們這裡沒別的活路，山區，太偏僻了。」老姜對我解釋說。他停下了挖土，拄著鋤頭，從兜裡掏出一包菸，點燃了一根抽著。他抽的菸叫「龍鳳呈祥」，是本地產的廉價菸，每包只要五塊錢。不夠「特供品」天價菸一支的價錢。

巫溪縣位於重慶最東部，東鄰湖北，南依長江，北傍陝西。到重慶市坐車要近十個小時。全縣總人口五十多萬，其中農村人口就占到四十六萬多。它是典型的山區農業縣，山地占整個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三。

「絕大部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四十歲以下的，留在家裡的很少。」老姜歎了口氣，「沒有誰願意留在家嘛，手上連個零花錢都難得有。」他的妻子也在四年前去了廣東打工，從此就再也沒有回過家。他的二個兒子也都在廣東沿海的建築工地打工。大兒子早兩年才返鄉，在縣城的建築工地幹活。小兒子依然留在廣東東莞。

「種植菸草的收入怎麼樣？老姜。」

「還可以，要是種好了，一年也有上萬塊的收入。」老姜回答我。他所說的「種好了」，指的是菸葉收成。菸葉烘乾後要「分級紮把」，由菸草站的人檢測把關，最高級別能賣到九塊六一斤，而最低價只有四、五塊錢一斤。「不過現在評級也要看關係，和收購員關係好的，就可以級別評高點。」老姜重新拿起鋤頭，在田裡劃出一道道筆直的壟坑。

我問老姜累不累？他笑了一下說這個不累。「累的是採收旺季的時候，收割、烤菸和分級紮把都很累，那是一門技術活，每天只能睡四個多小時。那時候正是最熱的夏天，人在烤菸房裡火燎煙熏的，身上都沒一處乾爽的地方。」他緊接著用了一個比喻，「就像烤臘肉一樣。」似

乎覺得這個比喻很道地，他笑了起來。

但我聽了這個比喻，心裡有點難受。我沒有再追問他，拎著攝像機去田邊獨自轉悠。無意中在那裡發現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重慶市『兩翼』農戶萬元工程到戶明白卡」。戶主一欄寫的正是老姜的名字，後面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家庭人數、家庭地址、耕地面積、年收入，以及叫「李益 石思斌」的兩個「幫扶責任人」。「增收金額」一欄則是空缺著，沒有寫上任何數字。這塊牌子的最底下，是一行醒目的黑體字：

拨打12316，帮你增收入；致富要持久，拨打12396。
—巫溪县万元增收办公室

很顯然，這是正在巫溪縣乃至整個重慶市推廣的某項「扶貧」工程。但在這塊牌子裡，一切都簡化成了乾巴巴的數字和政府自吹自擂的口號，我們一點都看不出那種「烤臘肉」的感覺和境況。

吃中飯的時候，老何剛從村裡收集了一捆土布回來—他在我拍攝老姜栽植菸苗之際，獨自在村裡四處搜寶，終於滿載而歸，看起來興致很高。

「這個在我們搞文物的叫做『家織布』，是上頭那個老太婆用木架子織成的，我朋友的博物館正需要這東西。」老何樂呵呵地秀出他的「戰利品」。這個正在脫離土地的農民，正努力追求一種和老姜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共同經歷一次黑色的打工經歷之後，兩個民工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老何奮不顧身地「洗腳進城」，老姜卻重新面對荒蕪的土地。

「小張，我們下午就下山吧，再待在這鬼地方也沒啥玩頭，我帶你去大昌古城玩。然後我們再回奉節，我帶你去看白帝城。」老何又催促著我，他用著不恭的詞語，流露出對農村生活的厭倦和不屑，全然不顧老姜就在旁邊。但我決心再住一天。因為老姜告訴我，他老婆和小兒子明天就要回來。因為大兒子要結婚了，在東莞打工的小兒子特意去找到了多年未見的媽媽，她終於答應回來參加長子的婚禮。

「那她回來後還去廣東嗎？」我問老姜。

「那不知道，隨便她。」老姜淡淡地說。

「老姜你就是太老實了，你老婆一定在外面有人了。要是我的話，她回來老子就絕不讓她出去了，她敢出去老子就打斷她的腿！」老何替老姜憤憤不平。

老姜沉默著，尷尬地笑了笑。

中午的時候，我們坐在廳房裡，聽到外面由遠及近響起了三輪車突突的聲音。老姜有點局促不安，但他仍然坐在矮凳上沒有動。我和老何走到門外，遠遠地看到三輪車回來了，貨廂裡坐著一個年輕人和一個身材胖胖的中年女人。

「老姜你老婆回來了，你出來，你怕啥子嘛。」老何扭頭朝屋內喊著。老姜有點忐忑地站起來，走到門口，還是一言不發。

三輪車在門前停下，小兒子姜偉一邊和我打著招呼，一邊往車廂外搬著行李。中年女人也在搬東西，她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很快就將東西搬進屋去了。經過老姜身邊時，兩人並沒有任何形式的示意，除了老姜的神色稍微有點不自然外，這兩個人就好像根本沒有看見一般。我暗暗覺得驚訝，沒料到這對分別四年夫妻的再次重逢，卻以這麼一種彼此無視的方式。這種彼此無視一直在延續。天黑了下來，一家人圍坐到一起吃晚飯，老姜坐在桌子的這一頭，他的老婆坐在另一頭，彼此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彷彿這張簡陋的桌子是人世間最遠的距離。

飯後，這位中年女人與我和老何拉起了家常。她終於露出了截然不同於老姜的外向而開朗的性格。她在廣東中山的一家高檔家具廠工作，先是做了三個月的普通員工，後來被提升為車間總管，「我就是戴上手套，用一塊布從油桶裡沾上油，刷到家具上。」她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每月工資兩千五百元，但如果加班的話，還有雙倍薪酬的加班費。

「總比在家裡好吧，像我們這麼大年紀的人，在家裡哪能這麼輕鬆賺到這麼多錢。」她感慨地說。老姜在一邊收拾桌子，他的動作變得有點遲鈍，但屋子裡光線太暗，我看不出他的表情。

「在家裡種菸，不是也能掙點錢嗎？」我說。

「掙是能掙到一點，但多辛苦啊。割完菸葉之後，還要上炕烤菸，分級紮把。哎呦，別提有多辛苦了。你要是夏天來就會看到。我就是以前在家種菸搞怕了，一說起種菸的事情，頭就痛！」她歎了口氣，搖了

搖頭，露出了心有餘悸的表情。「況且，現在再要我回來幹農活，也不熟絡了。我今天回來走那山路，就歇了好幾陣。好幾年沒有走過山路，一點不習慣了，在那邊都是走的大馬路。」

某種程度上，她和「洗腳進城」的老何成了一路人。已經不適應這個「還能有什麼變化，就是個窮山窩窩」的「鬼地方」。次日，我繼續拍攝老姜一家子種菸的場景。老姜的老婆也來到田裡幫忙，她彎下肥胖的身軀，用手往土裡栽種著一兜兜的菸葉，姿態略顯艱難而笨拙──畢竟她背離了泥土的家園達四年之久。她時不時直起身來，叉著腰歇息一會，用沾滿泥土的手背抹著額頭上的汗珠，有點茫然地看著遠山深處，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些什麼。

早上的時候，老姜就告訴了我們，昨天晚上他和他老婆並沒有同住在一起，他老婆去了一位鄰居家借宿。很明顯，滋生在兩人心裡的這種無形裂痕在擴大，隨著時間的累積，消除的希望將越來越渺茫。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老姜好。下午的時候，我決意離開。我留下了一個慶賀老姜大兒子結婚的紅包，祝他新婚快樂，白頭偕老。我也叮囑了老姜要注意身體，然後告別了他。小兒子騎摩托載著老何和我下山。摩托一路飛奔，耳畔掠過涼爽的山風，蒼翠的大山快速地後退，偶爾能看到道路兩旁正在栽種菸葉的山民。不知他們又和自己的土地之間有著怎樣的故事。

老何的新人生（二）

鎮上並沒有直通老何老家大昌古鎮的巴士。我們租了輛農用皮卡車，又繼續向另一側的大山開去。農用車沿著盤山公路一路前行，幾經輾轉，終於到了老何的老家。

讓我非常吃驚的是，這裡並不是老何引以為傲的「我們大昌古鎮」，而只是個叫做「龍塘村」的小山村。它位於一條乾涸的河道末尾，幾乎是四面環山。與老姜的家鄉比起來，除了地勢要低一些外，也幾乎是一樣的偏僻和貧窮。且同樣除了老人和孩子，村裡幾乎看不到什麼年輕人。老何的磚房子在一片田野中央，門前不遠就是那條幾乎乾涸的河道。河床上已經被農民開墾出不少菜地，種植著各種蔬菜。

「老何，你不是說你家在大昌古鎮嗎？」我奇怪地問。

「我們這個村就是屬於大昌鎮的嘛，」老何指著山那邊說道，「鎮上就在那邊，明天我就帶你去玩嘛。」

老何家裡大門緊鎖，空無一人。他年邁的父母住在另一棟土磚老房子裡，他的兩個兒子出去打工了，老婆則長年住在外嫁的女兒那裡。老何將大門打開，帶我參觀了他的家──不，你可以說，這是個粗糙簡陋、雜亂堆放的小型私人博物館。地上凌亂地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古玩，有各種瓷器、陶器，以及擺在桌頭的筆筒和佛像，更有半個人高的彩繪花瓶。牆上還掛著一些字畫。老何一一介紹這些寶貝的來歷和年代。

「看，這個是明代的青花罐，我從重慶收來的。」他的語氣裡充滿了驕傲，彷彿他在介紹大昌古鎮，卻更加底氣十足。這一刻，他儼然是一位家財萬貫的大財主，而他深藏在山裡的這間小屋，則是一座價值連城的寶庫。

不過，我很快就發現。他收藏的這些玩意兒大多做工粗糙，品質低劣，散發出一股子掩飾不住的新時代氣息：浮躁，輕浮，八成是仿舊的贗品。現在，我覺得老何的私人博物館很可能是一座贗品博物館。

「這是清朝的瓷板畫，是我花了七千元收來的，是我的鎮館之寶。」老何指著掛在牆上的幾塊雕花木窗，窗櫺裡各鑲嵌著一塊光潔的瓷板，上面分別彩繪著松竹梅蘭。老何用了「鎮館之寶」這個詞，和我做出的有關「私人博物館」的判斷並沒有太大偏差。

「清朝有瓷板畫這種工藝嗎？」我心生懷疑，這件鎮館之寶的形狀和氣質都不倫不類：雕花窗櫺明顯是仿古做舊的，但瓷板質地卻嶄新而光潔，彩繪畫也異常豔麗和工整，一看就是出自工業生產線上的印刷品，與一般建材市場裡的花瓷板沒有什麼兩樣。

「有的，但比較稀少，它是手工彩繪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都極高。」老何說，「有人出兩萬塊我都沒有賣。」

我趕緊憋住了本來想講的話，不忍心破滅老何的發財夢。但看著老何將自己辛苦賺來的一點血汗錢投資到這些亂七八糟的財富計劃上時，難免感慨萬千。

中午，我們在老何父母家吃中飯，老何的弟弟也來了。吃飯時，老何一直在教訓他，訓斥他腦子不靈活，只知道待在家裡守著幾塊田地沒出息。「你如果好好跟著我幹的話，我保證你比種田有出息多了。到時我跟我那位館長朋友說說，也算你加入進來。」老何的音調越說越高，

「我何澤福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問問小張看看，人家北京來的導演，也都將我當朋友，還特意從北京來看我。」老何突然將話題指向了我，並充滿期待地等待著我的呼應。我只好笑著點了點頭。他弟弟一直一聲不吭。這樣的場景，看起來好像一位大學教授正在給他愚笨的研究生上課。

吃完飯，老何要去另一個村莊收集一件古玩。據說是一件祖傳的清代水菸袋。而抵達那個村莊，依舊要翻越一座山。

「要爬一座大山喲，你行不行？」老何看了我一眼。

「當然沒問題。」

我知道其實他很想我陪他去，因為路途遙遠，他一個人走著會很無聊。老何家的大黃狗不知什麼時候跟來了，老何不斷地呵斥著要它回去，但它執意要跟著我們，老何只好帶上了它。我們的隊伍就變成了「三人行」。山坡上是一片密不透風的灌木叢，荊棘叢生，好多地方連路都沒有，老何艱難地在前邊開路，鋒利的棘刺經常掛在他的褲腳和衣服上，他只好時不時停下來，小心翼翼地用手將荊棘挑開，狼狽地往額頭上抹了一把汗。他的白襯衣後背上也汗濕一片。

「早知我就從家裡帶把柴刀來好了，這樣我就可以砍出一條路。」老何說，「這些年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柴沒人砍了。這條路就廢棄了。」

在路上，我們還碰到了一條大黑蛇，足有小孩手臂粗，盤踞在不遠處一棵樹下，昂著頭一動不動地看著我們，將老何和我嚇了一大跳。老何趕緊帶著我遠遠地繞過了它。大黃狗卻毫不示弱地衝過去，隔著兩米來遠的距離朝著那條蛇狂吠著。在老何的嚴厲訓斥下，它才善罷甘休地放過了那條蛇，又悻悻地跑過來跟我們會合。

「你這傢伙，還很勇敢嘛。要是蛇咬了你怎麼辦啊？」老何彎著腰，撫摸著大黃狗的頭，慈愛地說。好像牠並不是一條狗，而是他少不更事的莽撞孩子。

「牠叫什麼名字？」我問老何。

「哪個？哪個叫什麼名字？」我指了指大黃狗，他才明白過來。「哦，狗啊，狗就叫狗嘛。」老何說，「那還能叫啥子呢？」

我立刻意識到自己的提問是多麼幼稚。這裡只是重慶的偏僻山區，

並非光怪陸離的城裡。在這裡，狗就是狗，牠可能一輩子不會擁有主人給牠取的那些亂七八糟的名字，也不會有寵物狗才會有的那些花哨的人造狗糧和玩具。牠們的一輩子單純而短暫，有時候僅僅就是跟著主人，歡樂地爬過幾道荊棘密佈的山樑，朝另外的小動物吠幾聲……就這樣過完了牠們沒有名字的一生。就像黑皮，儘管因為修路者的到來，牠難得地獲得了一個名字，但牠的一生仍然只是一條鄉下狗的一生。我想起有一次，我特意從北京的超市裡給黑皮買了一包牛肉味的狗糧，它呈暗褐色，有著奇怪的長條捲筒狀，我將它帶去中夥鋪，丟在黑皮面前，牠用鼻子湊近去聞了聞，走開了。在牠的眼裡，這些造型奇特、氣味怪異的玩意兒，或許跟一根草叢裡的枯枝差不多。

我們終於翻過山坡，來到一道山樑上。視野頓時開闊起來，斜坡上開墾出一塊塊菜地，種滿了玉米、土豆、麥子和其它莊稼，一片生機勃勃。間或有零散的村舍點綴其間。一些村民正在彎腰勞作，看見老何過來，親切地打著招呼，並好奇地打量著手拎攝像機的我。

「他是幹嘛的？」一個村民問。

「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北京來的，特意來看我。」老何自豪地介紹。

「北京來的啊，你們怎麼認識的？」村民更加好奇了。

「在湖南挖樁的時候他過來採訪我，就這樣我們成了好朋友。」

「哦，你們去幹啥子嘛？」

「我去那邊村子裡收件老東西，他嘛，就跟著要拍我。」

「哦，聽說你現在混得蠻好的嘛。」

「馬馬虎虎吧。」老何看似謙虛的口氣裡暗藏著隱隱的驕傲。他咧嘴笑了笑，用手指撣了撣白襯衣上粘住的幾顆蒼耳。他依然穿著那件白得耀眼的短袖襯衫，自從我在奉節碼頭上見到他後就沒有換過。無論去老姜的山窩窩裡，還是回到自己的村莊，他都穿著它。它彷彿老朱身上的那件舊公安制服，已經成了主人的一個新標誌──對於老何來說，這標誌著他洗腳進城的決心，以及衣錦還鄉的夢想。

「衣錦還鄉」的老何今天的心情非常好，他一路上還時不時跟我開著玩笑。

「小張你看，毛澤東，江澤民，接下來就是我何澤福了。」

「什麼？」當老何突然將自己和兩位前國家領導人並置一起時，我沒明白他的邏輯。

「我們都是澤字輩的嘛。」他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跟著笑起來。這種出自底層的「無厘頭幽默」總讓人忍俊不禁。

在山樑頂上，可以遠遠地俯瞰長江的支流大寧河。大寧河古稱巫溪，發源於川、陝、鄂交界的大巴山麓，全長二百多公里，由北向南，由巫山縣注入長江。此刻，它靜靜地躺在山谷裡，像一根狹長的暗綠色帶子。兩岸群山逶迤，樹木青翠，世界顯得肅穆而沉寂。老何和他的大黃狗在前面走著，我在後面跟拍著，從鏡頭裡看到的這一幕，彷彿有點像劉燁主演的電影《那山那人那狗》般的意境。

男主人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農民，當我們一個小時後抵達目的地時，他一看是老何，馬上熱情地請我們進房間，從裡屋拿出一個水菸筒。老何接在手裡，仔細地掂量把玩，上下左右地查看了一遍，並掏出手機拍照。這是一個黃銅水菸袋。菸壺一面刻著個拄著拐杖、額頭飽滿的大壽星，一隻鹿和一隻鶴各守在其左右；另一面是一個繁體鏤空「壽」字，周邊飾有龍鳳呈祥的圖案，最上面還鐫刻著四個隸書小字：

祝君长寿

菸袋的側面，裝飾有喜鵲鬧梅的圖案，用行書寫著兩行字：

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

看到這裡，我突然又有一種不好的感覺。因為它和老何收藏的大部分文物很像，品質低劣，做工粗糙，通體散發出工業生產的氣息。尤其祝君长寿這四個簡體字，顯得非常面目可疑。如果說它是清朝的古物，那一定會顛覆我的歷史觀和美學觀。我想起老何家裡的「贗品博物館」，心裡又發出一聲歎息。我趕緊朝他呶了呶嘴，搖了搖頭。老何卻沒有任何反應，不知道是沒領會我的意思，還是不屑於我的態度。

「你說，多少錢嘛？」老何抬起頭來，目光堅毅地直視寶貝主人。看起來他主意已定。

主人卻閃爍其詞，「這可是我老漢傳給我的，小時候我就看他用過，至少是我爺爺那一代傳下來的。」

「這個我知道，你就說多少錢？」老何咄咄逼人。

「一千塊。」主人斬釘截鐵地說。

「哎喲，你別喊那麼高嘛。」老何甩了甩手，急切地說道，「你看我都翻山越嶺過來了，我是真心來買你的，你就說個真心價嘛。」

「這個就是真心價，我根本就沒有說高價。上次有人來我這收購，喊價一千塊我都沒給他，因為我答應了要給你留著，人還是要講誠信嘛。我們都是鄉里鄉親的，不存在騙你，你不信可以去我們鄰居家問問，看我說了半句假話沒有。」主人豪爽地說。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從他口裡說出來的「誠信」不那麼可靠。

「這玩意兒值不了一千，我做這行這麼多年了，這個我很清楚。」老何伸出一個巴掌，「五百，行不行？」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這樁古玩生意最後以六百二十元成交。我在攝像機後面看著老何，覺得他漸漸變得陌生起來。此刻的他儼然一個熟練的生意人，一點都看不出過去挖樁的影子了。他彷彿正脫胎換骨地走在一條新的人生道路上。

從農戶家出來，老何樂不可支地給他開民俗博物館的朋友打電話，報告這起成功的「收購」。在電話裡，老何給對方說的收購價格是一千元。

老何掛完電話，笑眯眯地跟我說，「不瞞你說，小張，我蒐集到的東西，一般會給我這個朋友報高一點價錢，另外他還會支付給我交通費和勞務費，所以我做這行還是划得來的。」我沒有做聲。內心卻有點小小的吃驚。

在返程路上，老何興致很高，拿著菸袋愛不釋手地把玩。「這玩意兒真是個好東西，你看上面的花紋雕得好精緻，真是值了！」老何將菸袋伸到我的眼前。我本來不想破壞老何的興致，也不想打擊到老何的自尊，但我沒忍住，還是說出了剛才的看法。「這件東西看起來不像是清朝的。」我小心翼翼地說。

「哪裡不像嘛？」老何的語氣中暗含著不快。

「我覺得它做工比較粗糙，不像手工做的，何況『祝君长寿』還是四個簡體字。清朝好像不這麼寫。」

老何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他又仔細地端詳了一番菸袋，然後抬起

來頭來直視我。

「小張──這個你就不懂了。我覺得無論做工還是刻畫都蠻精緻的嘛。這絕對是一件老東西，何況那個人跟我鄉里鄉親的，不可能騙我。」他的語氣變得很嚴肅，「我老何做這一行這麼多年，好醜還是能分辨得出的！」

我適時地閉了嘴，沒有再說什麼。我心想，在古玩鑒賞方面，我確實是個外行。但我又忍不住想，如果這樣的東西老何都如獲至寶，要是我帶他去北京的潘家園或者琉璃廠這些古玩市場，他還不知道會激動成什麼樣子呢。

為了緩和尷尬，我提出給老何和他的寶貝拍張照。老何一聽，笑容又重新浮現在臉上。他樂呵呵地叼著那個身份不明的「古典」水菸袋，擺出正在抽菸的樣子，非常優雅地站在山樑上。從鏡頭裡看過去，他好像一位剛從古代走來的地主，悠閒地帶著獵犬，巡視到自家的廣袤領地上，看到豐收在望，他便幸福地抽了口菸……身後是連綿起伏的群山以及山谷裡波瀾不驚的大寧河，不知道幾百年前，它們是不是也是如今這幅模樣？我百感交集地按下了快門。

晚上，我們就睡在他那棟藏品豐富的「私人博物館」裡──現在又新鮮入庫了一件「清代文物」。窗外蟲鳴不斷，蛙聲一片。老何很快就傳來了鼾聲，我卻罕見地失眠了，輾轉反側到很晚才入睡。老何的這條新道路究竟通往何方，我不得而知。

迷失在新的古鎮

第二天，我們告別了老何的父母，重新上路，下一站就是老何經常念叨的「大昌古鎮」。我們包了一艘機船，沿著大寧河一直向前駛去。大概一個小時後，船隻泊進了大昌鎮碼頭。這裡離老何的村莊至少有二、三十里地，和老何所說的「就在那邊」相差實在太遠。當我想起老何多次斬釘截鐵地說起「我就住在大昌古鎮」時，不由地啞然失笑。大昌鎮是一個新規劃的旅遊鎮，老的鎮區早已淹沒在大寧河下。新建的街道寬廣而繁華，人來車往，已和一個小城市沒有什麼區別。街道兩邊的房子整齊而嶄新，白牆青瓦，飛簷拱角，也是新農村建設的標準範式。

「走，我帶你去看看真正的大昌古鎮！」老何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何帶著我，在城鎮裡穿過幾條街道，繞來繞去，然後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突然意識到有點不對勁，這個路口剛才我們已經走過。老何顯然也意識到了這點，他東張西望了一會，仰頭看著街道邊的路牌，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狗日的，老子好像走錯路了，找不到古鎮了。」

「你之前去過古鎮嗎？」

「老鎮以前去過好多次，但搬遷到這裡後就沒進去過了，怎麼就找不到路了呢？」老何有點尷尬。這時候一個少年走過來，老何便截住他。

「大昌古鎮怎麼走？」他像位外地遊客。

少年指了指前方，「那邊，往前走一段就看見了。」

我們順從少年的指引，步行約一百米後，終於看到了這座「夢繞魂牽」的古鎮。它重建於大寧河畔的一片空地上，遠遠看去，青磚黛瓦，雕樑畫棟，翹角飛簷，呈現出明清式樣的古建築群面貌。這座有著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古鎮，是大寧河沿岸第一大鎮，也是三峽地區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它在古代堪稱「咽喉」要地，曾是重要碼頭和商品集散地。但隨著三峽大壩的蓄水，大昌鎮共搬遷移民一點五萬人，二○○四年初古鎮全部拆除，最後被整體搬遷至八公里外的此地，按原樣重建，整個工程耗資三千多萬元。但此時，它被一條溝渠團團圍住，幾個大門口都設有售票處和驗票處──顯然，它已經是一個商業化的景區了。

「日你媽，還要六十塊錢一張的門票！」老何罵了一聲。

我只好掏出錢來買了兩張票，和老何走進了這座象徵他故鄉的古城。看起來，這裡已經和中國各地不斷興起的仿古街沒有什麼不同。原來的古鎮居民幾乎全被遷走，沿街古宅都變成了商舖。時值下午，幾乎沒有什麼遊客。青石板路寬闊而平整，大部分商舖都關了門，只有少數幾家開著，店主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身後的旅遊用品在別的景區也隨處可見。我了無興趣地走了一圈，找到了老何曾說起的那棵百年黃桷樹。它紮根在新建的南城門城牆上，露出豐富的根系、粗壯的枝幹和茂盛的葉片，看起來生機勃勃，但其實也是贗品，枝葉的形態和伸展的方向都經過了人為的規範和修飾，令我覺得索然無味。這些年來，中國頻頻整體拆遷古城，再異地重建，這必然給後世考古帶來新難題：千百年後，如何鑒定出地層下的「大昌古鎮」們是否是複製的贗品，這可比鑒

定老何家的寶貝的真偽難上很多。

某種層面上，這棵黃桷樹就像一株被嚴格禁錮、斷了根基的盆景，是當下中國的一個縮影：在高速發展中不斷變遷，卻切斷了自己與歷史文明之間的聯繫和根基，因而展現出的繁榮未免虛假，讓人生疑。難道不是嗎？包括迷失在自己鎮上的老何，一定也象徵著什麼。

次日，我們從大昌鎮碼頭坐船去巫山縣城。去巫山有兩種船可做：快船和慢船。坐快船只要一個小時，而慢船卻要花上兩倍多時間。在碼頭，我和老何再次起了分歧。

「小張，我們別坐慢船，慢船太慢了，要花兩個多小時，還是坐快船吧。」在我掏出錢包準備買票的時候，老何在旁邊叮囑。

我卻有點猶豫。「老何，我來的時候，坐的就是快船，這次我想換慢船坐坐。」那是老式的木船，有著敞開的船艙和甲板，似乎更適合旅遊和拍攝。尤其在風景不錯的長江支流上，它似乎是個更好的選擇。當然，我傾向於選擇慢船還有另外一層原因：自從我拍攝獨立紀錄片以來，已經好幾年沒有正式工作，而之前的獨立創作幾乎沒有給我帶來什麼收入。為了這次三峽之行，我跟一位朋友借了一筆車馬費，現在，它已經有點捉襟見肘。當然這點考慮我沒有向老何說出。

「哎喲，慢船好難坐哦，坐起來屁股都痛。」老何變得不太高興，皺著眉頭說。看他說話的神態和語氣，你會覺得他是一位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而根本不是一位曾經在樁井裡揮汗如雨的民工。老何說，「我現在一般都不坐慢船。」

「我不怕慢。」說實話，我這個無業遊民更不吝嗇時間成本，多花兩個小時對我來說不算一回事。「我們只要今天下午趕到奉節就行了，不要著急嘛老何。」我安慰著有點情緒的老何。

「哎呀，你真是個怪人，你看快船多好啊。那真是快，快得很，嗖嗖嗖就到了。你一會可不要後悔哦。」老何用語速極快的重慶方言形容著快船的快。我腦海裡突然閃現出「速度之戀」這個詞。看來，在當下中國，患上「速度徵候」的人不在少數，無論是高高在上的馮局長，還是曾經的挖樁民工、現今的古玩販子老何，對速度的迷戀都大同小異。這真不愧是一個「高速中國」。

我不顧老何的反對，買下了兩張慢船票。老何很不情願地跟著我上

了船，氣鼓鼓地一個人坐在船艙裡頭發呆。我卻充滿感慨。聯想起沿途所見的種種，我發現現在的老何，跟那個我在懷化工地上遇見的老何，在某些方面似乎判若兩人了。他身上慢慢流露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特質。其中最嚴重的，應該是他的「忘本」—對「勞動者」的身份充滿了牴觸，似乎想極力抹殺這段歷史。這可是我來之前完全沒有料到的結果。我的心情變得有點沮喪。

幸好，從大昌去往巫山縣城的這段大寧河，峽谷幽深，山勢陡峭，還能看到兩岸石壁上的懸空棧道—也許是因為慢船給了我不同的觀景視角，我覺得這段航行遠勝長江上的航行。而我心中的鬱悶也在逐漸散開。我及時反省自己剛才的情緒，我覺得，也許根本不是老何變了，而是我之前對他的認識多少夾雜著自己的主觀臆想，那本來就只是一個「局部」的老何。何況，他身上還是有許多優點存在，他勤勞，堅韌，熱情，樂觀，開朗……至於所謂的「忘本」，也許是艱難的生存困境所逼迫出來的一種本能反應。或許，換成是我，也會做出無奈告別土地的選擇。總之，這才是人性的複雜和真實。對於影像記錄者而言，原本就不該坐在書齋裡預設答案，更不該給自己的拍攝對象貼上臆想的標籤。無論什麼時候，生活和真相都是最應該敬畏的。

我主動去找老何聊天。他正坐在船艙裡昏昏入睡。對於他來說，外面的風光因為熟視無睹而平淡無奇。

「老何，你們巫山的風光很不錯啊。」我說。

「是嗎？其實那裡面的小三峽更好看。」老何指了指遠處的山谷，立刻精神煥發，「不過這樣的風景我們可是看多了。不像你們北方來的，大驚小怪。」

大驚小怪的人不算少。大型的遊船經過，四、五層高的船舷上站滿了遊客，紛紛拿著相機拍攝兩岸的絕壁風景。「那是從重慶來的豪華遊船。」老何看著雕樑畫棟的遊船，羨慕地說。「他們一般會在大昌古鎮停留一、兩個小時。」

晚飯之前，我們回到奉節。我計劃請老何和他的家人吃頓晚飯。在我離開之前回請一頓，這樣才不至於失禮。

「老何，我們今晚找個大排檔吃點燒烤，喝點酒。」我向老何提議。

「恐怕你的想法做不到。」老何笑了笑說。

「為什麼？」我有點訝異。

「奉節現在正在創建全國衛生城市，已經取締了大排檔，因為燒烤對空氣環境污染很大嘛，」老何給我解釋，「尤其是木炭燒烤，那個煙子太大了。」

我搖了搖頭，這個決策，就像北京的專家建議人們通過減少做飯來減輕霧霾一樣可笑。在環保方面，他們更應該管好工廠的煙囪和汽車的尾氣排放管，而不只是盯著民眾的廚房。然而在中國，評選「衛生城市」或者「文明城市」等類似的官方活動，往往是形式主義和政績工程的舞台，不斷上演弄虛作假的醜聞，早已讓公眾不勝其煩。

「我敢打賭，現在你在奉節絕對找不到一家室外大排檔，更別說木炭燒烤。」老何沒有察覺到我的反應，得意地說，「我覺得這樣很好，薄書記就是整治得好嘛，城市就要有個城市的樣子，要不搞得烏煙瘴氣、亂七八糟的像什麼樣子？」

在對薄熙來的讚美中，我們爬上奉節商業廣場，走進一家室內燒烤店，吃了一頓沒有木炭污染的電燒烤。這可能是我吃過的最「環保」、最「政治正確」的一頓飯了。

第二天，天剛剛濛濛亮，我沒等到老何來送我，自己坐車走了。這趟短暫的巫山和巫溪之旅就這樣結束了。

夏天到了，正是菸葉收穫的季節，也是老姜最為忙累的時候。我想知道老姜怎麼樣了，我撥通了電話，問他今年的的收成怎麼樣。

「哎呀，不好。」電話那頭傳來老姜沮喪的聲音。

「怎麼了？」我的心一沉。

「今年的病蟲害比較厲害，收穫的產量和質量都很差。剛栽下菸苗沒多久，山裡還下過一陣冰雹，砸壞了不少苗子。」老姜歎了口氣，「哎，算起來這一年又白幹了，賺不到幾個錢。」

「不知怎麼搞的，這兩年我的運氣不怎麼好，做什麼都不順利，有點倒霉。」老姜總結說。像大多數普通民眾一樣，老姜將自己的坎坷經歷歸結於自身的命運。在底層遊走的這些年，我不斷地聽到那些倒霉的人跟我抱怨—「我命不好」、「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命中註定的，逃不脫的。」這就是所謂和諧盛世裡，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它的子民們的

命運觀和生存觀。這些屈辱而倒霉的民眾，絕對進不了這個國運亨通的大國光鮮的鏡頭；這個國家到處在修建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可是有太多的人無力踏上這條國家的通衢大道。

在兒子婚禮結束後沒多久，老姜的老婆又走了，重新去了廣東中山。

「我隨她，」老姜在電話裡平淡地說，「我知道這裡已經留不住她了。」

「賣完這點菸葉，我還是打算去外面找點活幹。」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好。電話裡傳來一陣長久的沉默。

我在工地上接到老何的電話。他正在湖北十堰，專程給他的博物館館長朋友送「清朝水菸袋」等文物。「小張，你還是蠻有見識的啊，那個水菸袋果然是個假貨，我的館長朋友和你說的一樣，他最後沒要它。」老何的聲音有點沮喪，「我不甘心，又找了幾個地方做了鑒定，但都說是假的，說頂多值五十塊錢。」

「我要早聽你的話就好了。」雖然這樣的結果早在我預料之中，但我還是擔心老何不能接受它，以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來說，六百多塊錢不是一筆小數字，夠他交一個多月的房租了。

「沒事，我會去找那個老傢伙算賬的，日他媽，鄉里鄉親的，他竟然敢騙我。我回去一定不會放過他！」老何在電話裡恨恨地說。

「老何你還是要多注意一點，做古玩這一行比較複雜，騙子比較多，還是要當心，別再被騙了。」我叮囑老何。但是我知道，在中國，其實做哪一行都差不多，哪怕挖樁這樣的體力行業，也還是照樣存在詐欺風險。也許，這就是「中國式生存」的必然代價。

過了些日子，老何又打來電話。「小張，我已經要回了買水菸袋的六百二十塊錢。」老何這次很開心，「多謝你的關心，這筆損失算挽回了。」

「我帶著我外甥去了那個狗日的家裡，」老何說，「他開始還不願退錢，後來我外甥就動手打了他，他就乖乖地給了。」

「媽個逼的，他這種騙子就該打！敢來騙我！」老何咬牙切齒地說。我親眼目睹的這樁古玩收購，剛開始看起來在遵循著熟人社會的商業傳統，卻出其不意地演變成了商業詐欺，最後竟然以一場暴力事件告

終。這可是我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這樁失敗的古玩收購對老何的打擊好像不小。老何告訴我接下來他將從事一項新的事業—網箱養魚。他將在家門前的孝子河裡，和幾個村裡人合夥進行。「我們那裡水好，養出來的魚一定很肥很鮮。」

「總要找條出路對不對？人要吃飯嘛。」老何的語氣有點無奈，「我馬上過六十歲生日了，住在城裡好是好，但生活壓力大，最近文物生意又不太好做。」

我聽了心生欣慰，老何那樣收羅販賣古玩並非正途，且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但「網箱養魚」到底是一條怎樣的道路？能不能一帆風順？我也並不清楚。唯有希望他扎實地走下去，少些波折，有一份付出就得一分收穫。

「老何，祝你一切順利，夢想成真。」在這通電話的最後，我誠摯地祈福。

「謝謝你的吉言。」老何在電話裡吃吃地笑了。這位馬上要迎來自己六十大壽的老者，聽起來又恢復了他的信心和樂觀，儘管世界如此堅硬，他可不是一個輕易被生活打倒的人。

祝君长寿

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

尾聲

大路朝天
各走一邊

二○一三年六月的最後一天，一列由皮卡車和廂式大卡車組成的車隊停在十四標項目部門前，車廂上滿滿當當地混裝著各種雜物家什——床、桌椅、鋪蓋、鍋碗瓢盆、文件櫃、電腦、空調和保險櫃；還有一輛加長的大卡車，裡面裝著從實驗室裡吊出來的笨頭笨腦的儀器設備。屋子裡已經空空蕩蕩，只狼藉地散落一地廢棄的物什……

顯然，離別的時刻已經到來。幾個施工員和測量員收拾好各自的行囊，將不安地東聞西嗅的黑皮甩在身後，擁擠地坐進卡車駕駛室內，他們皮膚黝黑的臉龐上表情平靜，既看不到興奮，也看不到失落——他們對這樣的搬離早已見怪不怪。隨著一聲略顯低沉的汽笛響起，他們朝站在大門口的房東吳老闆和我禮貌地揮了揮手，車隊朝著背離中夥鋪村的方向慢慢而去。一些規劃中的新道路正在遠方等待著這些職業築路者。如同「中夥鋪」這個古老村落名字所隱含的意義一樣，這裡只是他們漫長職業生涯和人生旅途中的一個小小驛站，為了未來的新行程和新目標，他們揮手告別了在這裡度過的三年多時光。

在攝像機的鏡頭裡，我目睹了他們越駛越遠——實話說，如果僅從別離的場面來看，他們一點都不像號稱訓練有素、戰鬥有方的「路橋部隊」，而更像一支「雄獅馬戲團」那樣遊走四方的草台班子。如果不說，誰也看不出就是經他們之手，一條現代化標準的通衢大道已經在山嶺間大功告成。至此，這條溆懷高速公路的主體工程基本完工，預計在年底可以通車——這次「預計」總算沒有再落空，在半年後，它終於如期通車了。三年裡，有些東西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天前，國務院新聞辦宣佈，截止到六月二十日，全國高速公路總里程數已經達到九點六萬公里，光是二○一二年，就新增高速公路通車里程數一點一萬公里。趕上美國，躍居全球第一已經指日可待。而湖南省仍然是全國高速公路建設的領先者，通車總里程達到近四千公里，省內高速公路網基本

形成。

此外，溆懷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設權和收費經營權，也被出售給一家叫做「現代投資」的公司，出售價十二點二四億元。「現代投資」是湖南省交通系統內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它高調宣稱這是該公司「成功完成一次戰略性收購」，並預計將在二○一六年收回投資成本。

這則刊發在各類財經媒體上的熱門財經訊息，對這條公路的建設者而言，除了意味著「後台老闆」再次發生變化外，並沒有帶來其它任何實質性的不同。他們照樣在工地上揮汗如雨，照樣擔心自己的安危，照樣憂慮著自己的血汗薪酬會不會被再次拖欠和盤扣。「收購」、「轉手」、「戰略」、「股權」、「紅利」……這些炫目的字眼，只是屬於「高富帥」們的財富遊戲。對於出身草根、見識貧乏的「屌絲」們（包括鏡頭後的我）來說，這樣的遊戲模糊而又遙遠。如同那句中國諺語「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所昭示的一樣：在命運的朝天大路上，我們永遠只能各走一邊。

三年裡，在我的鏡頭中，中夥鋪的山巒、河流、田野和村莊的形態也有了巨大改變：一條新生的道路將它們紛紛打碎、切割，然後又將它們和外部的陌生空間緊密勾連、整合。暮色中，留守村莊的老人和孩子們──有時候還有家禽家畜──紛紛穿過門前新修的橋樑或涵洞，回到今非昔比的家園。老人們臉上的皺紋在加深，比三年前我初次遇見他們時更加衰老。

在三年多的拍攝中，我積累了近三百個小時的拍攝素材，但這肯定只是我見證和親歷的一小部分。時光一直轉瞬即逝，世界永遠紛繁複雜，遠非一台攝像機就可以窮盡；更別說那些遠在攝像機之外的世界。

當「發展」成為這個時代的永恆主題，那是一條更漫長、更寬廣、更有力的道路。沒有人能置身其外：外來者與本地人，城裡人與鄉下人，勞心者與勞力者，富貴者和貧寒者，權勢者和無權者，既得利益者和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他們雖然彼此對立，各走一邊，卻不得不共同向前。沒有人能和這條大路背道而馳，逃脫它制定的軌跡、方向和速度。滾滾向前的，是永不停息的時光和宿命。

我的拍攝對象呢？他們的人生之路也在繼續延伸拓展。二○一二年上半年，我接到了老何打來的電話，他人不在奉節，而是在浙江海寧──那

裡屬於嘉興市，離黨誕生的那艘南湖紅船很近，他和「新老婆」分別在一家彈絲廠和電器廠幹活。這個新工作，是仰賴他「新老婆」在海寧的三峽移民親戚介紹的。他歡迎我有空時去海寧玩，在電話裡，他的語調有點低沉，遠不及他以前歡迎我去大昌古鎮和小三峽玩時那麼充滿激情和自豪。

二○一二年七月份的一天，我暫停在工地的拍攝，坐上了從懷化去往海寧的火車。在海寧火車站，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穿過大片哄亂的城市和廣袤的田野，來到一個叫「三建村」的小村莊。那個家庭作坊般的彈絲廠就位於村莊的路口，廠房上刷著醒目的標語「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老何就在標語下等著我。一年多不見，他看起來憔悴和衰老了不少，不復有奉節時的精神抖擻。他帶我參觀了他的工作環境，一間亂糟糟的大廠房，裡面機器轟鳴，氣味濃重，而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捆捆已經卷好的彈絲裝進白色的大編織袋，再用針線縫好，靠牆根碼成整齊的一堆，等待貨車拉走。簡單而枯燥。整個廠房就像一個大蒸籠，我只在裡面待了一小會，全身衣服就被汗水濡濕。而在這樣的環境中，老何一天要工作將近十二個小時——他早上七點上班，晚上七點下班，中間有半小時的午飯時間，沒有其它休息。一個月也僅休息一天。老何的月工資只有一千八百塊。

因為我的到來，老何請了半天假。他帶著我步行穿越酷暑炎炎的田野，來到離廠房幾公里外的新「家」。他的「新老婆」還在電器廠上班沒有回來，所謂的「家」是一間從當地農民家租住的小平房。擺放著一張木床，床頭放著兩張木桌和幾把低矮的小竹椅。其中一張桌子上放著電磁爐和鐵鍋，以及其它一些零散的廚具。顯然這裡既是老何的臥室，也是他的廚房。

就在這個每月租金七十元的「家」裡，老何坐在床沿上，向我零零碎碎地講述了他這一年多來的遭遇：他的古玩收購頻頻不順，他的網箱養魚夢想無疾而終；他的家庭也遭遇了變故：年輕的女婿突然得病去世，女兒悲憤欲絕；他和「新老婆」遭到了雙方家人的激烈反對，最後兩人只得一塊「私奔」出來；他的新工作待遇很差，他的新老闆也不近人情的苛刻；而他位於大寧河支流旁的巫山老家，因為受三峽大壩最高水位蓄水的影響，在最近面臨搬遷，屆時他們將成為新移民，移往涪陵——即美國作家何偉生活過兩年的「消失的江城」……

我抱著攝像機坐在他對面的小竹椅上聽著，一邊心潮起伏，一邊汗如雨下。我想，這不完全是因為酷暑炎熱，天氣預報說，當天是今年海寧入夏以來最炎熱的一天。二○一二年的七月五日，距我在中夥鋪村的田野上第一次遇見老何整整兩年了，那一天恰好也是七月五日。這種巧合，讓我相信人生是命運安排好的另一條道路。



老姜在菸草種植失敗之後，和兒子們一塊離開了家鄉，去了廈門的建築工地打零工，薪資微薄。再後來，他告別了兒子們，和老鄉來到了河南南陽的一家石材廠加工大理石。幾個月後，二○一二年十月，不幸的消息再次傳來，他的右手食指被切割石頭的機器切掉了一截。在醫院裡，他語氣低沉、非常沮喪地給我打來電話，讓我想起他在懷化535醫院裡惶恐而無助的表情。

兩年後，冷酷的命運之神再次安排了相同的情節和場景。他按我的建議將賠償訴求申訴到了當地勞動局，後來，在臨時僱請的律師的介入下，獲得了兩萬多元的賠償。他拿到賠償款離開了河南，想回到老家修養一陣。他的手指已經不能再使力了。他的未來究竟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除了命運之神，我們均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命運多麼艱難多舛，生活還得繼續。



那些在「十月九日事件」中受傷的民工們也在繼續著自己的生活。禹西湖、王又發回到了老家繼續務農，從此對外出打工心有餘悸；胡克元用賠償得款做起了小生意；吳磊明、曾江源等人卻繼續在外面打工。

那位受傷最重的張光求，我之前一直都沒有再見到他，有人說他的傷口還沒痊癒，仍然在家裡養傷。我於是有了見他一面的想法。二○一二年十一月份，我乘坐火車和汽車，輾轉幾百公里，趕到了他的老家，卻意外地撲了個空。他的家人說，張光求和老婆在幾十公里外的縣城工地上幹活。我很驚訝他遭此重傷後還能幹活，但在電話裡，張對我的突然登門充滿顧慮，不願意再談起「十月九日事件」，也不願我去見他。

我最後只得放棄了。生活還得繼續，他不願一直帶著這些傷痕和陰影朝前。我想像著他帶著被刻意掩藏的舊傷疤在新工地上勞動的場景，心中再次充滿感慨。



比起老何、老姜和其他的民工們，「共和國的同齡人」、「援越抗美」老兵老曾後來的生活軌跡要平穩不少。從漵懷高速工地撤出後，他原本想再去廣西的建設工地，但家裡人反對。他只得順從，正式開始了安逸卻未免枯燥的退休生活。在電話裡，我聽到了被攪動的麻將聲，以及七嘴八舌的噪雜人聲。老曾爽朗地告訴我，他幾乎每天都要和鄰居打打牌。當我問起他去越南的計畫時，他的語氣明顯黯淡了不少，「暫時還沒有機會，希望趁著還能走的時候實現這個夢想吧。」我在一片噪雜的麻將聲中，聽到了老曾的這個「夢想」，我不知道，這個卑微的夢想算不算最近在媒體上喧囂一時的「中國夢」？



協調經理孟至強的夢想是早日從那條是非不斷的道路上徹底退休，去韓國見最心愛的女兒，從而最終成為一位「專職星爸」。在二〇一三年年初，在蛇年春節來臨前，他和妻子一起去了韓國，一家三口共同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春節。和妻子女兒並肩走在異國街頭時，因為道路上的那些煩心事而引起的不愉快，早已煙消雲散。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寧靜時光異常短暫。在漵懷高速公路修建完之後，孟總又奔赴至四百公里外湖南的另一個偏僻山村。那是另外一條新規劃的高速公路—湖南婁衡（婁底到衡陽）高速公路的現場。項目經理還是佘總，他盛情邀請老搭檔孟總再次出馬。他依然是高速公路上的一名負責「滅火」和「維穩」的副總經理。「沒辦法啊，我真不想幹了，但現在他們找不到合適的做協調的人，你在工地上待了這麼久，應該知道沒有協調，一條道路根本就修不起來。」孟總仍將面對這條新建道路帶來的矛盾和糾紛，就像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仍將繼續面對這個躁動不安的國家。

□□

安保部部長楊保國去了附近的另一個工地，還是負責安全環保工作，也還是一個沒有任何部下的「光桿司令」。他現在的工作比在中夥鋪時更累，每天上工地不少於四小時。他也繼續求神拜佛，目前運氣不錯，所以工地上一直平安無事。

讓楊部長最失落的，是他和中夥鋪衛生所的小女友分手了。這是一段持續了將近四年的感情，他很愛她，期待和她結婚，但──「她說如果我要娶她，必須要我在懷化市區買一套房子，還要給她父母十萬塊錢，另外辦婚禮也要十萬塊。」楊部長給我詳細地算著帳，「你算算，現在在懷化市區買間房子，一百二十平米的話，就算最低三千塊一平米也要三十六萬，然後搞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裝修，以及購買家具家電，怎麼著也要十萬。這就是四十六萬，這樣總共就要六十六萬。」

這筆錢對於楊部長來說並非小數字。他與前妻生下的孩子今年十九歲，剛上大學，每年數額不菲的學費和生活費都得他供養。「我現在一個月工資只有五千塊錢，到哪裡去找到這麼多錢？除非老天有眼，保佑我的雙色球中了大獎。」

他一直有買彩票的習慣，之前在中夥鋪時辦公桌上便放著一隻碩大的金蟾蜍，這是傳說中能招財進寶的神獸。楊部長每天都要摸摸它的頭，幻想著自己發大財的一天。

□□

給佘總開車的司機王榮面臨著再次「下崗」，他回到了婁底的老家，重新和分開已久的老婆孩子住在一起。這幾年的努力工作和省吃儉用，他欠下的債務至今已基本還清，但困惑也隨之而來：下一步到底何去何從？王司機考慮去做滷豬腳生意。他的廚藝不錯，尤其無師自通地擁有一手滷製豬腳的好手藝。「只要有人要，我就去送貨，我有信心靠這個來養活我的家庭。」王司機顯得很樂觀。但他面臨著一個誘惑和選擇。他遠在湖北的一個親戚正拉他去那裡做一樁大生意，「他說他弄到了一塊七十畝的土地，打算邀我去共同融資來開發房地產，整個融資會高達數億元。」中國的房地產生意正如火如荼，一旦成功，自己就會發

上一筆以前不可想像的大財。「可是，我並不能肯定這靠不靠譜。」他矛盾地說。到底是做豬腳生意，還是做房地產生意？這既是王榮面臨的問題，也是這個時代面臨的問題。



唐老師也有著自己的夢想和問題。留雲寺的新建已經了卻了他的一樁心願──雖然有鄰近的商人找上門來要承包留雲寺，「你看現在的寺廟都可以承包用來斂財，多麼可笑。」被他拒絕了。他現在煩惱的是如何建一個新農貿市場。發生在省道上的車禍，讓他意識到這個省道旁的農貿市場是一個交通安全隱患，他提出，在龍門溪旁邊的高地上建一個新的市場。

政府並沒有回應他的呼籲，行動主義者的他說到做到，拿出主持建設新留雲寺的魄力，召集到了村裡的二十多戶人家參加了這一項目，很快，新市場就動土開工了。但理想主義的唐老師顯然低估了這一個項目所蘊含的利益糾葛，包括鄭支書在內的村幹部非常不滿唐的做法，在審批手續上極其不配合，後來國土局還以手續不全為名開出高額罰單。此外，少數村民被策反，工程被迫停了下來。唐老師一時憤憤不平，焦頭爛額。

緊接著，中夥鋪村又發生了一起重大車禍。一輛駛往懷化的巴士途經中夥鋪村時突然剎車失靈，衝上旁邊的高坎，造成九人死亡、數人受傷的特大慘劇。唐老師對此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強烈要求另外選址修建集市，從而避免以路為市，避免慘禍陸續發生。這些血淋淋的慘痛教訓，應該引起相關部門警醒，不然同樣的悲劇還會不斷上演。」可是，他除了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絮絮叨叨地抱怨，並沒有實際的效用。省道上還是車來車往，川流不息。它們不光奪走人的生命，也沒放過那些可愛的小動物，在項目部撤出中夥鋪村後沒多久，留在房東家的黑皮也被省道上的大卡車軋死，落得和牠的孩子們一樣的命運。對於一個發展的時代來說，犧牲幾條卑微的生命並不是件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搬進新家的歐婆婆在二○一二年冬天遭遇了一場突來的大病，從此幾乎只能臥病在床。我去看她的時候，她瘦得皮包骨，孤獨地斜躺在床上，用微弱的聲音向我抱怨著新居離菜地和水渠很遠，遠不如老房子住著方便和習慣。在老人們加速老去的同時，孩子們卻開始迅疾地成長——在歐婆婆的病榻旁，我吃驚地發現她的孫子，歐安鐵的兒子，已由三年前的不起眼的小屁孩變成了一位英俊時髦的少年。他穿著新潮款式的夾克和牛仔褲，留著飄逸的髮型，告訴我他剛剛從初中輟學，馬上就要跟隨爸爸去杭州打工了。

「我在等我的身份證辦下來，拿到身份證馬上就走。」他用正處在變聲期的嗓音說。但仔細看他，還是一臉稚嫩。

「你現在這個年齡有工廠要你嗎？」我問。

「嘿嘿，這個不用擔心，我申辦身份證時改了年齡，加了四歲，沒辦法，不到十八歲不會有工廠要你的。」他雖然滿臉稚嫩，但語氣都略顯成熟，完全看不出他只是個十四歲的未成年少年。

我不再追問他什麼。天色完全暗了下來，歐婆婆和她的兒子、孫子坐在黯淡的電燈下，沉默不語。

在三年多的拍攝中，我的家鄉也遭受著和中夥鋪村一樣的命運。二○一○年冬天的時候，我正在工地上拍攝，接到了母親從老家打來的電話，她告知我正在修建中的滬昆（上海—昆明）高鐵要經過老家的山地，爺爺奶奶留下來的一塊紅薯地將被徵收。賠償母親一千兩百塊錢。

掛完電話後，我腦海中不可抑止地浮現出那塊紅薯地的空間形貌。它位於一座叫「黃岩山」的半山腰，是一塊坡度略為陡峭的狹長山地，深褐色的泥土中偶露出嶙峋的石頭。至於是什麼年代，我頑強生存的祖先們在石頭縫裡艱難地開墾出這塊紅薯地，已無據可考。我只記起童年時，爺爺奶奶均還健在的時候，我經常跟著他們去這塊地裡勞作，春天時栽下紅薯或土豆，冬天時種下油菜或蘿蔔，偶而種植麥子和豌豆。隨著時節的更替，種植和收割都是在那塊斜坡上有條不紊地進行。

我腦海中至今記憶深刻猶在昨日的一個場景，是一個陰沉的春日午後，爺爺奶奶帶著我來到那塊坡地上栽種紅薯苗。年幼的我只能給大人們打打幫手，在田壟裡擺放一捆捆紅薯苗……正在我們埋頭勞作的時候，黑壓壓的陰雲突然堆積在山頂，彷彿伸起腰來便觸手可及。沒一會

便電閃雷鳴，暴雨突至，豆大的雨點從烏雲上刷刷地掉下來，打在泥土地裡，泛起一陣剛翻墾的新鮮泥土獨有的泥腥味。雨點也打在人的身上砰砰作響，且隱隱作痛。因為就著雨水栽下的紅薯苗更容易存活，爺爺奶奶非但不懊惱這場突然而至的暴雨，反而非常高興。他們拿出事先攜帶好的雨衣和斗笠給我披戴好，讓我趕緊去山腳下的人家裡躲雨，而他們披著白色塑膠薄膜裁成的簡易雨衣，繼續彎腰勞作。我在一片迷濛的雨霧中踉踉蹌蹌走下山來，回首來路，只見斜坡上一片雲蒸霧罩，遠遠地看去，爺爺和奶奶像掛在斜坡上的兩隻白色發亮的螞蟻，在雨幕中不斷地蠕動──至今我一想起這個場景便會雙眼潮濕。

後來，爺爺奶奶相繼過世，葬在距黃岩山不遠的另一塊自留地上。沒想到短短的一、二十年後，他們勞作和長眠的寧靜山地上，就會迎來一具他們從未見過的鋼鐵怪物，風馳電掣，日行萬里。更讓我感慨的是，當我著力在他鄉記錄一條道路的形成時，我自己的故鄉也迎來了一條更先進更聲名大噪的道路。

二○一二年歲末，我收到了獨立導演高子鵬發來的一條彩信，照片上是一塊巨大的T型看板，上面赫然寫著幾行氣勢磅礴的排比句：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他經過湖南邵陽火車站時，看到了這塊宣傳牌，他知道邵陽是我的家鄉，於是第一時間發來拍下的照片給我「鑒賞」。面對來自故鄉的訊息，我再次啞口無言。當「發展」當仁不讓地成為這個時代的第一主旋律，當整個國家沉迷於「速度之戀」時，你還能說出什麼呢？在這種畸形的發展下，一邊是經濟進步科技發達，一邊是環境倒退道德淪喪；一邊是器物和技術的現代化，一邊是文明和制度的叢林亂象。我的故鄉也不能倖免。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唐代詩人王維的這首《雜詩》，質樸而浪漫地模擬了一位他鄉遇故人的口吻，表達了遊子的懷鄉之情。我所在的時代已和王維的時代截然

不同，我所遇到的來自故鄉的故人，只會不斷給我帶來荒誕而慘烈的現實。無需再詢問，唐詩中的故鄉已經不復存在，那株美麗高潔的梅花也一定枯萎了。即便它能活到現在，只怕也逃不脫和歐婆婆的菜園一樣的命運，被工程爆破引起的飛石砸得花葉凋零。

而我這樣的游離於體制外的勞什子獨立導演，平時胸無大志，遊手好閒，窮困潦倒，自己不加快發展、不投身到「祖國的發展浪潮」中倒罷了，還要時不時藉助攝像機嘲諷和批評一下國家的發展主旋律。如此倒行逆施、螳臂擋車，完全配得上我的故鄉製造出來的三頂罪名。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我這個「千古罪人」、「不孝子孫」和「混世魔王」，註定只能走和他們不同的那一邊。

二○一二年四月–二○一三年六月初稿於湖南中夥鋪村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一四年七月修訂於北京芙蓉園

後記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湖南省溆懷高速公路通車儀式就在公路的入口處進行。與四年前場面盛大、程序繁冗的開工儀式截然不同，這場儀式異常低調而簡樸—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接連打擊「老虎」和「蒼蠅」，飛揚跋扈的官僚們變得前所未有的收斂和謹慎。現場既沒有鮮花和剪綵，也沒有鑼鼓和鞭炮，更沒有嘉賓雲集的主席台和載歌載舞的工人方隊，只見一排不辨職務的官僚安靜地站著，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宣佈：湖南省溆懷高速公路正式通車！他的發言像電報一樣簡短，整個儀式進行不到兩分鐘，我剛打開攝像機，它就結束了。

我坐著朋友的車進入到高速公路上，這條嶄新而寬敞的道路空空蕩蕩，只有稀疏的幾輛車行駛。兩側的群山和村鎮平淡無奇，好像和四年前我剛來這裡時沒有什麼不同。在我的非虛構寫作和紀錄片拍攝中，這條道路象徵了國家的發展之路，但如果你只是等到它修成之後，在上面走馬觀花一番，愜意地享受著它的成果—「速度之戀」結下的「愛情之果」，而沒有打算停下來用心地觀察和聆聽，那麼，你不會知道一條路的前世今生，更不會體會和它相關聯的那些卑微人生和悲喜故事。你看到的一切景致都會相當正常，甚至光鮮無比，就像「新聞聯播」。

但我並不打算刻意去揭示什麼，我只管說出自己在這個時代的真實所見和感受。這既是一次兩種載體（影像和文字）的個人寫作，也是一次個人視角的田野調查。四年來，我盡力讓自己站在事件的現場，盡力讓自己匍匐得更低，從而去記錄下那些很有可能迅速消失在歷史中的景象和聲音。我希望這本小書，是一部紙上的紀錄片。

早在我的大學時代，我是一位詩歌寫作者、標準的文藝青年，我希望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書是詩集。但沒想到十多年後，我的第一本書終於出來了，它卻是本非虛構寫作，而且寫的是一條橫過荒郊野嶺的道路。也許再沒有什麼比這更不詩意的了。不過，至此，我早已放棄了少年時幻想的所謂詩意和浪漫，更願意直面生活的粗糲和厚重，我能坦然接受命運出其不意的安排—就像我歪打正著走上獨立紀錄片之路。於我，影像還是文字，劇情片還是紀錄片，詩歌還是非虛構，都只是我表達的載

體，都是我自由意志的表現。

和我的紀錄片創作一樣，這本書的誕生也有賴於很多人的幫助。我首先要感謝八旗文化的總編李延賀先生，儘管我們至今從未謀面，但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撥冗閱讀了我的全部書稿，並在涉及書名、結構到文辭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細緻的修改。他的專業素養和工作態度讓我由衷欽佩。更重要的，是他讓我這個寫作新人獲得了非虛構寫作的觀念和經驗。在與他的郵件反復交流中我受益匪淺，也由此知道了一本書的誕生是作者和編者合力的結果；另外，他還一再鼓勵和謬讚我，給予我這個沒有規劃和抱負的散漫之人以繼續寫作的信心。對此我心懷感激和感動。還有，我也要感謝徐明瀚先生，是他將我的書稿熱心推薦給八旗文化，從而讓我的處女著作有機會在這家為我所敬佩的出版社出版，並有幸認識了如此優秀的出版人。

我還要感謝我的好友斌和，是他讓我獲得了一個進入這條道路的機會，並慷慨分享了他作為一位資深築路者的經歷、視野和思考。沒有他就沒有這本書，也就沒有同題的紀錄片。而且，這還不是他第一次幫助我，我的所有的紀錄片創作幾乎都從他那得到過切實的幫助。我的另外幾位摯友也是我在逆境中繼續走下去的動力：驚濤、昭霞，胖胖，玉廣，還有川子、仲良、才德、華仔、陳煒、志清、樂武，樂夫、宗波……他們的慷慨和無私讓我銘記不忘。

我還有幸得到紐約大學的張真老師的幫助，她是一位為我所尊重的電影學者，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處境心懷寬厚的愛心和體恤，我有幸與她相識，從而得以讓她成為了我的聯合製片人。這既是一種切實幫助，也是一種精神動力。我也要感謝朱日坤先生，他對我的鼓勵和幫助從我的第一部片子《天降》起就延續至今，一直以來，我不只是視他為同行和朋友，更為同道中人。我還要感謝我的製片人梁為超先生，及李姍姍小姐，還有好友李莉小姐，Gertjan Zuihof 先生及CNEX與栗憲庭電影基金會的諸多師友，他們在《大路朝天》的製作中給過我太多的幫助。如果說我是鐵匠鋪裡的小鐵匠，他們就是讓爐火燃得更旺的人。

我更要感謝出現在此書中的所有人：築路者和本地人──尤其是老何和老姜，唐老師和王榮，及婁底路橋的領導和職工們，我有幸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和他們成為同事和朋友。這既是一種緣分，也是一段記憶。

一直以來，我對自己的家人虧欠得最多，感謝他們長期容忍我的固執、自我、懶散、乖張和清貧。沒有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我不可能在這

條自己喜歡並認為有價值的道路上走到如今。

二○一四年八月於長沙

THE ROAD

「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作者　張贊波

總編輯　富察

編輯　穆通安　許奕辰

企畫　蔡慧華

設計　許晉維

排版　宸遠彩藝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八旗文化

出版/發行　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065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電子郵件　gusa0601@gmail.com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出版日期　2014年9月初版一刷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